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中国古代语言学史

何九盈 著







H1-09
H188

中国古代语言学史

何九盈/著



广东教育出版社

粤新登字 03 号

中国古代语言学史

何九盈　著

*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肇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肇庆市郊狮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5 印张 347,000 字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400 册
ISBN 7—5406—3400—6/H · 37
定价　16.00 元

序

“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章学诚这话颇有几分道理。它说明历史著作很难写，也说明社会对史学家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学术史当然不能与社会史相提并论，但要把学术史写好，并非易事；要把中国语言学史写好，尤非易事。

中国最早的、独具规模的学术史专著是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五四”以后，单科学术史如雨后春笋，应时而生，惟独语言学没有系统的、完整的发展史问世。直到王力先生的《中国语言学史》出版，才算填补了这个空白。王著有导夫先路之功，是这种研究工作的开始，而不是这种研究工作的终结。所以有步后尘之作。我写的《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就属于这种性质的著作。

“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写然后知难。青年时代，我听过王先生讲《中国语言学史》，“知不足”矣；壮年时代，我教过几遍《中国语言学史》，“知困”矣；后来，写了《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知个中之难矣。

“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知难而进也。自反而思．一部语言学史，要范围千古，牢笼百家，戛戛乎其难哉！

F1-136/1360

第一难通古人之书。以钱大昕之博学多才，犹感叹“史之难读久矣！”而况古代的语言文字学著作，多系专门绝学。啃一部著作比啃一个苦涩的干果还苦涩。义例纷纠，概念混乱。转注假借，如何定义？内转外转，怎么区分？“其间轻重清浊，犹未可晓；加以内言外言急言徐言读若之类，益使人疑。”至于《尔雅》产生于哪代，《韵镜》产生于哪朝，三十六字母何人所作，《中州》与《中原》是什么关系，聚说纷纭，莫衷一是。

第二难通古今之变。荀子说：“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王充说：“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研究学术发展史，宜贯通古今，其理至确，不用多说。所难者在于明变。“变”就是发展规律。不明变，其蔽也有二：一是拔高古人；二是苛求古人。拔高古人的结果，就认为《切韵》音系是洛阳音，是长安音，是活音系；苛求古人的结果，就大骂许慎不通，痛斥“明朝人的胡闹”，乃至于中国古代根本无语言学可言。王国维的方法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他主张“不屈旧以从新，亦不屈新以从旧，然后能得古人之实。”我们现在所说的语言学，其理论框架实际上是以“外来之观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这当然是一个进步。值得我们警惕的，就是“屈旧从新”、“屈新从旧”这两种偏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时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章学诚说：“岂可以秦汉之衣冠绘明人之图像耶？”以西洋之衣冠绘中国古人之图像就更是不可以的了。

第三难于别裁识断。学术史不是谱牒，也不是流水帐，更不能依样画葫芦。何九盈写的语言学史就应该体现何九盈的别裁识断。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取人之所长，补己之所短。这都

是理所当然的。如果硬要用普罗克鲁斯特床来衡量，那就是另一种性质的短长了。但别裁难免入主出奴，囿于成说；识断难免自以为是，轻议古人。所谓“公论久而自定”，往往也只有相对的意义，“公论”之中就不乏传统偏见和常识性的错误。《四库总目提要》是钦定的“公论”，它对历代小学著作的评价，不公之处甚多。至于钱大昕斥责的“空疏措大，辄以褒贬自任，强作聪明，妄生疻痏……陈义甚高，居心过刻”，这样的别裁识断更当引以为戒。

《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完稿于1983年，出版于1985年。七八年来，本学科出现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个人对某些问题也有新的看法。再看原书，取舍不当，见解不精，往往而有。这次增订，采纳了某些新的结论，补充了不少材料。第一章增加了一节《先秦时代的文字研究》。其他章节，大框架未变，具体内容多有补充、修改。限于精力，加之学问没有多少长进，无力另起炉灶，结构新篇。书中某些具体作品的评价，犹未敢视为定论。

本书1985年问世后，曾受到海内外同行及学人的关注与肯定，并发表过评介文字。言多溢美，其实难副。但我十分感谢他们的鼓励与支持。我与他们，素昧平生，盖因学术乃社会之公器，他们原本没想到什么“感谢”的。而且著作一经发表，褒贬随之而来。褒，固然可喜；贬，亦不足忧。“况乎萤光自照，蚁封自高，得其所得，聊为怡悦，讵谓与斯世竞短长哉！”王筠这种态度，是否也有几分哲理在其中呢?!

现如今，出书难，出语言学的书尤难。盖此类著作实在是与孔方兄缘分太薄。广东教育出版社的同志却另有不同时俗的考虑，他们愿出《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的增订版，并愿意出版我的

《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增订完毕后，意犹未尽，就写了上面这些话作为序言。

何九盈　1992年元月

北京西郊中关园

前　　言

语言学是人类社会一门很古老的学科。我们中国人自觉地对语言进行研究，起码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我国古代没有语言学（linguistics）这个名称，只有所谓“小学”。“小学”的内容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广义语言学大致上相当。

古人为什么要把语言文字之学称之为“小学”呢？这也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小学”原本是指八岁至十四岁的幼童读书的学校。《大戴礼记·保傅》：“及太子少长，知妃色，则入于小学。小者所学之宫也。”卢辩注：“古者太子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太学也。”汉崔寔《四民月令》说：“农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太学，学五经；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篇章”是指《苍颉篇》之类的识字课本。因《苍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①。”故以“篇章”指代这类字书。

在《汉书·艺文志》中，“小学”这个概念产生了新的意义，已由“学校”引申出“学科”的意思。《艺文志》说：“凡小学十家，三十五篇。”“小学”已成为一“家”之言，其内容全都是蒙童识字课本②。《尔雅》、《小尔雅》这些书不算在“小学”家之类，其理由就是后来《隋书·经籍志》说的，“《尔雅》诸书，解古今之意”，故附经籍之后。可见，汉代所

说的“小学”实际上只限于文字学，它的具体内容包括解释文字的形体结构（六书，六体）、“通知古今文字”，以及“正读”字音等[3]。

在《隋书·经籍志》中，“小学”这个概念又进一步扩大。其内容除字书之外，还包括训诂(如《说文》、《字林》等)[4]、音韵等方面的著作，而《尔雅》、《小尔雅》、《方言》、《释名》等仍列入“经义”一类，不入“小学”之林。直到《旧唐书·经籍志》，才把《尔雅》等书列进“小学”一类，从此，“小学”的基本内容才确立下来。只不过在宋代，又有人把“小学”称之为“文字之学”。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说：

> 文字之学凡有三：其一体制，谓点画有衡纵曲直之殊；其二训诂，谓称谓有古今雅俗之异；其三音韵，谓呼吸有清浊高下之不同。论体制之书，《说文》之类是也；论训诂之书，《尔雅》、《方言》之类是也；论音韵之书，沈约《四声谱》及西域反切之学是也。三者虽各一家，其实皆小学之类。

晁公武把“小学”称之为“文字之学”，这说明古代的“小学”家并不把语言看做是自己研究的对象，即使在事实上研究的是语言问题，他们也是从文字的角度来看待这种研究的。晁公武所说的三个方面的内容，就是指的字形（体制）、字义（训诂）、字音（音韵），即通常所说的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

由于古人认为“小学”就是“文字之学”，而且总是把“小学类”放在“经部”之中，因此，后人就产生了两种不正确的看法：

一、19世纪以前，中国还没有语言学；

二、“小学”是“经学”的附庸。古代的语言学不能算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第一种看法是受西方的影响产生的，第二种看法是古已有之。这两种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全对。

关于中国古代有无语言学，这里有个标准问题。我们不应拿现代语言学的标准去衡量古代语言学，更不应该拿西方语言学的标准来硬套。我们应该从事实本身出发。我们的古人在东汉末年就已经能用二分法分析汉语的音节，从魏晋以后，就能很好地对汉语的声、韵、调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反映汉语实际语音系统的韵书（如六朝韵书以及《中原音韵》等），宋元时代又产生了声韵调相配合的等韵图，明清时代还产生了历史语音学，有的人已明确认识到：“今音不同唐音”，“唐音不同古音”，“音韵之不同必论其世。约而言之，唐虞夏商周秦汉初为一时，汉武帝后洎汉末为一时，魏晋宋齐梁陈隋为一时⑤。”汉语音韵学的发展，从总的趋势来说，是和汉语语音的实际发展情况相符合的。在词汇研究方面，公元一世纪就产生了《方言》，二世纪末又产生了《释名》，这些著作基本上是以当时的口头词汇作为研究对象的。可见，我们的古人无论是对汉语语音的研究，还是对汉语词汇的研究，都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属于语言学性质的。就是在今天，我们仍然把这种性质的研究划在语言学的范围之内。

古代语言学是否算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呢？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应当确立这样一些原则：当我们衡量一门学科是否具有独立的资格时，首先要看它有无独特的研究对象，其次要看它有无独特的研究方法，其次要看它有无独特的科学体系，其次要看它有

无独特的研究成果。用这些原则来衡量一下，我们可以说，从汉代开始，语言学已经算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了。《方言》、《说文》、《释名》这三大名著的产生，就是语言学独立成为一门学科的标志。我们说扬雄、许慎、刘熙是语言学家，大概多数人是会赞同的吧。汉以后，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人从事语言学的研究工作，也可以说得上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像李登、张揖、沈约、颜之推、陆法言、陆德明、颜师古、徐铉、徐锴、吴棫、韩道昭、周德清、陈第、方以智、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江有诰、陈澧、俞越、孙诒让等人，都是重要的语言学家。他们在汉语、汉字研究方面，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创造了一套完整的研究方法，形成了优良的传统。当然，他们在观点上、方法上，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在本书的有关章节中将会具体论述。另外，我们也应看到，古代的语言文字学和经学的关系的确非常密切，但古代哲学与经学的关系不是更为密切吗？就是史学、文学与经学的关系在先秦时代也不是那么分明的。《诗经》是道道地地的“经”，但它是不折不扣的文学作品，《书经》是道道地地的“经”，但又是不折不扣的历史著作。如果我们还跟古人一样，只在“经学”这个概念中兜圈子，不唯看不到语言学的独立存在，就连文史哲的独立存在也成问题了。就语言学的三个部门而言，也不可一概而论。训诂学与经学的关系最为密切，文字学次之，音韵学的研究成果可以用于“经学”，但音韵学的产生和发展跟经学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如《切韵》系韵书和《中原音韵》系韵书的存在，难道不是独立的吗，能说这些著作都是经学的附庸吗！

有的人之所以不承认中国古代有语言学，不承认语言学的独

立存在，一方面是受了“洋教条”或“土教条”的束缚；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方面，是对中国古代语言学没有作深入的研究。所以，我们要加强对语言学史的研究工作，要造就一批既懂得辩证法、唯物主义，又能贯通古今的语言学史工作者，要写出多种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中国古代语言学史》来。围绕着这个任务，我们有下面一些工作要做：

用先进的理论作指导，对中国古代一些语言学名著重新进行整理；

要把古代语言学著作的系统、流派清理出来，从理论上建立起历史的联系，弄清中国语言学史的一些基本规律；

要开展断代语言学史的研究，如“明代语言学史”、“清代语言学史”这样的题目，还从来没有人做过，做好这些题目，有利于对整个中国古代语言学史进行深透的研究；

对古代语言学著作中的一些常见的名词术语要进行一番彻底的研究，基本名词术语搞不清，我们就难以对古人的学术成果作出准确的评价；

要写好古代语言学家的评传。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要等这些工作全都做好了之后，才能动手去写一部《中国语言学史》。而是认为：这些工作是究究中国语言学史的人应当做的。有一定数量的人来从事这种研究工作，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水平才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

有人问：研究中国语言学史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在这里，我谈点不成熟的意见：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每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应尊重自己的文化传统，继承并发扬自己优秀的文化传

统。语言学史是整个文化史的一个部分，不仅研究汉语的人应了解汉语研究的历史，就是研究哲学史、文学艺术史的人，也应该对汉语研究的历史有一个起码的了解。

传统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学虽然观点、方法都很不一样，但历史的经验还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至少也应该把它放在跟介绍外来经验一样的位置上来对待。拿汉语史的研究来说，在很多方面就要利用古代语言学的成果，如果撇开这些成果，我们对汉语史的研究就会碰到很大的困难。

研究语言学史还要解决一个分期的问题。本师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中将整个中国语言学史划分为两个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汉代到清代末年；第二阶段是从1899年到1949年。台湾省有位语言学家认为第二阶段（西学东渐的时期）的上限应提到明末。我个人认为这个意见不可取。明末到清代，某些西洋传教士和外交家，虽然也写了一些研究汉语的著作，中国的某些语言学家也接受了一些西方语言学的影响，但这并非主流，不应作为分期的根据。王力先生以《马氏文通》（1898年）作为两大阶段的分水岭是很正确的。因为《马氏文通》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它的出现，意味着古代语言学的终结，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开端。不过，我认为：古代语言学史和现代语言学史应该分开来写，各自独立成篇。本书名为《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就整个中国语言学史（古代的，现代的）而言，它只写了第一个大阶段的内容。在这一阶段中，我又分为六个时期，即：

先秦时期（？——公元前3世纪）；

两汉时期（公元前2世纪——公元3世纪初）；

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3世纪——公元6世纪）；

隋唐宋时期（公元6世纪末——公元13世纪）；

元明时期（公元13世纪中叶——公元17世纪初）；

清代（公元17世纪中叶——公元19世纪）。

古人在汉语研究中所造成的阶段性的特点，是我们进行分期的主要依据。

先秦时代以研究事物名称为特色；两汉以研究文字、词汇为特色；魏晋南北朝是汉语语音研究的开始阶段，是词义研究进一步发展的阶段；隋唐宋是汉语语音研究趋向稳固、统一的阶段，在文字学、语义学方面没有取得什么象样的成就；元明时代的语音研究以面向实际为主要特色；清代以研究古音古义为根本特色，这是古代语言学进行大总结的时期。

阶段的划分只能以反映某一时期的本质特征为原则，不可能照顾到各个方面，如拿等韵学的发展来说，应该是宋元算一个阶段，明清算一个阶段。而从全盘考虑，清代语言学不同于以往各代，特点很突出，应自成一段。我以为不必用绝对的观点来看待分期的问题，期与期之间不可能是一刀两断的，中间有过渡，有联系，不一致，这都是很自然的事，只要大致上合理，就不必斤斤计较了。

一本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究竟应当怎么个写法才好呢？这个问题我也仔细琢磨过。首先，我以为跟哲学史、文学史的写法应有所不同，如在语言学史中就无须用很大的篇幅去讲作者的世界观，去分析作品的思想性，也不必费很多的笔墨去谈社会背景，但语言学又跟文学、哲学、佛学、经学等有密切的联系，把这些联系恰如其分地揭示出来，对研究古代文化史也不无裨益。其次，怎

么写跟为谁而写是分不开的，本书是为大学生和具有同等水平的语文工作者而写的，这些同志一般都学过“音韵学”、“汉语史”这样一些课，所以我要力避重复，凡是在这些课程中已经解决得很透的问题，本书就少谈或不谈，如《广韵》是古代语言学史中第一流的名著，本书只有几句话就交代过去了，就是基于以上的考虑。第三，我以为不论怎么个写法，似乎都应当把各个时期的语言文字学原著放在中心地位来评说，离开了原著，还有什么“史”可言呢？对广大读者来说，把原著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来分析评论，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样得到的“史”的知识，是具体的而不是空洞的，是联贯的而不是孤立的，何况有的原著一般读者已经很难看到了，不作必要的介绍就会“不知所云”。第四，作为一本“史”来说，应该综合当前研究的最高水平，应该是一个时代的智慧的结晶，不可能每一条材料都由著者发掘出来，也不可能每一个正确的论点都是著者的独创，著者有责任吸收各家之长。“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遗憾的是我有“取众白”的愿望，却缺乏精辨“黑”“白”的能力。且何者为“黑”，何者为“白”，也容许个人持不同的看法，至于这些看法是否正确，诚不敢自以为是。我之所以要把这部不成熟的书稿交给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是应教学之急需，另外也是希望得到广大读者和专家们的指正。

本书的出版，得到河南人民出版社的支持。李学敏同志利用业余时间为我誊清了部分原稿。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何九盈

1983年5月于北京西郊蔚秀园

注:

①《汉书·艺文志》。

②这些蒙童识字课本是:《史籀》十五篇,《八体六技》一篇,《苍颉》一篇,《凡将》一篇,《急就》一篇,《元尚》一篇,《训纂》一篇,《苍颉传》一篇,另有《别字》十三篇,合计三十五篇。其中《别字》一书,钱大昭认为就是扬雄《方言》(见逸言27页)。不可信。

③六书:指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六体:指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见《汉书·艺文志》。

④《汉书·艺文志》的小学十家也包括几种训诂书,如扬雄《苍颉训纂》、杜林《苍颉训纂》、杜林《苍颉故》。全是《苍颉》一书的训诂,注释经典史籍的训诂书不包括在内。

⑤段玉裁《六书音韵表》一,见《说文解字注》8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目　　录

前言……………………………………………………………（1）
第一章　先秦的语言研究……………………………………（1）
　概况……………………………………………………………（1）
　第一节　先秦诸子的语言理论……………………………（4）
　第二节　先秦时代的名物释义……………………………（16）
　第三节　先秦时代的文字研究……………………………（34）
第二章　两汉语言学…………………………………………（41）
　概况……………………………………………………………（41）
　第四节　汉代方言学………………………………………（43）
　第五节　汉代文字学………………………………………（58）
　第六节　汉代词源学………………………………………（72）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语言学…………………………………（86）
　概　况…………………………………………………………（86）
　第七节　反切与四声………………………………………（90）
　第八节　韵书的产生………………………………………（105）
　第九节　辞书的发展………………………………………（110）
第四章　隋唐宋语言学………………………………………（119）
　概况……………………………………………………………（119）
　第十节　《切韵》系韵书…………………………………（120）
　第十一节　字母之学………………………………………（138）

第十二节　等韵学的兴起……………………………（115）
第十三节　古音学的萌芽……………………………（167）
第十四节　唐宋文字学………………………………（176）
第十五节　唐宋辞书…………………………………（187）
第五章　元明语言学………………………………（199）
概况……………………………………………………（199）
第十六节　《中原音韵》系韵书……………………（201）
第十七节　元明等韵学………………………………（215）
第十八节　明代古音学………………………………（253）
第十九节　元明文字学………………………………（258）
第二十节　明代辞书…………………………………（267）
第二十一节　元代语法研究…………………………（279）
第六章　清代语言学………………………………（287）
概　况…………………………………………………（287）
第二十二节　清代古音学……………………………（293）
第二十三节　清代今音学……………………………（320）
第二十四节　清代等韵学……………………………（332）
第二十五节　清代韵书………………………………（354）
第二十六节　清代词源学……………………………（365）
第二十七节　清代语义学……………………………（373）
第二十八节　清代文字学……………………………（386）
第二十九节　清代辞书………………………………（399）
第三十节　清代语法研究……………………………（413）
全书结语……………………………………………（421）
附录：人名索引……………………………………（425）

第一章　先秦的语言研究

（？——公元前3世纪）

概　　况

先秦时期（含秦王朝）还没有产生专门的语言学家，语言学也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当时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乃至中央王朝都已经很自觉地关心语言文字问题了。下述六事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证明。

一、方言调查。扬雄给刘歆的信，应劭的《风俗通义·序》都谈到：周秦时代的每年八月，中央王朝都派出“輶轩之使”到各地调查方言。这些调查材料“皆藏于周秦之室”。秦王朝覆灭时，这些珍贵的语言资料“遗脱漏弃”了①。

二、词义辨析。在先秦古籍中，有些词义辨析的例子是很精当的。《左传》庄公二十九年关于“伐”、“侵”、“袭”的辨析，庄公二十八年关于“都”和“邑”的辨析②，是辨析同义词的好例子；《荀子·修身篇》对一些反义词的辨析也颇有意思，如说：“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多闻曰‘博’，少闻曰‘浅’；多见曰‘闲’，少见曰‘陋’。”这

样的辨析，例子虽不算多，但已足以说明当时的人们对于词义问题不是漠不关心的。

三、修辞理论。修辞是属于语言运用范围内的问题，春秋战国时期，个人著书立说的风气大开，诸侯国之间交往频繁，因此，怎样正确地运用语言，就成为社会实践、写作实践中急需解决的课题。在这个问题上，孔子就发表过一些好意见：

修辞立其诚。　　　　（易·乾卦）

辞达而已矣。　　　　（论语·卫灵公）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左襄二十五年）

这些修辞原则，至今仍有积极意义。

四、名物训诂③。战国末年已出现了注解古籍的专著。如《墨子》的《经说》是解《经》的，《管子》的《形势解》、《立政九败解》、《版法解》、《明法解》也是对有关篇章进行说解的，《韩非子》的《解老》、《喻老》是说解《老子》的，《灵枢经》的《小针解》是解释《九针十二原》的。从一些材料来看，对古书进行训诂，不可能只是战国末年才有，像《诗》、《书》、《易》、《礼》（今所见三礼成书于战国）等文献，其中有的部分是很古老的，不经过老师的传授，春秋战国时候的人们就不一定全都能读得懂了，所以，训诂学的萌芽起码在春秋末年就出现了。春秋以后，在官方或民间兴办的学校中任教的先生，对古代典籍的字义进行训释，当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孟子提出的"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就是训诂学一条很重要的原则。成书于战国末年的《尔雅》包括不少春秋以来的训诂资料。

五、语言理论。从理论上对语言的社会本质、语言与思维的

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这是先秦时代在语言研究方面的重要内容。这跟古希腊的情形颇类似。丹麦语言学家威廉·汤姆逊说："希腊人走上语言分析的道路，是由哲学家们研究思想同词的关系，研究事物同它的（希腊）名称的关系而最先推动的④。"我国先秦时代所进行的"名""实"之争也是推动语言研究的直接因素。

六、文字规范。汉字起源于何时，至今尚无定论，但殷商时期的文字已经相当成熟了，周王朝和秦王朝都进行过文字规范工作，对于汉字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总的来看，先秦的语言研究还处在萌芽时期。方言研究的实际成果如何，由于资料失传，无从评说；《尔雅》虽是训诂名著，而目前对它的成书年代问题，看法还不一致；词义辨析还比较零散；修辞理论毕竟不成体系；语言理论的探索，虽说成绩可观，但哲学家并不就是语言学家，他们也不是把语言作为独立的科学对象来研究的。因此，我们不妨谨慎一点说：这是语言研究的萌芽时期。

注：

①扬雄答刘歆书："尝闻先代輶轩之使奏籍之书，皆藏于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遗弃无见之者。"
应劭《风俗通义·序》："周秦尝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秘室。及嬴氏之亡，遗脱漏弃，无见之者。"

②《左传》原文是："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

③骆鸿凯《尔雅论略》148页："古今训诂书不过名物、训诂二类，而名必有义，则训诂实为名物之根。"

④《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7页。

第一节　先秦诸子的语言理论

春秋战国是社会大动荡、学术思想大解放的时代，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尸子、申子、尹文子、公孙龙子、管子、荀子、韩非子等，在讨论哲学问题、逻辑问题、政治问题的同时，都对语言问题发表过一些意见。归纳起来，有如下三点：

一、语言与社会存在

在一个社会制度发生大变革的时候，语言，特别是一些表示称谓和社会伦理道德的名词也随之发生了大变革。这就是《淮南子·要略》说的："新故相反，前后相缪，百官背乱，不知所用，故刑（也写作"形"，即"实"的意思）名之书出焉。"这种"刑名之书"并不就是语言学著作，但在研究事物的名称和客观事物本身之间的关系时，必然要涉及语言问题。研究"名""实"问题的不只是名家，墨家就对名实关系问题有过很好的解释。墨家说："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墨子·经说上》）。这两个"谓"都是动词，是"称呼"、"叫做"的意思，分别与"所以"、"所"结合成名词性词组。"所以谓"是"用来作称呼的"，就是"能指"；"所谓"是指"所称呼的事物"①，就是"所指"。用来作称呼的叫做"名"，所称呼的事物叫做"实"。"名"是属于语言范围的问题，"实"是属于社会存在的问题。"名"，必须通过语言活动，即通过人的发音器官发出语音才可以表示出来，这一点，墨家也认识到了。《经说

上》指出："声出口，俱有名。""故言也者，诸口能之出名者也。"

墨家也认识到"实"是第一性的，"名"是第二性的。"有之实也，而后谓之；无之实也，则无谓也"（《经说下》）。墨家还强调"名""实"要一致。"名实耦，合也"（《经说上》）。"耦"，即二者相符的意思。

战国中后期名家的代表人物尹文和他的学生公孙龙，对名实的论述比墨家又进了一步。尹文子说："名者，名形者也；形者，应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则形之与名，居然别矣。"（《尹文子·大道上》）名称是给"形"命名的，"形"是与名称相应的。然而，"形"的存在并不是为了"正名"，名称的产生也不是为了"正形"，那么，"形"和"名"当然就有区别了。尹文子不仅说明了"形"和"名"的正确关系，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形"和"名"各自具有独立性，也就是"形"并不依赖于"名"而存在，"名"也不能改变客观存在的"形"。名称是名称，事物是事物，二者并不就是一回事。

正因为二者不是一回事，所以二者在发展中会产生矛盾，怎么克服这个矛盾呢？公孙龙在《名实论》中说："夫名，实谓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则不谓也。"他的意思是：名称，是对客观事物的一种称谓。但是，客观事物是发展的，语言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当这个名称已经不是指这个东西，那个名称已经不是指那个东西的时候，就不要这样或那样称呼了。

关于"名"是怎样产生的问题，古希腊哲学家为此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先秦诸子最早谈及这个问题的是老子。老子说："无

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在开天辟地的时候，“道”没有名称，后来万事万物有了各种不同的名称，就是由“道”这个“母”产生的。事实上，老子认为名生于“道”。战国中后期成书的《管子》也探讨了这个问题。它说：“名生于实，实生于德，德生于理，理生于智，智生于当。”（《管子·九守》）“名生于实”的观点比之名生于道似乎要进步一些，但这个观点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名称和实物并不存在必然的、固有的联系，客观存在的“实”不可能“生”出“名”来，何况《管子》所说的“实”又是由“德”产生的，一直推论到“智生于当”，这更是空洞的唯心主义说教了。

彻底地、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是荀子。荀子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唯物地解释了“名”的产生问题。他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荀子·正名》）荀子主张“名无固宜”、“名无固实”，这就批判了“名生于道”、“名生于实”这样一些错误观点。他提出的“约定俗成”论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他第一次阐明了语言的社会本质，正确地说明了词的意义和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

事物的名称，词的意义，一经社会“约定俗成”之后，就要求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荀子所说的“谨于守名约”，就是保持语言的稳定性的意思。他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他说：那些用己意来解析言辞或擅自制造名词以乱正名的人就是“大奸”，其罪行跟私造符节度量的人是一样的[1]。荀子为什么把“析辞擅作名”的人看作“大奸”呢？因为把名称搞乱了，各人妄加解释，就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使民疑惑，人多辨讼”（《正

名》)。所以《礼记·王制》说:"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这样看来,"守名约"的问题,既是个语言问题,也关系到统治阶级的利益问题。当然,荀子也认识到,即使从统治者的利益出发,语言不仅要保持稳定性,也要不断地发展。他说:"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正名》)"循旧作新",这个观点是正确的,既讲到了语言的继承性,又讲到了语言的发展。但"旧名"要由"王者"来"循","新名"要由"王者"来"作",这不跟上面所说的"约定俗成"论相矛盾吗?统观荀子《正名》的全部论述,二者并不矛盾。"约定俗成"是指"名"的起源;"循旧作新",大致上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语言规范化"。《正名》中所说的"后王之成名","制名之枢要","王者之制名",都是从语言规范化的角度来谈问题的。对语言进行规范(这种规范的内容主要是词汇,特别是有关社会制度方面的词汇),在当时的条件下,荀子只能寄希望于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的"王者"了。

先秦时代人们也认识到:对于个人来说,他的语言活动不是天生的,而是受社会环境制约的。孟子说:一个楚国的孩子要学齐国话,请一个齐国人教他,却有许多楚国人整天跟他喋喋不休,即使每天用鞭子打他,逼他说齐国话,也是不可能的;假如把他领到齐国临淄的庄岳住上几年,即使每天鞭打他,逼他说楚国话也是不可能的③。《吕氏春秋·善学》也说:戎族人生在戎地,长在戎地,而说的戎语不知是怎么会的;楚国人生在楚地,长在楚地,而说的楚语不知是怎么会的。假如使楚国人在戎地长大,戎族人在楚国长大,那么楚国人就说戎语,戎族人就说楚语了④。

二、语言与政治伦理

先秦诸子讲语言理论时，大都把它和政治伦理关系问题扯在一起，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就是人们很熟悉的所谓正名主义了。“正名”是孔子先提出来的。孔子所说的“正名”跟语言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孔夫子站在旧制度的立场上，维护一些表示名分的词的涵义。如他对齐景公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就是要维护君、臣、父、子这些词的旧有涵义，要用旧的政治伦理标准，来匡正这些词的内涵和外延；另一点，就是要求人们在运用语言的时候要按旧的名分来选择词语。《韩诗外传》卷五在解释孔子的“正名”论时就举了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实例：“孔子侍坐于季孙，季孙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马，其与之乎？’孔子曰：‘吾闻君取于臣谓之取，不曰假。’季孙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谓之取，无曰假。’孔子曰：‘正假马之言，而君臣之义定矣。’”假者，借也。在孔子看来，国君向臣子要马，怎么能用“假”这个词呢，这不就是“名不正，则言不顺”吗！“假”与“取”仅一字之差，却关系到君臣之间的大义所在。

墨家是儒家的反对派，他们也讲“正名”。不过，墨家所说的“正名”是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要求说话的人准确地使用词语。《墨子·经说下》：“正名者，彼此。彼此可：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彼此不可：彼且此也。”正名，就是要分清彼此。用于那个事物的名词只能用于那个事物，用于这个事物的名词只能用于这个事物。同一名词，不能既用来指那个事物，又用来指这个事物。不仅名词不能乱用，就是一般词语的使用，也要求准确贴切。如墨子是主张“非攻”的，有人非议他说：你认为

攻伐是不义的，可是，“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这是什么缘故呢？墨子回答说：“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墨子·非攻下》）用“诛”这个动词就表明征伐的性质是正义的，与“攻”的意思不一样。也就是说，“攻”与“诛”不是意义相“类”的词。墨子认为：“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墨子·大取》）“类”就是本质属性相同的事物，在墨子的正名论中，“类”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如不能把“牛”叫做“马”，也不能把“马”叫做“牛”，因为“牛之与马，不类。用（以）牛有角，马无角，是类不同也。”（《墨子·经说下》）

墨家讲的“立辞明类”，本来是关于逻辑和语言方面的问题，后来《吕氏春秋》加以发挥，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今有人于此，求牛则名‘马’，求马则名‘牛’，所求必不得矣……不正其名，不分其职……乱莫大焉……以牛为马，以马为牛，名不正也。故名不正则人主忧劳勤苦，而官职烦乱悖逆矣。国之亡也，名之伤也，从此生矣……故至治之务在于正名，名正，则人主不忧劳矣。”（《吕氏春秋·审分》）所谓“至治之务在于正名”，与孔子为政必正名，在政治立场上当然不会完全一样，但基本调子是一样的，他们都把各种政治矛盾、社会矛盾归结为名分问题，把“正名”视为安邦治国的灵丹妙药。

名家的代表人物公孙龙也讲正名，他的理论与墨家有相同之点。他说：“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焉。谓彼而彼不唯乎彼，则彼谓不行；谓此而此不唯乎此，则此谓不行。”（《公孙龙子·名实论》）。公孙龙所说的“唯乎彼此”跟墨子的“正名者，彼

此”是一样的意思，他正名的目的则完全是为了政治。他是“疾名实之散乱”，“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公孙龙子·迹府》）

法家也接过了孔子的“正名”口号。尸佼提出“治天下之要在于正名”（《尸子·发蒙》）。申不害认为尧与桀都以名治天下，但“其名正而天下治”，“其名倚而天下乱，是以圣人贵名之正也”（《申子·大体篇》）。不过，法家与儒家有一个重要不同之点，就是强调“以实覈名”（《尸子·分》），“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韩非子·奸劫弑臣》）。言语必须要符合事实，也是韩非子反复论述的一个问题。做臣子的，话说过头了要罚，话说得不够也要罚。“其言大而功小者则罚，非罚小功也，罚功不当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罚，非不说（悦）于大功也，以为不当名也。”（《韩非子·二柄》）

从现代语言学的观点看来，语言与政治伦理关系的问题，在语言理论方面没有什么重大的积极意义，但在春秋末年和战国时代，这却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而且影响及于后代，不可置而不论。

三、语言与逻辑思维

在先秦诸子中，比较系统地、科学地阐明语言和逻辑思维关系的，首推墨子，然后是荀子。其他一些哲学家、逻辑学家也发表过一些值得注意的看法。下面分三点来谈：

第一、词和概念

墨子说：“以名举实。⑤”（《小取》）荀子说：“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正名》）墨、荀在这里所说的“名”就是用词所表示的概念。所谓“举实”、“期累实”，即用概念反映

客观事物的意思。

概念反映事物是要靠词语来实现的。墨、荀把概念分为三个大类，也就是把名词（反映事物名称的词）分成三个层次。墨子说："名：达，类，私。"（《墨子·经上》）荀子也有类似的分类法。墨子所说的"达"，荀子叫做"大共名"，如"物"这个词就是；墨子所说的"类"，荀子叫做"大别名"，如"鸟"和"兽"这两个词就是；墨子所说的"私"是个体名词，即荀子所说的"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正名》）。

荀子还是第一个明确区别词和词组的人。他说：在确定名称的时候，"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正名》）能用单音词表明的就用单音词，不能用单音词表明的就用词组。荀子所说的"兼"，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词组。在荀子之前，尹文子和孟子已经注意到了某些表示事物性质的形容词，可以放在名词前面、修饰名词这样一种现象。《尹文子·大道上》："语曰'好牛'……'好'则物之通称，'牛'则物之定形，以通称随定形，不可穷极者也。设复言'好马'，则复连于'马'矣，则'好'所通无方也。设复言'好人'，则彼属于'人'矣，则'好'非'人'，'人'非'好'也，则'好牛'、'好马'、'好人'之名自离矣。"从概念来说，"物之通称"是指抽象概念，"物之定形"是指具体概念；从语言来说，"好"是形容词，"牛"、"马"、"人"是名词。"好"与"牛"、与"马"、与"人"分别组合，就是"以通称随定形"，因为"通称"不等于"定形"，所以"名自离（区别）矣"。孟子与告子互相辩论时，谈到"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又说："白马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孟

子·告子上》）“白”与“羽”、与“雪”、与“玉”、与“马”、与“人”分别组合，也是形容词修饰名词，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偏正结构，它是词组的一种类型。

在分析词和词组时，还涉及到概念中属（genus）和种（species）的关系问题。这里有两个著名的论断值得一谈。一个论断是墨子说的“杀盗人非杀人”（《小取》）；另一个论断是儿（倪）说、公孙龙说的“白马非马”（《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公孙龙子·白马篇》）。这两个论断在战国时就分别受到荀子、韩非子的批判，被当作以名乱名的典型例子，两千多年来一直被斥之为诡辩论。其实，从语言形式和概念来分析，这两个论断的本意都没有错。“盗人”、“白马”都是偏正结构，都是种概念；“人”和“马”都是单词，都是属概念，它们之间当然不能划等号。说“盗人”这个概念（用词组表示）不等于“人”这个概念（用单词表示），“白马”这个概念不等于“马”这个概念，无疑是正确的⑥。墨子的意思并不是说“盗人”不属于人类，公孙龙的意思也不是说“白马”不属于马类。公孙龙在回答非难他的人时说：“夫是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而非龙异‘白马’于所谓‘马’，悖。”（《公孙龙子·迹府》）既然肯定孔丘把“楚人”和“人”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别，而非难我公孙龙将“白马”和“马”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别，这不是悖谬吗！

在词和概念的关系问题上，墨子、尹文子还认识到二者不是等同的。同一概念可以用不同的词表示（同实异名），同一个词（这里主要是指语音形式一样）也可以表示不同的概念（同名异实）。如“狗”和“犬”是两个词，在墨子时代却是同一概念，“知‘狗’而自谓不知‘犬’，过也，说在重”（《墨子·经

上》）。“盗”是一个词，却可以表示两个不同的概念。“窃货曰盗”（《荀子·修身》），这是它的常用概念。可是，尹文子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老人给自己的儿子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盗”，有一天这位老人在外面追赶他的儿子，连呼他的名字：“盗！盗！”官吏听见了，以为老人所追赶的是一个小偷，就把这个儿子给捆起来了（《尹文子·大道下》）。这里的“盗”是专有名词，特定概念。

词和概念的不同，在方言中表现最为明显。同一概念，在不同方言中可以用许多不同的词来表示。春秋战国时期方言相当复杂，诸戎与华“言语不达”（《左传》·襄公十四年），“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吕氏春秋·知化》），孟子骂楚国的陈良是“南蛮鴃舌之人”（《滕文公上》）。在这样的情况下，荀子提出万物的名称（词）要以诸夏的雅言为标准。他说：“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正名》）“诸夏”就是中原地区的华夏族，他们所使用的“夏言”（即“雅言”）是当时的普通话，荀子提出远离中原地区的“异俗之乡”，要利用“夏言”作为交际工具，这是一个卓越的见解。我们不敢夸大地说，荀子已经有了推广“普通话（雅言）”的思想，但他主张“散名”要以诸夏为标准，各方言区的人要利用“雅言”作为交际工具，这是很明确的。

第二、辞和意

墨子说：“以辞抒意。”（《小取》）什么叫做“辞”呢？荀子说：“‘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正名》）“异实之名”就是不同实的名称（概念），即不同的单词。兼用不

同的单词才能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可见，从语言形式分析，这里所说的"辞"并不同于"词"，它是句子、言辞的意思。墨、荀已经认识到，语言中的单词和句子是不同的，句子要由单词组成，一般说来，一个句子不能只有一个词（独词句是很少的），也不能由完全相同的词组成，它必须是由几个相关而又相异的单词组成。如光说"仁仁仁仁"，不成句；"仁者爱人"，就成了句了。它由"仁者"、"爱"、"人"三个"异实之名以论一意"。这样看来，从思维形式分析，"辞"就是我们现在逻辑学上所说的判断了。"以辞抒意"，这句话的原意是：用判断（句子）表达意思。

"辞"怎么"抒意"呢？也就是语言怎样才能表达思想呢？墨子已经懂得：要通过人体的有关器官才能实现。《墨子·经上》说："闻，耳之聪也……循所闻而得其意，心之察也……言，口之利也……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辩也"。耳朵是听话的，嘴巴是说话的，心是思维器官（墨子和后来的孟子一样，还不懂得大脑是思维器官）。嘴巴之所以能用言辞来表达思想，耳朵之所以能用听觉来了解对方的思想，都要通过思维器官（心）的"察""辩"（即思维活动）才能起作用。两千多年前，墨子就能这样科学地阐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不能不令人惊叹！

第三、辩说和论据

墨子说："以说出故。"（《小取》）荀子说："辩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正名》）从思维形式而言，"说"是推理；从语言形式而言，"说"是论说、辩说。"故"是辩说的论据、理由。辩说的原则是"不异实名"，即所指的是同一对象（实），所用的是同一概念（名）。如果论题不同，或

偷换概念，辩说就无法进行。这就是墨子说的："异，则或谓之'牛'，或谓之'马'也，俱无胜，是不辩也。"（《经说下》）一方说是"牛"，一方说是"马"，异实异名，这样的辩说谁也不能获胜。"喻动静之道"是就辩说的目的而言的。《荀子》杨倞注："动静：是非也。""喻动静之道"，就是要论说道理的或是或非，这跟墨子的观点是一致的。墨子说："辩，将以明是非之分。"（《小取》）"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经说下》）

辩说问题，说到底是个语言运用问题。战国时期是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无论是哪一"家"，无论是什么性质的争鸣，都得运用语言。正确地巧妙地运用语言，是发展学术流派、战胜论敌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春秋末年，孔门已有"言语"科，墨子更是把"辩乎言谈"称之为"贤良之士"（《尚贤上》）。他教育自己的学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然后义成也。"（《耕柱》）荀子也强调"辩"，他甚至说："君子必辩。"（《非相》）老庄学派似乎是反对"辩"的，老子说："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庄子说："大辩不言。"（齐物论》）其实，"五千精妙"（《文心雕龙·情采》），不就是一部"辩书"吗？整部《庄子》不就是在大辩特辩吗？

"辩"推进了逻辑学的发展，促使了语言理论的产生。这些语言理论的精华部分，是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上绚丽多彩的奇葩；墨子、荀子等人为中国语言学史写下了光辉的第一章。

注：

①《说文》："谓，报也。"段玉裁注："盖刑与罪相当谓之报。引

申凡论人论事得其实谓之报。谓者，论人论事得其实也。”称谓也要求名实相当。

②原文是：故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则谓之‘大奸’，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

③原文见《孟子·滕文公下》。

④原文是：“戎人生乎戎，长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长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长乎戎，戎人长乎楚，则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

⑤《墨子·经上》：“举，拟实也。”孙诒让：“拟，度也。谓量度其实而言之。”《经说上》：“举，告。以之名举彼实也。”

⑥可参阅詹剑峰《墨家的形式逻辑》154页；周云之《公孙龙关于名（概念）的逻辑思想》（见《逻辑学文集》）。

第二节 先秦时代的名物释义

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先秦诸子以“正名”、“辨名实”为中心内容的语言理论研究，并不只是一种纯理论的探讨，它是与名物释义的研究紧密相联系的。

“名物释义”就是对反映事物名称的词进行解释，也就是解释古今方国之言。如：

> 春为青阳，夏为朱明，秋为白藏，冬为玄冥。四气和，正光照，此之谓玉烛。甘雨时降，万物以嘉，高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谓醴泉。祥风，瑞风也，一名景风，一名惠风。《尸子·仁意》

天神曰灵，地神曰祇，人神曰鬼。鬼者，归也。

《尸子卷下》

勤，劳也。遵，循也。肇，始也。怙，恃也。享，祀也。锡，与也。典，常也。慷，虚也。惠，爱也。敏，疾也。捷，克也。载，事也。　《逸周书·谥法解》

这些释义资料，起先是零散的。进而有人把有关词语编成单一的条目，如《尸子·广泽》就保存了两条这种性质的资料。

天、帝、皇、后、辟、公：〔皆君也〕[1]。

弘、廓、宏、溥、介、纯、夏、幠、冢、晊、昄：皆大也。十有余名，而实一也。

尸佼与商鞅同时，战国中期人。在他的著作中已经出现了类似《尔雅·释诂》中的词条，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它说明这种以一词释众词的释词方式在战国中期就已经产生了，并不是始于《尔雅》，《尔雅》只不过是更大量运用这种释词方式罢了；第二、尸子明确谈到：用一个“大”字来解释十一个与“大”有关的词，是“十有余名而实一也”，这说明先秦诸子研究词义是从辨名实出发的，他们是为了研究名实关系而从事词义研究的，这一点也可以间接证明，《尔雅》的编撰者也是以辨名实为目的的；第三，以上所引词条及《逸周书·谥法解》中的一些释义，差不多都见之今本《尔雅》，这证明《尔雅》是名物释义的大汇编。

那么，《尔雅》的编者是谁呢？《尔雅》一书是什么时候编定的呢？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已进行了不少的探索。

一说周公“著《尔雅》一篇，以释其意义”，“今（指三国时代）俗所传三篇《尔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

言叔孙通所补，或言沛郡梁文所考。”（魏·张揖《上广雅表》）

一说孔子门人所作。郑玄《驳五经异义》：“某之闻也，《尔雅》者，孔子门人所作，以释六经之旨，盖不误也。”（《诗·黍离》正义引，又《周礼·大宗伯》疏引）是孔子的哪个门人所作呢？扬雄说：“孔子门徒游、夏之俦所记。”（《西京杂记》引）明代的焦竑也赞同此说。他在《焦氏笔乘》卷一说：“《尔雅》，《诗》训诂也。子夏传《诗》者也。”

一说“《尔雅》出于汉世”。“考其文理，乃是秦汉之间学《诗》者纂集说《诗》博士解诂之言尔。”（欧阳修《诗本义》卷十，第2页，“文王”条）梁启超也说：《尔雅》“是西汉人编的字典，刘歆又扩大些，干周公什么事。”（《古书真伪及其年代》148页）

《尔雅》成书于西汉之说影响很大，似已成为定论。但主此说的人，如欧阳修、梁启超等，都没有提出过像样的证据。

据东汉人赵岐（约公元108年—公元201年）说：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孟子题辞》）近代学者王国维（1877—1927）又进一步考证，《尔雅》为“汉（文帝）中学之科目。”（《观堂集林》卷四，7页）汉文帝即位距离汉高祖开国才二十多年的时间，在这短暂的时期内如果有人编写了《尔雅》，而且中央王朝还为此书专立博士，此书的编著者是谁，岂能湮没无闻！

欧阳修认为《尔雅》的纂集人“乃是秦汉之间学《诗》者”。可是，秦王朝是反对学《诗》的，“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史记·秦始皇本纪》）欧阳修怎么把这样一个重

要历史事实给忘了呢？至于把整本《尔雅》的内容定为“说《诗》博士解诂之言”更是无稽之谈。《尔雅》共计四千三百多个词，释《诗》的不过七八百条。又，秦汉之际哪来的说《诗》博士呢？始皇帝有博士七十，未闻有说《诗》者；汉高祖至惠帝时，什么博士也没有，汉文帝时，“《诗》始萌芽”（《汉书·刘歆传》），只可能学《诗》者依据《尔雅》，而不可能《尔雅》是“秦汉之间”学诗的人所纂集。

我认为《尔雅》当成书于战国末年，它的编纂人是齐鲁儒生，理由如下：

第一、历史渊源。宋以来，不相信《尔雅》成书于先秦时代的人，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先秦时代的名物训诂学的发展认识不足。朱熹的“《尔雅》是取传注以作”（见《朱子语类》）的说法影响深远。一说“传注”，人们就坐实到毛传上，其实，在毛传之前，也就是在先秦时代，传注就已经产生了。如《国语·周语》中就有晋国叔向解《周颂·昊天有成命》的传注资料。

原诗：“夙夜基命宥密，于缉熙亶厥心，肆其靖之。”

传注：“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宽也。密：宁也。缉：明也。熙：广也。亶：厚也。肆：固也
靖：龢也。”

《礼记·乐记》中也有这种性质的材料。

原诗：“肃肃和鸣，先祖是听。”

传注：“肃肃：敬也。”

《吕氏春秋·不屈》也有解释《诗经》词义的资料。

原诗：“恺悌君子，民之父母。”

传注：“恺者，大也。悌者，长也。”

这些材料有的与《尔雅》一样，有的不同于《尔雅》，证明先秦时代解经的有不同的学派，《尔雅》并不是将各派解经的资料都收集起来了。拿《尔雅》与毛传相比，也有不同，如：

《小雅·巧言》："蛇蛇硕言。"《尔雅·释训》："蛇蛇：美也。"毛传："蛇蛇：浅意。"

《魏风·陟岵》："陟彼岵兮"，"陟彼屺兮。"《尔雅·释山》："多草木，岵；无草木，峐（屺）。"毛传："山无草木曰岵"，"山有草木曰屺"。

过去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是《尔雅》抄毛传呢，还是毛传抄《尔雅》呢？看来都不正确。二者来源有同有异，不存在抄袭的问题。

那些主张《尔雅》成书于西汉的人，不仅认为《尔雅》抄毛传，甚而至于认为《尔雅》抄《史记》，这就更不对头了②。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翻译《尚书·尧典》的文字，无疑是从《尔雅》中抄来的。这一点，可以《汉书·艺文志》的话为证："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什么叫做"读应《尔雅》"呢？陈澧在《东塾读书记》中解释得很好。他说："观于《史记》采《尚书》，以训诂代正字而晓然矣。如'庶绩咸熙'，《史记》作'众功皆兴'。庶：众也。绩：功也。咸：皆也。熙：兴也。皆见《释诂》。其一二字以代训诂者，如'寅宾'作'敬道'，'方鸠'作'旁聚'。寅：敬也。鸠：聚也。亦见《释诂》。此所谓'读应尔雅'也。"文学史家们津津乐道的司马迁翻译了《尚书》中的某些古文，实际上只不过是司马迁根据《尔雅》

"用训诂代正字"而已，"用训诂代正字"也就是"解古今语"。这里所谓的"古"是指《尚书》中用的古字，所谓"今"是指《尔雅》中的释词。

看来，《尔雅》不是渊源于汉初经师的"诂训"，而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名物释义的汇编，是不应该有问题的。

战国时候能否编成《尔雅》这样的书呢？西晋太康年间有人从魏王冢（战国末年的魏襄王或安釐王）中发掘出《名》书三篇，据说此书类似《尔雅》（见《晋书·束皙传》）。这条材料足以证明：《尔雅》之类的名书，在战国时代不仅可以产生，而且还不只一种、两种。魏王把《名》书作为随葬物品，也可说明《尔雅》这种性质的书在当时的地位。

第二、《尔雅》名义。《尔雅》这个书名，也是判断它成书年代的一个好证据。何谓《尔雅》？刘熙说："《尔雅》：尔，昵也；昵，近也。雅，义也；义，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为主也。""尔、昵"、"雅、义"各自构成声训关系，刘熙的《释名》是专主声训的，这一点我们先不去管它。要紧的是"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为主"这句话。在刘熙以前，王充、郑玄等人只讲到《尔雅》是解经的，刘熙提出《尔雅》是释方言的，把这两种意见合起来，才可以对《尔雅》作出全面评价。但刘熙所说的是什么时代的"五方之言"呢？是什么时候的"正（标准）"呢？从刘熙将《尔雅》这个条目安排在《国语》之后、《论语》之前来判断（见《释名·释典艺》），无疑是指先秦时代了。

在先秦时代，也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确存在"雅言"，这是人所共知的。《尔雅》的任务之一就是以"雅言"为标准解释

不同的方言词语。正如黄侃所言："《尔雅》之作，本为齐壹殊言，归于统绪。"（《黄侃论学杂著》361页）就是对于经书的训诂，也不可能是随意的，而是有师承的。师又承于谁？师承于"雅"。用当时的"雅言"去读经、去解经，大概也是社会的要求。"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③"，就可以为证。

到了汉代，"雅"的词义不仅有"正"的意思，又增添了"古"的意思，先秦时候的雅言，到这时就成为古言了，于是，"尔雅"这个词语的意思与先秦时候作为书名的"尔雅"已经有些不同了。

《大戴礼记·小辨》："尔雅以观于古，足以辨言矣。"

《史记·三王世家》："称引古今通义，国家大礼，文章尔雅。"

《史记·儒林列传》："臣（公孙宏）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小吏浅闻，不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

《史记·乐书》："至今上（汉武帝）即位，作十九章……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多尔雅之文。"

《白虎通·礼乐》："乐尚'雅'何？雅者，古正也，所以远郑声也。"

《旧汉仪》："武帝初置博士，取学通有修，博识多艺，晓古文《尔雅》能属文章者为之。"

《尔雅》作为书名原本是以雅言释方语释古语，而上述前五例中的"尔雅"都是近乎古雅的意思。"尔雅以观于古"是根据先秦雅言以了解古代；"文章尔雅"是指书奏文牍的体例根据于

古雅；“多尔雅之文”是指用了很多古雅的文言字；“雅者古正”更是以古为正（标准）来解释“雅”了，第六例《旧汉仪》的《尔雅》是书名，汉武帝时一般人已经不能完全读懂《尔雅》，要“学通有修，博识多艺”的人才能通晓。因此，这时候有犍为文学出来为《尔雅》作注，就是很可以理解的了。

第三、《尔雅》内容。《尔雅》的内容并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很难根据其内容判断其成书的确切年代，但其中有些内容还是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其时代背景的。如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曾根据《释地·九府》“中有岱岳（即泰山）”一语，推断此篇编者“是以岱岳之附近，为全国中央之思想”。又认为《释地·四极》云“距齐州（即中州）以南……”和《释言》“齐，中也”（齐：通“脐”。肚脐。）之思想大体一致，推断此篇所反映的“大约是战国文化中心之齐稷下多数学者所集之时代思想”（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中册171页）。这样的推测都是有意义的④。在地理方面还有两条资料也值得注意。一是《释地·十薮》与《周礼》《吕览》都不同，后二书只有“九薮”。《吕览》没有“大野”，《周礼》有“大野”，排在第五，《尔雅》将“鲁有大野”列为十薮之首，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另外，后二书九薮之中都没有“焦获”，《尔雅》将“周有焦获”列在最后，是否反映了齐鲁儒生的尊周思想呢？二是在释“九州”的称谓时，没有“梁州”，梁州是秦通巴、蜀之后才有的称谓，除《禹贡》外，《周礼》、《吕览》都无梁州，也可说明《尔雅》成书当在秦通巴蜀之前。《尔雅》的九州中有“齐曰营州”，而《周礼》、《禹贡》、《吕览》都作青州。刘熙在《释名·释州国》中，释了汉代十三州之后，又加了一笔：“古有营州”。营

州是汉以前的古制，其他先秦古籍都不载，只见之于《尔雅》，这跟《尔雅》的编纂者为齐鲁儒生不无关系吧。

《释天·星名》一章，暗含着四象、十二次、二十八宿的体系（都不全），可是并未出现“二十八宿”这样的称谓。二十八宿始见于《吕氏春秋·有始》，又见于汉初的《淮南子·天文训》，这正是秦汉时候的天文术语。《周礼》有“二十八星”的总称，把“宿”叫做“星”，这是战国时的用语，《尔雅》正与此合。如果是秦汉时代的人来编《尔雅》，不可能弃二十八宿这样的基本概念不用（司马迁称为“二十八舍”，“舍”与“宿”是同义词）。另外，十二次的名称，仅见于《左传》《国语》，此后，直到刘歆以前的典籍，均无十二次之名，而《尔雅·星名》中有之，这也可以证明《尔雅》是战国时代的产物。

从前研究《尔雅》年代的人，对“星名”一章往往忽略过去了。有的人认为这些材料应出现于二十八宿形成之前，有的人又疑心是汉代人随意加进去的，总之，都没有发现：星名虽不全，而次序的排列暗含着完整的体系。1978年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现了二十八宿青龙白虎图像，这是我国迄今所知的最早记载二十八宿名称的文字资料。我拿这份资料与《尔雅》的“星名”两相比较，发现二者在排列次序上完全一样，《尔雅》所不录的星名，都可以据曾侯乙墓星图在相应的位置上填补出来（见附表）。

问题在于为什么有的星名《尔雅》不录呢？若说是无意脱漏，其次序为何又如此整齐而不紊乱呢？若说是《尔雅》乃训诂书，其不录之星因经书中未曾出现，是又不然，如参星早已见之于《诗经》，《尔雅》若是专门释《诗》的，为何不录此星呢？这真是一个谜。后来，我把这些不录之星与战国时候的星宿分野

联系起来考察，谜底揭开了。原来凡属于秦楚两国分野的星名，《尔雅》就不录，不唯星名不录，就十二次而言，《尔雅》出现了九个次的名称，而属于秦楚两国的次名照样不录。我们认为：《尔雅》不录秦楚分野的星名，这是出于政治原因，我们从中闻到了齐鲁儒生的火药气味，战国末年的齐鲁儒生对西方的虎狼之秦，南方的蛮夷之楚，深怀敌意，他们在"星名"中把这两国的分野一笔抹掉，是否也表现了文化抗敌的思想呢？

第四，结构体例。《尔雅》一书结构完整，体例划一，不像是"递相增益"而成。《尔雅》乃"递相增益"而成的论点源于张揖，我们对此应取分析态度。首先要把材料的来源和编定成书的年代分开来看待；其次要把《尔雅》编定时基本面貌和后人"增益"的面貌弄清楚，"增益"的比例究竟占多少，是否影响了此书编定时的基本面貌。

《尔雅》书中的材料，其时代肯定不同，有的材料相当古老。如《释鱼》的"鱼枕谓之丁，鱼肠谓之乙，鱼尾谓之丙"，"左倪不类，右倪不若⑤"，这恐怕都是殷商和西周早期的材料，这些材料一代一代传下来，在《尔雅》成书之前，可能已有这种性质的著作了，但《尔雅》一经编定之后，在基本面貌方面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绝不可能像梁启超说的那样：

东汉时代今《尔雅》尚未通行，尚未独立……篇幅一定没有今本那么多。今本之多，由于刘歆，刘歆才特别提出这书来，有一回征募了千余能通《尔雅》的人，令各记字廷中，也许就因这回《尔雅》才变成庞然大物⑥。

这是捕风捉影，言之无据。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是个今文学家，他反对刘歆，把先秦时代一些重要古籍都说成是刘歆伪造的，梁

启超认为是刘歆把《尔雅》“变成宠然大物”，也是受了康有为的影响。

《尔雅》是一部结构完整、体例划一的著作。全书20篇（这是《汉书·艺文志》的说法。今本《尔雅》只有19篇。有人认为《释诂》分上下两篇；有人认为另有一个“序篇”，不论怎么说，今本《尔雅》的内容与当初《尔雅》编定时的内容，不会有多大的出入），每一篇的篇题都是“释×”，篇与篇之间的安排也不是杂乱无章，其次序的先后都是经过认真考虑的，释诂、释言、释训3篇，属于语词部分，其中有形容词、名词，也有动词；释亲以下16篇，几乎全是名词，其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等四篇是对于名物称谓制度的释义，释天至释畜十二篇属于自然科学的名物称谓，其中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等五篇为一组，是对天文、地理名词的释义；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等七篇是关于动植物名称的释义。

就每一篇的内部考察，各词条出现的先后，词条与词条之间的关系，虽说不上是精心设计，但布局大体上是统一的，有少数地方安排不合理，有些内容为书成之后所增益，基本上可分辨出来。如第一篇《释诂》第一个词条是：“初哉首基……始也。”最后一个条目是：“求酋在卒……终也。”有“始”有“终”这是编纂者的构思，在“终也”之后还有一个条目：“崩薨……死也。”这当是后人加进去的，即所谓“增益”。第二篇的第一个词条是：“殷齐，中也。”最后一个词条是：“弥，终也。”由“中”到“终”，也不是偶然的吧。又如第十一篇《释山》，开篇释“五岳”：“河南华，河西岳（指吴山，在陕西），河东岱，河北恒，江南衡。”篇终又出现释“五岳”：“泰山为东

岳，华山为西岳，霍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嵩高为中岳。”后者为增益成分，即汉初传《尔雅》者加上去的。

我们承认《尔雅》有“增益”成分，与“递相增益”论者不同的是：我们认为此书在战国末年编定之后，“增益”的成分很少，不影响此书的基本面貌；我们认为《尔雅》的编定是出自一人或少数几人之手，而不可能像内藤虎次郎认为的那样：书中有的部分是春秋时代的作品，有的部分是战国时代的作品，有的部分是秦汉之际的作品，因为《尔雅》结构的严整、编排的统一以及释词方式的一致，就否定了内藤的看法。所谓释词方式一致，不是说所有各篇的释词方式相同，而是说每一篇内部的释词方式基本一样，如释语词的三篇，都是“××××，×也”，只有《释训》的最后一条是：“鬼之为言归也。”“鬼，归也”，这是《尔雅》的释词方式，“之为言”这种训诂方式常见于汉代，在《释训》中仅此一例，当是后人增益成分。另外，汉代常用的释词方式如“某某声”、“某某貌”、“某某然”，也不见之于《尔雅》，也足以证明《尔雅》成书不可能是在汉代⑦。

确定了《尔雅》的成书年代，就可以进一步论断它的性质了。《尔雅》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呢？有的说它是字典，有的说它是训诂资料汇编，有的说它是类书，有的说它是百科全书。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也都有一定的事实作为依据，但又都是片面的，与编著者的本意是不相符的。

《尔雅》是一本为两个目的服务的教科书。欧阳修说：“《尔雅》出于汉世，正名命物，讲说者资之。”（《欧阳修全集》999页）这三句话讲了三个问题。第一句讲了成书年代，这是我们所不赞同的，上面已经说过了；第二句讲了编《尔雅》的目

的；第三句讲《尔雅》的性质是教科书。"讲说者"就是老师，"资之"就是以《尔雅》为凭籍、依据。明代的乔世宁也说："古者《尔雅》列诸小学，盖识名物，便训诂，自童子始也。"（《丘隅童见》，见丛书集成初编本3页）王国维只谈到《尔雅》在汉代是教科书，事实上，汉代用《尔雅》作教科书当是继承先秦古制。

"正名命物"是《尔雅》的第一个目的。清代的《尔雅》专家邵晋涵也说："《尔雅》者，正名之书也。"（《尔雅正义》卷十二）《尔雅》的正名有两个内容：一是辨名物。《周礼·地官·大司徒》说，大司徒的职责之一就是要辨九州之"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天官·庖人》说："掌共（供给）六畜、六兽、六禽、辨其名物。⑧"这里所说的"辨名物"是指对客观事物本身的名号与实体进行分辨，而这种分辨的结果笔之于书，就成为"名物释义"了，我们看《尔雅》中的释丘、山、兽、畜等篇，就可以印证《周礼》所说的"辨名物"不是纸上的空谈，当是实有其事。先秦时代，反映事物的"概念"，表示概念的"词"，纪录词的"字"，统称之为"名"，《尔雅》作为一部"正名之书"，既是辨析事物的概念，也是名物词的释义。正名的另一内容就是释方语，以雅言为标准，比较各地有关的方言词汇，有的是同一事物有不同的方言名称。如"中馗：菌"，"菌"是江东方言，"蛭：虮"，"虮"也是江东方言。有的只是方音的不同。如"茨：蒺藜"，"蟦：蛴"，"仓庚：商庚"。从这个意义上说，《尔雅》与《方言》在性质上有相同之处。《方言》卷一共计32个词条，其中有17个词条与《尔雅》相同或基本相同，占一多半。可以说，《尔雅》有

相当一些篇如果在释词部分加上方言区域，就成了《方言》，《方言》如果将释词部分的方言区域通通删掉，就和《尔雅》中的某些篇一个模样了。《尔雅》如此关心当时的方言，从政治上来说是为了加强与诸侯国之间的联系，研究别国方言，是现实政治联系的第一步。“夫习俗不同，言语不通，我得其地不能处，得其民不能使。”（《吕氏春秋·知化》）在春秋战国诸侯之争战中，言语问题是何等的重要。

《尔雅》作为一本教科书，还有第二个目的，就是解经。过去有的学者认为《尔雅》的唯一目的就是为经学服务，这个看法不全面，但并不是完全不对的。周初流传下来的文献（《诗》《书》《易》中的部分内容）到春秋战国时代也是“古代汉语”了，不经老师的训释，孩子们是读不懂的。《释训》把《诗》的叠字和释语编成大段韵文，就是为了便于儿童的记忆，《尔雅》把许多意义相关的词系联为一条，然后用一个词去加以解释，这种办法也可能是经师们的创造，应是古已有之，其目的也是为了学习的人记忆方便。当时注释并不附在经书之中，是独立成篇的，把独立成篇的注释贯通起来，再加以分类，就很容易形成《尔雅》这种性质的专书。

古代的语言学家们，大都很重视《尔雅》。从语言学史来评价，《尔雅》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尔雅》首创了按词的义类编排词汇的体例，它把2000来个词条分成19个义类，基本面貌是清楚的。后来的“雅书”差不多都模仿了这种分类法。按义类编排词汇，不便于人们查检，但《尔雅》原本就不是供查检用的字典，我们又何必从字典的角度去苛求它呢。

《尔雅》对词义进行解释时，态度比较实在，所以释义比较科学，它跟汉以后的词书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之处，就是全书“不语怪力乱神”，它只老老实实地去解释词义，没有那些节外生枝的说教，也很少有耸人听闻的怪诞异说。它的朴实的风格打着战国时代北方儒者的印记。

《尔雅》又是一部研究汉语词义演变史的好书。其中保存了不少先秦古义。如《释宫》：“宫谓之室，室谓之宫。”据此，我们可以判断：先秦时代宫室是同义词，《诗经·鄘风·定之方中》“作于楚宫”，又说：“作于楚室。”证明《尔雅》的释义是有语言事实为据的。“宫”在先秦时有“围绕”的意思，从《尔雅·释山》中可以得到证实：“大山宫小山，霍。”由于“宫”的“围绕”义汉以后已消失，有的人把这个句子的标点也搞错了。郦道元的《水经注》就以为“宫”是名词，结果成了“大山曰宫。”⑨又如“舅”这个词既可以指“舅父”，又可以指“公公”，指“公公”的意思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查《尔雅·释亲》就知道，先秦时候这个意义就存在了。《尔雅》对这两个义项的区别是很清楚的：“妇称夫之父曰舅。”又说：“谓我为舅者，吾谓之甥也。”

《尔雅》保存了一些天文、历法、地理、动植物等方面的资料，反映了战国时代自然科学研究方面的某些成果，这一方面使历代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对它产生兴趣，另外也为后来的训诂学家、词书编纂者注意这一方面的研究作出了榜样。郭璞说：“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这个评价是正确的。

《尔雅》也存在一些缺点。如把不是近义关系的词混为一

条。《释诂》："育、孟、耆、艾、正、伯：长也。"这六个词都用一个"长"字作释语，实际上意思并不同。"育"，是长养之"长"；"正、伯"乃长官之"长"（伯，本指排行，"孟"亦为排行之"长"。）；"耆、艾"为年长之"长"（六十曰耆，五十曰艾），共有三个义项。

有时把实词和虚词混为一条。《释诂》："孔、魄、哉、延、虚、无、之、言：间也。"被释的八个词中有五个是实词，是间隙、空隙的意思，有三个（哉、之、言）是虚词，是在句中起一种"语助"的作用的虚词，《尔雅》的编者认为这些词在"虚"这一点上与"孔"等词是一样的，就混到一块了。

还有的词条把假借字当作本字。《释诂》："栖迟，憩，休，苦……：息也。""苦"怎么会有"息"的意思呢？郭璞说："苦劳者宜止息。"这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实际上，"苦"应是"盬"的假借字。《诗·唐风·鸨羽》："王事靡盬。"这个"盬"字就是"止息"的意思[15]。

注：

①"皆君也"三字原本脱佚，今据《尔雅·释诂》及下条"皆大也"文例补。

②陆宗达《训诂简论》159页："《尔雅》在《释诂》、《释言》里曾用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用以翻译《尚书·尧典》的文字，与《尧典》的原文比较，以今释古，作出了许多互训。"

③《论语·述而》。

④阮元《问字堂赠言》已指出："泰山者，古中国之中也……古中国地小，以今之齐国为天下之中。故《尔雅》曰：齐，中也。又曰：中有岱岳。"见孙星衍《问字堂集》卷首。

⑤ "鱼枕"三句：释鱼之骨体。鱼的枕骨（在头骨中）似古文字中的"丁"字，鱼肠似古文字的"乙"字，鱼尾似古文字的"丙"字。可参阅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干》。"左倪"二句：左倪指西龟，右倪指北龟。《周礼·春官·龟人》："龟人掌六龟之属……西龟曰雷属，北龟曰若属。"雷"与"类"因声近而通。"不"为词头，亦写作"丕"，常出现在先秦文献中。

⑥梁启超这段话见《古书真伪及其年代》148页。据《汉书·王莽传》载：汉平帝元始四年曾征召"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谬、壹异说云。"可见，王莽不只是把通《尔雅》的人找了来，也把通《诗》、《书》、《礼》的人找了来。其目的是为了"正"文字之"乖谬"，"壹"训诂之"异说"，并没有说对《尔雅》原书有什么"增益"。

⑦可参阅洪诚《训诂杂议》，《中国语文》1979年5期。

⑧孙诒让《周礼正义》第一册"庖人"疏："名物，若《尔雅·释鸟》、《释兽》、《释畜》所说，种别不同，皆辨异之也"。（258页）又，第三册"大司徒"疏："名若《尔雅·释地》、《释丘》、《释山》、《释水》所说地名。"（692页）

⑨《水经注·庐江水》："余按《尔雅》云：大山曰宫。宫之为名，盖起于此。"

⑩1936年2月27日郭在贻先生来函指出："提到苦作止息解，是盬的假借，按：王引之《经义述闻》也是这么看的。此说恐不妥。据《说文》盬的本义是'河东盐池'，然则盬的止息义亦是假借义。朱骏声认为盬作止息解应是暇的假借，不管怎么说，苦、盬都不是止息这个意思的本字，因此不好说苦是盬的假借字。"盈按：此言甚是。可惜在贻兄已经逝世，再阅来函，不禁怆然伤怀。

附表

曾侯乙墓二十八宿名	尔雅十七星名及九次		星宿分野
角	角	寿星	郑
亢	亢		
氐	氐		
方	房		宋
心	心	大火	
尾	尾		燕
箕	箕		
斗	斗	析木	
牵牛	牵牛	星纪	越
女	○		吴
虚	虚	玄枵	
危	○		齐
西縈	定	娵觜	
东縈	东壁		卫
圭	圭	降娄	鲁
娄	娄		
胃	○		魏
矛	昴	大梁	
绊	毕		
此佳	○		赵
参	○		
东井	○		秦
与鬼	○		
酉	柳	鹑火	
七星	○		周
张	○		
翼	○		楚
车	○		

第三节　先秦时代的文字研究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把"标音字母的发明和使用文字来写文章"①，作为"高级野蛮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一个标志。他说："文字的使用是文明伊始的一个最准确的标志，刻在石头上的象形文字也具有同等的意义。认真地说来，没有文字记载，就没有历史，也没有文明。"②恩格斯肯定了摩尔根的这一观点。他说："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③

中华民族所使用的汉字是当今世界历史最悠久、寿命最长的一种文字。关于它的起源，战国时代已有明确的记载。

《荀子·解蔽》说："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

《韩非子·五蠹》说："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

《吕氏春秋·君守》说："苍颉作书。"

苍颉即仓颉。以上三种战国时代的文献都肯定仓颉是汉字的创始人。其中《荀子》谈到"好书者众"，意思是参与文字创作活动的不只是一两个人，而是有很多人，仓颉是创始人之一。这个说法更为确切。

仓颉造字说在古代已成为定论。如《淮南子·本经》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许慎《说文解字序》

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许慎说仓颉是黄帝时代的人，而且是史官，这都不可能是某些人凭空捏造，起码也会有远古传说作为根据。

由于科学文化的进步，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人们已经懂得，文字是由人民群众创造产生的，不可能是由某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独创而成。因此，对仓颉造字说表示怀疑，斥之为"荒诞"，甚而至于认为"仓颉"根本就不是人名。

如果我们赞同下面这个观点：许多伟大的发明创造，都要依靠群众和专门家相结合。那末，汉字的发生与发展也不会例外。原始文字为群众所创造，又有（一定有，必须有）专门家进行统一、整理、规范，才能发展成为全社会所共同承认的文字体系，仓颉就应当是这样的专门家。《荀子》所说的"壹也"，这个"壹"字值得我们仔细咀嚼。唐朝人杨倞在注释这句话时说："仓颉，黄帝史官。言古亦有好书者，不如仓颉一于其道，异术不能乱之，故独传也。""一于其道"就是对文字之"道"进行专门性质的研究，其内容自然包括收集、比较、规范等等。正因为仓颉能"一于其道"，对原始汉字的形成、统一起过伟大的作用，所以他的名字才能独传于后，永垂不朽。战国时代的史书《世本》卷一，在谈到"苍颉作书"的同时，还提到沮诵，原文为"沮诵、苍颉作书。"所以后世合称"沮苍"。

当然，我并不反对把仓颉、沮诵乃至黄帝，当作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也有可能这些名称并不是个人名称，而是部落的族称，但是，这并不影响汉字起源于黄帝时代的真实性、科学性。正如恩斯特·卡西尔所言："神话绝不仅仅是想象的产物。它并不是一个不健全、不正常的大脑的产物，也不是梦幻或幻想、荒谬观念

和怪诞观念的聚合体。它是对宇宙之谜作出的最初解答④。”我认为，把仓颉这个名字与黄帝联系起来，这就是对汉字起源之谜的最好解答。如何正确地理解这种“解答”，不能像老学究那样仅仅从先秦时代的几部经传中寻找直接根据，而要从整个人类社会各种原始文字的起源时代以及地下考古资料中寻找更为有力的证据。

根据多数史学家的研究，黄帝时代正是我国原始社会末期，也就是摩尔根所谓的“高级野蛮社会”时期。若按考古材料分期，即新石器时代。这个时期的人们已有相当发达的智慧和思维能力，他们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原始文化，我国古代不少发明都跟黄帝这个时代有关。我们认为原始汉字形成于这一时期，大的时代背景是不错的，古书的有有关记载是不应当轻易否定的。苏联文字史家B·A·伊斯特林认为：“图画文字的最终形成大概在新石器时代。”⑤又说：“在新石器时代，情况就不同了。在这个时代，在过去母系氏族集团的基础上产生了新的、更复杂、更庞大和更长时间的人们共同生活的形式——部落，然后则是部落联盟。部落和部落联盟往往占有广阔的空间；部落内部加强了劳动分工，因此也加强了要求以记载形式固定下来的劳动产品的交换；最初发展的是氏族——部落所有制，然后是个人所有制，要表现私人所有制就必需有标记、戳子等类的符号……部落之间和部落联盟之间的交易、战争以及其他联系也发展起来了。由于所有这一切，在新石器时代，对文字的需求必然成熟起来，因为文字是把语言固定下来并把它传至远方的最方便的工具。”⑥伊斯特林的论述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从宏观上理解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

中国上古时代，巫史不分家，他们是掌握文字的专门人才，是沟通天人关系、人鬼关系的权威，仓颉成为文字专家，也可能跟他的史官职责有一定关系。黄帝是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领，随着这个部落联盟的逐步扩大，其他部落的被消灭，语言、文字也逐步走向统一。正如分布在中华辽阔大地上的各部落会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或方言土语）一样，黄帝以外的部落也可能有自己的原始文字，所谓“作书者众”也可以这样来理解。既然战国时代的诸侯国还有“文字异形”的问题，更何况遥远的黄帝时代呢！因此，在黄帝时代出现一个统一文字的仓颉，跟黄帝统一中原地区的历史记载，可谓契合无间，不能不信。

再从地下考古资料来看，新石器时代也被考古学家称之为彩陶文化时期。已发现的陶器上的刻画符号，不少文字学家都认为是古老的原始文字。郭沫若说：“彩陶上的那些刻画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⑦在这样一个时代，出现了仓颉、沮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相反，把这些名字从神话传说中去掉，或许神话传说中根本没有这些人物，这倒是不可以理解的。至于汉以后的文献把仓颉神化、圣化，说他长着四只眼睛，生而知书，死于丙寅日，故“学书者讳丙日⑧”，这些附会之辞原于古人对文字的崇拜。所谓“仓颉四目⑨”也只不过强调了仓颉的视觉器官有特异之处，而文字正是要通过视觉发挥其功能的。

关于仓颉如何造字，先秦文献无明文记载。许慎说的“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又说仓颉从“鸟兽蹄迒之迹”受到启发，高诱为《吕氏春秋·君守》作注时也说“苍颉……写仿鸟迹以造文章。”他们这样说，想必是有先秦时代流传下来的材料作

为根据的，只不过这些材料已经失传，我们无法追溯其出典罢了。从许慎、高诱的话里可以引出两条结论：一是仓颉时代的文字还处于象形阶段；二是汉字起源于图画象形，符合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法国思想家语言学家保尔·拉法格说："人是从象形文字开始；他用物象的描写来代表物，狗表现为狗的图画。而后他过渡到象征的文字，全身只用它的某一部分来表现：用动物的头来表现它的全身。而后他上升到借喻的文字，他根据某物同被表现的思想有着真实的或假想的类似之点而作描写：狮子的前部被用来表示首位的思想，前臂被用来表示正义和真理，兀鹰被用来表示母性之道等等……⑩"原始汉字也经历过象形、象征、借喻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一点，从大汶口的陶文和商周的甲金文可以得到印证。总之，"依类象形"是原始汉字的基本特征。

先秦时代（含秦王朝）的文字研究，还有两件事情值得大书特书。一件是周王朝的书同文，一件是秦王朝的书同文。

先说第一件。《礼记·中庸》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明人邓退菴说："书即字，文即体式兼点画音声。"又说："以书而言，其笔之者非一人，而点画音声之文各有定法，四方如一也⑪。"所谓"今天下"无疑是指周王朝。

周王朝怎么"书同文"，我们从《周礼》的两条记载可以得到一点消息。

《周礼·春官·外史》说："掌达书名于四方。"郑注："或曰：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书之文字，得能读之。"孙诒让说："审声正读则谓之名，察形究义则谓之文，形声孳乳则谓之字，通言之则三者一也。《中庸》云'书同文'，《管子·君臣篇》云'书同名'，《史记·秦始皇本纪·琅琊台刻石》云

‘书同文字’，则‘名’即文字，古今异称之证也。云‘使四方知书之文字，得能读之’者，谓以书名之形声，达之四方，使通其音义，即后世字书之权与也⑫”

又《秋官·大行人》云：“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命；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属”是聚集的意思。象胥为语言之官，即翻译。瞽是乐师，史即大史、小史，掌管文字、文献资料、记言、记行的官员。孙诒让说：“此谓行人召侯国之象胥、瞽史来至王国，则于王官内为次舍，聚而教习言语、辞命、书名、声音之等也⑬。”

这些材料说明，统一文字（包括形音义），推广“雅言”，是周王朝每隔若干年就要进行的一项活动，且有专人负责此事。恐怕也就是适应这种文化活动的需要，壹王时代的大史籀编著了《史籀篇》。这种儿童识字课本对当时的“书同文”起了重要作用。也是由于中央王朝直接掌握文字，有专人对文字的声音、结构形式进行研究，所以《周礼·地官·保氏》出现了具有理论概括意义的“六书”说。证之以《左传》中的“于文，止戈为武”⑭，“故文反正为乏”⑮、“于文，皿虫为蛊”⑯，以及《韩非子》的“自营为厶”⑰，先秦时代的字形结构分析已具有政治说教的作用。

先秦时代还有一次“书同文”，就是人所熟知的秦王朝由李斯负责的文字统一工作。许慎说：“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足见，《仓颉篇》之类的字书不仅仅是为了供蒙童识字用，同时也是为了文字的统一。而文字的统

一，对民族的统一，社会的统一，都有积极意义。所以，当我们研究中国语言文字的发展历史时，绝对不可以低估从仓颉到李斯大约三四千年间在文字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仓颉、李斯都是中国杰出的文字学家。

注：

①② 《古代社会》11页，30页。杨东莼等译。

③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1页。

④ 《语言与神话》168页，于晓等译。

⑤⑥ 《文字的产生和发展》67页，69页。左少兴译。

⑦ 《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见《奴隶制时代》246页，1973年，人民出版社。

⑧ 《论衡·讥日篇》。

⑨ 《春秋元命苞》，转引自吕思勉《文字学四种》69页。山东沂南画像石墓刻有苍颉造字故事，苍颉刻有四目。《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

⑩ 《思想起源论》58页。王子野译，1963年。

⑪ 《四书补注附考备旨·中庸》。

⑫⑬ 《周礼正义》2139页，2984页，中华书局。

⑭⑮⑯ 《左传》宣公十二年，宣公十五年，昭公三年。

⑰ 《说文解字·厶部》许慎引《韩非》语。厶即私字，自营即自环，篆书字厶之形环绕如圆。

第二章　两汉语言学

（公元前2世纪——公元3世纪初）

概　　况

两汉王朝共有四百多年的历史。这一时期的语言学跟经学有密切的关系。从汉武帝开始独尊儒术，经学的地位越来越高；到东汉，经学发展到了极盛阶段。在汉代读经是博取功名富贵的重要途径，出身下层社会的人，也可通过读经获得进入仕途的机会。读经先得识字。两汉王朝对编写识字课本是很重视的。

西汉初年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三种课本汇编为《仓颉篇》，也称为《三仓》。汉武帝时司马相如编《凡将篇》，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编《急就篇》，汉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编《元尚篇》，西汉末年扬雄编《训纂篇》，东汉班固作《太甲篇》、《在昔篇》，汉和帝时贾鲂编《滂喜篇》（即《彦均篇》。后来晋朝人将《仓颉》、《训纂》、《滂喜》三篇合称为《三仓》。东汉末年蔡邕编《圣皇篇》、《黄初篇》、《吴章篇》、《女史篇》。上述这些课本只有《急就篇》流传至今，其余早已失传。这些课本的性质跟后代的《千字文》差不多，都算不上是语言学著作。

经学发展的直接结果是大大地推动了训诂学的发展。汉初有《毛诗诂训传》，东汉的马融和他的学生郑玄就是著名的训诂学家，给许多古籍作注。（可参阅张舜徽著《郑学丛著》、王利器著《郑康成年谱》）。另外，赵岐有《孟子章句》，王逸有《楚辞章句》，许慎有《淮南鸿烈解诂》，高诱为《孟子》、《战国策》、《淮南子》、《吕氏春秋》等书作注，甚至连东汉时成书的《汉书》，服虔、应劭也为之作注。古书注解的内容不外乎四个方面：字音，词义，名物制度，历史典故。而词义的解释占重要地位。

在词义研究方面值得一谈的还有贾谊《新书》中的《道术篇》以及蔡邕的《独断》，服虔的《通俗文》，汉末出现的《小尔雅》。

《道术篇》解释了56对有关伦理道德的反义词。如："兼覆无私谓之公，反公为私；方直不曲谓之正，反正为邪；持节不恐谓之勇，反勇为怯。"他这样解释反义词并不科学，但对于我们确定何者为反义词还是有帮助的。

《独断》保存了一定数量的汉代政治、人事词汇的释义。如："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诏；史官记事曰上；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所在曰行在所，所居曰禁中，后曰省中；印曰玺；所至曰幸。"又如："朕，我也。古者尊卑共之，贵贱不嫌。至秦，天子独以为称，汉因而不改也。"

《道术篇》和《独断》并非训诂专著，只不过其中有的内容属于词义研究的性质。《通俗文》和《小尔雅》是两本词汇专著。《通俗文》已经失传，从清人马国翰的辑佚看，这本书很注

重俗用词语的释义和方言词、同义词的辨析。如“陶灶曰窯”、“侏儒曰矬”，“伏伺曰狙”，“去汁曰滗”，“鸟居曰巢，兽居曰窟”，“徽号曰幖，私记曰幟”，“尘土日壓，灰尘曰埃”，“沉取曰捞，浮取曰摷”，“辛甚曰辣，江南言辣，中国言辛”。

《汉书·艺文志》载有《小尔雅》一书，不著撰人。成书于魏晋时代的《孔丛子》，内有《小尔雅》一篇，题为孔鲋撰。清朝人考证的结果，认为《孔丛子》中的《小尔雅》是伪书。这种性质的伪书，只不过作者“伪”，时代“伪”而已，如果我们不把它看成是孔鲋的作品，把它放在魏晋之前的东汉末年来处理，它就不“伪”了。《小尔雅》13篇，为广《尔雅》而作，所以篇名之前多加一“广”字，如“广诂”、“广言”、“广训”、“广义”等。本书对词的释义，大都可取。如说“凡无妻无夫通谓之寡”（广义），“诸，之乎也”（广训），“空棺谓之榇，有尸谓之柩”（广名），“跬，一举足也，倍跬谓之步”（度）。

两汉时期最为重要的语言文字学著作，有扬雄的《方言》，许慎的《说文》，刘熙的《释名》。这三部著作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方言》为汉语方言学的奠基之作，《说文》是两汉文字学和词汇学的结晶，《释名》是中国词源学的第一部专著。这三部著作各自代表语言文字学的一个分支，但又都以词义研究为中心内容，反映了这一时期语言学的主要特色。

第四节　汉代方言学

历古以来，我们中国就是一个土地辽阔、方言复杂的大国。

在第一章我们已经提到了，周秦时代就已经进行方言调查。汉代人把当时负责这一工作的官员叫做“轩车使者”、“遒（yóu）人使者”，或“𬨎轩之使”，这些称谓的意思是一样的。“𬨎”是一种轻车，“轩”是一种小车。“𬨎轩”后来成为一个词，就是指轻车，调查方言的使者乘这种轻车，所以就给他们加上了这样一些称号。

周秦王朝为什么要设立专管方言调查的官员呢？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十说：“此使考八方之风雅，通九州之异同，主海内之音韵，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风俗也。”通过了解各方言区的语言，以了解各地的风土民情，加强中央王期与各地的联系，这是他们的出发点。王莽天凤年间，刘歆给扬雄的信也说：“今圣朝留心典诰，发精于殊语，欲以验考四方之事，不劳戎马高车之使，坐知徭俗。”①扬雄的回信说：“其不劳戎马高车，令人君坐帏幕之中，知绝遐异俗之语。”②这两条材料也证明：调查方言是皇帝直接关心的一件事情，其目的是为了了解社会情况。

在扬雄给刘歆的信中，还谈到这样一件事，成都的严君平和临邛的林闾翁孺都见过“𬨎轩之使所奏言”。不过，他们所掌握的材料都不全，严君平才1千多字，翁孺也只是得其“梗概之法”（指体例、提要之类）。扬雄的话是可信的：一则严和林闾都是西汉末年人，他们上距秦王朝灭亡才200年光景，能见到𬨎轩使者方言调查的片断材料，这是不奇怪的；再则，据《华阳国志》卷十记载，这两个人不仅与扬雄同乡，又都是扬雄的老师。扬雄写《方言》，直接受到他们的影响。

由上面这些材料看来，扬雄写《方言》，并不是偶发性的行为，而是继承和发扬了周秦方言调查的传统；就个人条件而言，

扬雄最具备编著《方言》这样的著作的条件。

扬雄（有人考证"扬"应作"杨"。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字子云，四川成都人。他是文学家、哲学家，又是语言学家。他用27年的时间，从事方言研究。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方言》一书大概还不是定稿，很可能他没有把这本书写完就去世了。研究方言，必须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要有机会接触各方言区的人，只有向懂得某一方言的人进行口头调查，才可获得第一手材料，而要完成这种调查任务，调查者又必须要懂得当时的通语，并能分辨不同地区的方言；第二，当时没有音标，只能用汉字作记录方言的符号，这就要求调查者掌握大批汉字，对某些有音无字的词，调查人能自造汉字记录下来。这两条扬雄都具备。扬雄四十多岁的时候（汉成帝时）由老家来到长安，此后一直在长安任职，这就使他有机会熟悉当时的"通语"，有机会接触五湖四海的人，那些从全国各地来到长安的孝廉和士兵成了他的调查对象，他带着书写工具，到他们当中去，"以问其异语"③，然后加以汇集整理；扬雄还认识不少古文奇字（六国异体字），编写过识字课本，写过《仓颉训纂》，在文字训诂方面很有根底。这都是他进行方言调查的有利条件。还有一点也值得我们注意，扬雄是一个好模仿的人。他模仿《易经》作《太玄》，模仿《论语》作《法言》，模仿《苍颉》作《训纂》，至于《方言》，乃模仿《尔雅》而作④。扬雄的"模仿"，并不是依样画葫芦，拿他的《方言》来说，就是一部具有科学水平的独创性的著作。

《方言》为扬雄所作，原本没有什么异议。到了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提出《方言》不是扬雄写的，理由有三：一是《汉书·艺文志》和扬雄本传都没有提到此书；二是扬雄给刘歆

的信里谈到严君平这个人，君平本姓“庄”，后人因避东汉明帝刘庄的讳，始改为“严”，扬雄的《法言》并不讳“庄”字，为何此信独称“严”；三是刘歆给扬雄的信有这样一句话：“歆先君（指刘向）数为孝成皇帝言”，这意味着刘歆写此信时，汉成帝已经去世，所以称“孝”某帝，可是，此信的前面又说“汉成帝时”，前后抵牾。

对这三点理由，清朝人戴震作了批驳。扬雄的作品不见之于本传的，不只是《方言》，其它一些作品，也有为本传所不载的。刘歆写信向扬雄索取《方言》这本书稿时，此书尚未完稿，刘歆的《七略》因此不录此书，《汉书·艺文志》也因之不录。至于扬雄信中的庄君平被改为严君平，这是后人窜改本文所造成的。刘歆信前的一段话“汉成帝时”云云，乃后人加上去的介绍性质的文字，但写这段话的人很粗心，把刘歆在王莽时写的信挪到汉成帝时去了，洪迈执此“以疑古，疏谬甚矣”⑥。

在扬雄给刘歆写信时，还没有将此书命名为《方言》，只说《殊言》十五卷。《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这个名称不知是否为扬雄本人所定，这个书名长达12个字，这在古籍中是罕见的。因为这个书名太长，就产生了不同的简称，新旧《唐书》的“志”篇都简称为《别国方言》，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简称为《輶轩使者绝代语》。前者是把“别国方言”作为一个结构，后者实际上是把“释别国方言”作为一个结构。看来，新旧《唐书》的切分法比较合理，这个题目的意思是“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加“别国方言”。题目本身已说明了此书的内容不只是讲“方言”的，它包含对“绝代语”的释义和“别国方言”两个内容。当然，“绝代语”和“方言”对于某些具体的词来说，

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同一个词，从空间来看，与通语相对而言，它是方言；从时间来看，与今通语相对而言，它是绝代语。如："逢：迎也……自关而西或曰迎，或曰逢。"对通语"迎"而言，"逢"是关西方言词，但"逢"又是一个古词，在先秦时代它就有"迎"的意思。《孟子·告子下》："逢君之恶其罪大。"赵岐注："逢：迎也。"就"绝代语"而言，也不见得都是古之通语，其中也有古之方言。

今本《方言》共分十三卷。各卷的区分大都没有严格的标准。大致上卷一、二、三，是词语部分，其中有动词，形容词，也有名词；卷四释衣服；卷五释器皿、家具、农具等；卷六、卷七又是语词；卷八释动物，内容有飞鸟、走兽、家禽等；卷九释车、船、兵器等；卷十也是语词；卷十一释昆虫。这十一卷的体例基本一致，每一词条之下，都列举有关方言区的词相比较，以通语担任释词，各卷所收词条的数量也相差不太远。十二、十三两卷，在体例上与前面的十一卷大不相同。除卷十三的个别条目有方言词的比较，其它一律是以一个单词释一个或两个单词，其性质与《尔雅》的"释言"相类似。另外，这两卷所收词条的数量大大超过前面的卷，其中十二卷有102条，十三卷有149条，合计为251条。我以戴震的《方言疏证》为根据作了一个统计，全书共收词条658个⑥，那么，十二、十三两卷的词条占全书词条的比例为百分之三十八。因此，我怀疑原书是由十五卷变为十三卷，可能这后两卷原本是分四卷的，经过合并，就使全书少了两卷。至于十二卷和十三卷跟前面各卷的体例为什么不一样呢，记得有人说过，这两卷可能就是《训纂篇》的内容。这种解释令人难以置信。这两卷若是由《训纂篇》杂入的，那扬雄所说的十五

卷之数就差得更多了。合理的解释是，扬雄生前并没有把《方言》一书写完，现在的后两卷原本只是写作提纲，按原计划是要把有关方言的对比写进各条之下的。天凤三、四年间刘歆向他索求此书时，他解释说："而语言或交错相反，方复论思，详悉集之，燕其疑。"（各方言错综复杂，正打算进一步搜集材料解决一些疑难问题。）他要求刘歆"宽假限期"，待定稿之后，一定上呈，"何敢有匿？"大概此后不久，他就因病去世了。

《方言》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有重要意义。这本书还没有问世的时候，就有人做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是悬诸日月不刊之书也"⑦。历史证明，这个评价不算过分。粗略而言，它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意义：

一、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个人力量进行全国性方言词汇调查的一本书。

周秦时代有过方言调查，但那是官方进行的；明清时代也有人写过方言词汇书，但都是限于某一地区，影响甚微。扬雄的方言调查，差不多涉及到了全国各大方言区。东北至朝鲜，西北至西秦（今河西走廊），东南至吴、越、西瓯，西南至梁益，南至桂林。扬雄对方言区的划分，与当时的地理形势和行政区域密切相关，大致有三类：

1.大方言区。以关（函谷关，汉武帝时改设在今河南新安县境）、山（崤山或华山）、河（黄河）、江（长江）为标志。书中所说的"自关而东"、"自关而西"，"自山而东"、"自山而西"，"自河而北"，"自江而北"，这都是大方言区。

2.次方言区。有以古国为界线的，如秦、晋、赵、魏、燕、郑、宋、齐、鲁、陈、楚、吴等；也有以州郡为界线的，如青、

幽、徐、雍、梁、益、荆、扬、蜀、凉州等。

3.小方言区。以河流区域为标志的，如淮、泗、沅、澧、湘、瀑、洭、（今广东连江，又名湟水。）洌水等；以古地名为标志的，如周南、召南、洛、郢、宛、湘潭等。

扬雄的调查是以单个的方言词作为对象，而不是以每一个方言点作为对象。他对方言区域的划分是依词而定，所以方言分界线很复杂，但基本面貌还是能看得出来的⑧。

二、《方言》为我们了解汉代普通话的词汇提供了重要依据。扬雄明确提出了“通语”（又叫“凡语”、“通名”）这个概念。书中标明为“通语”或“凡语”的有二三十处。如卷一注明为“通语”的有：

娥㜲：好也……好，其通语也。

怃俺怜牟：爱也……宋鲁之间曰牟，或曰怜。怜，通语也。

悼惄悴慭（yìn）：伤也。自关而东汝颍陈楚之间通语也。

嫁逝徂适：往也……往，凡语也。

硕沈（dān）巨濯订（xū）敦夏于：大也……㭋（洛含反，与惏同）：齐语也。于：通语也。

以上五条材料说明：扬雄所说的“通语”有两个含义：一是不属于某一方言区的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如例一、例四；一是某一方言区的共同语，如例二、三、五。当然，那些没有注明为通语的解释词，同样具有通语的性质。如卷一共计三十二条，用来作解释的词有：

知、慧、好、余、养、爱、哀、痛、伤、忧、思、大、

至、往、惧、杀、老、长、信、会、盛、廓、续、跳、登、迎、取、食、勉。

这些词不唯西汉末年是通语，有相当一部分在先秦时代就是通语，有的在汉以后仍然是通语。大概从周秦到汉，通语中的基本词汇是相当稳定的。不过，汉代的通语跟春秋战国时代的“雅言”也不会完全一样。“雅言”是以山东六国为中心形成的通语，汉代的通语无疑受到自关以西秦晋方言的影响，一些关西方言上升为通语就可以证实这一点。如：

踏（tà）蹯踌（fú）：跳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曰跳。

（卷一）

逢逆：迎也……自关而西曰迎。

（卷一）

予赖：雠也。南楚之外曰赖，秦晋曰雠。

（卷二）

扇：自关而东谓之箑（shà），自关而西谓之扇。

（卷五）

布谷：……自关而西或谓之布谷。

（卷八）

蝙蝠：……自关而西秦陇之间谓之蝙蝠。

（卷八）

箭：自关而东谓之矢……关西曰箭。

（卷九）

盾：自关而东或谓之瞂（fá），或谓之干，关西谓之盾。

（卷九）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上古汉语（这里指周秦至西汉）的词汇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秦以前为一阶段，关东雅言是通语；秦汉又是一个阶段，关西方言上升为通语。而关东、关西这两大方言又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传播，对南中国各方言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有些本来是北中国的方言词，后来传到了南中国，如"蜩"、"蟋蟀"都见之《诗·豳风·七月》，而《方言》只说"楚谓之蜩"，"楚谓之蟋蟀"（卷十一），这两个词都变为楚方言了。

三、《方言》在词汇研究方面的作用。

《方言》是一座沟通古今的桥梁。上可以了解先秦古词，下可以用来研究现代词汇。我们在讲《尔雅》的时候已经谈到了，《尔雅》有不少同义词本来自方言，但《尔雅》没有将方言区的名称列举出来，《方言》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不足。应劭、郭璞、常璩、杜预都把《方言》与《尔雅》相提并论，不是没有原因的。下面我们列举两书的某些条目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尔雅·释诂》：佥、咸、胥，皆也。

《方言》卷七：佥、胥：皆也。自山而东五国之郊曰佥，东齐曰胥。

《尔雅·释诂》：烈、枿（niè）：余也。

《方言》卷一：烈、枿：余也。陈郑之间曰枿，晋卫之间曰烈，秦晋之间曰肄，或曰烈。

如果《尔雅》加上"陈郑"至"曰烈"等二十一个字，《尔雅》不就成为《方言》了吗，又如果《方言》删去这21个字，《方言》不就成了《尔雅》了吗？

还有《尔雅》一个条目，在《方言》中析为数条，如：

《尔雅·释诂》：弘、廓、宏、溥、介、纯、夏、幠(hū)、厖、坟、嘏、丕、奕、洪、诞、戎、骏、假、京、硕、濯、讦、宇、穹、壬、路、淫、甫、景、废、壮、冢、简、箌、昄、晊、将、业、席，大也。

《方言》卷一：敦、丰、厖、乔、幠、般、嘏、奕、戎、京、奘、将，大也。凡物之大貌曰丰；厖，深之大也；东齐海岱之间曰乔，或曰幠；宋鲁陈卫之间谓之嘏，或曰戎；秦晋之间凡物壮大谓之嘏，或曰夏；秦晋之间凡人之大谓之奘，或谓之壮；燕之北鄙，齐楚之郊或曰京，或曰将，皆古今语也。初，别国不相往来之言也，今或同，而旧书雅记故俗语，不失其方，而后人不知，故为之作释也。

《方言》卷一：硕、沈、巨、濯、讦、敦、夏、于，大也。齐宋之间曰巨、曰硕……荆吴扬瓯之郊曰濯，中齐西楚之间曰讦，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伟之谓之夏……

《方言》卷一：坟，地大也。青幽之间凡土高且大者谓之坟。

《方言》卷一：张小使大谓之廓。

《尔雅》一个词条，《方言》分之为四，它的释义比《尔雅》细致，《尔雅》用一个"大"字解释了39个词，而《方言》区分了各种不同的"大"。如"厖"是"深之大"，"嘏"是"物之壮大"，"壮"是"人之大"，"坟"是"地之大"等。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方言》点明了这些词"皆古今语"，原本是"别国不相往来"的方言词，"今或通"。《方

言》卷一另一个词条下也有类似的话："皆古雅之别语也，今则或通。"这里所说的"古"是指先秦时代，"今"指扬雄所处的西汉末年。先秦时代这些词是"别国不相往来之言"，到了扬雄时代变成"或通"了。这是汉代全国统一，"别国"往来增加，方言渐渐缩小的一个例子。既然"今或通"，为什么扬雄还要来"作释"呢？对此，扬雄特意作了说明：从前《尔雅》记载训故、方俗语时，本来对这些方言词的来历是明白的，而后人已经不懂了，所以给它作解释⑩。我们在本书第二节中讲了《尔雅》正名的内容之一是释方语，这些话又提供了确证；另外，这些话也可以证明《尔雅》绝对不是西汉时代的作品，因为《尔雅》中所汇释的方语，汉代人已经不知其"方"了，有的变成了"今则或同"。《方言》中的"绝代语释"有不少就是释《尔雅》的。

《方言》距今将近两千年了，其中有些词在现代方言中仍然保存着。如：

楚谓之党，或曰晓。 （卷一）

南楚曰攓。 （卷一）

秦晋之间曰搜，就室曰搜。 （卷二）

甂、㼜：罂也。鄱桂之郊谓之甂，小者谓之㼜。 （卷五）

器破而未离谓之璺。 （卷六）

所以刺船谓之篙。 （卷九）

崽者，子也。湘沅之会，凡言是子者谓之崽。 （卷十）

筑娌：匹也。 （卷十二）

这些词有的一看就能明白；有的不太明白，是因为语音变化

或书写形式不同。如"党"就是"懂"，易其音即可得其词。"攓"就是"捡"，"䫉"就是"额"，"煤"就是"緈"，改古字为今字，我们对这些词就不难识别了。

四、《方言》在方音研究方面的作用。

《方言》不是研究方音的，可是它记载的某些词在语音上是有联系的，如果当时有了音标，这些词的语音对应关系就显示出来了。扬雄已经敏锐地觉察到，某些方言词的区别是方音不同造成的，他把这种情况称之为"转语"。如：

庸谓之倯，转语也。 （卷三）

煤（huǐ）：火也，楚转语也。犹齐言"焜（huǐ），火也。"

（卷十）

䵷䵷，……或谓之蠾蝓。蠾蝓（zhū yú）者，侏儒语之转也。

（卷十一）

㘓哰（lán láo），謰謱（lián lóu），拏也……南楚曰㘓哰，或谓之支注，或谓之詀謕（zhān tí），转语也。

（卷十）

鋌，尽也……物空尽曰鋌。鋌，空也。语之转也。

（卷三）

有的地方把"庸"说成"倯"（sōng）"，"庸""倯"叠韵，懒惰无能的意思。《玉篇》："㛴，嬾女也。""庸"、"㛴"通。"倯"是现在的"悚"。《广韵·锺韵》："倯：倯恭，怯貌。"庸、倯在远古时代可能为复声母。庸为喻四、倯属心母，远古当为S词头。

楚国人把“火”叫做“煤”，齐国人把“火”叫做“焜”。“火”、“煤”、“焜”三字为双声；“火”、“焜”归微部，“煤”归歌部，微歌傍转。

有的地方把“蜘蛛”叫做“蠾蝓”，“蠾蝓”是“侏儒”的音转。蜘，端母；蠾，侏，章母。端章二母相近。蛛、蝓、儒，都属侯部，三字韵部相同。

“支注”与“詀謕”怎么构成“转语”呢？支，章母；詀，端母。（《广韵》音竹咸切，上古属端母）。章端二母相近。注，端母，謕（音义同“啼”），定母。端定声近。支与詀为准双声，注与謕为准双声。

“铤”为“空”之语转。铤，耕部；空，东部。二字韵相近。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就能了解到，所谓“转语”是指两词声母相同，或韵相同，或声韵相近，它们在意义上是相同的，是同一词的不同写法。“转语”跟“假借”不同，假借字只是语音相通，意义上没有联系。“转语”是语音上有联系的方言同义词。在《方言》一书中，有不少未注明为“转语”的，事实上也存在语音上的联系，若将这些材料全部加以排比归纳，对了解当时的方音面貌是有意义的。

扬雄还提出了“代语”这个术语。如卷十：“𧊒鰓(jlè sāi)、乾（gān）都、耇（gōu）、革：老也。南楚江湘之间代语也。”郭注：“凡以异语相易，谓之代语。”代语的性质跟转语一样，都是用来说明方音演变关系的。详说可参阅殷孟伦《子云乡人类稿》146页。

《方言》还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古书上一些训诂方面的问题，

这些就不细谈了。这里需要提一笔的是：为什么像扬雄这样的大学者花了27年的时间，才写了九千字的一本《方言》⑪，而且去世之前尚未定稿呢？我们设想，27年中扬雄不可能天天干这个，但这项任务的艰巨性也是可想而知的，他每写一个词条都要付出艰苦的劳动。如：

蝉，楚谓之蜩（tiáo），宋卫之间谓之螗（táng）蜩，陈郑之间谓之蜋（liáng）蜩，秦晋之间谓之蝉，海岱之间谓之蛴（jí），其大者谓之蟧，或谓之蝒马，其小者谓之麦蚻（zhá），有文者谓之蜻蜻（qīng），其雌蜻谓之疋（jié），大而黑者谓之䗲（zhàn），黑而赤者谓之蜺（ní）。

（卷十一）

要写下这么一个内容丰富的词条，并非易事。其中涉及的地区有楚、宋、卫、陈、郑、秦、晋、海、岱⑪，所出现的与蝉有关的名称达12种之多。要取得这样一些材料，他要亲自询问多少人？要写多少原始笔记？至于词目的确定，对应关系的确定，方言同语线的确定，都是煞费苦心的事。

扬雄着手写《方言》时，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一直坚持了27年之久。当我们想到这位不慕富贵的老人，这位与刘歆、王莽共过事的老人，怀铅提椠，在长安街头访问那些口操各种方言的孝廉、士兵时，不能不对他产生敬意，不能不感谢他为中国语言学史留下了这样一份宝贵的遗产。

注：

①据戴震考证，此信写于天凤三、四年间。戴说见《方言疏证·序》。圣朝，指王莽新朝。

②扬雄：《答刘歆书》，附于《方言》之后。

③扬雄：《答刘歆书》。

④《华阳国志》卷十扬雄条："史莫善于《苍颉》，故作《训纂》；典莫正于《尔雅》，故作《方言》。"

⑤戴震：《方言疏证》卷十三，341页。万有文库本。又，清人陶方琦认为："今之《方言》即《扬雄仓颉训纂》旧书。"今人马学良先生认为："扬雄采集方言的目的既为验证《仓颉》之诂训，那么《方言》实为《扬雄仓颉训纂》篇中之注释……《汉志》既收《扬雄仓颉训纂》其书，则《方言》即在其中矣。"（《罗常培纪念论文集》69页）

⑥若依周祖谟先生的《方言校笺》统计，则为674条。还有人统计为669条。各家所得结论不同，是因为对词条的划分不同而产生差异。

⑦张伯松语。见扬雄《答刘歆书》。张伯松是张敞的孙子，于王莽居摄元年封淑德侯。

⑧有人把书中的方言区分为11系，也有人分为14系。

⑨关于"旧书雅记故俗语，不失其方，而后人不知，故为之作释"这几句话，郭璞、戴震、卢文弨、王念孙各有不同的解释。郭璞认为"雅"指《尔雅》，戴震释"雅"为"常"，全句释为："旧书所常记故习之俗所语，本不失其方，而后人不知，是以作《方言》以释之。"（见《方言疏证》14页）卢文弨采用丁杰的意见："雅"当如郭氏解，若以"雅"为"常"，下节"古雅"训"古常"，尤不成辞。卢氏认为"书雅"当连文，"记"谓记载，"故"谓训故，"俗语"，乡俗之语，"为之作释"，乃自明作书之意。盈按："释"即"绝代语释"之"释"。王念孙释"雅记"为"故记"，通指六艺群书而言。我们取卢说。卢说见《重校方言》卷一，8页。

⑩今本《方言》有一万一千九百余字。

⑪《尚书·禹贡》："海岱惟青州。"岱：指泰山。青州东至于海，西至泰山。

第五节　汉代文字学

两汉时代所发生的今文经学派与古文经学派的斗争，直接推动了汉代文字学的发展。经过一百多年的斗争，培养了一批有高水平的文字学家，产生了象《说文解字》这样的优秀名著。可以说，《说文解字》是古文经学派战胜今文经学派所建立的一座丰碑。

何谓"古文经"？古文经原本主要是指秦以前用鲁国文字写的经书。它是与"今文经"相对立的一个概念。所谓"今文经"是指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的经书。这两种经书的不同反映了从战国到汉代中国文字的演变历史。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立即着手了"同书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琅邪刻石》）的工作，对汉字作了一次大规模的整理，规定以小篆作为标准文字，从而结束了战国时代"文字异形"的混乱局面。到了汉代，隶书成了通用文字，不仅战国文字一般人已经不认识，就是秦代小篆也为多数人所不认识了。如汉武帝时有一位名叫石建的郎中令，他在写奏折时，把篆文𩡧（马）字写错了，非常惶恐，担心皇帝要定他的死罪。（建曰："误书！'马'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①）另外，像蒙童识字课本《苍颉篇》，其中"多古字，俗师失其读。

宣帝（公元前73年——前49年）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之外孙之子杜林（？——公元47年），为作训故"。②直到东汉初年，篆文的书写还相当混乱。如光武帝时，城皋县县令、县丞、县尉三颗官印上的篆文"皋"字，就有三种写法。"城皋令印，'皋'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③因此，马援上书，要"荐晓古文字者"，"齐同"郡国印章。这些事实都说明，汉代只有少数人懂得古文字，古文字（小篆及六国文字）已成为专家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再也不是全国通用的书写工具了。

隶书兴起，古文废绝，为什么会形成学派斗争呢？与文字学又有什么关系呢？

汉武帝末年，有人从孔子住宅的墙壁里发现一批古文儒家经典（《古文尚书》、《礼》、《论语》、《孝经》等），从文字形体到经书内容都与当时流行的经典不同，如拿古文尚书和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相较，有脱简，有脱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④。这些古文经在西汉时期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当时的经学博士都是今文经学的人，古文经学是不列于学官的私学。汉哀帝（公元前6年——公元前1年）时，刘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⑤，遭到今文学派的强烈反对。为此，刘歆写了有名的责让太常博士书，正式拉开了古文学派与今文学派斗争的序幕。这场斗争，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古文学派只是为了争着要给自己这个学派建立几个博士，事实上反映了两种不同学风的斗争。

今文学派是偏于保守的。古文经的发现，应该说是一件有意义的新鲜事物，今文学派却不肯接受这个新鲜事物，他们"抱残

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⑥。

今文学派对经书的解释又很不科学，大搞其烦琐哲学。“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pí）老，且不能究其一艺⑦。”有的“便（pián）辞巧说，破坏形体（指字形），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⑧。有一个名叫秦近君的人，“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⑨。

东汉时期，古文学派渐渐占了优势，当时的著名学者如杜林、班固、贾逵、许慎、马融、郑玄等人，都是古文经学家。古文经学派对经书、对语言文字的解释当然也有种种不正确之处，但他们继承了《尔雅》、《毛诗诂训传》的传统，比较地注意从语言事实本身去解释文意。一般说来，治学态度也比较严肃，后人所谓的“汉学”、“朴学”、“实事求是”之学，主要以古文经学派为代表。许慎的《说文解字》就是“汉学”的代表作之一。

许慎，字叔重，东汉汝南郡召（shào）陵县万岁里（今河南郾城县）人，生卒年不详。据清人考证，大约生于汉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卒于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历任汝南郡功曹，太尉府南阁祭酒，沛郡洨（xiáo）县（今安徽固镇东）县长。汉安帝永初四年（公元110年)曾与马融等五十余人校书东观（国家图书馆）。著有《五经异义》、《淮南子注》（二书均已失传），并用二三十年的时间写成了不朽名著《说文解字》。许慎生平事迹，今人张震泽编著的《许慎年谱》可参阅。

关于《说文解字》的体例、内容，前人已经写了很多文章加

以介绍。作为一本语言学史，应该据《说文》以总结许慎的学术观点及其治学方法，研究《说文》一书在语言学史上的历史地位。

许慎能够写成《说文》这样的名著，除了社会、历史条件之外，就他主观条件而言，最为重要的是有先进的学术观点和科学的治学方法。下面四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讲发展；二、讲系统；三、重材料；四、重证据。

一、讲发展。文字是发展的，汉字也是发展的，对于今天的人来说，这个观点并不新鲜，也并不难以理解。可是，东汉时候的今文学家却不这样认为。他们"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10]这就是说，他们把当时通用的隶书当作远古造字时代的东西。他们的理由是：文字嘛，祖祖辈辈相传，怎么会发生变化呢？许慎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在他的《说文·叙》中一开头就讲汉字演变史，从黄帝史臣仓颉"初造书契"（笔者按：文字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仓颉最多是进行了一番整理工作）讲起，一直讲到秦始皇统一文字，讲到隶书的产生，古文的绝迹。其中谈到"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还谈到战国时代，"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学术观点的正确与否是非常重要的。今文学派用一成不变的观点看待文字，所以他们面对着一堆古文字材料，采取不承认主义，说什么古文字是一些"好奇"的人，故意改变隶书的字形，"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燿于世"。[11]这跟近代有人坚持认为甲骨文是伪造出来的说法一样，都是极其荒谬的。许慎因为有了发展的观点，就有了科学的批判武器，就能揭露今文学家在解释文字、经义方面的种种谬说。

二、讲系统。一个研究工作者，研究任何一个事物，都要努力揭示研究对象的内部系统，研究文字也不能例外。许慎已经很明确地认识到：汉字的内部结构有其严密的系统性。这个系统就是“六书”。六书说在战国时代已经提出（见于《周礼·地官·保氏》），班固（见《汉书·艺文志》）和郑玄（见《周礼·保氏》注）也谈到六书，但是，第一个用六书说对古文字进行大规模分析的人则是许慎。现在有人批评六书说不科学，也有人批评许慎在具体归类上有些不恰当的地方，这样的批评或讨论当然是有意义的。不过，我们不能不承认，六书说的主要内容是正确的，许慎对具体字的归类大部分是正确的。据清人朱骏声统计，《说文》九千多字，其中象形字364，指事字125，会意字1167，形声字7697。转注、假借不属于字形结构问题，故不在统计之列。这种分类是否完全符合许慎的本意呢，也不见得。如指事字，许慎标明为“指事也”的只有一个“上”字，究竟哪些字属于指事，它和象形字的区别标准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有可讨论的余地。我们不是肯定许慎每一个具体字的归类，而是肯定他所确立的基本系统，这两点是应该分清的。

由于许慎能从古文字本身去研究每一个汉字的内部结构，所以他开创了“据形系联”的部首归字法，这种方法不仅便于检字，也为后来的部首检字法奠定了基础，而且还揭示了字义内部的系统性。汉字是表意文字，同一形符的字在意义上有联系，《说文》的540个部，事实上也就是540个义类。这一点，许慎讲得很清楚。他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条牵属，共理相贯。”⑬所谓“类聚”“群分”“同条”“共理”，包括字义、字形两方面的系统性问题。而与许慎同时代的今文经学派就不懂

得文字内部是有系统可循、有系统可言的，他们把汉字看成一盘散沙，“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13]许慎批评他们为“俗儒鄙夫”，这是很正确的。

三、重材料。讲发展、讲系统，都要有材料作为基础。所见的文字材料有限，就看不出发展，也建立不起科学的系统。许慎给自己制订的写作原则是：“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14]他的儿子许冲也说：“盖圣人不妄作，皆有依据。”（《上〈说文〉表》）这都是强调材料的重要性。

许慎在收集古文字材料方面一定做了大量工作。他所见到的古文字材料有三种：篆文（指秦代小篆）；古文（战国时的鲁国文字）；籀文（春秋战国时秦国通用的文字）。古文、籀文与篆文一致的，则只出现篆文，与篆文不合的，则分别列出。这些材料的来源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小篆主要取自汉初书师编写的《仓颉篇》，司马相如的《凡将篇》，扬雄的《训纂篇》，另有秦刻石等方面的材料；古文主要来自“孔子壁中书”，还有出土鼎彝铭文，书中标明为古文的共510个字；籀文主要来自《史籀篇》，书中标明为籀文的有225个字。古文、籀文与小篆形体有差异，这是肯定的，但差异不会非常之大，所以许书标明为古文、籀文的字加起来也不过700多个，占全书所收字的比例还不到十分之一。所占比例虽很小，而三种文字材料的比较则是很细致的一项工作，不通过比较，许慎怎么能分别异同呢？许慎说：“今叙篆文，合以古籀。”这一个“合”字就包含着很多必不可少的琐碎的技术性的劳动在内。

四、重证据。许慎对于“不知而不问，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衺辞，使天下学者疑”[15]的学风是非常反对的。他著

《说文解字》时，就严格要求自己，必须做到“信而有证”⑯。他求证的方法有：

1.“博采通人”，“博问通人”。“通人”，是汉代的常用词。什么叫做“通人”呢？王充有一个解释：“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论衡·超奇篇》）又说：“通人胸中怀百家之言。”（《别通篇》）许慎所说的“通人”，有古之通人，如孔子、楚庄王、韩非、司马相如、董仲舒、刘歆、扬雄等；有东汉时代的通人，如杜林、班固、傅毅、卫宏、张林、王育、谭长等。大概有文字根据者则“采”之，无文字根据者则“问”之。“采”“问”而至于“博”，也足以证明许慎治学谦虚，能吸取众家之长，这是《说文》得以成为集大成著作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

在许慎所“博问”的“通人”中，有一个特别值得提出来一谈的人是贾逵。

贾逵（公元30年——101年），是东汉前期著名的学问家，古文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注解过《左传》、《国语》，又精通天文学。他的父亲贾徽是古文经学派开创者刘歆的学生，贾逵悉传父业，是刘歆的再传弟子，而许慎又是贾逵的及门弟子。许慎从汝南郡举孝廉到京师洛阳之后，“从逵受古学”，关于文字方面的问题，也多“考之于逵”（《上〈说文〉表》）。贾逵传授给许慎的“古学”，就是古文经学。段玉裁说：“古学者，《古文尚书》、《诗毛氏》、《春秋左氏传》及仓颉古文、史籀大传之学也。”⑰许慎在古文字研究方面能取得这样优异的成绩，固然首先是由于他本人好学深思，刻苦钻研，但其中肯定包含着贾逵的研究心得。

2.书证。许慎在解释词义时，对一些不很明白的词义，就引用古文经典为证。“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⑱对于一些缺乏证据解释不清的词义，则采取存疑的态度（“盖阙如也”。《说文·叙》），这都是很科学很老实的态度。

3.许慎不仅引用经典证词义，还引用了四十多种方言为证。《说文》出现的方言地区有古国名，如秦、晋、韩、宋、赵、齐、吴、楚等，州郡名有梁、益、青、徐、汝南、陈留、河内、陇西等，所证词义有170多条。这些方言资料，有的取材于扬雄的《方言》，有的是他所熟悉的家乡话，有的也可能是“博问”而来。许慎博采方言口语以证词义，对后世学者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段玉裁为《说文解字》作注时就学习了这一方法。

在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上，许慎是一个继往开来的人物，他对中国语言文字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创学科。中国的文字学、字典学真正成为独立的学科，是从许慎开始的。许慎是第一个编纂汉字字典的人，也是第一个从理论上阐明文字重大意义的人。他说：

> 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⑲。

这段话讲了三个问题：文字与经艺的关系；文字与王政的关系；文字作为一种信息在传递人类文化知识和社会经验方面的伟大作用。

迄今为止，评论《说文》的人总还是要捎上一句：《说文》是为“尊孔读经”服务的。证据就是许慎引用了孔子的话。如果

引用了孔子的话就算是“尊孔”，我们现在有的文章不是也引用孔子的话吗？至于为读经服务，这话也带有片面性。经书是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在也还要研读。许慎讲先秦古义，不引经据典能行吗？与其说《说文》是为读经服务，还不如说许慎读经是为写《说文》服务。许慎在经学上达到了“五经无双”[20]的最高水平，这对他写好《说文》不能说没有帮助吧。而且许慎所强调的是“文字者经艺之本”，而没有倒过来说“经艺者文字之本”。许慎把经艺当作一种语言资料来研究，让它为解释词义作证、服务，这有什么不好呢？这不正好说明他已经是把语言文字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对待了吗！当然，许慎的思想是属于儒家学派的，他的读经和我们今天的读经在观点上自会有不同之处，他的儒家思想也使《说文》在科学性方面受到限制，这些都是无庸讳言的。

至于文字和王政的关系，如果从抽象的原则来说，各个时代都很重视。在中国古代，没有哪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对文字问题是漠不关心的。汉平帝元始年间（元始四年或五年），曾召开过有关文字问题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一百多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扬雄的《训纂篇》就是根据这次会议的材料写成的。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在洛阳白虎观召开了一次经学问题讨论会，这是今文经学派想通过皇帝的权威战胜古文经学派的一次辩论会。这次会议所产生的一个文件叫做《白虎通义》，也叫《白虎通德论》，简称《白虎通》。文中对许多有关名物制度的字义进行了解释，黄侃认为“汉以来说经之书，简要明晳者，殆无过《白虎通德论》。设主客之问，望似繁碎，其实简明。”[21]有趣的是这本反映今文经学说结晶的书，它的执笔人却是一个古文经

学家（班固）。许慎头脑中的“王政”也必然要受到《白虎通义》的影响，要知道，董仲舒的“深察名号”的唯心主义思想是汉代的正统思想，《白虎通义》、《说文解字》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这一套。从积极方面看，许慎所处的时代连廷尉都随意“以字断法”，玩弄“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之类的把戏㉒；鄙夫俗儒们竟然说什么《仓颉篇》是“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仙之术焉”㉓。在这种情况下，许慎强调一下文字为“王政之始”，我认为是有进步意义的，不应不加分析就盲目反对。

如果说以上两点多少总还带有封建意识的话，那么第三点：“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这已经完全是科学的论断了，这是对文字的本质、对文字的社会作用的正确评价。这个问题不需要多加说明，读者也是很明白的。

二、通百科。许慎写《说文》，曾经“博采通人”，他把许多“通人”的知识集合于一身，他自己就变得“无所不通”了。他的《说文》对“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蚰（kūn）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上〈说文〉表》）这就意味着许慎必须精通以上各方面的知识，必须掌握当时人们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认识上已取得的成果，才能写出《说文解字》来。这部著作的内容已大大超出经学的范围了，经书上有的字他应该说解，经书上没有出现的字他也应该说解，九千三百五十三个字，要一一讲出一个道理来，还不能胡说（这句话只有相对的意义，拿我们今天的水平衡量，也有“胡说”之处），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凡是编过字典的人就会明白此中的甘苦吧。以一人之力，要成此伟业，实非易事，而许慎完成得

这么好，他无疑是一个聪明过人，而又脚踏实地、勤奋苦干、甘心献身科学的了不起的人物。

正因为《说文》涉及的知识面如此广泛，所以至今不仅搞语言文字的人要研读它，就是其它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的人有时也要利用《说文》。本世纪20年代末期，程树德教授（程氏福建人，前清翰林，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任教京师大学堂，后任北大、清华教授）写过一本《说文稽古篇》，他提出了“因字求史之法”，利用《说文》研究先秦两汉的制度、风俗，这也是了解古代社会的一种方法。

三、存古篆。许慎是保存小篆的功臣，《说文》所收小篆达九千多，是保存秦篆最为完整的一本字典。许慎所见的篆文并不一定是秦小篆的真面貌，我们今天所见的《说文》小篆又并不都是许慎写定时的真样子，但大体上还是可靠的。有了小篆这个桥梁，我们才能上探甲骨金文的字义，下推隶楷演变的轨迹。过去有人给许慎扣上“复古主义”，“反对文字改革”之类的帽子，这是违背历史的不公之论，秦始皇若地下有知，恐怕也不会赞同的。

四、“达神恉（旨）”。《说文》是我国第一部字典，和后来的字典所不同的是：它不是一般备查检用的字典，而是以研究字的本义为目的的字典，也就是要“达”造字的“神恉”。所谓“达神恉”，并不只是泛指通晓六书之义，而是通过字形、字音的说解以推求每一个字的神妙的旨意所在，即明瞭其本义所在。所以，《说文》一字之下，一般只有一个释义，而不罗列其它义项。但说解字的本义，难度相当大，许慎时候的学者已经是“知此者稀”，尤其是一般俗儒，据隶书以析字义，闹出了“马头人

为长，人持十为斗”之类的笑话。许慎讲本义未必字字都正确，讲对了的还是占多数，可贵的是他为自己确立了这样一个正确的目标、原则，这是《说文》高出后世其它字典之上的一个重要原因。段玉裁说：“《字林》、《字苑》、《字统》，今皆不传；《玉篇》虽在，亦非原书。要之，无此等书无妨也；无《说文解字》，则苍籀造字之精意，周孔传经之大指，薶缊不传于终古矣。”㉔所谓“苍籀造字之精意”，就是指造字时的本义，《说文》在保存本义方面的确到现在还有很高的价值。

五、存古音。《说文》为研究上古音提供了两种材料：一是谐声资料，一是声训资料。据谐声可以研究上古韵部。段玉裁说：“许叔重作《说文解字》时，未有反语（即反切），但云某声某声，即以为韵书可也。”㉕声训资料也可用来作为探求上古声韵的旁证材料，据黄侃说：“《说文》义训只居十分之一二，而声训则居十分之七八。”㉖他的话是否可信，我们没有核实，但《说文》中的声训资料的确是研治上古音的人所不可忽视的。

以上我们对许慎及其《说文》说了许多恭维的话，是不是《说文》就没有缺点和不足之处呢？当然不是。无论是从当时可能的条件来看还是从发展的观点来考察，《说文》存在的问题还是不少的。

一、作为一本探求本义的字典来要求，《说文》有一些字的释义还嫌太笼统，太粗疏。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以属概念释种概念。如木部楑、楷、榈等三十余字，都只用“木也”二字作释语，草部蒉、苴、蒈等五十余字，都只用“草也”二字作释语，读者从这些释义中只能获得“义类”的知识，再具体一点的东西就得不到了。

（2）几个字展转相训。即甲等于乙，乙等于丙，丙又等于甲，如言部：

语：论也。

论：议也。

议：语也。

这种循环式的释义方式，实用价值很低。

（3）甲乙两字互训。即以甲释乙，以乙释甲。如手部：

排：挤也。

挤：排也。

水部：

滥：氾也。

氾：滥也。

以上是同部互训的例子，还有异部互训的例子，如：

逃：亡也。（辵部）

亡：逃也。（亡部）

互训有利也有弊，但弊大于利。有利之处是大致上可以确定二者为同义关系，其弊在于各自有什么特点，《说文》反映不出来。我们现在要辨析上古汉语中的同义词，《说文》除了提供一些线索外，就不能指望它提供更多的材料了。

二、对字的本义解释有误。许慎有时把后起义当作本义。如㒳部："两：二十四铢为一两。"这肯定不是"两"字的本义。《广雅·释诂》："两：二也。"这就比《说文》准确。有时还用假借字充当本义。如手部："揆：葵也。"这真是莫名其妙，揆度的"揆"与葵菜的"葵"有什么关系呢？原来这条释义抄自《尔雅·释言》："葵：揆也。"《释言》这个词条是释《诗》

的。《诗·小雅·采菽》："乐只君子，天子葵之。"这里"葵"乃"揆"之假借，许慎不假思索地就抄来了，可见，大学问家有时也免不了要出点差错。还有的本义解释不当，是由于许慎对先秦时代的一些名物制度已经不甚了解。如米部："粲：稻重一秙为粟二十斗，为米十斗曰毇，为米六斗太半斗曰粲。"按许慎的释义，"粲"是比毇米还要精细的一种白米。今据1975年出土的秦墓竹简记载："十斗粲，毁（毇）米六斗大半斗。"粲，是一种原粮，十斗粲可舂成毇米六又三分之二斗（$6\frac{2}{3}$）[28]。粲是未脱壳的原粮，其色黄，这样，从粲得声的"灿"字也就好理解了，所谓"金灿灿"、"黄灿灿"、"灿烂"都有"黄"颜色的意思。许慎不仅未见到甲骨文，也很少见到战国时代的原始文献，他在解释词的本义时出现某些错误，是可以理解的。

三、用封建说教代替词的释义。在这一点上《说文》反而不如《尔雅》、《方言》，这是由许慎的世界观决定的。下面举两个例子为证。如："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一个"一"字，许慎郑重其事地用了十六个字作释文，从开天辟地说到万物化成，归结为一个"道"字，这是许慎的宇宙观，颇有点"道生一，一生天地，天地生万物"的道家思想。

关于"玉"的释义："玉：石之美有五德（者），润泽以温，仁之方也；鰓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絜之方也。"

《说文》在释义方面还有一些缺点，如声训失据，形训有误等等，但无损于这部著作在语言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注：

①《史记》卷103，2766页。

②④⑧《汉书·艺文志》。

③《后汉书》卷24，839页注引《东观记》。

⑤⑥⑦《汉书·刘歆传》。

⑨《汉书·艺文志》注引桓谭《新论》。江式《进古今文字表》作"秦近"，说他是西汉宣帝时的讲学大夫。按：秦近君乃秦延君之误。《汉书·儒林传》："信都秦恭延君……恭增师法至百万言"。信都，古地名，在今河北境内。

⑩⑪⑫⑬⑭⑮⑯⑲⑳㉒㉓许慎：《说文解字·叙》。

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十五卷下，785页。

⑱《后汉书·许慎传》："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

㉑黄侃《论学杂著》460页。

㉔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十五卷下，784页。

㉕段玉裁：《说文解字注》818页。

㉖转引自《训诂研究》第一辑，77—78页。

㉗钱大昕认为《说文》这样的释义是"连上篆字为句"，"皆当连上篆读。艸部蕍、蘸、菌蕣诸字，但云'艸也'，亦承上为句。谓蕍即蕍艸，蘸即蘸艸耳，非艸之通称也……"（《十驾斋养新录》卷四，64页）即使承认此说，"苿，苿草也"之类的释义，仍然不解决什么问题。

㉘可参阅陈抗生《睡简杂辨》。见《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一集。

第六节　汉代词源学

词源学（etymology）也叫做语源学，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

一个部分。它的任务就是要探索词的形式及意义的来源和演变历史。古代语言学家关于词的来源问题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词和它所反映的事物具有一致的本质的联系，这是本质论者；一种意见认为词和客观事物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用某一词指称某一事物，乃是约定俗成所致，这是约定论者。本质论者对词源的认识往往是某种社会意识特征和个人主观心理感受的反映，可信程度不高。荀子属于约定论者，我们在本书的第一节已经讲过了。盛行于两汉时代的"声训"法，属于本质论的范围，这是本节要研究的内容。

声训，古人也叫"谐声训诂"。它是用音同或音近的词去说明被释的词的来源，也就是以词的语音形式（声音相谐）为先决条件来说明两词之间的语源关系。这种探求词源的方式导源于先秦，盛行于两汉，集大成于《释名》。

先秦时代的声训，具有偶发性，人们还没有自觉地普遍地使用这种方法，而且，当时的声训虽不足以证明两词之间的意义上的必然联系，但也不显得离奇古怪。如：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论语·颜渊）

彻者，彻也；助者，藉也。

（孟子·滕文公上）

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

（庄子·齐物论）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

（礼记·中庸）

樊，藩也。

（尔雅·释言）

"政""正"音同。

（章母，耕部）

"庸""用"音同。

（喻四，东部）

"仁""人"音同。

（日母，真部）

"义""宜"音同。

（疑母，歌部）

"奘""藩"音同。

（並母，元部）

"助""藉"音近。

（助：精母，鱼部；藉，从母，铎部）

"用""通"音近。

（用：喻四；通：透母。二者都属东部）

"通""得"音近。

（通：透母；得，端母）

至于"彻者，彻也"，这是同字为训。在这种情形下，被训释的字往往是名词，担任训释的字一般都是动词，很少有例外。如"彻者"的"彻"是名词，指古代的一种赋税制度；而"彻也"的"彻"是动词，意思是"彻取"。

两汉是声训发展的极盛时期。理论性，政治性，主观随意性，普遍性，是当时声训的四个特点。

汉初，今文学派的创始人董仲舒首先把声训提到了名实关系、天人关系的理论高度。他说："名生于真，非其真弗以为名。名者，圣人之所以真物也，名之为真言也。"又说："古之

圣人謞（xiào，大声叫唤）而效天地谓之号，鸣而施命谓之名。名之为言鸣与命也，号之为言謞而效也。謞而效天地者为号，鸣而命者为名。名号异声而同本，皆鸣号而达天意者也。天不言，使人发其意……名则圣人所发天意”①。

所谓“名生于真”，就是认为事物的名称和事物本身存在必然的本质的联系。换言之，名是由真规定的，所以董仲舒说：名的意思就是“真”。但是，客观存在的“真”怎么能获得自己应有的“名”呢？董仲舒说，这要依靠圣人，由圣人“鸣而施命”。这样，名的意思又成了“鸣”和“命”了（名：鸣、命。也是声训）。圣人根据什么来“鸣而施命”呢？董仲舒说：圣人能“达天意”，天使圣人“发其意”。说到底，“名”原是“天意”的表现，声训无非是为了传达“天意”。“天”是谁？“天”不就是封建统治阶级吗！很显然，董仲舒的词源学理论是唯心主义的，与荀子的“约定俗成”论完全相反，它和《圣经》上所宣扬的上帝给事物命名的观点，是同样的荒谬！

在唯心主义词源学的指导下，汉代的声训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班固的《白虎通义》，以及《春秋元命包》、《春秋说题辞》这样一些纬书，都对许多天文、地理、政治、人事、名物制度等方面的词语，用声训的方法，传播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宣扬封建意识形态。例如：

天之为言镇也。

（《春秋说题辞》）

王者，往也。神所向往，人所乐归。

（《春秋文耀钩》）

民者，瞑也。民之号，取之瞑也，使性而已善，则何故

以暝为号？以暝言者，弗扶将则颠陷猖狂，安能善！

（《春秋繁露》）

丈者，长也；夫者，扶也。言长万物也。

（《大戴礼·本命》）

女者，如也（如是随从、顺从的意思）；子者，孳也。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长（增益）其义理者也。故谓之妇人。妇人伏于人也。

（《大戴礼·本命》）

琴之为言禁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

（《风俗通义·声音》）

把词源的探求建立在为封建政治服务的基础上，势必导致词无定义。因为同样一个词，可以按照各种不同的政治需要和各种各样的政治原则，任意发挥，这就是主观随意性的表现。如“霸”就有五种声训：

霸者，伯也。　　　　（《白虎通义·号》）

霸犹迫也。　　　　（《白虎通义·号》）

霸者，把也，駮（驳）也，言把持天子政令，纠率同盟也。　　　　（《风俗通义·皇霸》）

伯者，白也，言其咸建五长，功实明白。　　　　（同上）

训“霸”为“伯”是有道理的，二者同源，“霸”是“伯”的区别字。

训“霸”为“駮”，这是儒家的观点。儒家认为霸道駮杂不纯。

训“霸”为“迫”、“白”、“把”，也都是滥用声训。而且同样以“白”训“霸”，具体解释也不一样。如蔡邕《独断》

说：“伯者，白也。明白于德。”就与《风俗通义》释为“功实明白”有所不同。

汉语中有那么多音同音近的词，稍加牵强附会，就能给同一个词搞出多种不同的声训来。而这多种不同的声训，往往出自好些人之手，这也足以证明汉代的声训具有普遍性。

所谓普遍性还包括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不只今文经学家爱搞声训，古文经学家也搞。许慎的《说文解字》和郑玄注的《周礼》，都有不少声训，其中有他们自己独创的，也有抄袭别人的，甚至公认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桓谭也不例外。他的作品中也有这样的话：

王者，往也。言其惠泽优游，天下归往也。

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

（以上所引均见孙冯翼辑《桓子新论》）

这些大概都是当时广为流传的时髦语言，是具有权威的统治思想。

经过几百年的创造、积累，到东汉末年，声训资料已经相当丰富了，产生一部总结性的声训著作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了，于是《释名》这样的著作就应运而生。当然，《释名》并不只是声训资料的汇编，它既有总结，又有开创，完全算得上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词源学性质的专著。

关于《释名》的作者是谁，史书有两种说法。《后汉书·文苑传》说刘珍撰《释名》三十篇。《三国志·吴志·韦曜传》说刘熙作《释名》。《颜氏家训·音辞篇》：“刘熹制《释名》。”“熹”与“熙”同。隋以来的图书目录都称刘熙作《释名》。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释名》为刘熙所作，大概是不成问题的。曾朴

《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认为珍、熙各自撰《释名》，一存一亡，不得牵合为一。今人张震泽先生也认为“此两书自是各自为书，并非二人合作。”可参阅张氏编著的《许慎年谱》90页。

刘熙，字成国，东汉青州北海（今山东潍坊西南）人，生卒年不详。据清人陈澧推断，他可能是郑康成门人。[②]钱大昕据《三国志》程秉、薛综、韦曜（即韦昭）三传所载推断：“刘君汉末名士，建安中（公元196—219年），避地交州，故其书行于吴……史又不言其曾仕吴，殆遁迹以终者，清风亮节，亦管宁之流亚矣。”[③]

《释名》全书八卷，27篇，例仿《尔雅》，明朝有人称之为《逸雅》，实则此书收词的原则以及释义的方式，与《尔雅》大不相同。书中收词一千五百余条，大多为常用词，释义主要是用声训法。

刘熙的声训并不比前人高明多少。不过，他编著此书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从事语言研究。他在序言中说：

> 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

刘熙认为名之于实都有一定的义类，这是对的。《释名》分篇的原则就是义以类聚，《释名》的任务就是要探寻事物名称的“所以之意”（即事物得名的原因），这是道道地地的词源学。刘熙对名实关系的看法并没有成套的理论，但有一点应当肯定，董仲舒那些“圣人发天意”的谬论他没有接受。大概他身居乱世，思想比较活泼，君权观念较为淡薄。所以刘熙搞的那些声训往往令人可笑，却并不令人讨厌，因为他不像某些今文经学家那样，刻

意通过声训来进行封建说教。如同样用声训法释天，态度就很不一样。纬书上说“天之为言镇也”，“镇”谁呢？还不是镇压被统治者，镇压平民百姓，这显然是统治阶级的帮凶词源学。古文经学家许慎说：“天，颠也，至高无上。”“天”“颠”存在语源关系，这是可信的，二者原本都指头顶。然“至高无上”就暗含着对“天威”和君权的崇拜。段玉裁的话就可以为证，段氏说：“然则‘天’亦可为凡颠之称。臣于君，子于父，妻于夫，民于食，皆曰‘天’是也。”④刘熙对“天”的声训又不同。他说：“天：豫、司、兖、冀以舌腹言之，天，显也，在上高显也；青、徐以舌头言之，天，坦也，坦然高而远也。”⑤这就像个语言学家在说话了，他注意到“天”这个词在两个方言区中发音不一样，并能从发音部位上加以区分，这近乎描写语言学了。遗憾的是他竟然根据方音的不同，对同一个“天”字下了两个定义，而这两个定义又都是错误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刘熙的错误是一个语言学家犯的错误；纬书的错误则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打个比方，刘熙的错误好比：2×2＝9；纬书的错误则是：2×2＝狗。前者还是算术范围以内的错误，后者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这只是一个总体比较，不等于说《释名》中就完全没有2×2＝狗之类的声训。如说：“宋：送也。地接淮泗而东南倾，以为殷后，若云滓秽所在，送使随流东入海也。”⑥为了证明“宋”源于“送”，就把封于宋的殷商后裔比作“滓秽”，要让流水把这些“滓秽”“送”入大海，这样的词源学也算是胡扯得可以了。

王力先生指出：“声训作为一个学术体系，是必须批判的，因为声音和意义的自然联系事实上是不存在的。”⑦王力先生还引用了马克思的话来证实这一点，马克思说：“任何事物的名称，

跟事物的性质是没有任何共同之点的。”（有人译为：物的名称，对于物的性质，全然是外在的。）这些意见是完全正确的。明代的焦竑（公元1540——1620）已经对声训进行批判了。他说："汉儒郑元（玄）、贾逵、杜预（按，杜乃晋代人）、刘向、班固、刘熙诸人，皆号称博洽，其所训注经史，往往多不得古人制字之意。姑以释亲言之，如云：父、矩也，以法度教子也；母、牧也，言育养子也；兄、况也，况父法也；弟、悌也，心顺行笃也；子、孜也，以孝事父，常孜孜也；孙、顺也，顺于祖也；男、任也，任功业也；女、如也，从如人也……凡此率以己意牵合，岂知古人命名之意，固简而易尽乎！……细玩篆文，其义立见，乃漫不知省，辄为之附会其说，亦凿矣哉！”又说："以'群'释'君'以'往'释'王'，以'先醒'释'先生'，至如司马迁、班固、郑康成、应劭、刘熙之徒，诸所训注，此类非一，则徒以声之相近者而强释之，初不考六书之本意，其误后人甚矣。"⑧

刘熙的《释名》在"论叙""义类"”的"指归"方面，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是不是说这部著作在语言学史上就毫无价值可言呢？不能这么说。

一、《释名》的声训并不是一无是处，其中也有一些说解精当的例子。因为声音和意义虽然原本不存在本质上的必然的联系，但事物名称一经约定俗成之后，音同或音近的词就有可能存在意义上的联系。正确的揭示这种联系就能显现词源关系。如：

《释天》："宿，宿也。星各止宿其处也。”被释的"宿"是二十八宿的"宿"，旧音xiù，名词。"宿也"的"宿"乃动词，即止宿之意。名词"宿"当是由动词"宿"转化而来。

《释天》："冬，终也。物终成也。"冬为终之古字。甲金文冬字均用为终，不作冬季解。终是冬的后起字。冬终同源。

《释天》："岁，越也。越故限也。"这个释义可以与《说文》相印证。《说文·步部》："岁，木星也。越历二十八宿，宣徧阴阳，十二月一次。从步，戌声。"许慎只讲到"岁"是木星，但木星为什么叫做"岁"呢？《释名》的解说正好可与之相发明。"岁""越"在上古都是月部字，叠韵为训。"岁"字从步，步就有越历的意思[①]。

《释姿容》："仆，踣（bó）也。顿踣而前也。"仆（滂母）踣（并母）都是双唇音[②]，都是向前跌倒的意思。

《释姿容》："负，背也。置项背也。"负（并母）背（帮母）都是双唇音，背上背东西叫做"负"，背、负是同源词。

可惜，刘熙的声训说对了的很少，说错了的则占多数。

二、《释名》对我们了解东汉的词汇面貌有参考价值。《释名》收字比《说文》要少得多，但由于两书收字的原则不同——《说文》面向书本，以考古为主；《释名》面向生活，"下及民庶应用之器"，所以《释名》收了一些《说文》不录之字。另外，《说文》收的是单字，《释名》收的是词，因为是以词为单位，许多《说文》不录的双音词，《释名》也收进了，这对研究汉代的构词法也有用处。

《说文》不录而见之于《释名》的字，如棃、褖（tuàn）、裋（shù）、褠（gōu）、帕、襈（zhuàn）、粹、仼、罳（sī）、庵、圊（qīng）、矟（shuò，同槊，矛属）、疚……

双音词以偏正结构为最多，如：彗星、孛星、笔星、流星、朝阳、夕阳、鱼梁、水碓、蒸饼、汤饼、金饼、苦酒、干饭、鲍

鱼、胡粉、禅衣、中衣、心衣、裲裆、帛屐、辇车、羊车、槊车、安车等。这类双音词多以属概念为中心词，前面加上修饰语，使之变为种概念。

《释名》对东汉末年的同义词、反义词也有一定的反映。其中同义词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方言同义词，如：

咽（喉咙）：或谓之嗌，青徐谓之脰（dòu），又谓之嗌。

（《释形体》）

另一类是古籍中常见的同义词，如：

城上垣曰睥睨，亦曰陴，亦曰女墙，或名堞。

（《释宫室》）

狱：又谓之牢，又谓之圜土，又谓之囹圄。

（《释宫室》）

甲：亦曰介，亦曰函，亦曰铠，皆坚重之名也。

（《释兵》）

《释言语》还有意将一些同义词，反义词分别按组排列。如：

言语　说序　翱翔　导演　名号　委曲

踪迹　扶将　缚束　覆盖　威严　侍御

艰难　侯望　奸宄　断绝　骂詈　祝诅

盟誓　佐助　饰荡　喔嗟　噫呜　念思

以上各组都是同义词，反义词分组的例子如：

敬慢　厚薄　是非　善恶　好丑　迟疾

缓急　巧拙　燥湿　强弱　能否　躁静

逆顺　清浊　贵贱　荣辱　祸福　进退

羸健 哀乐 雅俗 吉凶 停起 出入

消息 往来 粗细 疏密 甘苦 安危

成败 乱治 烦省 闲剧 贞淫 沉浮

贪廉 洁污 公私 勇怯

在《释名》以前，还没有一本字书这样有意识地集中地来排列反义词。

三、《释名》对考证东汉时期的语音有重要参考价值。如章太炎写《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就多次引用《释名》的声训资料为证：

> 《释长幼》："男：任也。"《释言语》："入：内也。内使还也。"入、任今在日纽，古音"入"同"内"，"任"同"男"，在泥纽也。《释宫室》："泥，迩也。"《释书契》："尔：昵也。""尔"、"迩"今在日母，"昵"今在娘母，古音"尔""迩""昵"皆为泥母。

其它如轻重唇不分，舌头舌上不分，都可从《释名》中找到旁证。在韵部方面，罗常培、周祖谟合著的《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也充分利用了《释名》的声训资料。

四、《释名》对研究汉代社会文化生活有重要参考价值。《释名》所"释"之"名"，上至天文（《释天》），下至地理（《释地》、《释山》、《释水》、《释丘》、《释道》、《释州国》），又广涉人事的各个方面，如衣着（《释彩帛》《释首饰》、《释衣服》）、食（《释饮食》）、住（《释宫室》）、行（《释车》、《释船》）、身体（《释形体》）、动作（《释姿容》）、言语（《释言语》）、亲属称谓（《释亲属》）、文化典籍（《释书契》、《释典艺》）、疾病丧事（《释疾病》、

《释丧制》）等。我们真要感谢刘熙，他为我们提供了汉代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的异常丰富具体的资料，对我们了解东汉时代的作品及名物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如汉乐府《陌上桑》："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又："为人洁白皙，鬑鬑颇有须。"可见，胡须这东西在东汉人的美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些描写可与刘熙对"髭"、"须"的释义相印证。在刘熙的笔下，对"髭""须"二字充满了赞美之情。他说："口上曰髭。髭，姿也。为姿容之美也。""颐下曰须。须，秀也。物成乃秀，人成而须生也；亦取须体干长而后生也。"（《释形体》）"髭"与"姿"，"须"与"秀"在意义上谈不上有什么关系，而"姿容之美"，"物成乃秀，人成而须生"，确实表达了东汉人对胡须极为欣赏的思想感情。《释言语》："仁，忍也。好生恶杀，善含忍也。"仁忍均日母字，韵亦相近。在孔孟哲学中并没有直接将仁释为忍，这种声训反映了汉末佛教文化的渗透。儒家的"不忍其觳觫"、"不忍见其死"、"不忍食其肉"与佛教的"好生恶杀，善含忍"的戒律结合在一起了。

刘熙对一些实物的释义有助于我们对古名物的了解。如《释书契》对"简""札"的训释，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书籍的形制。"札：栉也。编之如栉齿相比也。""札"与"栉"在意思上无关。但刘熙说"札"的形状像一把梳子。那么，其顶端应是编结在一起，下列诸札互相比连，如同梳子的齿一样，这个释义就形象化地描述了"札"的样子。"简：间也。编之篇篇有间也。"我们完全可以不赞同"简、间"的声训，却不可放过"编之篇篇有间"一语。它说明当时的竹简或木简是几道绳子编缀起来的，所以才会"篇篇有间"，这一点从出土的汉简得到了可靠

的证实。

注：

①《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②见《切韵考》卷六。

③《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七。

④《说文解字注》一篇上"天"字注。

⑤《释名·释天第一》。何谓"舌腹"，江永《音学辨微》认为即"今人所谓舌上也"。不妥。王力先生认为是指舌根音，即晓母。（《中国语言学史》49页）舌头，指三十六字母的透母。周祖谟先生说："天下舌腹言之者，疑读为〔ㄏ〕。天与显声母不同，天是透母字（《韵》他前切），显是晓母字（呼典切）。天为真部字，显为元韵字，韵相近。显为摩擦音。与以舌腹言之相合。《广韵》'祆，胡神，'音呼烟切。祆即祆教字，字即从天。至于天以舌头之言，则当读〔t'〕。"（《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295页）

⑥《释名·释州国第七》。

⑦《中国语言学史》51页。

⑧《焦氏笔乘》卷六，132——133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⑨仆、踣在《广韵》都作蒲北切。"仆"在《集韵》作普木切。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语言学

（公元3世纪　　公元6世纪）

概　　况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语言学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不仅语义学、修辞学有新的发展，而且出现了一门新学科——汉语音韵学。从此以后，中国语言学的内容更为丰富了，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更显示了自己特有的生命力。就条件而言，当时佛教的盛行，韵文的发达，文学批评的繁荣，都对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从魏文帝于公元220年立国到公元581年隋王朝的建立，共有360多年的历史。中间除西晋有过短暂的统一，其余大部分时间里国土分裂，战乱不休。人们饱受乱离生活的痛苦，厌恶现实，皈依佛门。关于佛教的种种消极作用，人们早已作出了批判，我们关心的是佛教与语言学的关系。佛教为什么会跟语言学发生关系呢？佛教是西汉末年从印度、西域传进来的，佛典的翻译直接促使了汉人对梵文的研究，进而启发人们对汉语语音进行科学的分析。《隋书·经籍志》说：

> 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①，与八体六文之义殊别②。

所谓《婆罗门书》即西域字书，"十四字"指梵文十四个元音。南朝刘宋诗人谢灵运（公元385年——433年）也是一个"笃好佛理"的人，他研究过十四字音，还写过《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照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③"条列梵汉"大概就是用汉字与梵文的十四字母进行对照。由此可见，后来唐宋的字母之学应是导源于六朝，与佛教的传入有直接关系。这一点，我在本书的第十节还要讨论。

反切法与四声说也跟佛教有关，这是经大多数学者所肯定了的。汉末人既已懂得胡书"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就不难悟出反切的道理来。六朝的佛门信徒有不少是精通梵汉语音的人。如著《四声论》的王斌就当过"道人"（和尚），他"博涉经籍，雅有才辩，善属文，能唱导"④。六朝又是骈体文、韵文大发展的时期，一般作家都很讲究声律，对平仄、双声叠韵都要求很严。韵书的产生更意味着诗歌格律化的要求日趋严密，也证明当时的音韵学家对汉语语音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一时期也产生了一批辞书。魏国张揖是许慎之后首屈一指的词义学家，他著有《广雅》、《埤（pí）苍》、《古今字诂》、《杂字》等辞书，晋代吕忱著有《字林》，葛洪著有《要用字苑》，宋何承天著有《纂文》，梁阮孝绪著有《文字集略》，顾野王著有《玉篇》，陆德明著有《经典释文》。非常可惜，除《广雅》和《经典释文》之外，其余都已久佚。原本《玉篇》也只能见到残卷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玉篇》是宋朝人的重修本。

齐梁时期的刘勰（约公元465年——约公元520年）是文学批评家，也是修辞学家。他的《文心雕龙》有不少篇章论述了修辞问题，如《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隐秀》等篇，研究了谋篇布局和修辞格方面的一些问题，还从修辞的角度讲到了有关文言虚字的知识。如说："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于、以者，乃札句之旧体；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据事似闲，在用实切。"⑤刘勰对这十二个常用虚字的分类及其作用的看法，都很有道理。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期，他们在古书注解中所表现出的思想观点，与"汉学"大相径庭。其中何晏的《论语集解》，王弼的《周易注》、《老子注》、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郭璞的《尔雅注》、《方言注》、《山海经注》，都是古书注解史上的名著。至于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郦道元的《水经注》，更是别开新面，具有很高的价值。

注：

①婆罗门：梵文Brah ma na的音译。婆罗门本是印度奴隶制时代最高级的种姓，自称梵天（众生之父最高的神）后裔，婆罗门掌握神权，是政教合一的统治者。东汉以后也称印度为"婆罗门"。"十四字"的汉译音字写法不一。这里把饶宗颐先生有关"十四字"音的一段文字转录于下，供参考：

十四音者（附记悉昙汉译音字）：

噁短声a	阿长声ā
亿短声i	伊长声ī
郁短声 u	优长声 ū
哩 e	野 ai

乌	o	奥	au
〔庵〕	am	〔痾〕	aḥ
鲁	ṛ	流	ṝ
卢	ḷ	楼	ḹ

七字声短者，指aiueoṛḷ；七字声长者，指āīūaiauṝḹ，其中ai au乃二音联结，原为增益元音，亦称复重韵(Vradhi)，亦被视作声长。谢灵运云："以后鲁、流、卢、楼四字足之，若尔则成十六。何谓十四？解云：前庵、痾二字非是正音，止是音之余势，故所不取。若尔，前止有十，足后四，为十四也。"（《悉昙藏》卷二引）十四音之说甚繁，安然（盈按：安然为日本僧人，生于841年，卒年不详）所举计有十家。其最大歧异，在于计庵、痾二音或将鲁、流、卢、楼作为二音。梁武帝著《涅槃疏》，鲁、流、卢、楼四字概作釐、力、基、黎，又称此是外道师名叶波跋摩之说，以弹谢公，具见南朝时对梵音究心之众，不独谢公一人而已。（以上引文见《鸠摩罗什〈通韵〉笺》）

俞敏《等韵溯源》说："梵文元音一共14个：a、ā、i、ī、u、ū、ṛ、ṝ、ḷ、ḹ、e、ai、o、au。外加两个附加号'太空点'ṃ，跟'涅ḥ槃点'。这只是附加号。比方大空点anusvāra就可以加到各个元音上得aṃ，āṃ，iṃ，īṃ，uṃ，ūṃ，'暗'只是个代表。'恶'也一样。数元音数出十六来是因为加上了暗恶。"盈按：暗恶即庵痾。

② 《汉书·文艺志》有"八体六技"。八体：指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这里说的"八体六文"泛指汉字形体结构。唐兰说："六技或许是六文之误……六文就是六书。"（《中国文字学》15页）

③参阅梁慧皎所著《高僧传》卷七《慧叡传》。

④ 《南史·陆厥传》。

② 《文心雕龙·章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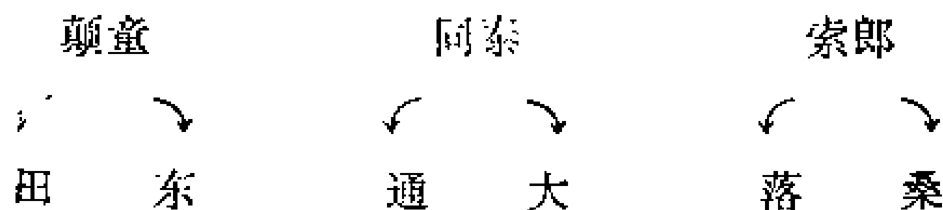
第七节 反切与四声

反切的产生，四声的发现，是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上的两件大事。反切法和四声说为古代音韵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反切”，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是一个词。古人则单说“反”（也叫“反语”），或单说“切”（也叫“切语”）①。有人说：“反切二字，本同一理。反即切也，切即反也，皆可通也。”（直指玉钥匙门法）这话大体上不错，若探本求源，“反”与“切”还是有区别的。

毛晃《增修互注礼部韵略·条例》说：“音韵展转相协谓之反，亦作翻；两字相摩以成声韵谓之切，其实一也。”毛氏“反”“切”二字的定义很明显有不同，而又说：“其实一”，正是在区别不同的基础上又强调二者实质上的一致。

所谓“展转相协”叫做反，就是作为反语的两个字有交互反复的作用，即反语中的两个字都可以担任反语的上字或下字。如：“东田”的反语“颠童”，“颠童”为“东”，“童颠”为“田”。“大通”的反语“同泰”，“同泰”为“大”，“泰同”为“通”。“桑落”的反语“索郎”，“索郎”为“桑”，“郎索”为“落”。“颠”既作“东”的反语上字，又作“田”的反语下字，“童”既作“东”的反语下字，又作“田”的反语上字，其余两例理同，见下图：



顾炎武说："南北朝人作反语，多是双反，韵家谓之正纽、到（倒）纽。"②上述三例就是所谓的"双反"，"颠童"是正纽，"童颠"为"田"是到（倒）纽。这种"双反"法不宜于用作注音工具，但后来注音中或韵书中的"××反"的"反"字正是来源于这种"展转相协"的"双反"，由双反演变为单反。

所谓"两字相摩"叫做切，"即两合读法，缓呼之则二字，急呼则一字也。"（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七》）如"德红"两字"相摩"而成"东"。缓呼之"德红"为二字，急呼成"东"，则一字也。但毛氏对"反""切"二字的解释，只是讲了取切时的发音方法，还没有说清取切的语音条件，因为并不是任何两个字都能"展转相协"或"相摩"的，必须具备一定的语音条件才行。其条件就是江永、陈澧所说的："切字者，两合音也。上一字取同位（即同声母），下一字取同韵。同位不论四声，同韵不论清浊。"（江永：《四声切韵表·凡例》）"切语之法，上字定清浊，而不论平上去入，下字定平上去入而不论清浊，此出于自然，非勉强而为之也。"（陈澧：《切韵考卷六》）

反切也是发展的，由于时代不同和制作切语的人有方言的不同，古反切的情形是比较复杂的，我们现在要掌握它并不那么容易，必须具有古今语音流变的知识才行。这些非本书应解决的问题，我们就不详谈了。

下面我们谈一下反切产生于何时，是怎样产生的。这两个问题是互相联系的，前人发表了不少意见，归纳起来，有三种看

法。

一种意见认为反切起源于东汉末年。

《颜氏家训·音辞篇》："孙叔炎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唐朝的陆德明、张守节，宋朝的王应麟，清朝的江永、戴震、段玉裁、钱大昕都主此说。后来章太炎又根据《汉书·地理志》应劭注已有反语，断定"应劭时已有反语"。(《国故论衡·音理论》)应劭也是汉末人。

从宋代起，产生了另一种意见，认为"反切之学，自西域入于中国，至齐梁间盛行"。(陈振孙语③)陈振孙之前的沈括、郑樵，后来清代的纪昀、姚鼐等人主此说。这种意见受到戴震、钱大昕等人的猛烈攻击。

戴震说："宋元以来，为反切字母之学者归之西域，归之释神珙，盖由郑樵、沈括诸人，论古疏漏，惑于释氏一二剪劣之徒，眠娗诬欺，据其言以为言也。"④

钱大昕说："天下之口相似，古今之口亦相似也。岂古昔圣贤，犹昧于兹，直待梵夹西来，方启千古之长夜哉！魏世儒者，创为反切，六朝人士，好言双声叠韵。"⑤

第三种意见认为：反切不唯不出于西域，甚至也不是出自汉末，而是周秦时代即已有之，更有甚者认为仓颉造字时代已有反切了。

顾炎武说："反切之语，自汉以上即已有之。宋沈括谓古语已有二声合为一字者，如不可为叵，何不为盍，如是为尔，而已为尔，之乎为诸。郑樵谓慢声为二，急声为一，慢声为者焉，急声为旃，慢声为者与，急声为诸，慢声为而已，急声为耳，慢声为之矣，急声为只是也。愚尝考之经传，盖不止此。如《诗·墙

有茨》传：'茨，蒺藜也。'蒺藜正切茨字。'八月断壶'，今人谓之胡卢。《北史·后妃传》作瓠芦，瓠芦正切壶字……以此推之，反语不始于汉末矣。"⑥

到了俞正燮（1775—1840），上推得更远了。他说："且有字则有反切。《北齐书·废帝纪》云：迹字自反，'足亦'反为'跡'，'足责'反为'蹟'也。《论衡·商虫篇》云：夫虫风气所生，仓颉知之，故凡虫为风之字，是仓颉从凡虫省……则凡虫自切为风……古人用文字中自有反切，两合自反，则古人制文字中亦自有反切。""反切不出西域，至显白矣"。⑦

我认为：考察反切的产生，要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笼统地争论反切是出自西域还是中国的"土特产"，无助于问题的彻底解决。

汉语的语音结构是以单音节为特点的，差不多每一个字都可以切分为声母和韵母两部分。两字按一定的条件相切，取上字之声，取下字之韵，就可以拼出第三个字的音来，这个字的读音与上字为双声，与下字为叠韵，所以反切法的本质是双声叠韵，这是汉语所固有的特点，也是反切法产生的内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切出自西域的说法就带有片面性。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内因只是事物起变化的根据，没有一定的外因作为条件，事物还是不会起质的变化的。中国为什么在佛教传入之前没有产生反切呢？这里要说明一下，顾炎武等人把古代的合音词也当作反切来看待，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二者在性质上不一样。"蒺藜"为"茨"之类的合音词⑧，不只是以双声叠韵为特点，它的前两字与后一字在意义上是相等同的。即蒺藜＝茨，瓠芦＝壶，不可＝叵，何不＝盍，如是＝尔，之乎＝诸，

者焉=旃……而反切是不管意义的，如德红切东，能说“德红”二字之义等于“东”吗！另外，反切是人们自觉地利用汉语音节的特点而造出来的一种注音方法，合音词是人们在交际过程中不自觉地造成的，二者在功用上很不一样。过去，国内外有些谈反切的文章用这些材料来证明周秦时代已有反切，实属皮相之见。现在还回到原来的话题上去，中国在佛教传入之前为什么没有产生反切呢？道理很简单，在此之前的古人还不懂得分析汉语的音节结构，而不能自觉地分析出汉语的声母和韵母来，就难以产生反切法。不要说周秦时代了，就是东汉时代的语言学大家许慎给一个字注音时，显得多么费劲，他用的那个“读若”法又是多么不灵便。如他注一个“卸”字的读音：“读若汝南人写书之写。”（卷九上）注“挃”字的读音为：“读若铚尔舍瑟而作”。（卷十二上）前者用了9个字，后者用了8个字，假若许慎时代已有反切法，他何苦要用这样的笨法子来注音呢？日人大矢透据《后汉书·和帝纪》李贤注有“许慎《说文》肇音大可反”一语，断定许慎曾用过反切（转引自《等韵源流》8页）。这样的材料，我也可以随手补充两条。《经典释文·尔雅音义》有：“蝗，《说文》荣庚反”，“鹨，《说文》力幼反”。这两条材料都比李贤注要早，但也都不可信。唐以前诸书所引《说文》反切，有可能是后人加上去的，并非许慎原书所有⑨。比较而言，我们还是相信颜之推的话：“汉末人独知反语。”汉末人在梵文的拼音字母直接启发下创造了反切，佛教徒们译经时所传进的拼音法是反切法得以产生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外因条件。汉末人运用梵文拼音法的知识来分析汉字的音节结构，这是“洋为中用”的范例。乾嘉学人蔑视这种外来影响，这是盲目排外的狭隘民族主

义思想在作怪，是并不可取的。什么“华不袭梵，梵不袭华”（四库总目玉篇提要语），简直就不懂科学无国界，未免有些头脑冬烘了。

反切的价值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在注音字母出现之前，反切一直是汉字注音的主要工具。孙炎的《尔雅音义》大概是第一次大量使用反切法注音的著作。孙炎，字叔然，乐安（今山东博兴）人，郑玄的学生，当时有“东州大儒”之称。他的《尔雅音义》已失传，陆德明《经典释文·尔雅音义》引有该书反切68条（其中又音10条），从这些不多的材料已可以看出，孙炎用的反切上下字很不统一。如见母用了“古”“九”“居”三字，溪母共用“苦”、“犬”、“去”、“丘”四字。这说明当时造反切的并非孙炎一人，同时代的服虔、应劭都已用反切注音(服虔的《通俗文》有时用反切作注)，他们当然也会造出反切来，孙炎的《尔雅音义》就有可能采集别人创造的反语，以致切上下字很不统一。

二、反切法的创造，意味着韵书的产生已为期不远了。没有反切法，韵书是不可能产生的；有了反切法，韵书必然要产生。因为有了反切，人们就能把切下字联系起来，归纳韵部，韵部的建立就有了可靠的根据。颜之推说：孙叔炎创《尔雅音义》之后，“音韵锋出”。这是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

三、反切不仅有注音的作用，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它还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统一读音的作用。中国古代的方言土语是相当复杂的，各方言土语区的人如果按照自己的口语来读反切注音，有些音肯定切不出来，只有按照读书音来读反切，各方言区的人才能获得共同的读音。可以说，读书音寄存于反切，反切又起了统

一读音的作用。对六朝以后的多数反切基本上可以这样来看待。

四、反切在历史上起了这么好的作用，到现在是否还有作用呢？回答是：不仅有作用，而且作用还相当大。我们根据一个汉字的反切时代，就能确定它在一定历史时期之内的音韵地位，根据一大批反切资料，就能建立起一定历史时期的语音系统。利用反切归纳音系，作历史的研究，是汉语音韵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另外，编纂字典、词书，都要审音、订音，这些工作都不能离开古反切。

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反切与声调是分不开的，不考虑声调这个因素，反切法就会失灵。但从记载来看，南北朝以前，有声调之实，而无声调之名⑩。直到南齐的周颙、沈约才明确提出平上去入四声。隋刘善经《四声指归》说：“宋末以来，始有四声之目，沈氏乃著其《谱》论，云起自周颙。”又说：“陆公（指西晋文学家陆机）才高价重，绝世孤出……至于四声调贯，无闻焉尔。”（以上引文均见《文镜秘府论·四声论》）他的意思就是晋宋以前，四声说尚未产生。《南史·周颙传》说：“颙始著《四声切韵》行于时。”《梁书·沈约传》说：“约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

周颙（？—485），河南汝南人。沈约（441—513），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他们所著关于“四声”的书都失传已久。清人纪昀写了一本《沈氏四声考》，认为“（陆）法言之书，实窃据沈约西作者也”，明清时代有的音韵学家甚至误以为《唐韵》来源于沈约《四声谱》。《四声谱》的内容是研究如何识别四声的，全书只有一卷，根本就不同于切韵系韵书。所谓法

言“窃据沈约而作”云云，纯属无稽之谈。

《文镜秘府论》天卷有“调四声谱”。此书的编者日僧空海（法号遍照金刚，追封为弘法大师，生于公元774年，卒于公元835年，于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即公元804年来中国留学）说：“诸家调四声谱，具例如左。”此所谓“诸家”是否包括沈约这一家呢？已无从考实，不过约《谱》的性质应与此相近。“调四声谱”很简略，其中最重要的是“纽”。有所谓“四字一纽，或六字总归一纽”。如：

（平） 皇 滂 光 荒
（上） 晃 旁 广 恍
（去） 璜 傍 珖 侊
（入） 镬 薄 郭 霍
（平） 禾 婆 戈 和
（上） 祸 泼 果 火
（去） 和 紴 过 货

上三字，下三字，纽属中央一字，是故名为总归一入。

这个“纽字图”按原样直排，不可横着读。所谓“上三字”，如“皇晃璜”；“下三字”，如“禾祸和”；“纽属中央一字”，如“镬”。上三字代表阳声的平上去，下三字代表阴声的平上去。四声中入声是“纽”，入声既配阳声，又配阴声。如“皇晃璜镬”，“禾祸和镬”。阴阳入相配，说明其主要元音必同。根据王力所考定的魏晋南北朝的韵部，这个纽字图正是歌铎阳相配，其主要元音为〔ɑ〕。纽字图以双声叠韵为基础，竖读为双声，横读即叠韵。纽字图既体现了四声相承的原理，就为按声调编制韵书奠定了基础。

按照双声叠韵的原则配置四声，制成纽图，大概是周、沈之辈的得意杰作。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说：“周颙好为体语，因此切字皆有纽，纽有平上去入之异。”体语也叫双声语，说话时有意用双声词组成词句。旧称梵文元音为“声势”，辅音为“体文”，故称双声语为“体语”。唐代僧人神珙《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说：“昔有梁朝沈约，创立纽字之图。”这两条材料都证明，《文镜秘府论》中的“调四声谱”与周、沈有密切关系。沈氏的“纽字图”又是在周颙的切字用纽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

平上去入这四个调类的调值如何，唐朝人写的《文笔式》有如下描述：

平声哀而安，上声厉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直而促。

（转引自《文镜秘府论》222页）

所谓“哀而安”是出音哀婉而收音平稳，这是一个平调；“厉而举”是出音激厉而收音扬起，这是升调；“清而远”是出音轻清而收音悠远，这是降调；“直而促”是出音直捷而收音短促，当有塞音尾。看来，周、沈等人选用“平、上、去、入”四字作为四声标目是有道理的。在当时，这四个字的读音肯定能反映四声的调值。现代汉语“平”字还读平声；“上”字有两读，一读上声，一读去声，作为调类名称时，仍读上声；“去”字还读去声；“入”字因入声消失变成了去声。不论变与未变，古今调值当然不会完全相同。

四声的发现，据陈寅恪（公元1890年—1969年）考证与佛经的“转读”有关（陈氏有《四声三问》一文，见《清华学报》九卷二期）。什么叫做“转读”？梁慧皎《高僧传》卷十三说：“天

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呗’。”（《高僧传》一书见于《大藏经》卷五十）咏经是经师们的事，当时帝都建康是佛教徒云集之处，出现了不少“偏好转读，”“善于转读”，“巧于转读”的经师。转读佛经，很讲究声音的高低抑扬，陈寅恪认为周、沈等人从中受到启发，“俱受佛经转读之影响”，提出了四声之说。陈氏判断四声与经声有关这是正确的，但发现四声的人未必就是周、沈二人。上距沈约为时不算太远的北齐李季节，在《音韵决疑·序》中说：“平上去入，出行里闾，沈约取以和声之律吕相合。”（转引自《文镜秘府论》33页）依此说，则四声的分辨源出民间，并非沈约个人的发现。闾里之人能分辨四声，也必然与佛经转读有关。“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平民百姓受到过佛教的影响，他们从经师的转读中悟出了汉语四声的原理，周颙、沈约等人再加以总结提高，字字落实，写成专著，使四声之说得以正式成立，这恐怕是最为合乎情理的解释了。

四声之说在沈约时代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所以有人不懂什么叫“四声”，有人则坚决反对。

据《梁书·沈约传》载：梁武帝肖衍问周颙的儿子周舍何谓四声，周舍回答说：“天子圣哲”就是四声。这四个字的调类刚好分属于平上去入。

刘善经的《四声论》也记载了同样的故事：“经数闻江表人士说：梁王（一作“主”）肖衍不知四声，尝从容谓中领军朱异（一作“弃”）曰：何者名为四声？异答云：‘天子万福’即是四声。衍谓异：‘天子寿考’，岂不是四声也？”（转引自《文镜秘府论》31页）这个皇帝竟然把“考”字也当成了入声字，证

明他的确是分辨不出四声了。

反对者也有之。如北魏定州刺史甄思伯，“以为沈氏《四声谱》不依古典，妄自穿凿。”（见《文镜秘府论》31页）反对者后来还有。如宋濂《洪武正韵·序》说：“自梁之沈约拘以四声八病，始分平上去入，号曰《类谱》（明清时代有人将约书称之为《四声切韵类谱》，或简称《类谱》，都失实）大抵多吴音也。”宋的批评涉及到《切韵》音系的性质，我们在第九节再讨论。甄氏批评沈约“不依古典”，关乎到四声和五声的关系问题。

在四声被发现之前，古人已有五声（即五音）的说法。五声的名称就是宫商角（jué）徵（zhǐ）羽。这原本是古乐中的名词术语，以此五字代表五个音阶。齐梁以前音韵学上所谓的“五声”是指什么呢？古人已不甚了了。

一种意见认为五声就是四声。北齐李季节说：“窃谓宫商徵羽角，即四声也。”他的理由是：“案《周礼》：‘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大蔟为徵，姑洗为羽。’商不合律，盖与宫同声也。”从“凡乐”到“为羽”这几句话见之于《周礼·春官·大司乐》，李季节根据这几句话中只提到“宫”“角”“徵”“羽”，而未出现“商”，因而推断“商”与“宫”同声，“五声”就变为四声了。以“宫商”代表平声，“徵”代表上声。“羽”，李季节说：“读如‘括羽’之羽”，即王遇切，去声，“角”代表入声①。这样一来，“宫商、徵、羽、角”五个字正好与“平、上、去、入”四个调类相应。刘善经在《四声论》中对此说评价很高。他说：“经每见当世文人，论四声者众矣，然其以五音配偶，多不能谐。李氏忽以《周礼》证明‘商不合律’，与四声相配便合，恰然悬同。愚谓钟、蔡（当指钟子期、

蔡伯喈）以还，斯人而已。”（转引自《文镜秘府论》34页）

另一种意见认为“五声”是指五个声调。近人王国维主此说。王国维在给罗振玉的信里说：“近日续研究音韵，颇怪李登《声类》已分宫、商、角、徵、羽五部，而齐梁以来四声行而五声废，迄不知所谓五声者言何？昨忽悟得古之五声，平分阴阳二种与上去入为五，其阳声一种有平而无上去入（原注：王怀祖、江晋三谓无入，今知并无上去，汉魏以前，此类上入〔盈按：“入”当系“去”字之误〕字皆读平声，段氏《音韵表》以为三代之音如此，今知汉魏亦然），阴声则大抵具平上去入。阴阳二声之分，较之阴声平上去入之分较为了然。凡阳声皆有余音，商收声于鼻，其性质本不能有上去，其有上去者，乃后日因阴声之上去而为之。因沈四声为诗文句中平仄而设，以律文而非论韵，以文中阴平阳平可以相代，故减五为四，古韵与今韵相异之关键即在此。”⑫王氏所说的“平分阴阳”，与《中原音韵》的“平分阴阳”性质根本不同。王氏在这里所使用的“阴阳”是指上古音中的阴声韵和阳声韵。王氏认为阳声韵只有一个调类，即平声，阴声韵有平上去入四个调类，加起来是五个调类。宫、商、角、徵、羽是否代表这五个调类？上古音的调类是否为五？这都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但魏晋时代所谓的五声，不会是像李季节所说的那样是指四个调类。我认为五声就是五个调类，在汉魏六朝时代，有可能有的方言中实际存在五个调类。这一点，并不只是一种主观推测，从沈约《答甄公（即甄思伯）论》书可以找到有力的佐证。沈氏说：

经典史籍，唯有五声，而无四声。然则四声之用，何伤五声也。五声者，宫商角徵羽，上下相应，则乐声和矣；君

臣民事物，五者相得，则国家治矣。作五言诗者，善用四声，则讽咏而流靡；能达八体，则陆离而华洁。明各有所施，不相妨废。

（以上引文见《文镜秘府论》32页）

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1.沈约将四声与五声相提并论，并没有否认“五声”为声调。尤可注意者为“君臣民事物”五字，我认为这五个字就是五声的代表字。“君”代表宫，表阴平；“臣”代表商，表阳平；“民”字今读阳平，按理推断，应是徵的代表字，表上声；“事”代羽，表去声；“物”代角，表入声。[13] 2.沈约强调四声之说是为“作五言诗者”提出来的，与五声“各有所施”，“何伤五声也”。可见，王国维说“沈四声为诗文句中平仄而设，以律文而非论韵”，深得沈氏之旨。

《南史·陆厥传》：“永明末（永明乃齐武帝年号，公元483——493年），盛为文章，吴郡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为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这两段引文中的“宫商”、“角徵”、“宫羽”无疑都是声调的代称，四声之说刚刚成立，故还用五声的旧名称，一时尚不能摆脱。另外，所谓“永明体”的实质就是一联五言诗中平上去入四声的布局问题，也就是格律问题。[14] 具体而言：出句和对句的首二字都是平声，就算是“平头”，出句和对句的最后一个字都是上声，就是“上尾”，出句

和对句的第三字都是去声，就算是“蜂腰”，出句和对句的第四字都是入声，就算是“鹤膝”。⑬为了避免犯这些毛病，就必须要掌握四声，周、沈的四声之说原本就是为建立五言诗的格律服务的。至于四声之说确立以后与韵书韵图的密切关系，不待细说，读者也会明白的。

注：

①宋朝人也称之为“切韵”。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五：“所谓切韵者，上字为切，下字为韵。”

②⑥《音论》卷下。

③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87页。国学基本丛书本。

④《戴东原集》（上），71页。万有文库本。

⑤《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五，378页。万有文库本。

⑦《癸巳类稿》卷七，262页。

⑧关于蒺藜为茨这种语言现象，现有不同的解释，有人以此证明古有复辅音，有人认为是方音之别，我在此不想扯得太远，姑且一律以合音词看待。

⑨徐锴：《说文系传·通释》卷一“一”字注云：“许慎时未有反切，故言读若。此反切皆后人之所加，甚为疏朴，又多脱误，今皆新易之。”盈按：六朝时已有人给《说文》注音，如《说文音隐》。

⑩赵翼：《陔余丛考》卷十九有“四声不起于沈约说。”，因《隋书·经籍志》载：晋之张谅已著有四声韵林二十八卷。

⑪《文镜秘府论》13页引元氏曰：“声有五声，角徵宫商羽也。分于文字四声，平上去入也。宫商为平声，徵为上声，羽为去声，角为入声。”其说当本之李氏。

⑫《中国历史文献集刊》第一集。陆志韦也主张古有五声。他说：

古音但有四声之分，即不当借用五音之名。古实有五声，沈约自不知耳。”（陆说见周祖谟《问学集》上册516页）张琨也认为“在沈约等人采用平上去入四目以前，五音也许被用来指声调的不同。”（汉语音韵史论文集》28页）又根据安然《悉昙藏》的记载，袁晋卿所代表的方言就有五种声调。“我日本国元传二音：表（应为“袁”字，即753年去日本的袁晋卿）则平声直低，有轻有重；上声直昂，有轻无重；去声稍引，无轻无重；入声径止，无内无外。”有轻平、重平、轻上、去、入五个调类。

⑬《礼记·乐记》说：“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这里也是用“君臣民事物”来代表五声。

⑭封演指出了这种格律的消极作用。他说：“自声病之兴，动有拘制，文章之体格坏矣。”（《封氏闻见记》12页）

⑮详说可参阅冯春田：《永明声病说的再认识》。《语言研究》1982年第一期。

附录

殷孟伦《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简释》指出这段文字有些不确，兹摘录于下：

1. 傍旁徬之“旁”，《广韵》上声无此字，且亦无并纽字……此当系借平声“旁”字而读作上声者。

2. 婆泼紴之“泼”“紴”均系误字。“泼”字之读照《广韵》只有入声；去声无“紴”字，亦无并纽，平声虽有“紴”，但读“博禾切”，在帮纽。而《广韵》上声果韵并纽则有“爸”　去声过韵并纽则有“縛”，《韵镜》、《切韵指掌图》、《七音略、《《四声等子》等均同，此当据正。

3. 荒恍侊之“恍”“侊”，《广韵》皆在平声见纽，同读“古黄切”，此当依《广韵》改作“慌”（读呼晃切），“荒”（读呼浪切）。

4. 咊火货之“咊”，《广韵》读“户戈切”，在匣纽，无读晓纽者，

而《广韵》戈韵即无晓纽之读，此当系借晓纽之读为之。又此字旁所注“呼果反”亦误。（殷文见山东大学学报1957年第一期）

盈按：殷文所指出的这几条，有的确实系原文有误，如“泼”。有的可能是本纽图的字音原本与《广韵》有不同，未必就是错字，若一以《广韵》为准，则扞格不通矣。

第八节　韵书的产生

根据记载，中国最早出现的韵书是公元3世纪魏国李登著的《声类》。继李登之后，有晋朝吕静的《韵集》。二书都已失传，下列记载给我们提供了一点可供参考的资料。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二：“魏时有李登者，撰《声类》十卷，凡11520字，以五声命字，不立诸部。”

《魏书·江式传》：“（吕）静别放故左校令李登《声类》之法，作《韵集》五卷，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而文字与兄（吕忱）便是鲁卫，音读楚夏，时有不同。”

《隋书·潘徽传》：“李登《声类》，吕静《韵集》，始判清浊，才分宫羽。而全无引据，过伤浅局，诗赋所须，卒难为用。”

空海《文镜秘府论》：“齐太子舍人李节（即李季节）知音之士，撰《音韵决疑》，其序云：五行则火土同位，五音则宫商同律，暗与理合，不其然乎！吕静之撰《韵集》，分取无方。”

《经曲释文·尔雅音义》“蝗”字下注云：“《声类》、

《韵集》并以'蝗'协庚韵。"

《颜氏家训·音辞篇》："《韵集》以成仍宏登，合成两韵，为奇益石，分作四章。……皆不可依信。"

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韵目下面有关《韵集》一书的小注，以平声为例。如：

二冬	吕与钟江别
六脂	吕与之微大乱杂
十四皆	吕与齐同
十五灰	吕与咍别
十七真	吕与文同
十八臻	吕与真同
二十一元	吕与魂别
二十二魂	吕与痕同
二十五删	吕与山别
二十七先	吕与仙别
三十六谈	吕与衔同
三十七阳	吕与唐同
四十三尤	吕与侯别

据上述材料，我们对二书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一、按五声分韵，而不是按四声分韵。我在上一节已经讲过了，宫商角徵羽是五种声调，当是某一实际方音的反映。李书分为十卷，当是每一调分为两卷。吕书五卷，当是一调一卷。清人邹汉勋说："以五声命字，则但曰宫韵、商韵、角韵、徵韵、羽韵而已。"[1]依邹氏此见，则二书只有五大韵。然而，他把"五声"当作五个韵部，这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们承认"五声"是

指五个声调，那么，韵书的编排按声调分卷，韵书的结构按声调再分出若干韵部，则始于李吕二人，后来《切韵》系韵书在声调上只不过减五为四而已。清人陈澧也说："古无平上去入之名，借宫商角徵羽以名之……其分为五声者，盖分平声清浊为二也。"（《切韵考》卷六）

二、二书除以声调为纲之外，都已分出若干韵部。这里我要特意解释一下"不立诸部"是什么意思。邹汉勋说："不立诸部，则自东冬至乏之部名，登书未有也"。③赵诚说："封演说《声类》是不立诸部，即尚未分韵部。如果《韵集》分了韵部，应该说是一种创造，和《声类》就显著不同，为什么江式还说静仿李登之法呢？这样说来，《韵集》一书不仅未分四声，也没有像后来的韵书那样划立韵部④。"我认为"不立诸部"的"诸部"根本就不是"韵部"的意思，而是指的部首。理由有二：1.唐以前，"韵部"只称"韵"，而不称"部"；2.《封氏闻见记》卷二"文字"与"声韵"是分作两篇的，封演是将《声类》一书放在"文字"篇介绍的，在《声类》这条材料之前，封氏介绍"《说文》凡五百四十部"，在《声类》这条材料之后，紧接着介绍《字林》"亦五百四十部，诸部皆依《说文》。"很显然，联系上下文判断，所谓"不立诸部"一语中的"诸部"，与"诸部皆依《说文》"的"诸部"，意思完全一样；另外，张参《五经文字·序例》也说："近代字样，多依四声，传写之后，偏傍渐失，今则采《说文》、《字林》诸部，以类相从。"所以，我认为"诸部"绝非"韵部"之意。字书的部首称"部"，韵书的韵目称"韵"，唐以前是分别得很清楚的。"不立诸部"一语解释清楚之后，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上引有关的材料都可

贯通了。如《韵集》是仿效《声类》的，两书的分韵也可能差不多。又如《尔雅音义》说《声类》、《韵集》并以“蝗”协庚韵，可证二书都有“庚韵”这样的韵目。他如《刊缪补缺切韵》下面的那些关于《韵集》的小注，也足以证明吕书的确已经分出韵部来了。

三、二书已分出韵部应是无疑议的了，与陆法言的《切韵》相比有什么不同呢？1.二书分韵肯定不如《切韵》细密，如脂之微不分，齐皆不分，真文臻不分，魂痕不分；2.从后人对二书的批评来看，它们的音系不会像《切韵》那样是综合性的，可能比较接近某一方言。李季节批评《韵集》“分取无方”，颜之推批评《韵集》有的韵“不可依信”，潘徽批评《声类》“全无引据，过伤浅局，诗赋所须，卒难为用”，江式批评《韵集》“音读楚夏，时有不同”，这四家的批评都关乎到审音的标准问题。所谓“分取无方”是说分韵与取韵没有正确的标准；所谓“不可依信”也是个标准问题，颜之推不“依”不“信”，是因为颜之推有自己的标准，不见得吕静的分韵本身是无依据、不可信的；江、潘二人的批评是关于“雅俗”的问题，“浅”“楚”都是“俗”的意思，李吕二人的韵书因偏于“浅”，偏于“楚”，所以若以夏言（雅言）为标准，“诗赋”就“卒难为用”了，说到底还是个分韵标准的问题。遗憾的是《声类》、《韵集》是以何地语音为根据，我们已无法弄得清了。

四、清代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录了《声类》佚文二百余条，《韵集》佚文70余条。这些辑录来的材料不见得全可靠，但也不能说全不可信吧。如果我们不去计较个别材料的可靠程度如何，而是要从这2百多条材料中找出二书的某些特征，我

看还是可以的。如《声类》佚文中有反切60多条，拿这些反切上下字与《切三》相比较，就发现二书的切语很不一样，其中多数不同是用字问题，无关乎音类，但涉及音类的也有。如：

	声类	切三
謍	呼宏反	乌宏反
	（呼，晓母；乌，影母）	
跪	渠委反	去委反
	（渠，群母；去，溪母）	
蹶	渠月反	居月反
	（渠，群母；居，见母）	

从佚文也可以判断，二书和后起的韵书一样，不单有反切注音，也有词的释义。如：

燧　取火者也。

炉　火所居也。

蒂　果鼻也。

挑　挟也，谓以手挟取物也。

吃　重言也。

析　劈也。

菸：乙余反。今关西言"菸"，山东言"蔫"。蔫，音於言反。江南亦言"痿"。痿，又作萎，於为反。菸邑：无色也。

从佚文还可以看出，《声类》也载有古今字，异体字。如：

頫：古文俯字。

[illegible]：古文窨字。

於：即古乌字。

嚾：呼也，今作"唤"也。

衖：巷字。

僊：俗仙字，

熹：亦熙字也，

闓：此亦开字。

我们对这两部最早的韵书进行一番考察，对了解后来的韵书的发展是有作用的。南北朝时期，韵书进入了一个大发展阶段。从《隋书·经籍志》和陆法言《切韵·序》可知，这一时期产生了十几种韵书，其中有的韵书在当时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如阳休之（右北平无终人，官于北齐、北周）的《韵略》分"五十六韵，科以四声，制作之士，咸取则焉，后生晚学，所赖多矣"⑤。自从法言《切韵》出现之后，这些"各有土风"的韵书都逐渐消失了，这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注：

①五均论，见《邹叔子遗书》。

②唐兰也认为是五个韵部，他在"王三"跋语中说："创始者粗疏，故但列五部耳。"

③五均论，见《邹叔子遗书》。

④《中国古代韵书》16页。

⑤《文镜秘府论》33页。

第九节　辞书的发展

关于文字、词汇的研究，先秦两汉时代已开辟了四条道路。

《尔雅》是一条路，《方言》是一条路，《说文》是一条路，《释名》是一条路。

《尔雅》这条路子发展成为“雅学”。产生于曹魏时代的《广雅》是雅书系统中的名著。《广雅》的作者张揖（220——265），字稚让，清河人，一说河间人，魏太和（魏明帝曹叡年号。非后魏孝文帝之太和）年间（公元227年至232年）担任博士。《广雅》的体例完全仿照《尔雅》，也分《释诂》、《释言》等19篇，释义方式也是以一词释众词，全书有2345个条目（比《尔雅》多250多条），原有18150个字（王念孙的《广雅疏证》经过一番校勘，实为17326个字，比原字少了824个）。张揖为什么要编《广雅》呢？他说：

> 夫《尔雅》之为书也，文约而义固，其陈道也，精研而无误，真七经（诗、书、易、礼、春秋、孝经、论语）之检度，学问之阶路，儒林之楷素也。若其包罗天地，纲纪人事，权揆制度，发百家之训诂，未能悉备也。臣揖……窃以所识，择撢群艺，文同义异，音转失读，八方殊语，庶物易名，不在《尔雅》者，详录品覈，以著于篇。
>
> （《上广雅表》）

张揖著《广雅》就是为了“广”“尔雅”之“未能悉备”。《尔雅》所“未能悉备”的内容，并不一定就是《尔雅》的缺点，因为《尔雅》成书于战国末年，只能收集解释战国末年以前的词语。从战国末年历经秦汉到三国时候的曹魏，已有400多年的历史，社会在发展，名物制度在发展，语言也在发展，许多新词产生了，许多新义产生了。于是《尔雅》已经不能适应新的需要，这就要求有人出来写一本总结秦汉至魏的词汇著作，张揖的《广

雅》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它的重要价值也在于此。从《广雅》反映汉魏词汇面貌这一特点来说，它的作用丝毫不亚于《尔雅》。《广雅》和《尔雅》一样，也不能片面地笼统地用"训诂资料汇编"这样的话来概括，因为它不只是"训故言"，也"解今语"。这一点张揖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他说的"择撢群艺"，那是书本子上的训故言，而"八方殊语，庶物易名"，则完全是今语问题。后魏江式（陈留济阳人）说："究诸《埤》《广》（《埤苍》和《广雅》），缀拾遗漏，增长事类，抑亦于文为益者"。①江式所言"缀拾遗漏"是指搜罗《苍》《雅》未载的诂训资料，"增长事类"也是指今语问题，意思是要解释反映当时新"增长"起来的"事类"的词语。正因为《广雅》有"解今语"的特点，所以利用它来解释汉魏作品中的词语就大有用处。

如司马迁《报任安书》："仆尝厕下大夫之列"。这个"厕"字不见之于《尔雅》，《说文》只释其本义，《广雅·释言》："厕，间也。"这个释义不仅可以用来解释"厕下大夫之列"的"厕"，而且还使我们认识到，《左传》曹刿论战中的"又何间焉"的"间"与"厕"为同义关系。

又如，扬雄《法言·寡见》："曼是为也，天下之亡（wú）圣也久矣。"又《五百》："周之人多行，秦之人多病，行有之也，病曼之也。"（病与行相对为义，学而不能行谓之病。）又《重黎》："神怪茫茫，若存若亡，圣人曼云。"这三个"曼"字怎么解释？《广雅·释言》："曼、莫：无也。""曼"原来也可作否定词，是"没有"、"不"的意思。在今湖南安仁话中还保存这个词，如说："他曼来"，就是"他没有来"，"你还

曼吃饭”就是“你还没有吃饭”。王念孙指出：“曼、莫、亡，一声之转也。”这是可信的。

也因为《广雅》有解今语的特点，并不只是搜集书本子上的训诂资料，所以有的“今语”一消失，《广雅》中有少量这样的词就不能得其确解了。如《释言》：“伪，条也。”“叠，怀也。”“播，抵也。”“弑，然也。”“怜，缀也。”这些解释不了的词条，有讹误或其他的原因，但大多数是由于已经找不出语言事实来证实。

《尔雅》在编排、释义方面的缺点，《广雅》也都有。尤其是声训，《广雅》问题更多些，因为两汉是声训大发展的时期，《广雅》对这些声训材料也多所采纳。

《说文》之后的一部重要字书是《字林》。作者吕忱，字伯雍，为《韵集》作者吕静之兄。《魏书·江式传》说：“晋世义阳王典祠令任城吕忱表上《字林》六卷，寻其况趣，附托许慎《说文》，而案偶章句，隐别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隶，不差篆意也。”封演《闻见记》说：“晋有吕忱，更按群典，搜求异字，复撰《字林》七卷，亦五百四十部，凡一万二千八百二十四字，诸部皆依《说文》。《说文》所无者，是忱所益。”

根据这些记载来看：1.《字林》的分部与《说文》一样；2.收字12824，比之《说文》多出3471 个字；3.它比《说文》多出来的字是从“群典”中“搜求”出来的“异字”、“古籀奇惑之字”，如：

> 殉：杀生送死也。盈按：《说文》有“侚”无“殉”。
>
> 註：解也。盈按：《说文》有“注”无“註”。
>
> 窯：烧瓦灶也。盈按：《说文》有“窯”无“窯”。

㑬：狠也，戾也。盈按：《说文》无此字。朱骏声说：即“执拗”字。

瞠：直视貌。盈按：《说文》有“矘”无“瞠”。

（以上全引自《字林考逸》）

《字林》不只是比《说文》多收了几千字，二书释义也略有不同。如：

窜：《字林》释作“逃也”，《说文》解作“匿也”。

枭：《字林》释作“鸋鴂”也。形似鸮而青白，出于山，即恶声鸟也。楚人谓之服鸟，亦鸱类也。山东名鸋鴂，俗名巧妇。”《说文》解作“不孝鸟也，日至捕枭磔之。”

符：〔信也〕，谓分而合之曰“符”。字〔从竹〕。〔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为信。竹取岁寒不变，以布德也。又用铜，君臣同心也。盈按：这一条是对《说文》释义的改写，内容加详。〔　〕中的内容为《说文》所原有。

（以上全引自《字林考逸》）

从南北朝至隋唐，《字林》的影响仅次于《说文》。唐代科举设明字科，考试科目有《说文》六帖，《字林》四帖。张参《五经文字·序例》说：“吕忱又集《说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补之。今制国子监置书学博士，立《说文》《石经》《字林》之学。”又说：“《说文》体包古今，先得六书之要，有不备者，求之《字林》。”

《字林》流传至南宋已经不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其书集《说文》之漏略者凡五篇，然杂揉错乱，未必完书也。”《字林》亡于元明之际。清人任大椿有《字林考逸》八

卷，陶方琦有《字林考逸补本》一卷，均按部首排列。

距《字林》200多年左右，顾野王的《玉篇》问世了。顾野王（公元519年—公元581年），字希冯，吴郡人。梁武帝大同年间任黄门侍郎兼太学博士，曾奉诏撰《玉篇》，于大同九年（公元543年）完稿，时年24岁。

《玉篇》是在什么情形下产生的呢？顾野王说：

> 微言既绝，大旨亦乖，故五典三坟，竞开异义，六书八体，今古殊形，或字各而训同，或文均而释异，百家所谈，差互不少，字书卷轴，舛错尤多，难用寻求，易生疑惑。
>
> （《玉篇·序》）

这里说了四种情况。一是经书的训诂产生了"异义"；二是文字发展了，由篆至隶，由隶至楷，"今古殊形"；三是关于字的释义也"差互不少"；四是字书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错误，检字又不甚便。这就要求编出一部新的字典来，规范字形，确定义训，纠正谬误，便利检查。所以顾野王"总会众篇，校雠群籍，以成一家之制，文字之训备矣。"他汇集了魏晋以前的各种（经书注释以及字书、词书）训诂资料，并以个人的意见决定取舍，要"成一家之制"。可见，《玉篇》虽然在部首方面基本遵《说文》旧制（分为542部，有增有删，部首排列顺序亦与《说文》有别。），在内容方面则与《说文》大不相同。如它不分析字形结构，释义务求全备，全书用楷体，是一部真正供查检用的常用字典。从这个角度而言，它的实用性和普及性都优于《说文》，对后世字典的编纂工作也产生过很好的影响。

《玉篇》原书早就不存在了，宋朝人的《大广益会玉篇》删掉了原书的许多内容。清末黎庶昌在日本见到了《玉篇》残卷，

经考定认为是原本《玉篇》，后来编为《玉篇零卷》。下面从《玉篇零卷》举些例子以说明其体例。

廱　於甑反。《埤苍》：廱，对也。野王按：谍语相廱对也。《礼记》：无噭廱。《论语》：子夏之门人，洒扫廱对是也。今为“應”字，在心部也。显按：今本《大广益会玉篇》只存“於甑反，廱对也”六字，其余全删。

欺，去其反。《左氏传》：背盟以欺大国。野王案：欺犹妄也。《论语》：吾谁欺，欺天乎？是也。《苍颉篇》：绐也。《字书》：欺，诈也。显按：今本《大广益会玉篇》只存“去其切，欺妄也”六字，其余全删。

歌　古何反。《说文》：咏歌也。或为“诃”字，在言部。古文为“哥”字，在可部。显按：今本《大广益会玉篇》只存“古何切，咏声也，与诃同”，其余全删。

（以上所引《玉篇零卷》材料，全见丛书集成本）

看来，原本《玉篇》有这样一些特色：先出反切以注字音，再引书证以释义，对其他字书的材料也多所采纳。有时加上野王自己的案语，以进一步阐明词义；有时还注明古今字、异体字。这个体例是比较完善的。但有的释义引证烦琐，有的义过于简略，所以书成之后，“太宗嫌其书详略未当，以（肖）恺博学，于文字尤善，使更与学士删改。”③

据《封氏闻见记》说：“《玉篇》三十卷，凡一万六千九百一十七字。”又据广益本祥符牒后双行小注说：“注四十万七千五百有三十字。”清朝的杨守敬认为，这个注文数字“为顾氏原本之数”。④宋代大中祥符年间修的《大广益会玉篇》，连同正文和注文一起才有20余万字，说明原本《玉篇》的注文被删掉了

一大半，这是很可惜的。而所谓的“大广益会”，只是正文增加到22000多字，比原本《玉篇》多5000余字。

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总汇经典音义，是一部资料性质的工具书。

陆德明（约公元550年—630年？），名元朗，苏州吴县人。他于陈后主至德元年(公元583年）开始编纂《经典释文》，大约完稿于隋灭陈（公元589年)之前。钱大昕说：“细检此书，所述近代儒家，惟及梁陈而止，若周隋人撰音疏，绝不一及，又可证其撰述，必在陈时也。”⑤全书共30卷，采集汉魏六朝关于易、书、诗、三礼、三传、孝经、论语、老、庄、尔雅等书的音义，计230余家。

《经典释文》是《切韵》以前汇集反切资料最为丰富的一部著作。作者收集这些语音资料的原则有两个：一是广采博收，“或字有多音，众家别读，苟有所取，靡不毕书。”⑥一是标举正音，“若典籍常用，会理合时，便即遵承，标之于首。”⑦在一字多音的情况下，把“会理合时”的音放在最前面，以示“遵承”。如《庄子音义》：

而后乃今培　音裴，重也。徐（指徐邈）扶杯反，又父宰反，三音扶北反。本或作陪。

“培”字收了四个读音，以“音裴”为正音。

陆德明有感于当时“微言久绝，大义愈乖，攻乎异端，竞生穿凿”⑧。对于经典的义训，也“搜访异同，校之苍雅”，“经注毕详，训义兼辩”。如《论语音义》：

名曰论语　论，如字。纶也，轮也，理也，次也，撰也。答述曰语。撰次孔子答弟子及时人之语也。郑玄云：仲

弓、子游、子夏等撰。

又如《毛诗音义·邶风·匏有苦叶》“厉”字注云：

厉　力滞反。以衣涉水也。《韩诗》云：至心曰厉。《说文》作“砅”，云：履石渡水也。

“至心曰厉”和“履石渡水”是两种不同的释义，陆德明兼收，不下已意。

《经典释文》不只是收集正文的音义资料，还对旧注也进行训释，即给注文作注。如《论语·学而》“道千乘之国”一语，旧注引《司马法》以释“千乘”。《经典释文》又为“司马法”作注。

司马法　齐景公时有司马田穰苴，善用兵。《周礼》，司马掌征伐。六国时，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兵法，附穰苴于其中，凡一百五十篇，号曰《司马法》。

注：

① 《魏书·江式传》。

② 《广雅疏证》卷五上，501页。万有文库本。

③ 《梁书·肖子显传》所附之肖恺传。

④ 《玉篇零卷》（四），375页。丛书集成初编本。

⑤ 《潜研堂文集》卷27，410页。万有文库本。

⑥⑦ 《经典释文·条例》。

⑧ 《经典释文·序》。

第四章　隋唐宋语言学

(公元6世纪末　　公元13世纪)

概　　况

隋唐至宋末，有近七百年的历史。这一时期，隋王朝首创了科举制度，唐代又开始实行诗赋取士的办法，格律诗以及词、赋的发展都进入了完美的艺术境界，至于佛教的发展更是到了极盛阶段。所有这些文化特点都对这一时期的语言研究起了促进作用。

自从隋代陆法言写了一本《切韵》之后，几百年间，文士们虽然"共苦其苛细"，但也无可奈何。因为唐宋时候，它已具有"官韵"的资格，充其量只能"刊谬补缺"、增字增注而已，即使有脱离这一体系而产生的韵书，也难与之抗衡。唐宋时期在音韵学方面也有新的贡献，如字母之学、等韵学都兴起于这一时期。

在文字学方面，唐朝人几乎没有写出一部像样的著作。他们只是为了科举制度的需要才写了几部正字形的书。到了南唐宋初才出现了大小二徐这样的文字学家。

唐宋时期对古书注释是有成绩的。现在流行的《十三经注疏》，每一种都有他们的成果在内。如唐代孔颖达等人为《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传》等五部书

作了"正义"，贾公彦为《周礼》、《仪礼》作"疏"，徐彦为《春秋公羊传》作"疏"，杨士勋为《春秋谷梁传》作"疏"，宋朝的邢昺为《尔雅》、《论语》、《孝经》作"疏"，孙奭为《孟子》作"疏"。还有，唐代李善的《文选注》，张守节的《史记正义》，颜师古的《汉书注》，宋代朱熹的《诗集传》、《楚辞集注》、《四书章句集注》，都是训诂名著。颜师古的《匡谬正俗》是一本未完稿的词义札记，其中讨论到的词语有一百八十多条，有不少精到的见解。宋人的笔记文也包含着一些词义研究的条目，对研究近古汉语词汇很有意义。如王观国的《学林》、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叶大庆的《考古质疑》、袁文的《瓮牖闲评》、陈淳的《北溪字义》等。

陈淳是朱熹的弟子，是位理学家。《北溪字义》从理学的角度对"命"、"性"、"仁义礼智信"、"道"、"理"、"德"等词进行训释，是一部小型的"理学词典"。

从总体来考察，唐宋时期的语言研究成就不算突出。他们既不像汉魏六朝人那样长于开创，也不像清朝人那样长于考古。这一时期很少有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大概唐宋士人的主要精力并不在此，这是由社会、政治以及文化发展等多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

第十节 《切韵》系韵书

《切韵》系统的韵书究竟包括哪些著作，各人的意见可能是

不一样的，这涉及到对某些韵书性质的看法问题，分歧是难免的。

我个人认为从陆法言的《切韵》，到《广韵》、《集韵》、《五音集韵》以及平水韵，都应算是《切韵》系韵书，主要理由是他们所反映的基本音系大致上都一样。

陆法言，名词，临漳人。祖先为鲜卑族，由步陆孤氏改姓为陆。其父陆爽（公元539年——公元591年）在北齐担任通直散骑侍郎，跟颜之推（公元531年——约590以后）同事。陆法言研究音韵，曾受到过颜之推的指点。隋开皇初年，颜之推已经五十多岁了，有一次他和刘臻、魏彦渊、卢思道、李若、肖该、辛德源、薛道衡等人，“同诣法言门宿，夜永酒阑，论及音韵”。（切韵·序）这时候的陆法言才二十多岁，诸前辈讨论音韵时，他“烛下握笔，略记纲纪”。过了十几年之后，他才把这个记录稿加以整理，并参考其他一些资料，于隋文帝仁寿元年（公元601年）写成《切韵》五卷。

开皇初年在陆家举行的那次讨论会，对确立《切韵》的编写原则、指导思想、基本内容具有决定意义。现对八位与会者的情况略加介绍。

刘臻（527——598），字宣挚，沛国相（今安徽宿县西北）人。父刘显精于《汉书》。臻幼年可能居于金陵，梁元帝时，任中书舍人，隋文帝时，进位仪同三司。臻亦精于《汉书》，时人称为“汉圣”。

卢思道，字子行，范阳（今河北涿县）人，十五岁至邺下（今河北临漳西南），北齐天保（550——559）年间为司空行参军长，北周时迁武阳太守，关于他的生卒年说法不一。一说卒于

开皇三年（583）年，一说卒于开皇六年（586年），一说卒于开皇十年（590年）。

魏彦渊（526——590），名澹。钜鹿下曲阳（今河北石家庄地区晋县）人。可能出生邺下。开皇初任著作郎。

李若，顿丘（今河南濮阳市清丰县）人，开皇五年任散骑常侍。李若居邺下，若在北齐时，“风采词会，有声邺下。”“时人为之语曰：京师灼灼，崔儦、李若。”

萧该，兰陵（今江苏武进）人。梁鄱阳王恢之孙，梁武帝之从孙。著有《汉书音义》、《文选音义》。开皇初年任国子博士。

辛德源，字孝基，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县）人。他的族人都仕于北齐，他很可能生长于邺，陇西仅仅是他的郡望罢了（周祖谟语，1963）。辛曾撰有《集注春秋三传》三十卷，并为扬雄《法言》作注。开皇初年担任谘议参军。

薛道衡（531——609），字玄卿，河东汾阴（今山西运城地区万荣县）人。父薛孝通仕于北魏，卒于邺，道衡当亦生于邺城（周祖谟语，1963）。开皇八年（588年）隋伐陈，道衡任淮南道行台尚书吏部郎，灭陈后，迁吏部侍郎。

颜之推，字介，祖籍瑯琊临沂（今属山东省）人。先世随晋室南迁，定居金陵。颜历仕梁、北齐、北周、隋四朝。梁元帝时任散骑仕郎，奔齐后任黄门侍郎、平原太守，入北周任御史上士，隋开皇中，太子召为学士，甚见礼重。颜之推是六世纪下半期最有影响的语言学家，主要著作有《颜氏家训》，其中《书证》、《音辞》两篇，专论语言文字问题，是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的重要文献。

《音辞篇》追溯了六世纪以前语音研究的历史，从许慎、郑玄、刘熙等人用“譬况假借以证音字”，到“汉末人独知反语”，到魏世以后“音韵蜂出”，其中存在种种“声读之是非”，颜之推提出了解决是非的标准，并对南北方音的不同特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篇中还对某些字的南北读音进行了对比研究，对当时流行的字书、韵书的语音问题也有不少评论。不难发现，他的许多观点对陆法言产生了直接影响。陆法言在《切韵·序》中一开头就提到开皇初的讨论会，并着重点明颜外史的作用，这不是偶然的。

《切韵》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所产生的影响相当深远。隋以后的各种韵书（中原音韵系统的韵书不算）几乎都没有跳出它的框框，它处于韵书的支配地位达一千多年之久，真是“时俗共重，以为典规”。（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序》）

陆书失传已久，而它的基本面貌还是可以弄清楚的。全书有五卷，平声分上下两卷，其余三卷为上、去、入。平声54韵，上声51韵，去声56韵，入声32韵，共计193韵。据封演《闻见记》记载，《切韵》收了12158字。

清末在甘肃敦煌发现了一些《切韵》残卷，其中编号为S 2683的（也称之为“切一”），基本上可以肯定是陆法言的原著。这个残卷一共只有四十五行（多数行残缺不全），内容是上声海韵至铣韵。从这个残卷可以看出陆书的一些特点：1.韵字少；2.注释简略；3.注释的格式是先释义，后出切。如果是小韵的领头字，就注明这个小韵内共有的字数。如：

混：流，一曰混沌，阴阳未分。胡本反。八。

鲧：禹父。古本反。四。

唐高宗仪凤二年（公元677年），长孙讷言给《切韵》作笺注，这个笺注本已失传。敦煌残卷"切二"（即S 2055）之前载有讷言写的一篇序文（与《广韵》的讷言序，文字稍有不同），从序文可知：1.笺注本加了600字，用补缺遗；2.陆书在七十多年的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错别字，讷言为之纠谬；3.增加释义。

长孙氏之后，又有王仁昫（煦）的《刊谬补缺切韵》。据唐兰考证，此书为唐中宗神龙二年（公元706年）所作。我们现在称之为"王一"、"王二"、"王三"的，就是指的这种韵书。"王一"是指在敦煌发现的残卷，原卷藏于法国巴黎国民图书馆，编号为P 2011；"王二"是故宫所藏的项子京跋本；"王三"是全本，价值最高，1947年发现。有宋濂作跋，又称宋跋本。

王书标明为"刊谬补缺"，就表示了他的目的所在。刊谬就是刊除原书中的谬误。如平声21元韵：

> 蕃，草盛。陆以为"蕃，屏"，失。盈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切三》，正是作"蕃，屏。"这是保留了陆氏的原训。

补缺就是增加韵字和义训。陆书原为33922字，新增加26453字。

王书对研究法言《切韵》有重要价值。

一、据王书可以了解法言《切韵》的分韵情况。王书共195韵，其中上声广（yǎn，《广韵》作俨）韵下注："陆无此韵目，失。"又去声严韵（《广韵》作酽yàn)注："陆无此韵目，失。"从这两条注推断：陆书原本只有193韵。平声严韵没有与之相承的上声、去声，大概是由于韵字少，就没有另立韵部，不牵涉到

音系问题。

二、王书在韵目之下注明了《切韵》以前五家（指吕静、阳休之、夏侯咏、杜台卿、李概）韵书分韵的情形。这些注文王国维认为是陆法言《切韵》的原注，也有人认为是王仁昫本人作的注，这个问题关系不大。总之，有了这些注文，我们就能大致上了解到六朝韵书分韵的一些情况，也可以据此考察陆韵与五家韵书的关系。

唐天宝年间，孙愐把原本《切韵》改编为《唐韵》。“名曰《唐韵》，盖取《周易》、《周礼》之义也。”（《唐韵·序》）

《唐韵》现在也只能见到一些残卷和孙愐的序言。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吴县蒋斧在北京发现《唐韵》残卷，计44页。有去声一卷（缺一送至八未之前半，又缺十九代之后半至二十五愿之前半）和入声一卷（全）。此书成于天宝十载（公元751年），人称“天宝本”以别于另一种开元本《唐韵》。

《唐韵》与陆法言《切韵》不同的地方是多出了十一个韵：

平声：别谆（合口）于真（开口），别桓（合口）于寒（开口），别戈（合口）于歌（开口）；

上声：别准于轸，别缓于旱，别果于哿；

去声：别稕于震，别换于翰，别过于箇；

入声：别术于质，别末于曷。

《切韵》193韵，加此11韵，等于204韵，再加上广、严二韵，就是206韵了。可见，宋人所修的《广韵》（成书于公元1008年），其韵部的区分原本来自《唐韵》，只不过四声韵目的次序采取了唐代李舟《切韵》（原书已失）的排列法。《唐韵》、

《广韵》的主要特点就是上面说的把一些合口韵从开口韵中分出来，语音系统并无实质性的变化。另外，《广韵》所收之韵字有26194，超出原本《切韵》收字一倍有余。

《广韵》的全称为《大宋重修广韵》。所谓“重修”，是因为宋太宗时曾修订《切韵》，名曰《新定广韵》。真宗时奉命重修《广韵》的是陈彭年（961——1017）、丘雍。《广韵》全书分五卷，平声分上下二卷，上去入各一卷。平声57韵，上声55韵，去声60韵，入声34韵。入声韵少于平上去三声，因为《广韵》中的入声韵只跟阳声韵相配。去声多至60韵，是因为“祭、泰、夬、废”四个去声韵，没有相应的平、上声韵。下面将《广韵》韵目按阴、阳、入三声列出：

阴声韵（举平以赅上去，末四韵只有去声）26个：

支、脂、之、微、鱼、虞、模、齐、佳、皆、灰、咍、萧、宵、肴、豪、歌、戈、麻、尤、侯、幽；祭、泰、夬、废。

阳声韵（举平以赅上去）35个：

东、冬、钟、江、阳、唐、庚、耕、清、青、蒸、登；真、谆、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删、山、先、仙；侵、覃、谈、盐、添、咸、衔、严、凡。

入声韵34个：

屋、沃、烛、觉、药、铎、陌、麦、昔、锡、职、德；质、术、栉、物、迄、月、没、曷、末、黠、辖、屑、薛；缉、合、盍、叶、帖、洽、狎、业、乏。

《广韵》各韵内部由若干小韵组成，同一小韵的字，读音完全一样。小韵也叫做“纽”，纽与纽之间有一圆圈作为间隔号。旧说

《广韵》有3890个小韵，今人统计只有3700多。《广韵》的反切系统基本同于《切韵》，在“王三”被发现之前，《广韵》是研究《切韵》音系最主要的依据。

《广韵》收字26194个，字义训释方面也有很高的价值，注文中所引用的古籍有270多种。

《广韵》各种版本有繁简之别。周祖谟的《广韵校本》质量最高。

比《广韵》晚出三十一年（即宋仁宗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的《集韵》分部虽然跟《广韵》一样，但有它自己的一些特色：

一、改动反切。“凡字之翻切，旧以‘武’代‘某’，以‘亡’代‘茫’，谓之类隔，今皆用本字。”（《集韵·韵例》）“武”“亡”，微母；“某”“茫”，明母。微、明都是唇音，但微属轻唇，明属重唇，实同类而相隔。

《集韵》不仅对“类隔”有改动，而且对一些反切上字与被切字等呼调类不合的也进行了改革。如：

东：《广韵》作德红切，《集韵》作都笼切。“东”本是合口一等平声，而“德”为开口一等入声，二者虽同属一等，但调类不同，呼也不同，故将“德”字改为“都”字。“东”“都”全是合口一等平声，

钟：《广韵》作职容切，《集韵》作诸容切。“钟”本是合口三等平声，而“职”为开口三等入声，二者虽同属三等，但调类不同，呼也不同，故将“职”改为“诸”。“诸”“钟”都是合口三等平声字。

这些改动，反映了《集韵》的编者们已经认识到，韵书的注

音要照顾到实际语音的变化。

二、《集韵》对同用、独用的规定有所不同①，小韵的排列也有所不同，《集韵》注意到按声纽次序排列小韵，但《集韵》有些韵部的归字混乱，如有的字本属开口，却归入了合口韵。如《广韵》上声轸韵“引”小韵，《集韵》归到准韵；《广韵》翰韵的“炭”、“摊”两小韵，《集韵》归到换韵。

三、《集韵》收字53525，比《广韵》多出一倍。顾广圻说：“盖自宋以前群书之字，略见于此矣。”（《补刊集韵·序》）

四、在释义方面，对“经史诸子及小学书”的诂训，多所采纳；对《广韵》中一些与字义训释无关的资料则有所删削。

为了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宋代还出现了多种《礼部韵略》，其特点是收字少，注释少。现在能见到的有：《增修互注礼部韵略》（毛晃及其子毛居正编），《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后附《韵略条式》，对研究宋代科考有一定作用）。

到宋代，《切韵》系韵书已经与口语严重脱节，它那过于苛细的分部，使人们运用起来极为不便。《集韵》以后，就出现了改并韵书的要求，首先起来改并《切韵》系韵书的人出现在与南宋王朝相对抗的金朝。金章宗泰和八年（相当于南宋宁宗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真定松水（今属河北省石家庄地区）人韩道昭著《改并五音集韵》，过了四年之后，也就是金崇庆元年（公元1212年），他“又以《龙龛》训字增加五千余字焉。是以再（盈按：有人未注意这个“再”字，以为《五音集韵》始刊于崇庆元年，不确。）命良工，谨镂佳板”②。

此书的全称本是《改并五音集韵》，后来简称为《五音集

韵》。这个题目确切地反映了此书的特色。

何谓“改并”？就是将206韵改并为160韵。韩道昭的堂兄韩道升在该书序言中说：

> 复至泰和戊辰（公元1208年），有吾弟韩道昭……又见韵中古法繁杂，取之体计，同声同韵，两处安排，一母一音，方知敢并。却想旧时，先宜一类，移齐同音，薛雪相亲，举斯为例，只如山删、狝铣、隳墟、庚耕、支脂之，本是一家；怪卦夬，何分三类？开合无异，等第俱同，性例非差，故云可并。今将幽随尤队，添入盐丛，臻归真内，沉埋严向（？），凡中隐匿，覃谈共住，笑啸同居，如弟兄启户皆逢，若侄叔开门总见③。

韩道昭说的“开合无异，等第俱同”，这是并韵的根据，这个根据当然反映了当时的实际语音。

何谓“五音”？就是对160韵内的字全都按“五音”分类排列，即按三十六字母排列。韩道昭说：

> 尝谓以文学为事者，必以声韵为心，以声韵为心者，必以五音为本，则字母次第，其可忽乎！故先觉之士，其论辨至详，推求至明，著书立言，蔑无以加。然愚不揆度，欲修饰万分之一，是故引诸经训，正诸讹舛，陈其字母，序其等第，以见母牙音为首，终于来日。
>
> （五音集韵·序）

序中所说的“先觉之士”是指谁呢？我们从韩道升的序文中，知道此人名叫荆璞（字彦宝）。是荆璞首先于“大金皇统年间（公元1141年—1149年）……将三十六母添入韵中，随母取切，致使学流取之易也”④。

荆璞是将三十六母添入哪一部韵书之中的呢？明朝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滕霄写的重刊《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海集韵序》说："《五音集韵》者，荆璞取司马公之法（按：指等韵图）添入《集韵》，随母取切者也。"原来所谓《五音集韵》，正是将三十六母添入《集韵》之中，其法始于荆璞，并非韩道昭首创。

"随母取切"法是运用了等韵学的成果，将韵书与等韵图合而为一。下面举一东为例，可以了解其具体编排的情况。

见	一公	三弓	
溪	一空	三穹	
群	一硕	三穷	
疑	一岘		
端	一东		
透	一通		
定	一同		
泥	一齈		
知		三中	
彻		三忡	
澄		三虫	
滂	一锋		
并	一蓬		
明	一蒙		
非			四风
敷		三丰	……
奉		三冯	

微			三瞢	
精	一葼			
清	一怱			
从	一丛			
心	一檧			四嵩
照			三终	
穿			三充	
床		二崇		
晓	一烘			
匣	一洪		三雄	
影	一翁		三硧	
喻				四融
来	一笼		三隆	
日			三戎	

若将160韵中的全部小韵的声母、等、小韵代表字都提示出来，就可以制成一份等韵图。我仅将东韵分等归字的情况与《韵镜》、《切韵指掌图》作一比较，就发现小有出入。如疑母三等《韵镜》有“𩅦”，《指掌图》有“颙”，《五音集韵》不收；“䑐”字《韵镜》及《指掌图》都归去声一等，《五音集韵》归平声一等。

在韩道昭稍后，金朝的王文郁编著了《平水新刊韵略》，其书并上下平声各为十五，上声二十九，去声三十，入声十七，计106韵。书前载有正大六年(金哀宗六年，公元1219年)河间许古写的序言，称王文郁为“平水书籍”，据钱大昕考证：“平水即平阳也。平水书籍者，文郁之官称耳。”⑤

宋理宗淳祐十二年（公元1252年），江北平水刘渊也编了一种《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并206韵为107韵。与王书相比，上声多一韵。王刘二家的《韵略》都已失传。

总以上所言，《切韵》系统的韵书，在韵部的划分上，经历了由简到繁，由繁到简的过程，在音系、编排等方面也不断有所改革，但并无根本性的变化。

现在，我们再分析一下《切韵》音系的性质。60年代初，音韵学界曾讨论过这个问题。一种意见认为《切韵》是一个"活音系"，代表当时的洛阳话；另一派意见认为《切韵》是一个综合音系，大致以当时的"雅音"（即读书音）为基础。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赞成后一种意见①。时隔二十多年，我仍然没有找到足够的理由和充分的证据使我感到应当放弃自己的观点。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尊重《切韵》作者陆法言的意见，要尊重对《切韵》一书"多所决定"的颜之推的意见。

> 陆法言说："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选精切，除削疏缓。"
>
> （《切韵·序》）
>
> 颜之推说："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搉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
>
> （《颜氏家训·音辞篇》）

我真不明白，颜、陆的话已经表述得如此明确，为什么有人还是一个股劲儿认定《切韵》音系是一个什么单一的活方语。

我们知道汉语中任何一种方音，不论是古方音还是今方音，不论是北方音还是南方音，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对于使

用这种方言的人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是"和"非"的问题。迄今为止，我们也不能宣布哪一种方音是正确的，哪一种方音是错误的；也不能说哪一种方音中既有正确的成分，又有错误的成分。可是，陆法言等人编韵书时，竟然要"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这就证明了他们压根儿就没有要搞出一个单一音系的指导思想，单一音系的思想与颜、陆的指导思想水火不相容，我们又何必拿单一音系的思想来强加于古人呢！很显然，他们的韵书是要驾乎个别方言之上的。他们首先选择的标准音是"帝王都邑"，南北朝时作为帝都的，南有金陵，北有洛阳，西有长安，颜之推最重视的是金陵与洛阳；其次，还要"参校方俗"，如果是一个单一音系，还要参校方俗作什么呢？汉语的"方""俗"可多了，是何"方"何"俗"？再其次，还要"考核古今"，如果是单一音系，"核今"就够了，又何必去"考古"呢？颜之推主张把帝都之音、方俗之音、古今之音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然后来一个"折衷"（请特别留意"折衷"二字）。用这样的方法搞出来的音系，不是"综合"，不是"杂凑"，又是什么呢！

在这里，我想解释一下"杂凑"这个词语的本意何在。首先用"杂凑"这个词语来说明《切韵》音系性质的人我不知道是谁，但清朝人江永已经说它是"杂合五方之音"，"其源自先儒经传子史音切兼诸书来"。（《古韵标准·例言》）我在使用这个词语的时候是有确切含义的。"杂"是指古今杂揉，"凑"是指南北拼凑。"杂凑"是针对"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而言的。我们说《切韵》音系在性质上具有"杂凑"的特点，西不是说《切韵》这部书是杂乱无章的，也不是说《切韵》没有严密的语音体系。一部韵书有严密的语音体系和这个体系的性质是"杂

凑”的，本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怎么能混为一谈呢？就是说，一部韵书作为书本子上的体系可以是严密的，若拿这个体系与某一特定的活方音对比则又是“杂凑”的，在中国韵书史上这样的例子难道还少吗？如明代的《洪武正韵》，就具有古今南北杂凑的特点，可是我们不能说《洪武正韵》这部韵书没有严密的语音体系。我们考察中国古代某些韵书，若不懂得书本体系和活语系之间既相联系又相脱节这一重要特点，就难免不失之于臆断。

我们说《切韵》音系具有杂凑性的特点，这个结论的全部含义仅在于说明《切韵》非单一性的音系而已，而不能理解为《切韵》音系与当时的实际语音没有任何的一致性。应该承认：一致性是主要的。只不过它不是跟个别方音一致，而是跟大多数方言区的人都基本上能听得懂、能理解得了的“雅音”一致。

在当时是不是存在这样的“雅音”呢，我以为是存在的。南北朝时期的作品中经常出现“音有楚夏”这样的话。如：

> 音读楚夏，时有不同。　　（《魏书·江式传》）
>
> 古今言语，时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异。
>
> （《颜氏家训·音辞篇》）
>
> 乃以音有楚夏，韵有讹切。
>
> （转引自《文镜秘府论》33页）
>
> 加以楚夏各异，南北语殊。　　（《经典释文·序》）

“楚”“夏”之别，《荀子·儒效》已经谈到：“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楚指楚地、夏指中原地区。左思《魏都赋》专以楚夏别方音。“盖音有楚夏者，土风之乖也。”这里所说的“楚”是“伧楚”即粗俗的意思，与“楚”相对的“夏”是雅正的意思。跟“楚”不是指某一具体方言一样，

“夏”也不是单指洛阳话，或金陵话、长安话，大体上是指黄河流域为基础的北方官话，这些官话的内部肯定是有分歧的，是有各自的单一音系的，而它们又会有许多共同点，《切韵》音系就是以这些共同点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从现代语言学的观点看来，那些“各有土风”的“楚”言韵书，是研究单一音系的重要资料，是很可宝贵的。而带有拼凑性特点的《切韵》则不能满足懂得现代语音学而又一心追求单一音系的人的需要，从这个意义来说，《切韵》的价值反而不如“土风”韵书了。可是，事情的发展却完全不是这样，《切韵》一出世，“各有土风”的韵书通通消失了，而一本“杂凑”性质的韵书反而取得了官韵的地位，这是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就因为这部韵书代表的是“雅言”，受到了南北士人的共同欢迎。尽管文士们有时也“苦其苛细”，但毕竟要比接受一个具有某种“土风”的韵书要容易一些。我设想，如果《切韵》是单一的南音，北人就会抵制它，如果《切韵》只是北音中的某个活方音，南人也会抵制它。正因为它长于“折衷”，它才能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明朝的方以智就很欣赏这一点。他说：“自沈韵(实指切韵)行而古音亡，然使无沈韵画一，则唐至今皆如汉晋之以方言读，其纷乱又何可胜道！”江永说：“此言实为确论。”（《古韵标准·例言》）

说《切韵》是以“雅言”为基础而又“折衷”了南北方音，丝毫不意味这部韵书就是颜、陆等人主观随意捏造出来的。要明白，当时的“雅言”虽不可能像现在的普通话那样，有确切单一的语音系统，但它也有悠久的历史根源和相当的群众基础。所以，无论是拿六朝诗人的用韵还是拿隋唐诗人的用韵来与《切

韵》音系相印证，一致的地方总是多于不一致的地方。一个诗人即使他的方言中有五个声调，他也会按照四个声调的韵书写出诗来，即使他根本不知道“支脂之”的读音有何种区别，他写起诗来照样能把它们区别得非常清楚。所以，有人甚至拿唐朝何超的《晋书音义》来证明《切韵》为洛阳音，更是劳而无功。因为《晋书音义》基本上是根据《切韵》一书作出来的，这不等于以《切韵》证《切韵》吗！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迄今为止，有的文章总是强调：《切韵》韵部的划分的确有实际语音作为基础，以此来反对综合说。我认为，有实际语音作为基础与综合说并不矛盾，因为二者不是同一个层面上的问题。持综合说者并不是说《切韵》没有实际语音作为依据，只是说它不是以一时一地之音作为基础。封演说：“陆法言与颜、魏诸公定南北音，撰为《切韵》。”南音、北音，当然都是实际语音，所谓“定”者就是综合。“我辈数人，定则定矣。”这不仅因为“数人”学术地位高，也因为“数人”中南人有三(刘、萧、颜)，北人有五(卢、魏、李、辛、薛)，他们自身的口语（雅音）就可以作为依据。江东雅言以金陵为代表，河北雅言以邺下为代表。按之《切韵》，南音成分显然可考。如一等重韵东冬、咍泰、覃谈，代表初唐（距离法言时代不过二三十年）长安音的《一切经音义》不分，而南朝齐梁陈的诗文分用；二等重韵佳皆夬、删山、庚二耕、咸衔、《一切经音义》不分，齐梁陈诗文大体上分用；三等韵的东三钟，北音多无分别，而南音有别；真殷、鱼虞、脂之、支脂，北音不分南音分；与四等相配的三等韵，如盐—添、仙—先、清—青、祭—霁、宵—萧，《一切经音义》均混用，南朝韵文有的也通押，《切韵》据吕静、杜台卿等人的韵

书加以区别。还有所谓重纽问题，至今没有定论，但《音辞篇》有一条材料说明某些重纽字南北音不同。颜之推说："岐山当音为奇，江南皆呼为神祇之祇。"查《切韵》：

岐：	巨支反	群母支韵开口四等	（上古）支部
祇：	巨支反	群母支韵开口四等	（上古）支部
奇：	渠羁反	群母支韵开口三等	（上古）歌部

岐奇为重纽，它们的切下字（支、羁）均属三等，北音不分，而江南"岐祇"与"奇"不同，似乎还保存上古支歌之别。

还有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元魂痕排在一起，而且同用，既不同于上古音（上古元在元部，魂痕在文部），又不同于《韵镜》（元山仙同图，痕魂与真谆同图）。《切韵》之所以不同于上古音，可证《切韵》并不是由代表北音的《诗经》音系直接演变的结果；《韵镜》之所以不同于《切韵》，因为《韵镜》以北音为据对《切韵》做了调整。《切韵》以元魂痕排在一起，是以南朝时代的实际语音作为根据的，反映了南音的特点。慧琳、李涪指出《切韵》有吴音，实非偶然。

关于《切韵》音系的性质，张琨教授发表过许多精采的意见。他的《汉语音韵史论文集》很值得一读。上面这段文字的主要论点就参考了张氏的《论文集》。

注：

①参阅钱大昕：《唐宋韵同用独用不同》。见《十驾斋养新录》卷五，95页。

②韩道昭：《改并五音集韵序》。

③这里所说的"宣"、"移（成臡切，shī）"、"霄"都是韵部名称。《唐切韵》以仙韵合口为宣韵、从齐韵分出移。夏竦《古文四声

韵》也有这两个韵目。

④韩道升：至元庚寅重刊《改并五音集韵序》。袁子让《字学元元》卷一："荆璞取司马之法添为《集韵》。"袁氏所谓《集韵》就是《五音集韵》。

⑤钱大昕：《跋平水新刊韵略》。见《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七。

⑥何九盈：《切韵音系的性质及其它》。见《中国语文》1961年9期。

第十一节　字母之学

汉语音韵学中所说的"字母"就是声母的意思。隋唐之前，还没有产生"字母"这个名称，但人们已经懂得双声，把双声字加以类聚，字母之学就不难产生了。

现存元刊本《玉篇》卷首的《切字要法》，不知产生于何时。但毫无疑问这是字母出现之前的产物。《切字要法》可以看作是由切上字类聚而产生的声类代表字，原文共分三十类，现照录于下：

1.因烟（影）　　2.人然（日）
3.新鲜（心）　　4.饧涎（邪）
5.迎妍（疑）　　6.零连（来）
7.清千（清）　　8.宾边（帮）
9.经坚（见）　　10.神禅（禅）
11.秦前（从）　　12.宁年（泥）
13.寅延（喻）　　14.真毡（照）
15.娉偏（滂）　　16.亭田（定）

17．陈缠（澄）　18．平便（并）
19．擎虔（群）　20．轻牵（溪）
21．称燀（穿）　22．丁颠（端）
23．兴掀（晓）　24．汀天（透）
25．精笺（精）　26．民眠（明）
27．声羶（审）　28．刑贤（匣）
29．——　30．——

29、30，原标明“四字无文”，下有两条注。

第一条注：“如上平一东韵风字，方中切。方——风。”

第二条注：“如上平八微韵微字，无非切。无——微。”

从这两条注可知“四字无文”所代表的是两个声母。第一条注以“风”为例，属非母；第二条注以“微”为例，属微母。其余括号中注的字母是我添上去的。

任铭善（1913—1967，江苏如皋人，生前任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张世禄均认为非微二母为后人所加，原本只有二十八母①。与后来的三十六字母相比，缺知彻娘床与非敷奉微。轻唇尚未从重唇分化出来。吴稚晖（1866—1953，江苏武进人）在《国音沿革·序》中认为床母即澄母（陈缠代表床母）。这样，舌上音亦未分化出来。我认为当时床禅不分，第十类“神禅”二字之“神”就代表床三。

张世禄先生对二十八字母的来源有如下推断：“‘四字无文’表明，《切字要法》可能是从藏文三十字母演化出二十八类和缺字的两类。藏文三十字母，是受梵文影响制订出来的。因

此，可以认为《切字要法》的二十八类和缺字两类，是间接来源于梵文字母的②。”这仅仅是是一种推断，藏文字母创始于七世纪，《切字要法》是什么时代的产物呢？是不是唐以前就已经有了呢？很难定论。

现把全部字母按五音排列如下：

唇音　帮、滂、并、明

舌音　端、透、定、泥、来

　　　　澄

齿音　精、清、从、心、邪

　　　照、穿、审、禅、日

牙音　见、溪、群、疑

喉音　影、晓、匣、喻

《切字要法》所反映的声母系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一、在排列方面，它不是有意按照五音来安排其次序的，有可能《切字要法》时代还没有出现以五音编排声母的方法。

二、《切字要法》不是选择一个字作为声母的标目，而是以双声字标目，这还是取反切的方式，但它又正好包括二十八字母在内，我推想有可能这是某一实际方音声母系统的反映。

三、《切字要法》的声母系统既不同于上古音，又不同于《切韵》系统，也不同于唐代的三十字母。能否这样设想，它是六朝时候的产物。这当然还要进一步论证。我们用《切韵要法》代表唐人三十字母所产生之前的一个发展阶段，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字母之学的正式产生是在唐代。敦煌发现的唐人《归三十字母例》③和守温韵学残卷的三十字母都是很好的证明材料。先看

三十字母例：

端	丁当颠敁	透	汀汤天添
定	亭唐田甜	泥	宁囊年拈
审	昇伤申深	穿	称昌嗔觘
禅	乘常神谌	日	仍穰忎任
心	修相星宣	邪	囚详饧旋
照	周章征专	精	煎将尖津
清	千枪金亲	从	前墙朁秦
喻	延羊盐寅	见	今京犍居
溪	钦卿褰祇	群	琴擎寒渠
疑	吟迎言鱼	晓	馨呼欢祆
匣	形胡桓贤	影	缨乌剜烟
知	张衷贞珍	彻	伥忡柽缜
澄	长虫呈陈	来	良隆冷鳞
不	边逋宾夫	芳	偏铺缤敷
并	便蒲频苻	明	绵模民无

上表中字下的圆点是我加上去的。这些有圆点的例字全都见之于《切字要法》，这就给我们一点启发，三十字母可能是在《切字要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两个声母系统不一样（字母例有知、彻，《切字要法》没有），但唐人归字例有十九个声母的二十七个例字直接取材于《切字要法》，恐怕不是偶然的。设若我们把归字母例前的字母加到《切字要法》上，《切字要法》不也成了《归三十字母例》吗？这又证明把《切字要法》看作是三十字母的前身是很可信的[1]。

守温韵学残卷三十字母与唐人《归三十字母例》基本上一

样，请看下表：

唇音　不芳并明

舌音　端透定泥是舌头音

　　　知彻澄日是舌上音

牙音　见溪群来疑等字是也

齿音　精清从是齿头音

　　　审穿禅照是正齿音

喉音　心邪晓是喉中音清

　　　匣喻影亦是喉中音浊⑤

守温三千字母与唐人三十字母的不同点是：

一、排列次序不同。

二、守温字母已经明确对声母的发音部位进行了分析，分出了唇、舌（舌头、舌上）、牙、齿（齿头、正齿）、喉等五音。

三、守温字母已有发音方法的分析，即喉音有清浊之别。

守温字母也存在一些不应该出现的错误。从发音部位看，来母应归舌音，不应归入牙音，心、邪应归齿音，不应归入喉音；从发音方法看，影母应是喉之清，不应归入喉之浊。这种错误不一定是制订字母表的人弄出来的，很可能是传抄之误。

到宋代又出现了三十六字母。郑樵的《通志·艺文略》和王应麟的《玉海》都著录了三十六字母图。与三十字母比，三十六母增加了非、敷、奉、微、床、娘六母。

字母之学的产生，就其外因而言，也得助于佛学的传入。首先，“字母”这个词就是由佛门信徒从梵文翻译过来的。如《广大庄严经·示书品》说：“佛告诸比丘尼，尔时有十千童子，而与菩萨在师前同学字母。唱阿字时，出一切诸行无常声，唱长阿

字时，出自利利他声。”⑥

其次，关于声母发音部位的名称也是佛教徒在佛经启发下规定出来的。如《一切经音义》所引《大般涅槃经·文字品》就有比声（表示梵语辅音）二十五字⑦。分为舌根声、舌齿声、上咢声、舌头声、唇吻声等五类。这里所说的“舌根声”就是字母家所谓的牙音；“舌齿声”就是正齿音；“上咢声”就是舌上音；“舌头声”就是舌头音；“唇吻声”就是唇音。涅槃字母中没有齿头音。

陈澧在《切韵考外篇》中说：“《大般涅槃经》有舌根声、舌齿声、上咢声、舌头声、唇吻声，是此种名目出于西域。”钱大昕说：“窃意唐末作字母谱者，颇亦采取涅槃，而有取有弃，实以华音为本。”（《潜研堂文集》卷15，218页）这些意见都是对的。

最后，字母的制订人也是佛教徒。敦煌韵学残卷说三十字母为“南梁汉比丘守温述”，宋祝泌《观物篇·皇极经世起数诀》说：“胡僧了义三十六字母，流传无恙。”明吕介孺《同文铎》说：“大唐舍利创字母三十，后温首座益以娘、床、帮、滂、微、奉六母，是为三十六母。”⑧

关于三十六母的制订人，诸说有矛盾，我们不必去细加考证，因为我们想说明的是字母制订者乃是和尚，无论守温还是了义，还是大唐舍利，他们都是和尚，他们都与字母之学有密切关系，这是不成问题的。

注：

①任说见《汉语语音史要略》34页，张说见《等韵学讲话提纲》，李行杰教授整理，发表于1990年第2期《青岛师专学报》。

②同上。

③见姜亮夫：《瀛涯敦煌韵集》卷九，编号为S512。

④参阅《瀛涯敦煌韵集》论部十九。

⑤见《敦煌掇琐·守温音学残卷》。

⑥转引自赵荫棠《等韵源流》16页。

⑦比声二十五字：迦、呿、伽、暅（其柯反）、俄（鱼贺反）舌根

k kh g gh ṅ

声（凡五字中第四字与第三字同，而轻重微异）；

遮（重）、车、阇、膳（时柯）、若（耳贺反）舌齿声；

c ch j jh ñ

咤（重）、咃（丑加）、茶、咤（宁贾）、拏上腭声；

ṭ ṭh ḍ ḍh ṇ

多、他、陀、驮（徒柯）、那（奴贺）舌头声；

t th d dh n

婆（波）、颇、婆、婆（去）、摩（莫个）唇吻声。

p ph b bh m

钱大昕说："见溪群疑，即涅槃之迦呿伽暅俄也，而去其一；照穿状审禅，即涅槃之遮车阇膳若也，而更其一；知彻澄娘，即涅槃之吒咃茶□拏也，而去其一；端透定泥，即涅槃之多他陀驮那也，而去其一；邦滂并明，即涅槃之波颇婆婆摩也，而去其一。其余皆不与涅槃合。是僧守温定三十六母，虽亦参取梵音，而实以华音为正。"（《潜研堂文集》卷15，220页，万有文库本）

⑧其言据释真空《篇韵贯珠集·总述来源谱》。真空还有一首《字瀛歌》："法言造韵野王篇，字母温公舍利传，等子观音斯置造，五音呼嗡是轩辕，大唐舍利置斯纳，外有根源定不妨，后有梁山温首座，添成六母合宫商，轻中添出微于奉，重内增加帮滂滂，正齿音中床字是，舌音舌上却添娘。"温首座应该就是守温，但守温字母数只三十，而这个温首座却增母为三十六。真空乃明代人，他的

《歌》可能是讹以传讹，不足深信。

第十二节　等韵学的兴起

等韵学也叫"七音之学"，是汉语语音分析的一门学科，相当于现代语音学、音位学。它的内容包括汉语声、韵、调等方面的问题。吴宗济先生说："等韵研究方面，早于西方的音系学区别特征理论数百年，更应受到语言学界的重视①。"

一、等韵学的意义

1.等韵学的出现表明我国古代的汉语音系学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古人有关声类的区别，发音部位、方法的分析，韵类的分析，声调的辨别等方面的知识，在等韵学中得到全面反映。等韵图实际上就是以声韵调相配合的拼音表，把每一个字（以韵书小韵的领头字为代表）的音节结构用图表的方式全面展示出来。本来，反切已暗含着一个字的声韵调诸要素，但反切并不能具体指明是什么声母，什么韵母，什么调类，而在等韵图中，一个音节的各种要素都明白地显示出来了。潘耒说："等韵者，以各母贯各韵之字而等次之也。字之在韵，散乱无统，得等韵而始有条理，为功甚大②。"可以说，等韵图的出现标志着古人对汉语语音的分析已达到了相当精密的程度。

2.等韵学是汉语音韵学的一个分支，但这个分支却具有整体上的指导作用。人们都知道，无论是研究上古音还是研究中古音，都要求具备等韵方面的知识。不懂等韵，何以审音？江永批

评陈第："盖陈氏但长于言古音，若今韵之所以分，喉牙齿舌唇之所以异，字母清浊之所以辨，概乎未究心焉③"。陈第于等韵之学未得其门，对他的古音研究显然很不利。

3.等韵图作为一种音节表，在古代也是帮助人们查检字音的工具，对普及汉字语音知识以及文化的发展都产生过好的作用。张麟之《韵镜》序开篇就说："'读书难字过④'，不知音切之病也。诚能依切以求音，即音而知字，故无载酒问人之劳⑤。"

4.等韵学与现代方言调查、汉语语音史的研究，乃至辞书注音、审音，均有直接关系。

二、等韵学的萌芽

等韵学的兴起与"悉昙"⑥的传入有关。唐代和尚智广的《悉昙字记》就是一本讲梵文拼音知识的教材。其中讲到："对声呼而发韵，声合韵而字生焉。"还谈到韵有"长呼"、"短呼"之别，声有"轻音"、"重音"之分。和尚们在"悉昙"的启发下创造了反映汉语特点的韵图。所以郑樵说："七音之韵，起自西域，流入诸夏，梵僧欲以其教传之天下，故为此书。"⑦又说："臣初得《七音韵鉴》，一唱而三叹，胡僧有此妙义，而儒者未之闻⑧。"《康熙字典》前面的《字母切韵要法·切字样法》也说："夫等韵者，梵语悉昙，此云字母，乃是一切文字之母。"

悉昙的构成是以元音为经，辅音为纬，一个一个元音轮流跟辅音相拼，组成拼音字表，故中国和尚就以"悉昙"二字来称呼梵文拼音表。悉昙何时传入中国，说法不一。《出三藏记集》（梁释僧佑撰）引东晋释道安（314——385）所撰经录已有《悉昙慕》二卷，后秦僧人、翻译家鸠摩罗什（344——413，生于西

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县）所撰《通韵》，是研究早期悉昙学的重要文献。《通韵》为敦煌写卷，饶宗颐有专文笺证。

等韵仿照悉昙而成为专门之学，应该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大概经过了几百年的摸索、研究。下面四种材料都属于萌芽时期的产物。

1.本书第七节所介绍的“调四声谱”，即沈约的纽字图，“已经具备了纵横交贯的等韵图的雏形⑨。”此图竖则双声，横则叠韵，以入为纽，四声相承，为韵图的构思迈出了第一步。

2.张麟之说：“有沙门神珙（原注：恭拱二音），号知音韵，尝著《切韵图》，载《玉篇》卷末。”神珙为西域人，唐代和尚。所谓《切韵图》当即《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这个《图》的序言中提到《元和韵谱》，可证神珙大概生活在唐宪宗元和年间以后。殷孟伦（1908——1988，生前任山东大学教授）撰有专文解释此图，并且认为“它是由采用双声叠韵法过渡到后来兴起等韵之学这一阶段里面的必然产物⑩”。《玉篇》末还有《五音声论》，钱大昕定为神珙作⑪，戴震认为珙《序》未涉及《五音声论》，“殆唐末宋初，或杂取以附《玉篇》末，非珙之为⑫。”《五音声论》的内容是：

东方喉声	何我刚鄂谓可康各
西方舌声	丁的定泥宁亭听历
南方齿声	诗失之食止示胜识
北方唇声	邦尨剥雹北墨朋邈
中央牙声	更硬牙格行幸亨客

列举的例字有四十个，与后来的三十六字母不合。但将声母分为喉、舌、齿、唇、牙五类，而且又有类似后来字母的例字，这也

是等韵学正式产生之前的过渡产物。

3.所谓“等韵”原本是以等分韵的意思。以等分韵始于唐代。敦煌韵学残卷中有“四等重轻例”，如：

高古豪反	交肴	娇宵	浇萧
观古桓反	关删	勬宣	涓先
满莫伴反	矕潸	免选	缅狝
杲古老反	绞巧	矫小	皎篠
旰古案反	谏〔谏〕	建愿	见霰
特徒德反	宅陌	直职	狄锡

每行的四个正文，分别表示一二三四等。注文有两种：一种是反切，一种为韵目。如高，豪韵，一等；交，肴韵，二等；娇，宵韵，三等；浇，萧韵，四等。观，桓韵，一等；关，删韵，二等；勬，宣（仙）韵，三等；涓，先韵，四等。为什么只在一等字下注明反切呢？因为知道了一等字的反切，再加上等的不同，二、三、四等字的音就可以推知了。

这些例字的等第与《韵镜》相符，有可能是从某种韵图摘录出来的，也有可能是完整韵图出现之前的一种图式。后来韵图中的“重轻”指的是开合，这里的重轻似乎是指洪细，指等第元音的差别。三等韵目中有“宣”、“选”，说明此例所据韵书为《唐切韵》。

4.俞敏先生指出：“到武周时代，《韵诠》出现了，这就是等韵的萌芽③。”《韵诠》已经失传，作者武玄之对陆法言《切韵》颇为不满。孙光宪说：“曾见《韵诠》，鄙驳《切韵》，改正吴音，亦甚覈当④。”《韵诠》平声分五十韵，韵目见日僧安然《悉昙藏》卷二。安然说：“又如真旦《韵诠》五十韵头，今

于天竺悉昙十六韵头，皆悉摄尽，更无遗余。”后来韵图分摄，滥觞于此。下面是五十韵与悉昙十二元音对照，也就是十二摄。

阴声二十一韵，十摄：

阿阿　伊伊　邬乌　翳爱　污奥

｜｜引｜｜引｜｜引｜｜｜｜

罗家　支之微　鱼虞模　佳齐皆移灰咍萧宵周幽侯肴豪

阳声二十九韵（入配阳），二摄：

暗恶

｜｜

东冬江钟阳唐京争青清蒸登／春臻文魂元先仙山寒／琴岑覃谈咸严添盐（入声字）

《韵诠》有四条“明义例”，也与韵图结构相关：

凡为韵之例四也：

一则四声有定位，平上去入之例是也；

二则正纽以相证，令上下自明，“人忍仞日”之例是也；

三则旁通以取韵，使声不误，“春真人伦”之例是也；

四则虽有其声而无其字，则缺而不书，“辰蜃習”之例是也。

“四声定位”，这是韵图构成的基本原则之一。所谓“正纽”即神珙《九弄》之“正纽”，指同声母同韵母而四声相承，顺呼取读；所谓“傍通”指同韵同调不同母，横读取韵；所谓“有声无字”，“缺而不书”，即后世韵图之“列围”。

竖读为纽，横读为韵，这正是张麟之《调韵指微》所强调的：“声音者，经纬之机杼也。纵为经，横为纬，经疏四声，纬贯七音。”

从东晋悉昙学传入中国，从鸠摩罗什、谢灵运等人研究悉昙，“条列梵汉”，到唐代韵图正式产生，经历了三四百年的时间，所谓“萌芽”也者，的确是一个非常缓慢的渐进过程。

三、《韵镜》和《七音略》

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韵图是《韵镜》。多数研究者认为，在《韵镜》之前应当已有别的韵图出现了，因为像《韵镜》这么精密的韵图是不可能一下子就得以产生的。它的具体年代已有不少推测。张麟之推测为神珙所作⑮；罗常培和葛毅卿都主张《韵镜》为唐人所作⑯；俞敏认为成书可能在五代⑰，不可能比守温三十字母更早，因为在《韵镜》中已用三十六字母；李新魁主张“作于1007年至1037年这三十年之间⑱。”我比较倾向于俞敏先生的说法。

《韵镜》将206韵分列于四十三张图内，每图横列七音（暗含三十六母），纵列四声。四十三张图又分内转、外转两大类。内转二十图，外转有二十三图。张麟之说：“反切之要，莫妙于此，不出四十三转，而天下无遗音。”“四十三转”就是四十三图。什么叫“转”？分内外转的根据是什么？

“转”这个概念也是从梵文中学习过来的，是辅音与元音相拼的意思。韵图的作用就是让人们能根据切上字查声母，根据切下字查韵母，韵与声的结合点就是被切字的读音。这和拼音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原理则是一样的。

关于内外转的解释，《四声等子》和《切韵指掌图》都有“辨内外转例”，文字完全一样：

> 内转者，唇舌牙喉四音更无第二等字，唯齿音方具足；外转者，五音四等都具足。

这段话的意思是：内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唇舌牙喉四音没有二等字；一种是齿音一二三四等具备。外转则是唇舌牙喉齿五音，四等具备。这个释义说明内外转的划分与“等”有关。内转除齿音之外无二等字，外转则是有二等字的。可是，齿音既有二等，为何还要放在内转之中呢？我们分析一下《韵镜》中那些内转齿音二等字的情形就明白了（以平声为例）：

内转一东：崇

内转四支：龇差齹釃

内转六脂：师

内转七脂：衰

内转八之：菑茬

内转十一鱼：菹初鉏疏

内转十二虞：㑳刍雏毹

内转二十九麻：巴葩爬麻……叉楂鲨

内转三十一阳：庄疮床霜

内转三十七尤：邹搊愁搜

内转三十八侵：簪嵾岑森

以上十一个内转图的齿音有二等字，除二十九图之外，一共二十九个字，分属东、支、脂、之、鱼、虞、阳、尤、侵等九个韵。这九个韵原本是没有二等字的，而这二十九个字的声类又都属于正齿音的庄组，照等韵门法规定，庄组字又必须排在二等，于是这些本属三等韵的字排在二等的音位来了，音韵学家给这类字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假二等”。这样，内外转的分界就很明白了：内转无真二等，外转有真二等。以真二等的有无作为区分内外转的标准，从韵图看完全解释通了，不存在什么问题。但内外转的

对立是否仅止于此，仍有不同的看法，在这里不必细述[19]。

有一个问题是：二十九麻的“巴葩麻”等字都是真二等，为什么也列入内转之中呢？这可能是传写过程中所造成的谬误。郑樵的《七音略》把麻韵列为外转，那是正确的。

《韵镜》还有一对基本概念是开合。开合二呼这个术语最早见之于此。四十三张图基本上分为两大类：韵图一、六、八、九、十一、十三、十五、十七、十九、二十一、二十三、二十五、二十九、三十一、三十三、三十五、三十七、三十九、四十二等十九图为“开”；韵图五、七、十、十四、十六、十八、二十、二十二、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三十、三十二、三十四、三十六、三十八、四十、四十一、四十三等二十图为“合”；另有四图（二、三、四、十二）标明为“开合”。“开”、“合”分指开口呼，合口呼。另四图以“开合”并称的，有人认为与图旨不合，可能是后人加上去的，也有人认为可能是这四韵的元音介乎开合之间，还有人认为可能是方言问题，即这些韵的字有的方言属开口，有的方言属合口。我们没有充分的论据可以证明，这些韵图的“开合”并称是后人加上去的。有可能韵图制订者的方音中，这些韵的字在有的声母下读开口，在有的声母下读合口，这也只不过是一种看法而已。韵图对“开”“合”的划分不见得都很合理，但也不宜拿一个标准去衡量它。不论怎么说，韵图明确分出开口呼、合口呼，比之韵书对韵部的分析又算是进了一步。《广韵》中有些韵已经开合分立，如真谆、寒桓、歌戈等，有的韵则是开合混而为一，如支、脂、微、佳、山、元、仙等，韵图将这些韵按开合分之为二，各自的特点就显得更为明确了。

开合之下又各分四等，这是韵图的基本内容。四等，就是把韵字分为四个类别。这四个类别是根据什么条件来划分的呢？

首先是根据韵母中的介音和元音。如东韵有一等和三等之别，其差别不在于元音，而在于介音；豪肴宵萧四韵，正好分为一二三四等，则是由于主要元音不同。

但是，韵图上所表现出来的"等"与声母有密切关系。所以等韵学家们也有主张以声辨等的。如江永《四声切韵表》就以三十六字母与四等配合。"等"既与韵类有关，又与声类有关，这是很可以理解的。因为不论任何一个"等"里的字音，总要合声韵两要素才能构成，其中自有严密对应规律，有的声母与各等都发生联系，有的声母则只与某些等发生关系，或只与某一个等发生关系，韵图本身就已揭示了这些规律。如果只承认"等"和韵的关系，而忽视"等"和声的关系，就会"经纬不明，所以失立韵之源"㉙。在理解"等"和"声"的关系时，要注意假二等、假四等并不是声韵配合规律的真实反映，只是韵图结构规律的反映。

在宋代还有一部与《韵镜》相同的韵图，这就是郑樵的《七音略》。这两部韵图所依据的都是《切韵》系韵书，但从韵目排列顺序考察，《韵镜》跟李舟《切韵》相近，把覃谈等韵排在侵韵之后，《七音略》把覃谈列于阳唐之前，跟法言韵书相近。

对内外转的划分，两图略有不同。如十三图咍皆齐祭夬，《韵镜》为外转，《七音略》为内转；二十九图麻韵，《韵镜》为内转，《七音略》归外转；《韵镜》三十四图庚青为外转，《七音略》三十七图庚青归内转。

《七音略》无开合之名，而以重轻为别，重轻大致上相当于

开合。对这个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七音略》入声铎药二韵，既与阳唐相承，又与豪肴宵萧相承。以入声兼承阴阳，和《韵镜》入声韵只承阳声韵不同。有人认为这是偶然出现的错误，与音理无关。

四、《四声等子》和《切韵指掌图》

韵图的编制也是随着实际语音的发展而发展的。《韵镜》、《七音略》之后，又出现了《四声等子》、《切韵指掌图》。这两种韵图的作者和写作年代都不可考。孙弈《示儿编》已引用《指掌图》。经后人研究，大体上可以断定是南宋后期的产物。两图的共同之处有：

一、都有二十个图。《等子》还出现了十六摄的名称：

1.通摄内一　　重少轻多韵
2.效摄外五　　全重无轻韵
3.宕摄内五　　阳唐重多轻少韵　　江全重，开口呼
4.宕摄内五
5.遇摄内三　　重少轻多韵
6.流摄内六　　全重无轻韵
7.蟹摄外二　　轻重俱等，开口呼
8.蟹摄外二　　轻重俱等韵，合口呼
9.止摄内二　　重少轻多韵，开口呼
10．止摄内二　　重少轻多韵，合口呼
11．臻摄外三　　轻重俱等韵，开口呼
12．臻摄外三　　轻重俱等韵，合口呼
13．山摄外四　　轻重俱等韵，开口呼
14．山摄外四　　轻重俱等韵，合口呼

15. 果摄内四　　重多轻少韵，开口呼
16. 果摄内四　　重多轻少韵，合口呼
麻外六
17. 曾摄内八　　重多轻少韵，启口呼
梗摄外八
18. 曾摄内八　　重多轻少韵，合口呼
梗摄外二
19. 咸摄外八　　重轻俱等韵
20. 深摄内七　　全重无轻韵

江摄包括在宕摄之中，假摄（麻外六）包括在果摄之中，梗摄包括在曾摄之中，实际上只有十三摄。

与《韵镜》相比，少了二十三个图，这是韵部归并的结果。《等子》有“摄”名而无“转”名，但保留了内外的分别。《等子》采用了《韵镜》开合的名称，又采取了《七音略》重轻的名称。重轻又有多少之分，说明了一个摄内的字已不能完全用“开”、“合”来作简单的概括。如通摄、遇摄都注明“重少轻多”，说明这两个合口（轻）摄内已经产生了少量的开口（重）字。《等子》的图次与摄次有矛盾，所标的“内一”、“外五”、“内五”等数字是摄的次序，这些摄名当来自他书，而次序又打乱了，所以与图次不相应。

《等子》在宕、果、曾三摄都注明了“内外混等”，说明内外转、十六摄的划分，并不怎么科学。江在《韵镜》属外转，阳唐属内转，《等子》时代它们的主要元音已混同，再绳之以内外，岂不是用旧瓶装新酒！《韵镜》蒸登属内转，庚耕清青属外转，麻归外转，歌戈归内转，曾与梗、假与果的主要元音并不完

全一样。《等子》让它们“混等”，这“就是典型的削足适履了！”（俞敏语）

本来，十六摄、十二摄的分法，“其实皆出梵文之十六韵而来。”悉昙章有十二章、十六章，所以等韵家也“千方百计凑十二、十六的数。”（俞敏《等韵溯源》）

《等子》仍采用传统的三十六字母。根据唐作藩教授的研究，其“韵母系统，除入声韵，它的阳声韵阴声韵可以归纳为十九部49个韵母，已经十分接近《中原音韵》了。③”

《指掌图》前面有“二十图总目”，但无“摄”名，一至六为“独”，七至二十或“开”或“合”。所谓“独”是指效、通、遇、流、咸、深摄为独立图，其间无开合对立。它和《等子》一样，实际也只有十三摄（江归宕，假归果，梗归曾），有的两摄共一图。

《指掌图》的语音系统，我在《古汉语音韵学述要》（1988年，浙江古籍出版社）中已有详细分析。它有71个韵母，其中入声韵母24个，阴声、阳声韵母计47个。与《四声等子》的韵母系统相比，主要有以下四点不同。

1.《等子》江韵唇牙喉音归开口，照、知组和一个来母字排在合口。这样，江韵就有aŋ、uaŋ两个韵母。《指掌图》江韵全归合口，只有uaŋ一个韵母。

2.《等子》登韵有开合两个韵母：ɑŋ、uɑŋ。《指掌图》登韵合口与庚耕二等合口已混而为一。

3.《等子》的止摄只有i、uei两个韵母，而《指掌图》的止摄有四个韵母：ɿ、uei、i、iuei。因为“兹雌慈思词”等字，《等子》归四等，《指掌图》归到了一等；《等子》蟹摄开口齐韵系

字，在《指掌图》里已与止摄三等（支之脂）合流，主要元音已变为i；《等子》蟹摄合口灰韵（一等）及合口齐韵系字，在《指掌图》里也并入止摄。这样，《指掌图》的止摄就多出了两个韵母。

4. 《等子》的蟹摄有aĭ、aĭ、iɛĭ、uaĭ、uaĭ、iuɛĭ等六个韵母，而《指掌图》只有aĭ、ai、iɛĭ、uaĭ四个韵母。其原因就是第三条已经讲过的，蟹摄一部韵字归到了止摄。

《指掌图》和《等子》均以入声兼承阴阳，这是和《韵镜》大不相同的。这说明"当时入声已经逐渐消失，与《中原音韵》的韵母系统很相近似"[22]。

《指掌图》和《等子》都采用三十六字母，并标举字母名称，但《等子》列表仍为二十三行，《指掌图》则为三十六行，字母排列次序也不完全一样。这两种不同的字母排列法，张麟之已有论述。他说："旧体以一纸列二十三字母为行，以纬行于其上，其下间附一十三字母（盈按：指唇音"非敷奉微"，舌音"知彻澄娘"，齿音"照穿床审禅"等），尽于三十六，一目无遗。"这就是《韵镜》及《等子》的排列法。又说："杨变三十六，分二纸，肩行而绳引。"杨指南宋孝宗时的杨倓（tán），杨氏所撰《韵谱》久已失传。戴震于《永乐大典》内曾发现此书，"校正一过。其书亦即呼等之说，于旧有入者不改，旧无入者悉以入隶之[23]"，《指掌图》与之类似。三十六字母一字排开，也与杨倓《韵谱》同。这种改变是类隔变音和的必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声母的变化。

门法是等韵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在韵学残卷中已有"类隔"之辨。《韵镜》的七条叙例也具有门法性质，发展到《等子》、

《指掌图》，门法已颇为烦琐。《等子》的门法有九类之多，说明这些韵图与实际语音已存在不少矛盾。

五、《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

在本节最后，介绍一下邵雍的《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这个《图》不同于一般等韵图。

邵雍（1010——1077），字尧夫，谥康节，祖籍范阳，长期寓居洛阳，北宋中叶理学家，与司马光、程颐、程颢友善。他以象数之学为理论基础分析语音系统。他说："物有性情形体，则有声音，有声音则有律吕，有唱和。律吕者，天地之变化交；唱和者，阴阳之感应合也。"律指声，即韵类；吕指音，即声类。用律唱吕，以吕和律，表示声与音相拼切，他认为这也是"天地变化"、"阴阳感应"的理数交合。所以他的"声音唱和图"又叫"天声地音图"。什么天地阴阳，对于语音系统而言，无疑是牵强附会，但是他的这套理论影响深远。宋代的祝泌，明代的袁子让、吕坤、方以智，清代的熊士伯、李光地、江永、庞大坤都研究过邵雍的韵图，今人赵荫棠、陆志韦、周祖谟等先生也有专文论述[24]。

邵氏分天声（正声）为十，地音（正音）为十二。天声为韵摄表，地音为声类表。下面这两个表是从庞大坤的《等韵辑略》转录来的，袁子让、庞大坤的解释也附录其中。

庞大坤说："八声至十声，即所去地之体数四十八，故不列。"

八声、九声、十声三图无字，只有四十八个黑圈。为什么要设立这些无字黑圈，这是数有必然。太阳（日）之数十，少阳（星）之数十，太阴（月）之数十，少阴（辰）之数十，故声必

天声（正声）图

		平上去入	袁子让说	庞大坤说
一声	辟日 翕月 辟星 翕辰	多可个舌 禾火化八 开宰爱○ 回每退○	果开 果假合 蟹开 蟹合	此以歌麻与佳灰为一部，《古韵谱》则以歌麻与鱼虞为一部，《韵统》则以歌麻与支微齐之齐齿呼字及鱼虞为一部。
二声	辟日 翕月 辟星 翕辰	良两向○ 光广况○ 丁井亘○ 兄永莹○	宕开 宕合 曾梗开 曾梗合	此以江阳庚青蒸为一部，《古韵谱》则合东冬为一部，《韵统》东冬并于庚青蒸之合口撮口二呼。
三声	辟日 翕月 辟星 翕辰	千典旦○ 元犬半○ 臣引艮○ 君允巽○	山开 山合 臻开 臻合	此以真文元寒删先为一部，《古韵谱》及《韵统》同。
四声	辟日 翕月 辟星 翕辰	刀早孝岳 毛宝报霍 牛斗奏六 ○○○玉	效开 效合 流开 流合	此以萧肴豪尤为一部，《古韵谱》及《韵统》同，惟“毛宝报”皆开口呼字，而此以为翕，疑误。下“北、十、妾”三字同。
五声	辟日 翕月 辟星 翕辰	妻子四日 衰○帅骨 ○○○德 龟水贵北	止齐开 止齐合 止齐开 止齐合	此以支微齐为一部，误也。《古韵谱》则合佳灰为一部，《韵统》以咍佳为阳，支微齐灰为阴，而开口呼补入“碑披陪眉”四纽，据《正音》及《指掌图》则当补入“咨雌慈思祠”五纽。

续上表

		平上去入	袁子让说	庞大坤说
六声	辟日 翕月 辟星 翕辰	宫孔众○ 龙甬用○ 鱼鼠去○ 乌虎兔○	通开 通合 遇开 遇合	此以东钟与鱼虞为一部，误也。说二声及一声。又分东钟鱼虞为辟翕，与《七音略》分重轻同。
七声	辟日 翕月 辟星 翕辰	心审禁○ ○○○十 男坎欠○ ○○○妾	深开 深合 咸开 咸合	此以侵覃盐咸为一部，《古韵谱》同。《韵统》云：覃盐咸与寒元删先近，侵与真文近，则覃为阳，侵为阴也。

有十。

每声都有“日月星辰”四类，一二类（太阳，太阴）为洪音，三四类（少阳，少阴）为细音。洪音与细音又各分辟翕（开合）。

此图不言摄，而每一声多包括两摄。陆志韦说：“所谓七声，代表七类大同小异的主元音而已。”

一声。日月两类相当于果假二摄，包括歌戈麻三韵，果与假合，与《等子》、《指掌图》同。入声与阴声相配，可证北宋中期（11世纪）入声已接近阴声。其中“八”字《广韵》属开口，《指掌图》“八”字三见。一见于果摄合口，与此同；又见于蟹摄开口、合口。

星辰两类相当于蟹摄洪音，包括佳皆灰咍泰夬等韵。与《指掌图》的摄摄近似，只不过灰韵《指掌》归止摄。

二声。日月两类为宕摄，包括阳唐韵，庞大坤以为江韵亦在

其中，这是对的。星辰两类为曾梗二摄之合并，与《等子》、《指掌图》同。此摄包括庚耕清青蒸登等韵。

三声。日月两类为山摄，包括寒桓删山先仙元等韵，元韵不与魂痕类，而与仙同，后来的《指掌图》亦如此。

星辰两类为臻摄，包括真谆臻文欣魂痕等韵。

四声。日月两类为效摄，包括萧宵肴豪等韵。《等子》及《指掌图》的效摄为独韵，而此图分辟翕两类。庞大坤已指出：毛宝报皆开口呼，而此以为翕。周祖谟的解释是："今列为合口者，以其为唇音字故也。"陆志韦说："这一声的平上去全用唇音字作代表。邵氏方言的唇音字（一二字）看来全是作嘬口势的，并不是真的合口。"这样解释比较可信。效摄和流摄都有入声相配。

星辰两类为流摄，包括尤侯幽三韵。流摄亦为独韵，所以"牛斗奏"没有与之相应的合口。

五声。相当于止摄支脂之微及蟹摄齐祭废等韵。蟹摄细音归并止摄，与《指掌图》同。精组的"子四"都排在日类，与《指掌图》的"兹雌慈思词"排在一等，性质一样，可证ɿ音已经产生。五声内都有相配的入声。

六声。日月类为通摄，包括东冬钟三韵。《指掌图》通摄不分开合，《等子》"重少轻多"，说明已经有开口呼。陆志韦说："从这第六声的分配看来，邵氏方言的东冬韵系的主要元音是O，像现代吴音似的，而鱼韵系的主要元音也还得从《切韵》作O，所以都是"辟"音。钟韵系也许是合口的Iwoŋ。"

星辰类为遇摄。《指掌图》为独韵，《等子》"重少轻多"，有少量开口呼字。此摄包括鱼虞模三韵。没有入声相

配。

七声。日月为深摄。只有侵韵系字。《等子》“全重无轻”，即没有合口呼字。《指掌图》为独韵。本图合口也只有入声“十”字为合口，与“心审禁”相配的位置均为O，袁子让标为“深合”是不对的。

星辰为咸摄，包括覃谈咸衔凡盐严添等。《等子》“轻重俱等”，《指掌图》为独韵。

邵雍的韵摄与《指掌图》相当接近。陆志韦说：“司马光跟邵雍是同时代的洛阳人。后人把《切韵指掌图》归在司马光名下，未始没有一点蛛丝马迹。”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问题。下面介绍声母部分。（地音图见下页）

十二音图，太柔（水）之数十二，少柔（土）之数十二，太刚（火）之数十二，少刚（石）之数十二，共计四十八位。较之三十六字母，多出十二，而实际声母不足三十六。

邵雍的“开发收闭”与等韵的一二三四等不完全相同。一、二、三、五、十、十一、十二等七个音图之开为一等，发为二等，收为三等，闭为四等。四、六、七、八、九等五个音图的开发收闭并不相当于一二三四等。

全浊声母已消失，其仄声与相对之清音相配，如“兑大弟”与“东丹帝”相配，“近揆”与“九癸”相配；其平声与相对之次清音相配，如“旁排平瓶”与“普朴品匹”相配，“同覃田”与“土贪天”相配。仄声归不送气清音，平声归送气清音。次浊之鼻音边音各母中的平去入归浊，如“吾牙月尧”、“鹿荦离”等；上声归清，如“五瓦仰”、“老冷吕”等。

另外，非敷合一，泥娘合一。

地音（正音）图

		开发收闭	袁子让说	庞大坤说
一音	清水 浊火 清土 浊石	古甲九癸 □□近揆 坤巧丘弃 □□乾虬	见清 群浊 疑亦作见 溪清 群浊	此牙音见溪郡三母，见母无浊，以浊音之去声补之。帮端精照知五母同，或以入声补之。
二音	清水 浊火 清土 浊石	黑花香血 黄华雄贤 五瓦仰□ 吾牙月尧	晓清 匣浊 疑半清 疑半浊	此浅喉音晓匣与牙音疑母。疑母无清，以上声补之，明微泥来日五母同。雄，《唐韵》羽弓切，喻母；此入匣母，盖从《集韵》作胡弓切。
三音	清水 浊火 清土 浊石	安亚乙一 □爻王寅 母马美米 目貌眉民	影清 喻浊 爻借匣 明半清 明半浊	此深喉音影喻，与重唇音明母。爻，《唐韵》胡茅切，匣母，此入喻母，疑误。按佁《唐韵》夷在切，可补喻母有音无位之字。
四音	清水 浊火 清土 浊石	夫法□飞 父凡□吠 武晚□尾 方万□未	非敷清 奉浊 微半清 微半浊	此轻唇音非奉微三母，按奉为敷之浊，而此以为非之浊者，敷并于非也。又轻唇音向列三等，此分列开发闭，而收反有音无字，疑误。
五音	清水 浊火 清土 浊石	卜百丙必 步白备鼻 普朴品匹 旁排平瓶	帮清 并浊 疑亦作帮 滂清 并浊	此重唇音，帮滂并三母。

续上表：

		开发收闭	袁子让说	庞大坤说
六音	清水 浊火 清土 浊石	东丹帝□ 兑大弟□ 土贪天□ 同覃田□	端清 定浊 疑亦作端 透清 定浊	此舌头音端透定三母。按舌头音向列一四等，此以丹大贪覃列发，帝弟天田列收，而闭为虚位，疑误。
七音	清水 浊火 清土 浊石	乃你女□ 内南年□ 老冷吕□ 鹿荦离□	娘清 泥浊 来半清 来半浊	此舌头音泥母与半舌音来母。你，《广韵》奴蟹切；女，《唐韵》尼吕切娘母，此入泥母，并娘于泥也。按南列发，年列收，而闭为虚位，误与端透定同。
八音	清水 浊火 清土 浊石	走哉足□ 自在匠□ 草采七□ 曹才全□	精清 从浊 疑亦作精 清清 从浊	此齿头音精清从三母。按齿头音向列一四等，此以哉在采才列发，足匠七全列收，而闭为虚位，疑误。
九音	清水 浊火 清土 浊石	思三星□ 寺□象□ □□□□ □□□□	心清 邪浊	此齿头音心邪二母。按此以三列发，星象列收，而闭为虚位，误与精清从同。
十音	清水 浊火 清土 浊石	□山手□ □士石□ □□耳□ □□二□	审清 禅浊 士借床 日半清 日半浊	此正齿音审禅与半齿音日母。士，《唐韵》锄里切，床母，此入禅母，盖从《集韵》作上史切。按半齿音向列三等，此以二等为有音无字，疑误。

续上表：

		开发收闭	袁子让说	庞大坤说
十一音	清水 浊火 清土 浊石	□庄震□ □乍□□ □叉赤□ □崇辰□	照清 床浊 疑亦作照 穿清 床浊 辰借禅	此正齿音照穿床三母。辰，《唐韵》植邻切，禅母，此入床母，疑误。按此当列于审禅日之前，今列此者，欲共与知彻澄近也。
十二音	清水 浊火 清土 浊石	□卓中□ □宅直□ □坼丑□ □茶呈□	知清 澄浊 疑亦作知 彻清 澄浊	此舌上音知彻澄三母。按此当列于泥来之后，今列此者，古音近端透定，后世音变，近照穿床也。

现在，将邵雍的声母构拟如下：

一音：k，k'。　二音：x，ŋ。　三音：o，m。

四音：f，w。　五音：p，p'。　六音：t，t'。

七音：n，l。　八音：ts，ts'。　九音：s。

十音：ʃ，ʒ。　十一音：tʃ，tʃ'。　十二音：tʂ，tʂ'。

（以上构拟基本上采取了赵荫棠的方案）

《声音唱和图》的语音系统已与《中原音韵》相当接近，这两种资料是我们研究十一世纪到十四世纪北方官话发展史的重要根据。

注：

①《中国语文》89·6期。

②《类音》卷二。

③《古韵标准·例言》。

④杜甫《漫成二首》之二："读书难字过，对酒满壶频。"

⑤《汉书·扬雄传赞》："家素贫，耆酒，人希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

⑥悉昙（siddham）是梵文"成就"的意思。古印度幼童学习拼音的缀字表前面，一定要写上这么一句吉祥的话。中国僧人取"悉昙"两字作为梵文拼音表的名称。可参阅周一良《中国梵文研究》，见《思想与时代》35期，1944年。

⑦⑧《通志·七音略》。

⑨张世禄《等韵学讲话提纲》，李行杰整理。见《青岛师专学报》1990年第二期。

⑩《子云乡人类稿》300页。

⑪《十驾斋养新录》卷五，98页。商务印书馆。

⑫《戴东原集·书玉篇卷末声论反纽图后》。

⑬《等韵溯源》，见《音韵学研究》第一辑。

⑭《北梦琐言》卷九，77页。

⑮张说见《韵镜·序》。

⑯《代景印至治本〈通志·七音略〉序》。葛文题目是《韵镜音所代表的时间和区域》。见《学术月刊》1957年8月。

⑰《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504页《韵镜》条。

⑱《韵镜研究》。见《语言研究》1981年第一期。

⑲罗常培《释内外转》（1933），薛凤生不赞同罗说，见《语言研究》1985年第1期。张世禄《等韵学讲话提纲》也谈到内外转问题。（《青岛师专学报》1990年第二期。）王静如认为内外转是元音长短造成的。"短音＝内转，长音＝外转。"（《汉字文化》1990年第4期17页）

⑳《韵镜·调韵指微》。

㉑《四声等子研究》。见《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

㉒王力《汉语音韵》134页。

㉓《戴东原集·答段若膺论韵》。

㉔赵荫棠《等韵源流》。陆志韦《记邵雍〈皇极经世〉的"天声地音"》。周祖谟《宋代汴洛语音考》。见《问学集》下册。

第十三节　古音学的萌芽

古音学是特指研究上古音的一门学科。这门学科也是经过古人不断摸索才逐步发展起来的。六朝人已开始觉察到先秦古音不同于"今音"，他们用"叶音"、"协韵"的办法，临时改变音读，以求协韵，唐人注古书或称之为"合韵"，与"叶音"意思一样。

"叶音"说并不科学，陆德明提出"古人韵缓，不烦改字"①，已认识到古今韵不同，但这种认识还是不系统的，是很模糊的。直到南宋初年，吴棫才开始把上古音作为专门学科来进行研究，所谓"考古之功，实始于吴才老。"②

吴棫（约公元1100年——公元1154年），字才老，福建建安人，宣和六年进士，担任过太常丞、泉州通判等职。他的古音学著作有《毛诗叶韵补音》、《楚辞释音》、《韵补》等。前两种都已失传。

吴棫的古音研究，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取206韵的架子，用

"通""转"的方法，集"叶音"说之大成③。"通""转"是在"叶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叶韵"只讲个别字的协音，只临时改变个别字的音读。而"通"则发展为整个韵部之间相协了。一个韵部里的字如果跟好几个韵的字有"叶韵"关系，吴才老就说这个部跟好几个部相通，实在"通"不了的，他就说是"转声通"。其结果必然是无所不"通"，无所不"转"。《四库全书》在陈第《毛诗古音考》的《提要》中批评说："言古韵者自吴棫，然《韵补》一书，庞杂割裂，谬种流传，古韵乃以益乱。"这个批评当然相当苛刻，但也说明《韵补》的"通""转"的确十分不科学。下面请看《韵补》平声"通"、"转声通"的情况：

一东

附注 二冬，古通东。

三钟，古通东。

四江，古通阳或转入东。

五支

附注 六脂，古通支。

七之，古通支。

八微，古通支。

九鱼

附注 十虞，古通鱼。

十一模，古通鱼。

十二齐，古通支。

十三佳，古转声通支。

十四皆，古转声通支。

十五灰，古通支。

十六咍，古转声通支。

十七真

附注　十八谆，古通真。

十九臻，古通真。

二十文，古转声通真。

二十一殷，古通真。

二十二元，古转声通真。

二十三魂，古转声通真。

二十四痕，古通真。

二十五寒，古转声通先。

二十六桓，古转声通先。

二十七删，古转声通先。

二十八山，古转声通先。

一先

附注　二仙，古通先。

三萧

附注　四宵，古通萧。

五肴，古通萧。

六豪，古通萧。

七歌

附注　八戈，古通歌。

九麻，古转声通歌。

十阳

附注　十一唐，古通阳。

十二庚，古通真或转入阳。

十三耕，古通真或转入阳。

十四清，古通真或转入阳。

十五青，古通真。

十六蒸，古通真。

十七登，古通真。

十八尤

附注　十九侯，古通尤。

二十幽，古通尤。

二十一侵，古通真。

二十二覃，古通删。

二十三谈，古通覃。

二十四盐，古通先。

二十五沾，古通盐。

二十六咸，古通删。

二十七衔，古通删。

二十八严，古通先。

二十九凡，古通严。

何谓"通"和"转声通"呢？许昂霄《词韵考略》说："凡音响相协出入不拘者曰通；音响稍别，或因所通而兼及者曰转。"许氏虽然论的词韵，但与吴棫所说的"通"、"转"意思是一样的。顾炎武也说："通""则全韵皆通。"① "转声者，改此之声以就彼之韵。如才老所注佳为坚奚切，来为陵之切之类是也。"②

究其源，"古通"来自陆德明的"古人韵缓"；"古转声

通”就是改字叶音。

从韵目上看，吴棫似乎是分古韵为九部：东、支、鱼、真、先、萧、歌、阳、尤。实则这九个部也是一团乱麻。戈载批评它：“其所注‘通’‘转’，颇多疏舛，如文曰古转真，是以‘通’为‘转’也；魂曰古转真，痕曰古通真，是同一类而一作‘通’，一作‘转’也……”⑥问题实不止此。他连m、n、ŋ三尾的大界限都打通了。如耕、清、青、蒸、登古通真，是混—ŋ尾于—n尾；侵通真，盐通先，覃、咸、衔通删，是混—m尾于—n尾。他的九部中根本就没有闭口韵。就归字来说，往往一个字归好几个部，如一东所收之“东”字、“登”字，均见于十阳；所收之“分”字又见于十七真，还见于一先。所以我说它是集“叶音”之大成。

吴棫的分部、归字，都有韵文材料为证，似乎是有根据的，实际上这些材料既无严格的时代界限，更谈不上具体的韵例了。他不惟疏于考古，也完全不懂得审音，怎么能建立起一个科学的古音系统呢！

这样说来，是不是吴棫的探索就完全失去了意义呢？不是的。对此，钱大昕有过公正的评说：

> 才老博考古音，以补今韵之缺，虽未能尽得六书谐声之原本，而后儒因是，知援《诗》、《易》、《楚辞》以求古音之正，其功已不细；古人依声寓义，唐宋久失其传，而才老独知之，可谓好学深思者矣。
>
> （《潜研堂文集·跋吴棫韵补》）

钱氏赞扬了吴棫有两大功劳：一、后人用“六书谐声”、先秦韵文“以求古音”是吴棫启其先；二、独知“依声寓义”之法，是

“好学深思”。我认为吴棫还有一条功劳，他所说的“或转入”已具有离析今音的倾向。书中提到“或转入”的只有“江或转入东”、“庚耕清古或转入阳”，这两条材料很值得留意。他把“江杠”等归入一东，“京庆卿行”等归到十阳，都符合上古语音特点。

他的《诗补音》已经失传。这部书是专讲《诗经》叶音的。如：

> 《补音》云：“仪有牛河切，合音莪字。”
>
> 《诗补音》“明”字有谟郎切，如《鸡鸣》之诗：“东方未明，颠倒衣裳”是也。
>
> 《诗补音》云：“马字有某音，满补切。”引《左氏传》辛廖之占曰：“震为土，车从马”为证，故《击鼓》之诗“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马”字乃“某”音也。“野字有墅音，上与切。”引《左氏传》童谣云：“鸜鹆之羽，公在外野”为证，故《东山》之诗“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野”字乃“墅”音也。

以上三条材料全引自宋人袁文（1119——1190，浙江鄞县人）的《瓮牖闲评》卷一。袁与吴棫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袁所引《补音》材料已足以证明这是一部讲叶音的著作。

在这里，我们还要谈一下为《韵补》写序言的徐蒇(chǎn)。徐蒇，字子礼。由进士知饶州，乾道初，改知江阴军，迁转运副使。《苏州府志·人物》称赞“蒇有学，尤善汉隶书。”大约卒于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左右。徐蒇与才老本是同里，又是好友。他在序言中，明确提出了谐声同韵的原则：

殊不知音韵之正，本诸字之谐声有不可易者，如“霾”为亡皆切，而当为陵之切者，由其以“狸”得声；“浼”为每罪切，而当为美辨切者，由其以“免”得声；“有”为云九切，而贿、痏、洧、鲔皆以“有”得声，则当为羽轨切矣；“皮”为蒲縻切，而波、坡、颇、跛皆以“皮”得声，则当为蒲禾切矣；又如“服”之为房六切，其见于《诗》者凡十有六，皆当为蒲北切，而无与房六叶者；“友”之为云九切，其见于《诗》者凡十有一，皆当作羽轨切，而无与云九叶者，以是类推之，虽毋以它书为证可也。

徐蒇已经提出了探求古韵的一个重要方法。清朝人搞的谐声表就导源于此，这是值得郑重提出来加以表彰的。

南宋时期在上古音研究方面作出一定贡献的还有项安世。安世字平甫，松阳（今属浙江丽水地区）人，淳熙二年（1175）进士。庆元（宋宁宗年号）中谪居江陵时，著有《项氏家说》，中有“诗音”、“诗音类例”两条。项氏明确提出古韵“与今韵不同”，“古人呼字，其声之高下，与今不同。”他还提出字有“本声”，“夫字之本声，不出于方俗之言，则出于制字者之说，舍是二者，无所得声矣。”“求之方俗之故言，参之制字之初声，尚可考也。”他已明确认识到要据方言以考古音，据谐声以考古音，这是值得肯定的。他的“诗音类例”已具有韵脚系联的性质。他说：“《诗》韵皆用古音，不可胜举。今择众音之聚者，举之以为例。”他所说的“聚”，有“三韵之聚为一者”，“四韵聚而为一者”，“六韵之聚而为一者”。当然，他对《诗经》押韵规律的认识还非常不够，非常粗疏，而且只列举了十四条例子，但这是“系联”的先声，值得一提。

南宋时的古音学著作还有程迥的《音式》和郑庠的《古音辨》。

程迥，字可久，祖籍河南宁陵沙随人，人称沙随先生。乔居浙江余姚，孝宗隆兴元年（1163）进士，历宰泰兴、德兴、进贤、上饶等县。《音式》今已不传。他总结《韵补》的义例“不过四声互用、切响同用二条”⑦，他的《音式》“以三声通用，双声互转为说。”⑧所谓“三声通用”，当指平上去三声相承的字在古音中可以“通”为一韵；“双声互转”大概是指音转的根据主要以双声为条件。

郑庠的《古音辨》也早已失传。他分古韵为六部：

真谆臻文欣元魂痕寒欢删山先仙十四韵相通，皆协先仙之音；

东冬钟江阳唐庚耕清青蒸登十二韵相通，皆协阳唐之音；

支脂之微齐佳皆灰咍九韵相通，皆协支微之音；

鱼虞模歌戈麻六韵相通，皆协鱼模之音；

萧宵爻豪尤侯幽七韵相通，皆协尤侯之音；

侵覃谈盐添严咸衔凡九韵相通，皆协侵音。⑨

郑庠也还是没有摆脱206韵的框架，还是讲部与部之间的“通”“协”。事实上他只不过把《广韵》（韵目次序与今《广韵》略有不同，如严在咸衔之前）平声五十七韵合并为六个大类：

一、先仙　二、阳唐　三、支微

四、鱼模　五、尤侯　六、侵谈

这六大类已注意到韵尾的不同，比吴棫有进步。但郑庠的六部与

顾炎武的十部在性质上是不一样的。与顾炎武同时的柴绍炳（字虎臣，杭州人）对郑庠的分部有过详细的批评，其中有些意见是很好的。⑩

注：

①《经典释文》毛诗音义·邶风“南”字注。

②顾炎武：《韵补正·序》。见音韵学丛书初编。

③孔广森说：“至吴才老大畅叶音之说，而作《韵补》。要其谬有三：一者若庆之读羌，皮之读婆，此今音讹，古音正，而不得谓之‘叶’；二者古人未有平声仄声之名，一东三钟之目，苟声相近，皆可同用，而不必谓之‘叶’；三者凡字必有一定之部类，岂容望文改读，漫无纪理！以至《行露》‘家’字，二章音谷，三章音公，“于嗟乎驺虞”，首章五加反，次章五红反，抑重可嗤已。”（见《诗声类·序》）

④《韵补正》五支注。

⑤《韵补正》十三佳注。

⑥戈载：《词林正韵·发凡》。

⑦杨慎：《答李仁夫论转注书》。

⑧四库全书韵补提要，886页。

⑨见《熊先生经说》卷二。

⑩见《柴氏古韵通》。柴氏说：“真文元寒删先皆当协先，东冬江阳庚青蒸皆协阳。又云：鱼虞歌麻同协，侵覃盐咸同协。其说似优于吴，然亦知一昧二，不可为恒例也。按：古韵先部多叶入真，如《易》以‘天’叶‘人’，《诗》以‘田’‘年’叶‘人’之类，何必定从先！其真文互通于寒删先者，间亦有之，岂成法哉！故两部自当区分，考之古制，断不能并。寒删先、真文绝不相杂，故断以真文为一部，寒删先为一部，元则半通两属焉。若东冬江自为一

部，庚青蒸自为一部，阳则独用，而庚半通阳。至鱼虞歌麻，古韵間通，秦汉而后，不得不分两。然三百篇如'莫赤匪狐'、'羔裘如濡'之类，自从鱼虞；'有頍者弁'、'鱼丽于罶'之类，自从歌麻。亦不必混而一之也。若侵之与覃盐咸，同属闭口，似乎可通，然侵近真，覃盐咸近寒删先，故宜析而二之。考诸风雅骚赋，侵多独用。其覃盐咸可通者，衹南、男、覃、躭、三、黔、潜、廉、咸、凡数字有本耳。"柴氏虽不精于古音，但他主张真文与寒删先分为两部，侵与覃盐咸分为两部，不唯超出郑庠，亦在顾炎武之上。又，他主张东冬江、庚青蒸、阳（庚之半）分为三部，鱼虞与歌麻各自为部，大体上是对的，当然还非常粗疏。

第十四节　唐宋文字学

唐宋文字学的主要内容有四：一、正字形之学；二、说文之学；三、右文说；四、金石之学。

关于正字形的著作，影响较大的有唐代颜元孙的《干禄字书》，张参的《五经文字》，唐玄度的《新加九经字样》，宋代郭忠恕的《佩觿（xī）》，张有的《复古编》。

颜元孙，学有渊源。他的祖先颜之推、颜师古都是著名学者。"字样"之学就起源于元孙之伯祖颜师古。贞观年间，唐太宗命师古"刊正经籍，因禄字体数纸，以示雠校楷书，当代共传，号为《颜氏字样》。怀铅是赖，汗简攸资。"（《干禄字书·序》）《干禄字书》按四声编排，列举同一个字的俗、通、正三种写法。

所谓俗者，例皆浅近，唯籍帐、文案、券契、药方、非涉雅言，用亦无爽，倘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谓通者，相承久远，可以施表、奏、牋、尺牍、判状，固免诋诃；所谓正者，并有凭据，可以施著述、文章、对策、碑碣，将为允当（原注：进士考试，理宜必遵正体；明经对策，贵合经注本）。

（《干禄字书·序》）

现举例如下：

聡聦聰　　上、中通，下正。

功功　　上俗，下正。

兹兹兹　　上俗，中通，下正。

囬回　　上俗，下正。

书中所辨，并不全是异体字，有些是形体近似而意义不同的字。如：

辤辭辞　　上中并"辞让"，下"辞说"。

俳徘　　上"俳优"字，音排，下"徘徊"字，音裴。

勤懃　　上"勤劳"，下"慇懃"。

瑒塲場　　上音长，中音伤，下音亦。

瞋嗔　　上"瞋目"，下"嗔怒"。

磐盘　　上"磐石"，下"盘器"。

《干禄字书》曾于大历九年（公元774年）由颜元孙的侄子、大书法家颜真卿刊于石。

张参是唐大历年间的国子司业，于大历十一年(公元776年)著《五经文字》。这部书是适应读经与科举的需要编写的。他

说："考功礼部，课试贡举，务于取人之急，许以所习为通，人苟趋便，不求当否，字失六书，犹为壹事，五经本文，荡而无守矣。"（序例）因此，他奉命根据《说文》、《字林》及石经残本等资料，考订字形，以存"本真"。

全书收字3235个。在编排方式上，"采《说文》、《字林》诸部，以类相从"，但又"不必旧次，自非经典文义之所在，虽切于时，略不集录，以明为经，不为字也。"（序例）根据这些原则，他确定的部首只有一百六十部。

《五经文字》主要收集经典中的异体字，有的还有简要的释义。如

> 指指　上《说文》，下石经。（手部）
>
> 㝵得　上《说文》，下石经。（彳部）
>
> 遯遁　二同。上《易》卦，遯，逃也。下"迁"也。经典通用之。（辶部）

《新加九经字样》为配合刊刻"开成石经"而作，成书于唐文宗开成二年（837）。与《五经文字》一起刻石刊出，列于石经之后。全书按76部排列，收字421。以辨字形为主，有时也分析意义。如：

> 笑笑　喜也。上案《字统》（北魏杨承庆撰，已失传）注云：从竹从夭。竹为乐器，君子乐然后笑。下经典相承。字义本非从犬。"笑、宾、莫、荖、芊、雝、鼎、隶"等八字，旧字样已出，注解不同，此乃重见。
>
> （竹部）

所谓"旧字样"当指《干禄字书》及《五经文字》之类的书。《干禄字书》去声收有"咲笑"，注云"上通下正"。《五经文

字》竹部也收了“笑”字，注云“喜也，从竹下犬。”二书都以“从竹下犬”为正体，《说文》无“笑”字，《玉篇》竹部有“笑”字，下亦从犬。当时的文化心理认为，人笑从犬，有失雅意，故唐玄度赞同笑字应当从夭，强调“字义本非从犬”。

《五经文字》注音，既有直音，也用反切。《新加九经字样》则“谨依《开元文字》，避以反言，但纽四声。”（《新加九经字样·序》）如手部：“控：空去·引也，见《诗》。”亻部：“侯：后平……”

《开元文字》即《开元文字音义》，凡三十卷，分三百二十部，唐玄宗开元年间徐坚等奉命编撰，书已不存。

郭忠恕，历仕后汉、后周、北宋三朝，卒于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工小篆，通小学，长于绘画。文字学著作有《汗简》、《佩觿》。

“觿”是古代解结的用具，也可以用作佩物。《诗·卫风》：“童子佩觿。”郭忠恕以“佩觿”作为书名，表示此书乃童子之学。郭忠恕用“三段十科”一语概括了此书的全部内容。

“三段”是指汉字形、音、义三个方面的问题，这是卷上的内容，具有通论的性质。

“十科”是把形近义别的字按声调编为十类。如：

第一科：平声自相对。

僮犝 上音童，僮仆；下昌容翻，行貌。

盲肓 上木庚翻，目疾；下火光翻，膏肓。

偟徨 并胡光翻。上暇也；下彷徨。

第六科：上声去声自相对。

囗（wǎng）四 上亡往翻，囗罗；下息利反，数名。

第八科：去声自相对。

況况況　并虚访翻。上发语之端，中寒冰也，下形况，亦修况，琴名。今多通用下字。

第十科：入声自相对。

汨汩　上莫的翻，汨罗江，又音骨，没也，从“曰”，非。下于笔翻，流水。

《郭忠恕传》称赞“《佩觿》三卷，论字所由，校定分毫，有补后人，亦奇书也。”这个评论是正确的。

张有的《复古编》成书于大观、政和（宋徽宗年号，公元1107年至1118年）之间，书名“复古”，就是要“复”《说文》之“古”。他的宗旨是：“字之合于古者，皆所不论；惟俗书乱之者，必正其讹舛，毫厘不贷。”①全书所正有3千余字。如：

原，别作源，非。

奔，别作犇，非。

曑，别作参，非。

恥，别作耻，非。

芦菔，别作萝卜，非。

細，隶作细，非。

以上五种正字书，以颜郭二书价值为高。颜元孙提倡正体，但也不是很反对俗体，他的思想比较通达。郭书以辨形似为主要任务，对后人研究古代词义与文字形体的关系，很有参考意义。张有的小篆写得很漂亮，不过他的确是一位复古主义者。被他判为“非”的，有的是区别字，如“源”是“原”的区别字；有的已成为通用字，如“参商”之“参”。汉字形体结构的演变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观点是错误的。颜元孙说得好：“若总据《说

文》，便下笔多碍。”② 张有抱住《说文》的点画不放，说什么“《说文》所无，手可断，字不可易也。”这就是缺乏发展观点，泥古非今，不足为法。

我们认为，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对汉字进行整理规范，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不仅科举考试要求汉字标准化，就是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也应该力求有统一的标准，才能更好地发挥文字的工具作用。

桂馥的《说文统系图》，立唐赵郡李阳冰于江式之下，把他算作许慎的功臣，这是很公正的。李阳冰，字少温，李白从叔，唐肃宗宝应元年（762）为当涂令，官至将作少监。《宣和书谱》说李阳冰“留心小篆迨三十年……作《刊定说文》三十卷，以纪其学，人指以为苍颉后身。方时颜真卿以书名世，真卿书碑，必得阳冰题其额，欲以擅连壁之美，盖其篆法妙天下如此。”（卷二）徐铉等人也赞扬他“篆迹殊绝，独冠古今”。③ 阳冰对《说文》字义进行了不少新的解说，所以宋人著作中常有“阳冰新义”之类的说法。徐铉曾高度赞扬李阳冰在《说文》研究方面的贡献，说：“往者李阳冰，天纵其能，中兴斯学，赞明许氏，奂然英发。”④ 娄钥也说：“许叔重著《说文解字》，垂范千古，李阳冰中兴斯文于唐。”⑤ 可惜，李阳冰的《说文》论著已经见不到了。大概他的“新义”也有不少是标新而失据。徐锴常批评说“阳冰不了其义”，“阳冰妄矣”，“其谬甚矣”。现在有的人就根据这些批评，对阳冰进行全盘否定，那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是片面的。

唐宋时期，还有《说文》偏旁之学，专门研究《说文》部首，也叫“字原”。如五代蜀林罕著有《字原偏旁小说》，对

541个偏旁进行说解。宋释萝英著《英公字源》一卷，解释了539个偏旁。二家篆体皆宗李阳冰。

阳冰之后，在《说文》研究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的是大小二徐。大徐即徐铉（公元917年—公元992年），字鼎臣，扬州人。其弟徐锴，字楚金，后人称为小徐。小徐于宋太祖灭南唐时已去世。他著有《说文解字系传》四十篇，第一至三十为“通释”，是对《说文》进行注释，三十一至四十为“部叙”、“通论”、“祛妄”、“类聚”、“错综”、“疑义”、“系述”等篇。其兄徐铉赞扬这部著作：“考先贤之微言，畅许氏之玄旨，正阳冰之新义，折流俗之异端，文字之学善矣尽矣。”

小徐所注之《说文》，当然比不上后来的段注，但段注未必不受到小徐的启发。如小徐已注重发明许书义例，注重引古书以证古义，注重词义的辨析，这些优点段玉裁都吸收了。

大徐在《说文》研究方面贡献有二：一是于宋太宗雍熙年间与句中正等校定《说文》；二是对《说文》的正文补充了十九个字（诏、志、件、借、魋、綦、剔、醫、醆、趄、颀、玓、曆、緻、经、笑、迓、睆、峰）正文之后还新附入402字。现在通行的《说文》就是大徐本。

大徐本与小徐本存在一些差异。

一、正文字数有多寡之别。如示部，小徐有六十五字，大徐本只有六十三字。

二、说解的文字有异。如玉部“球”字的释义，大徐本作“玉声也”（段注说：“铉作玉磬也。”与孙星衍覆刻宋本不同），小徐本作“玉也”。小徐是而大徐非。

三、两书所用反切不同。大徐本用孙愐《唐韵》反切，小徐

本用朱翱反切。

中华书局于1963年出版了以清代陈昌治刻本为底本的大徐本，于1987年出版了清代祁寯藻校刻的小徐本。这两种本子都比较好。但这两种本子肯定与许书原貌有出入。仅以清代发现的唐写本木部残卷与大徐本相较，就有七点不同。1.个别字的排列次序不同，如“枪”唐写本列于“㯕”之后“闲”之前，大徐本列于“柤”之后“楗”之前。2.篆书的体势有别，如“杷”字大徐篆作[illegible]，唐写本作[illegible]。3.声旁用字不同，如“椎”大徐从木隹声，唐写本从木隼声。4.字形结构的分析不同，如“栅”大徐作“从木从册册亦声”，唐写本作“从木删省声。”5.释义有别，如“椴”大徐本释作“种楼也”，唐写本作“种椴也。”6.释义用字不同，如“楫”大徐为“舟櫂也，”唐写本作“舟擢也。”7.反切不同，如“栊”大徐作卢红切，唐写本作力工切。唐写本还有两种口部残简：一种存六行，十二字；一种仅有四个字。口部十二字残简也与二徐本有些不同。如“咼”二徐本的释义均作“口戾不正也。”残简无“不正”二字。“吠”字大徐本作“从犬口”，小徐本“从口犬”，残简作“从口犬声”。二徐本均作会意，残简作形声，只是“犬”乃“犮”之讹，应是犮声。残简保存了“声”字，蒋礼鸿说：“这个‘声’字真一字千金！”（《怀任斋文集》110页）

南宋的郑樵也写了两本文字学专著，即《象类书》、《六书证篇》。两书都已失传，我们从《通志·六书略》还能了解他关于文字学的一些主张。如他批评许慎“犹不达六书之义”，“许氏惟得象形、谐声二书以成书，牵于会意，复为假借所扰，故所得者亦不能守焉。学者之患在于识有义之义，而不识无义之义。

假借者，无义之义也。假借者，本非已有，因他所授，故于已为无义。”许慎说：“能，熊属。”又说：“能兽坚中，故称贤能。”把“贤能”之“能”与“能兽”之“能”混为一谈，郑樵批评他是“惑象形于假借者也”。郑樵对假借的论述甚为精辟，明代杨慎赞扬说：“郑渔仲《六书》考论假借，极有发明。”⑥

郑樵对《说文》五百四十部也有批评。他说：

> 许氏作《说文》定五百四十类为字之母，然母能生，而子不能生。今《说文》误以子为母者二百十类。且如《说文》有句类，生“拘”、生“钩”；有卤(tiáo)类，生“㮚”、生“𥻆”；有半类，生“胖”、生“叛”；有菐类，生“仆”、生“䑑”。据“拘”当入手类，“钩”当入金类，则“句”为虚设；“㮚（栗）当入木类，“𥻆”（粟）当入米类，则“卤”为虚设；“胖”当入肉类,“叛”当入反类，则“半”为虚设；“仆当入人类，“䑑”当入臣类，则“菐”为虚设。盖句也，卤也，半也，菐也，皆子也，子不能生，是为虚设。此臣所以去其二百十，而取其三百三十也。

他把许慎定的部首区分为“母”“子”两类，根据“子不能生”的原则，砍掉了二百多个部首，定为三百三十部首，这也是一种大胆的尝试。郑樵不盲从许慎，“是者从之，非者违之”，这就是批判地继承。《六书略》在南宋时已很有影响。张世南说：“建炎间，莆中郑樵字渔仲，作《六书略》，谓象形、谐声、指事、会意、转注、假借，从六者而生，总计二万四千二百三十五。其间惟谐声类最多，计二万一千八百一十。约以简易，而尽得作字之义矣。”（《游宦纪闻》卷九，76页）

据《宣和书谱·正书》载：北宋王圣美（名子韶）写过二十

卷的《字解》。他解字的一个重要方法即"右文"说。何谓"右文"？《梦溪笔谈》卷十四有一条记载：

> 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为右文。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戋（jiān）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niè）而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

"左文"和"右文"就是汉字的形符与声符。形符常居左，故称"左文"；声符常在右，故称"右文"。左文表义类，这是不成问题的，"右文"是否都能表义呢，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右文表义作为普遍规律来看待，是不科学的。右文说与声训不同，声训过于宽泛，只顾声音，不顾意义，右文毕竟有声符作为根据，而声符中的确有一些有表义的作用，所以后来有人认为王圣美的"右文"说是"是训诂学里一个很重要的法则"⑦。

王观国（湖南长沙人，宋徽宗政和九年进士，当过祠部郎中，或说为祠部员外郎。）《学林》卷五提出了类似右文说的"字母"说："卢者，字母也。加金则为鑪，加火则为炉，加瓦则为甗，加目则矑，加黑则为黸。凡省文者，省其所加之偏旁，但用字母，则众义该矣。亦如田者，字母也。或为畋猎之畋，或为佃田之田。若用省文，惟以田字该之，他皆类此。"观国所说的"字母"，即具有构形能力的声符，不以"右文"为限。从他举的例子来看，带有"字族"的性质。

张世南（江西鄱阳人，生活于南宋宁宗、理宗年间。）《游宦纪闻》卷九也谈到"右文"问题。他说："自《说文》以字画左旁为类，而《玉篇》从之，不知右旁亦多以类相从。如'戋'有

浅小之义，故水之可涉者为'浅'，疾而有所不足者为'残'，货而不足贵重者为'贱'，木而轻薄者为'栈'。'青'字有精明之义，故日之无障蔽者为'晴'，水之无溷浊者为'清'，目之能明见者为'睛'，米之去粗皮者为'精'。凡此皆可类求。聊述两端，以见其凡。”张氏说“青”有“精明”义，无据。

一般认为，“右文”说滥觞于晋代扬泉《物理论》。杨氏说：“在金曰坚，在草木曰紧，在人曰贤。”（转引自《艺文类聚·人部》）但是，从杨泉到王子韶、张世南，都只略举个别例证，既无理论，又无系统性可言，所以这个学说在当时还很不成熟。

宋人又开钟鼎文字研究的先河。欧阳修、赵明诚都有专著问世，以薛尚功的《历代钟鼎款识》影响较大。

郭忠恕的《汗简》对宋代金石之学的兴起有一定的作用。《汗简》是一部收集古文字的资料书。全书分七卷，收字2962个，除去重复，还有2400余字。《汗简》引用的文字资料计七十一家，所收古文多为战国时文字，形体与《说文》、《石经》颇不同，其中也有些字体属后人伪托。此书历来受到非议，认为书中的古文“大抵好奇之辈影附诡托，务为僻怪，以炫末俗⑧。”近几十年来，由于大批战国文字从地下发掘出来，古文字学家对《汗简》有了新的认识。如李学勤先生就多次强调此书的重要性。他说：“《汗简》和《古文四声韵》对于东周特别是战国文字的研究，有很重要的意义。有学者认为，近年不少东周文字的发现，其中不少字形均能从《汗简》中获得印证，因之今天对《汗简》有重加估价的必要⑨。”

《古文四声韵》也是一部古文字资料书。作者夏竦（985

—1051），字子乔，江州德安人。于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编著此书。全书收古文约九千字，按《唐切韵》210韵列字（206韵加上移、宣、选、聿四韵），先出楷体，后出古文。此书对研究战国文字也有参考价值。何琳仪的《战国文字通论》第二章第五节专论《汗简》与《古文四声韵》，可参阅。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李零、刘新光整理的《汗简》和《古文四声韵》。

注：

①楼钥：《攻媿集·复古编序》。

②《干禄字书·序》。

③《说文解字》320页，1963年中华书局影印本。崇文总目载李阳冰刊定说文二十卷。书已佚。

④《说文解篆韵谱·序》。

⑤《攻媿集·复古编序》。

⑥杨慎：《古音后语》。

⑦唐兰：《中国文字学》19页。

⑧郑珍：《汗简笺正·叙》。

⑨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365页。

第十五节　唐宋辞书

在谈唐宋辞书时，首先要评述佛典音义书。佛教经典的翻译到唐宋已达极盛阶段。佛典中涉及许多音译、意译过来的梵文名词术语，需要有专门的音义书来加以解释，而从事这种音义工具

书的编纂者又必须精通语言文字之学，所以佛典音义书是传统语言学的一份宝贵遗产。

唐代和尚玄应编写的《一切经音义》价值较高，此书共二十五卷。《唐书·艺文志》改名为《众经音义》，通常也叫《玄应音义》。玄应大概与玄奘同时，于贞观末年开始"捃拾藏经，为之音义"①所谓"一切经"，即佛教典籍丛书。

玄应之后，慧琳（公元736年—公元820年）也撰有《一切经音义》，此书又名《大藏音义》，也叫《慧琳音义》，共一百卷。慧琳本是西域疏勒国（今新疆喀什）人。他对"印度声明（即语文学），支那诂训，靡不精奥。"②慧琳于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 783 年）开始编著《音义》，至唐宪宗元和二年（公元 807 年）完稿，历时达二十五年之久，所释之佛经达五千七百多卷。书稿问世之后，"京邑之间，一皆宗仰。"③

北宋初年，辽国僧人希麟编著《续一切经音义》十卷，补《慧琳音义》之所未备。

僧人们为佛典作音义书，原本是为了"正名"，为了"显教"。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来看，这些音义书有以下一些意义：

一、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译名的原意。如音译词"和尚"的原意是什么呢？请看玄应《一切经音义》和《慧琳音义》的释义。

> 和尚，《菩萨内戒经》作"和阇（shé）"，皆于阗国等讹也。应言"郁波弟耶夜"，此云近诵，以弟子年小，不离于师，常逐常近，受经而诵也。又言"邬波陀耶"，此云亲教。旧译云：知罪知无罪，名为和尚也。邬，音于古反；陀，音徒我反。
>
> （《一切经音义》卷14）

和上：案五天雅言，和上谓之鸡波地耶。然其彼土流俗，谓和上殟社，于阗、疏勒乃云"鹘社"，今此方讹音谓之"和上"。虽诸方殊异，今依正释。言"坞波"者，此云近也；"地耶"者，读也。言此尊师为弟子亲近习读之者，旧云，"亲教"是也。

（《慧琳音义》卷22。见大藏经54卷，441页。）

窣堵波：上苏骨反。梵语也。或云苏偷婆，或云塔婆，皆梵言楚夏耳。此译云高胜方坟也，即安如来舍利砖石铁木等塔是也，俗语或云浮图也。

（《续一切经音义》卷一。见大藏经54卷，937页。）

天竺，相承音竹，准梵声合音笃。古云身毒，或云贤豆，新云印度，皆讹转也。正云印特伽罗，此翻为月也。月有千名，斯乃一称。《西域记》云：良以彼土佛日既隐，贤圣诞生，相继开悟，导利群生，如月临照，故以为名也。

（《续一切经音义》卷三。见大藏经54卷，946页。）

二、保存了不少文字资料，如古今字、俗体字、异体字等。如：

嘲戏：又作"啁"，音竹包反。《苍颉篇》云："啁，调也，谓相调戏也。"盈按：《说文》有"啁"无"嘲"。啁、嘲古今字。

（《一切经音义》卷一）

贪惏：字书或作"啉"，今亦作"婪"，同力南反。惏亦贪也。盈按：啉惏、异体字，与婪为古今字。

（《一切经音义》卷一）

懊侬：今皆作“恼”，同奴道反。懊侬，忧痛也。盈按：侬、恼异体字。

（《一切经音义》卷四）

褴褛：谓衣败也。凡人衣破丑弊，皆谓之褴褛。经文（指佛经）从草，作“蓝草”之“蓝”，“丝缕”之“缕”，非体也。盈按：褴蓝、褛缕，皆正俗之别。

（《一切经音义》卷十二）

三、保存了丰富的训诂资料。如：

姑：妇称夫之母曰“姑”，姑在则曰“君姑”，没则曰“先姑”。

（《一切经音义》卷十二）

鹫峰：上音就。西国山，此山高峻，鹫鸟所居，或名灵鹫山，或云鹫岭，皆一山而一名也。如来于此山中得转法轮，甚多圣迹，在中天界。

（《慧琳音义》卷一）

腊沓子：沓，徒合反。《考声》，合也。案，腊沓子者，以五谷杂合一处，用以加持，如今俗言腊杂子也。

（希麟《续一切经音义》卷四）

勉励：劝奖也。勉强：谓自劝强也。励：相劝励也。亦勉力为励。

（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三）

四、在校勘、辑佚方面也很有价值。《玄应音义》和《慧琳音义》引用了相当丰富的唐以前的音义资料，这些音义书有不少已失传。因此，校勘家和辑佚古书的人对这些音义资料都颇为重视。清人任大椿著《字林考逸》，孙星衍辑《仓颉篇》，都从其

中采取了大量的资料。

在校勘方面同样有用处。如《玄应音义》卷二十三“快”字下引《说文》云：“心不服也。”今本《说文》作“快，不服怼也”。段玉裁说：“当作不服也，怼也。夺一也字，遂不可解矣。”④段说有一定道理，但“怼”字有可能是后人据《仓颉篇》添上去的，玄应引作“心不服也”才真正符合“快”的原意。《史记·淮阴侯列传》说韩信“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正是“心不服”的意思。“鞅”为“快”之假借。

五、《慧琳音义》为研究唐代秦音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景审《一切经音义·序》说：“古来音反，多以傍纽而为双声，始自服虔，元无定旨，吴音与秦音莫辨，清韵与浊韵难明，至如‘武’与‘绵’为双声，‘企’以‘智’为叠韵，若斯之类，盖所不取。近有元庭坚《韵英》及张戬《考声切韵》，今之所音，则取于此。”⑤由此可知，《慧琳音义》用的是元庭坚和张戬的反切，今人黄淬伯据此写了《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他说：“今欲上窥千百年前之关中音系，探其涯略，则《经音义》实为之奥藏。”

除佛经音义外，还有为儒家经典服务的《群经音辨》，这是宋代贾昌朝编的。他说：“《音辨》之作，欲使学者知训故之言咸有所自，聊资稽古之论，少助同文之化。”⑥

书中包括“辨字同音异”、“辨字音清浊”、“辨彼此异音”、“辨字音疑混”、“辨字训得失”等内容，对于考订古音古义，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宋代的雅学著作有陆佃的《埤（pí）雅》，罗愿的《尔雅翼》。

陆佃（字师农）的儿子陆宰在《埤雅·序》中说：

埤雅言为《尔雅》之辅也。《埤雅》比之《物生门类》，愈益精详，文亦简要。先公作此书，自初迨终仅四十年，不独博极群书，而严父牧夫，百工技艺，下至舆台皂隶，莫不诹询，苟有所闻，必加试验，然后纪录，则其深微渊懿，宜穷天下之理矣。

陆佃在写《埤雅》之前，原来还写过《物生门类》。《周礼·大司徒》："辨五土之物生。"可见，《物生门类》也是一部研究自然科学词语的名物训诂书。

《埤雅》释词296条。其释词方式跟《尔雅》大不相同。书中的大多数条目都像一篇小论文，在写法上大抵是旁征博引，加上考辨、议论。如卷十一《释虫》中的"释鼠"，写了一千多字，引有《说文》、《诗》、《毛传》、《广雅》、《兵法》、《博物志》、《庄子》、《易》、《燕山录》、东方朔、《尔雅》、《禽经》、《荀子》、马融、《韩非子》、杜甫诗等十六种资料。另外还有描写议论。如说："今一种鼠，见人则交其前足而拱，谓之礼鼠，亦或谓之拱鼠。《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其或取诸此乎？"又说："鼮鼠，兔首，似鼠而大，能人立，交前两足而舞，害稼者，一名雀鼠。"

陆佃对名物释义不见得都正确。如他对"老鼠"的释义是：

又鼠类最寿，俗谓之"老鼠"是也。若"老鹞"、"老鸱"、"老乌"之类以"老"称，亦如此。

（卷十一释虫）

他不知道"老"是名词词头，因而犯了"缘词生训"的错误。

《尔雅翼》也是解释百科名词的书。"翼，谓编次此书，所以羽翼《尔雅》并行于世也。"罗愿（字端良，徽州歙县人，卒于宋孝宗淳熙乙巳年）著此书，也对自然界的动植物进行过一番考察研究。他说：

> 乃探其原，因《尔雅》为资，略其训诂、山川、星辰，研究动植，不为因循；观实于秋，玩华于春，俯瞰渊鱼，仰察鸟云，山川皋壤，遇物而欣；有不解者，谋及刍薪，农圃以为师，钓弋则亲。

由于作者注意对实物进行多方面的研究考察，获得了第一手材料，故有的条目写得很生动，且有科学根据。如他关于"猫"、"鼠"的描写就是很好的例证。

> 猫，小畜之猛者，性阴而畏寒，虽盛暑卧日中，不惮，鼻端四时冷涩，惟夏至即温，目睛早晚员（圆），日中如线，就阴则复员。其耳经捕鼠之后，则有缺如锯，如虎食人而锯耳也。
>
> （卷五释兽。丛书集成本，236页）

> 鼠，盗窃小虫，夜出，昼匿穴，虫之黠者，其种类至多……好自扬弄其须，禾稼成时，辄相率窃取覆藏之，以为冬储，人或掘之，得数斗许……今河东有大鼠，能人立，交两脚于颈上，或谓之雀鼠。韩退之所谓"礼鼠拱而立"者也。
>
> （丛书集成本259页）

罗氏释名物时，也涉及到某些历史常识，可供参考。如《释鱼》关于"鲤"的典故：

> 鲤者，鱼之主。《唐律》：取鲤鱼即宜放，号赤鲜公，

卖者杖六十。以国氏“李”，讳其同音也。故用鱼符，盖取象于鲤，至武后革李氏，则代之以龟。

（丛书集成本298页）

跟《埤雅》一样，书中也有一些糟粕，甚至同一条目中，也是菁芜并存。《埤雅》和《尔雅翼》的作者，在多数士人只顾埋头书本、不辨五谷的情况下，能联系实际考订名物，这种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

辽、宋、金时期还有四部各具特色的辞书，即《龙龛手鉴》、《类篇》、《字说》、《篇海》。辽代和尚行均（字广济）编的《龙龛手鉴》（原名《龙龛手镜》，因避赵匡胤祖父赵敬讳，改镜为鉴），“观其字音韵次序，皆有理法”。⑦ 这部字典收字有26430余，释义有163170余字，共计189610余字。

一、它将《说文》部首归并为242部，这些部首的排列以平上去入四声为序。如第一卷平声共九十七个部首：金部第一，人部第二，言部第三，心部第四……知部第九十七。

二、各部内所收之字又按平上去入排列。

三、唐五代盛行俗字，写本经卷俗字更多，故编者很注意收集俗体字。如第四卷（入声）舌部中的“甜”字共有七种写法，有五种是俗体，一种是或体，只有“甜”是正体。此书对研究敦煌出土文献的文字有一定作用。

四、字条中有一定数量的双音词。如：

卷一衣部：襁褓

卷二手部：抖搂

卷三草部：芭蕉

卷四足部：踌躇

五、字的释义都没有书证，这是很大的一个缺点。

《类篇》是继《玉篇》之后的一部大型字典。这部字典是与《集韵》相配的。宋仁宗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翰林学士丁度等奏：

今修《集韵》，添字既多，与顾野王《玉篇》不相参协，欲乞委修韵官将新韵添入，别为《类篇》，与《集韵》相副施行。

（《类篇》卷十五）

《类篇》以《说文》为本，也分十四篇，每篇之内又分上中下，收字31319，重音（一字多音）21846，共544部（实际部首为540）。

它的每一个正文之下，都注明正文字数和"重音"数。如：

万：无贩切，数也。又密北切，虏复姓，北齐特进万俟(mò qí)普。文一，重音一。

（卷一　上）

迹蹟逮：资昔切。《说文》，步处也。或作蹟逮。蹟，又士革切，走貌。文三，重音一。

（卷二　中）

脸：千廉切。《埤苍》，臛也。又居奄切，颊也。又两减切，脸臜，羹属。文一，重音三。

（卷四　下）

《类篇》的编撰历时达二十七年之久，曾四易其编纂负责人，质量颇高，但创造性似嫌不足。

提起王安石的《字说》，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起与此有关的戏谑。下面举三则为例：

1. 东坡闻荆公《字说》新成，戏曰："以竹鞭马为'笃'；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曰："鸠字从九从鸟，亦有证据。《诗》曰：'鸤鸠在桑，其子七兮。'和爹和娘，恰是九个。"

2. 东坡尝举"坡"字问荆公何义？公曰："坡者土之皮。"东坡曰："然则，滑者水之骨乎？"荆公默然。

（以上二则转引自沈宗元编《东坡逸事》）

3. 王荆公晚喜说字。客曰："霸字何以从西？荆公以西在方域主杀伐，累言数百不休。或曰："霸从雨，不从西也。"荆公随辄曰："如时雨化之耳。"其学务凿，无定论类此。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

这些笑柄恐怕并不全是因王安石变法失败"旧党"故意捏造出来的。张世南说："王金陵《字说》之作，率多牵合，固不免坡公之讥。"（《游宦纪闻》卷九）王辟之说："荆国王文公，以多闻博学为世宗师，当世学者得出其门下者，自以为荣，一被称与，往往名重天下。公之治经，尤尚解字，末流务多新奇，浸成穿凿。朝廷患之，治学者兼用旧传注，不专治新经，禁援引《字解》。于是学者皆变所学，至有著书以诋公之学者，且讳称公门人。故芸叟为挽词云：'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渑水燕谈录》卷十）

《字说》久佚失传，全部内容如何，不得而知。从《周官新义》、《尔雅新义》、《埤雅》、《王氏字说辨》、《瓮牖闲评》等书所引用的《字说》材料来看，王安石解字的方法并不全是"右文"说，也有声训、形训、义训、描写等，其目的就是要追溯

字的本原，"以天地万物之理著为此书"。（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下，九〇页）王安石研究过许慎的《说文》，"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王临川集·答曾子固书》）他的这些知识在《字说》中也有反映。《字说》并不是一无是处。如：

役：役则执殳。（《瓮牖闲评》卷四）

梅：梅用作羹，和异味而合之如媒也。（同上）

母：方为女时，未有所乳，为母，则两乳垂矣。

（《范公偁《过庭录》）

社：社者，土示也。（《周官新义》卷十二）

艾：艾可乂疾，久而弥善，故字从乂。

（《本草纲目》卷十五）

行：道也。（《诗·鹿鸣》）

《字说》成书于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时为二十卷。元丰五年（1082）《进〈字说〉表》称此书为二十四卷。大概元丰本为增订本。王安石《成〈字说〉后与曲江谭掞、丹阳蔡肇同游齐安院》云："据梧杖策事如毛，久苦诸君共此劳。"说明《字说》并非安石一人所作。所谓"末流务多新奇，浸成穿凿。"恐怕撰《字说》"诸君"也在"末流"之列吧。刘铭恕《王安石字说源流考》（收入刘盼遂《文字音韵学论丛》），可参考。

在金代出现了一部按音序检字的字典叫《五音篇海》，简称《篇海》。

《篇海》的最初编者是王与秘，到金章宗丙辰年（公元1196

年）韩孝彦又加以改编，办法是“改《玉篇》归于五音，逐三十六母之中，取字最为绝妙。此法新行，惊儒动众。”[8] 泰和戊辰（公元1208年）韩道昭又加以改编[9]，把部首改并为四百四十部，增加字数计12345，共收字54595，分为十五卷，书名叫做《五音增改并类聚四声篇海》。

《篇海》与《龙龛手鉴》都用音序检字法，但具体编排并不一样。《篇海》按三十六字母排列，字母之下再分平上去入四声。如第一卷见母，内分平声金部第一……上声己部第十八……去声见部第三十二……入声珏部第三十八。

音序检字法一般人并不习惯。所以《字汇》作者梅膺祚说：“《篇海》以字音为序，每苦检阅之烦。”[10] 周国光《〈四声篇海〉琐论》（信阳师院学报1986年第1期），可参考。

注：

①《大唐众经音义·序》。

②③《宋高僧传》卷五。

④《说文解字注》5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⑤见《大藏经》54卷，311页。

⑥《群经音辨·序》。

⑦《梦溪笔谈》160页。

⑧韩道升：《篇海·序》。

⑨新《辞源》作韩道升，误。

⑩《字汇·凡例》.

第五章　元明语言学

（公元13世纪中叶 —— 公元17世纪初）

概　　况

我把元明二代定为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的一个阶段，是基于以下一些考虑。

这一时期，汉语音韵学展开了新的一页。以周德清的《中原音韵》为代表，产生了一批以研究当时实际语音为任务的韵书；《韵法直图》、《等韵图经》的出现，标志着等韵学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古音学方面，陈第、焦竑、赵宧光等人的研究成就也是超越前人的。

在文字学方面，元明出现了一批研究六书的著作，其中以戴侗的《六书故》水平较高；明朝人在文字学方面没有什么建树，而《字汇》、《正字通》这两本字典还是很有影响的。

在元代还出现了我国第一本研究文言虚字的专著，这就是卢以纬的《语助》。

在这将近四百年的历史时期内，音韵学成就较高，最具特色。如果把南北朝时代算作汉语音韵研究的第一次高峰，元明时代的音韵研究可以称得上是第二次高峰。这次高峰的出现，首先

是由于汉语语音的发展给音韵学家们提出了新的任务；其次是由于戏曲文学的空前繁荣，这时期产生的一些有价值的韵书，都跟戏曲这种文学形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第三是元朝初年，推行蒙古新字（八思巴文），后来又产生了《蒙古韵》之类的著作，这对旧的韵书是一个有力的冲击，同时也启发人们对汉语语音进行新的分析。

我认为元明时代的重要语言学家都表现了一种值得赞扬的破旧立新的精神。周德清在“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中，对那些“泥古非今，不达时变”，“呼吸之间，动引《广韵》为证”的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讥讽他们为“鴃舌”，为“迂阔庸腐之儒”，要“转其喉舌，换其齿牙”。他批评“自隋至宋”的韵书，只不过“年年依样画葫芦耳”。其他如戴侗、焦竑、陈第，以及方以智、梅膺祚这些人，都敢于批评旧传统，敢于探索新事物，敢于提出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他们在语言研究方面能取得新的成就，跟这种革新精神是分不开的。

大概元代的最高统治集团，长于军事统治，思想统治相对要薄弱些，他们轻视汉民族的传统文化，歧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地位低了，传统的包袱、压力也少了，所以他们也敢于破旧说，出新意；明朝的情形则不同，他们很注意思想统治，扼杀人才的“八股文”就是那个时候发明的，但从整个封建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此时已接近没落阶段，尤其明代后期，徐光启从利玛窦译出了《几何原本》，在学术界引起很大震动，人们于“高头讲章”之外，看到了新的科学园地，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也受到不少人的重视，传教士们有的也从事汉语研究，利玛窦著有《西字奇迹》，金尼阁著有《西儒耳目资》，这些书对中国的语言学家

无疑是有影响的。

应该指出，清朝人对元明二代语言学的评价并不是很公平的。钱大昕骂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是“无知妄作”①，《四库提要》骂《洪武正韵》的编者之一宋濂是“曲学阿世，强为舞文”，朱彝尊讥讽《字汇》、《正字通》是“兔园册”②，这都是偏见，不是科学的论断。

注：

①《十驾斋养新录》卷五，101页。

②朱彝尊：《字鉴·后记》。

第十六节　《中原音韵》系韵书

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韵书。就影响而言，它小于《切韵》系韵书，若论价值则比《切韵》系韵书要高得多。

《中原音韵》的产生绝对不是偶然的。戈载说：“宋时已有《中州韵》之书，载《啸余谱》中，不著撰人姓氏，而凡例谓为宋太祖时所编。毛驰黄亦从其说，是高安（指周德清，周为江西高安人）已有所本。”①明代程明善《啸余谱》中的《中州音韵》为明之王文璧撰，所谓宋太祖时已有《中州韵》的话是断乎不可信的。

但是，在《中原音韵》之前，反映北音系的韵书已有《古今

韵会举要》和载于《举要》卷首的《七音》（明吕维祺《音韵日月灯》所列书目有《中原七音》一书）。在《举要》产生之前，还有分为十五个韵部的《蒙古字韵》；另外，近年蒋希文、杨耐思、龙晦等同志又考证出《中原雅音》一书，其时代也可能早于《中原音韵》。蒋希文说："这部书有可能出于两宋遗民之手，是1292——1375年间的产物。"②

《古今韵会举要》成书于元成宗大德元年（公元1297年），比《中原音韵》早二十七年。这部韵书是熊忠据黄公绍（福建邵武人，咸淳元年举进士）《古今韵会》改编而成。它表面上还是用107韵的框架，而实际上对"旧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批评"旧韵"是"吴音"，分韵很不合理，"有一韵之字而分入数韵者，有数韵之字而并为一韵者"，"今以七音韵母通考韵字之序，惟以雅音求之，无不谐叶。"（举要·凡例）《举要》批评旧韵是"吴音"，拿元代的语音来衡量旧韵，这是不妥当的，而作者提出以"雅音"作为标准，这就决定了这部韵书的性质是《中原》系的，而不是《切韵》系的。

既然作者明确提出要"以雅音求之"，为什么还要采取"吴音"的107韵这个框架呢？这是因为"旧韵"的影响非常深远，《举要》的作者又缺乏周德清那种勇于跟"旧韵"决裂的精神，下面这段话就很能说明问题：

> 旧韵所收，有一韵之字而分入数韵不相通用者，有数韵之字而混为一韵不相谐叶者，不但如前诸儒所论而已。且如东韵，公东是一音，弓穷是一音，此二韵混为一韵者也；冬韵攻冬与公东同，恭銎与弓穷同，此一韵分为二韵者也。若一以《七音》正之，不胜纷纭；又兼《礼部韵略》承用既久，

学者童习白纷（意思是：童而习之，白首纷纭），难以遽变。今但于逐韵各以类聚，注云："已上属某字母韵。"若首举文字，事干条例，须侯申明；至于泛作诗文，无妨通押，以取谐叶之便。

（《举要》一东"拢"字注）

"逐韵各以类聚"，注明"某字母韵"，是这本韵书表现"雅音"的基本方式。如一东和二冬就有"公字母韵"、"弓字母韵"、"雄字母韵"，八庚、九青、十蒸三韵里也有"公"、"弓"、"雄"字母韵；又如六鱼、七虞虽分为两韵，而字母韵都是"居""孤"。如果把《举要》的"字母韵"（不等于韵部）归纳起来，就能跟《中原音韵》十九韵部中的韵类找到对应关系。当然，拿《举要》和《中原音韵》相比，后者更能反映当时实际的语音面貌。

《中原音韵》成书于元泰定甲子年（公元1324年），作者周德清（公元1277年—1365年），字挺斋，江西高安人，他是音韵学家，也是文学家。《中原音韵》的独创性表现为：平分阴阳，入派三声，韵分十九部：

一东钟	二江阳	三支思	四齐微
五鱼模	六皆来	七真文	八寒山
九桓欢	十先天	十一萧豪	十二歌戈
十三家麻	十四车遮	十五庚青	十六尤侯
十七侵寻	十八监咸	十九廉纤	

《中原音韵》一反传统韵书的模式，书中收字5866个（有的本子为5869个），既不注反切，也不标字母，更没有释义。它在十九韵部之下分阴平、阳平、上、去四个声调，凡同音字类聚在

一起，各同音字组之间用圆圈隔开。关于它的音系，目前还有些不同的看法：

一、关于声母的分歧是：罗常培认为有二十声类，赵荫棠认为有二十五声类，陆志韦认为是二十四声类，杨耐思订为二十一声类。分歧的由来是“知章庄”三组字要不要拟为两套声母，见组要不要分两套，疑母要不要独立。③

二、入声是否消失的问题。本来，根据入派三声和其他一些资料看来，周德清所描写的这个音系，入声已经消失，是不应该有异议的。可是，陆志韦先生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说：“近来研究音韵的人老是肯定《中原音韵》之后，北方官话早已失去入声，那是无稽之谈。”④他断言“国语完全失去入声，至多不过二百年的事。到现在还有许多官话方言保存入声”，“入声的派入三声并不跟三声同音。”⑤

陆先生这样看待入声问题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周德清本人就说了一些语意含混的话。如说：“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者，以广其押韵，为作词而设耳，然呼吸言语之间，还有入声之别。”⑥这就是说，入派三声完全是为了押韵，口语中入声并未消失。而在“起例”中周德清又说了这样的话：“平上去入四声，《音韵》无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前辈佳作中间，备载明白，但未有以集之者，今撮其同声，或未有当，与我同志改而正诸！”这说明周德清在《音韵》中取消入声韵，将其派入三声，是以“前辈佳作”为根据的，在那些佳作中已经“备载”着入声应派入何声，周德清只不过“集之”而已。可是，前辈为什么要注明入声应派入另外三声之中呢？我们知道，曲文是要上口的，是要演唱给观众听的，必须要考虑艺术效果，假若当时任何

一种方言都还保存入声的话，入派三声就完全失去了根据，曲韵也就谈不上"共守自然之音"了，只能是没有群众基础的，是由"前辈"们主观臆造出来的曲艺语言。这样的舞台语言，不仅观众接受不了，而且一定是无规律的，不成系统的，周德清又怎么能"集之"起来派入到三声中去呢？问题只能这样解释，周德清所说的"呼吸言语之间还有入声之别"，不是指的全国各个地区，而是指有些地区。周德清是一位江西老表，他的"呼吸言语之间"无疑就"有入声之别"；另外，正如陆志韦所指出的："到现在还有许多官话方言保存入声"，更何况元代呢！只是别的官话方言还保存入声，完全不能拿来证明《中原音韵》也保存入声，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周德清的书名为《中原音韵》，就以为广大中原地区都已经消失了入声。

入声的消失必然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就地区而论必然是不平衡的。大概唐末北宋时代，入声已经开始起变化了，夏承焘先生曾写有《'阳上作去' '入派三声'说》⑦，认为唐宋词中已有"入派三声"之例，透露了入派三声的一点消息。元代韵书《中原雅音》也提供了入声已经消失的旁证材料（见李实《蜀语》引文），元末明初浙江人陶宗仪也说："今中州之韵，入声似平，又可作去声。"⑧明末清初的李实，在谈到四川方言中一些入声字的变化时，也追溯到《中原音韵》。他说："玉读若遇，蜀入皆读为去声。"⑨"十读若诗，杨升庵曰：十，寔执切，入声，亦可作平声。""《历代小史》录虞集（1272—1348）一诗，以术、蜀同鱼字押韵，《中原音韵》驳沈约（盈按：他以为《广韵》即沈约《四声谱》）颇多，然则今俗之声亦有所本矣。"⑩李实的话，可证西南官话入声的消失是受中原北音影响的结果，

他提到的这位虞集（字伯生，号道园，江西崇仁人，文宗时官奎章阁侍书学士），正是给《中原音韵》写序的人，他的诗中以“术”“蜀”同鱼部字押韵，跟《中原》的归字完全一样，当不是偶然的。

三、《中原音韵》究竟是代表中原地区的哪个地方的音系呢，它与现代普通话的音系是什么关系呢？一种意见认为《中原音韵》音系是元代的大都音系，现在的普通话音系就是由此演变而来；陆志韦先生不赞成这样的看法。他说：“中原音韵不能代表今国语的祖语”，“北平话跟周氏、樊氏（指樊腾凤）所记的方音十分相近，可是出于另一个邻近的方言。”⑪邻近的哪个方言，陆先生没有细说。

我赞同第一种意见。《中原音韵》根源于元曲的实际押韵，大都是元曲发展的胜地，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一点，只要读一读《马可波罗游记》就可获得鲜明的印象），元曲的杰出作家关汉卿（河北安国县伍仁村人）、马致远（号东篱，大都人）以及当时的著名杂剧演员珠帘秀、天然秀等人，都和大家有着密切关系，他们不用大都音押韵，不用大都音演唱，而用中原地区别的什么方言来写曲、来唱曲，这恐怕于情理上说不过去吧。

大都，即后来的北平、北京、元明清三朝都是全国政治中心，从大都音到北京音，一脉相承，如果我们能从大处着眼，而不去纠缠个别语音演变上的问题，这种性质的讨论几乎就是多余的了。周德清把清入声派入上声，而现代汉语这类字却分别归入四声，这种不一致并不能证明北京音的来源非大都音。一则周德清的归字不见得都很正确；再则当时入声字的消失可能只是基本

定局；另外，也不能排斥这类字的归类是以北方另一种方言作为依据的。总之，这个问题不影响《中原音韵》是大都音的根本结论。

我在本节开篇时说，《中原音韵》的影响小于《切韵》，这是就官方和广大士人的态度来说的。士人作诗，官方取士，总以《切韵》系韵书为正宗，他们对《中原音韵》系韵书很不以为然。可是，《中原音韵》在戏曲界的影响则是相当深远的。自从有了《中原音韵》之后，“作北曲者守之，兢兢无敢出入”。⑫就是南曲作家，如果在不应该违背《中原音韵》的地方离开了它，“辄笑为不识中州之音矣”。⑬

《中原音韵》在古代韵书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派别。周德清稍后，燕山卓从之著有《中州乐府音韵类编》，这部书刊在元代杨朝英的《朝野新声太平乐府》中，1958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隋树森的校订本，质量较高。大概因为卓从之的书名太长吧，所以它的简称有四种之多。如杨朝英称之为《北腔韵类》，也是园书目称之为《中州韵》，还有的记载简称之为《中原音韵类编》或《音韵类编》。这部书收字只有四千多一点，比《中原音韵》少一千多字。韵部的划分与各韵的结构跟《中原音韵》完全相同，只是平声调类除阴平、阳平之外，多出了一个“阴阳”类。如二江阳（每一同音组只举一字为例）：

〔阴阳〕　牕○床○／香○降○／雱○傍○／腔○强○／鸯○阳○／方○房○／昌○长○／汤○唐○／湘○详○／枪○墙○／匡○狂○／汪○王○／仓○藏○／荒○黄

“阴阳”调的意义在于说明阴调与阳调两两相配的关系。如“牕床”、“香降”、“雱傍”、“腔强”、“鸯阳”、“方房”，

都是两两相配。在这一点上，似乎卓从之与周德清不同，其实，周氏的传钞“墨本”也是这么办的。

距《中原音韵》五十二年之后，即明太祖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乐韶凤等人奉命编《洪武正韵》。王力先生说：“这是古今南北杂揉的一部韵书。”⑭这个意见很对。但是，在主张《中原音韵》保持了入声系统的同志看来，“它的语音系统与《中原音韵》是基本相合的，它的分立入声，是当时实际语音的反映。《中原音韵》对原来入声字的处理，只是按照词曲作品惯于将入声字派入三声的做法加以归纳而已，当时实际语言中还有入声韵存在。”⑮我不赞同《中原音韵》还有入声的看法，却赞同把这部“南北杂揉”的韵书与《中原音韵》联系起来考察。我以为这部韵书在两点上接受了《中原音韵》的影响，作为一本官韵来说，已经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了。

一、它跟《中原音韵》一样，对传统旧韵持批评态度。此书之所以名曰《正韵》，要“正”的就是旧韵。“凡例”表示：“沈约以区区吴音，欲一天下之音，难矣，今并正之。”他们敢于这样谈问题，是有朱元璋给他们撑腰的。朱元璋出身于大老粗，旧韵在他心目中没有什么地位。他也跟元朝人一样打官腔，说“韵学起于江左，殊失正音”。（《正韵·序》）

二、《正韵》正音的标准是什么呢？编者在“凡例”中讲得很明确：“以中原雅声正之。”朱元璋是安徽人，《正韵》的编者也有不少南方人，当时的首都又在南京，为什么要推崇“中原雅声”呢？这个问题他们从理论上作出了回答：

> 天地生人，即有声音，五方殊习，人人不同，鲜有能一之者……欲知何者为正声，五方之人皆能通解者，斯为正

音也。

（《正韵·凡例》）

这段话很重要，它证明编者们认识到中国的方言相当复杂，而这些复杂的方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无法统一的；另外，当时全国已存在一种“五方之人皆能通解”的“正音”，这个“正音”就是“中原雅声”，“五方之人皆能通解”的话不见得就是单一音系，但也够得上是“普通话”了，韵书的编者们要以“普通话”作为标准音，这种思想、主张是值得肯定的。由此也可以断言：今之普通话在元明时代已逐渐形成。

遗憾的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降低了这部韵书的价值。它平声不分阴阳，又设立十个入声韵部，有三十一个声母，保存全浊，这都不符合“中原雅声”，而韵分二十二（若算上、去二声、则为六十六），又继承了《中原》特色，这就是“杂揉”。它的“杂揉”与《切韵》的“杂揉”不同，它是在保存元以来北音的基础上“杂揉”了当时的南音，从基本点上看，它还是《中原音韵》系韵书，正因为如此，这部韵书的命运就跟《中原》一样，不要说清朝人瞧它不上眼，就是在大明王朝，“亦鲜有从者”，他们“从”什么呢？“独斤斤沈韵（指旧韵），尺寸不敢逾，即有疑其非者，亦固曰姑尔尔。”⑯千百万人的传统势力的确是难以改变的。

《洪武正韵》虽不受士人欢迎，却是“南曲协律的规范”。⑰明王骥德说：“余之反周（德清），盖为南词设也。而中多取声《洪武正韵》。”⑱说明戏曲家对此书是颇感兴趣的，这也是我们把它视为《中原音韵》系韵书的一个理由。

《洪武正韵》毕竟不就是曲韵书，为了适应南曲发展的需

要，朱权在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编写了《琼林雅韵》。此书平声不分阴阳，但跟《中原》一样，也分十九个韵部。王骥德说：“涵虚子（朱权）有《琼林雅韵》一编，又与周韵略似，则亦五十步之走也。”⑲

继《琼林雅韵》之后，又有《词林韵释》，也是平声不分阴阳，韵分十九。关于此书的作者，旧题“菉斐轩刊”，它跟《词林要韵》是一书二名呢，还是本各有别，说法不一。嘉庆庚午（公元1810年）秦恩复在《词林韵释》跋语中说：“吾乡阮中丞家藏有《词林韵释》一卷，一名《词林要韵》，不知何人所撰。”⑳据此记载，《韵释》与《要韵》乃一书二名，而《词林要韵》的作者为明代的陈铎，成书于1483年。元明时代，“曲”亦被称为“词”，此书名为词韵，也就是曲韵书。

王文璧的《中州音韵》是曲韵书南化的一部重要著作。大约刻于弘治十六年（1503）。王骥德《曲律》说：“吴兴王文璧，尝字为厘别，近槜李卜氏复增校以行于世，于是南音渐正。”关于《中州音韵》的底本、作者，现在还有一些疑问没有彻底解决，㉑但王文璧对此书进行过校正，进行过加工整理，这是不成问题的。我们感兴趣的是这部书所表现的语音系统。

《中州音韵》有二十九个声母，跟三十六字母相比，少了知彻澄娘疑喻敷等七个声母，跟《洪武正韵》相比，只少疑喻二母，可证它的声母系统跟《洪武正韵》非常接近，二书都保存了浊声母系统。也就是在这个主要点上，《中州音韵》不同于《中原雅音》（据邵荣芬研究，《雅音》有20个声母），也不同于《中原音韵》，因为北曲韵书浊声母已消失。

《中州》保存九个浊声母（并定奉从群床禅邪匣），大概就

是王文璧以北曲韵书为底本进行“厘别”的结果，所谓“南音渐正”，这是标志之一。《中州》全浊系统以“南音”为据，所以与《广韵》的全浊系统有别，我在《〈中州音韵〉述评》（《中国语文》1988年·5）中有论述，这里不细说。

《中州音韵》有44个韵母，与《中原音韵》很接近。按杨耐思《中原音韵》有46个韵母计，《中州》只少〔iɛu〕、〔io〕两个韵母。

《中州音韵》只有三个声调(平、上、去)，平声不分阴阳，与《中原雅音》一致。但三个声调不一定是实际语音的反映。

《中州音韵》有日本内阁文库本，有“啸余谱”本。现代戏曲家吴梅（1884—1939年，吴县人）任教北京大学时，将康熙时西吴张汉校本交北大出版社印出，也属于啸余谱本，另一种啸余谱本为万历年间古歙赵善达校。

南曲的发展、盛行，主要在江浙地区，南曲韵书的编者也多系江浙人。继吴兴（今湖州境内）王文璧之后，万历年间槜李（今嘉兴境内）卜氏又据王本《中州》改编为《中原音音问奇集》，嘉定（今上海市境内）人范善臻（字昆白）编《中州全韵》，依《中原音韵》体系，韵分十九部，所不同者，不唯平声分阴阳，去声亦分阴阳。

明代还有两部值得叙述的韵书是《韵略易通》和《韵略汇通》。

《韵略易通》作者兰茂，字廷秀，号止庵，云南人。此书成于明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它之所以特别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是因为在《中原音韵》系韵书中，它第一次用一首《早梅诗》标明了云南官话的声母系统：

东风破早梅，向暖一枝开，

冰雪无人见，春从天上来。

与《中原音韵》一样，全浊已经消失。不同的是卷舌声母（枝春上）已最后形成，疑母已经消失。在韵部方面，此书分为二十部，将《中原》的“鱼模”韵析为“居鱼”、“呼模”二韵，证明〔y〕韵于此时已经产生。二十部的名称是：东洪、江阳、真文、山寒、端桓、先全、庚晴、侵寻、缄咸、廉纤、支辞、西微、居鱼、呼模、皆来、萧豪、戈何、家麻、遮蛇、幽楼。《易通》平声也不分阴阳，入声分为十部，与阳声韵相配。

这里附带提一笔，明代还有一种《韵略易通》，作者为云南僧人本悟，成书于万历丙戌年（1586）。此书用传统三十六字母，显然与当时当地的实际语音不符。㉙

《韵略汇通》成书于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是在《韵略易通》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改编者毕拱辰，山东人。《汇通》有一个重要特点是分为十六个韵部：

东洪　江阳　真寻　庚晴　先全

山寒　支辞　灰微　居鱼　呼模

皆来　萧豪　戈何　家麻　遮蛇

幽楼

毕拱辰把三个收-m尾的闭口韵取消了，他说：“真文之于侵寻，先全之于廉纤，山寒之于缄咸，有何判别而更分立一韵乎！”（凡例）这证明到了17世纪，北方官话的-m尾已经不存在了。另外，此书坚持平分阴阳，却又保存入声，或许是受了《易通》的影响。

崇祯年间还有一部韵书叫《音韵日月灯》。此书既有等韵的

内容，又有韵书的作用。它所表现的音系"以《正韵》为主"，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中原系韵书。因此书在历史上有一定影响，下面简单介绍一下。

作者吕维祺（？—1641年）字介孺、号豫石，河南新安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其书成于明崇祯六年（1633年），吕氏时任南京兵部尚书。

《日月灯》分三部分，即《韵母》、《同文铎》、《韵钥》。《韵母》是同音字表，分上平、下平、上、去、入五卷，各韵所收之字按字母排列，母下分等。"每一母先画一圈，注'见一'等字，以定七音。旁注切脚，各字旁仍注'众''独'字。众者，一字数音也；独者，独音也。""盖以七音生切，切生字，字复生字，生生不穷，故曰《韵母》。"

他以四等与开发收闭相配。《同文铎》卷首"四等说：按见一系牙音第一等字，属开；见二系牙音第二等字，属发；见三属收；见四属闭。上二等其声粗而洪，下二等其声细而敛。其溪、群、端、知以下诸母俱仿此。"

《同文铎》的内容是对所收韵字注音释义。"引言"说："'同文'云者，谓点画、形象、音切、意义、皆有王制，班班可考。"如卷三七虞：

株，陟输切。木根也。徐锴"入土曰根，在土上曰株。"

又：株檽，短柱。

《韵钥》"则仍以《同文铎》所收之字，删其细注，但互注其字共几音几叶，以便检寻，故名曰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小学存目二》）

《日月灯》仍用三十六字母，一〇六韵，但音系则以《洪武

正韵》为宗，“其以五声七音分开合，核清浊，次开发收闭，而以母定等，以等定切，以切定音，以音定义，或析其形，或汇其义，或附以古韵古叶，或引《易》《诗》古传词赋，则以羽翼《正韵》而振其宣铎云尔。”（《同文铎·引言》）

注：

①《词林正韵》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②蒋希文：《中原雅音记略》。《中国语文》1978年第4期。何九盈《中原雅音的年代》。《中国语文》1986年第3期。

③请参阅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22—23页。李新魁：《中原音韵音系研究》第三章。

④陆志韦：《记五方元音》。《燕京学报》34期。

⑤陆志韦：《释中原音韵》。《燕京学报》31期。

⑥《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211页。

⑦《唐宋词论丛》8—13页。

⑧《南村辍耕录》卷四，14页：“虞邵庵先生集在翰苑时……偶谈蜀汉事，因命纸笔，亦赋一曲，曰：‘鸾舆三顾茅庐，汉祚难扶，日莫桑榆，深渡南泸，长驱西蜀，力拒东吴，美乎周瑜妙术，悲夫关羽云殂，天数盈虚，造物乘除，问汝何如，早赋《归与》。’盖两字一韵，比之一句两韵者为尤难。先生之学问该博，虽一时娱戏，亦过人远矣……今中州之韵，入声似平声，又可作去声，所以蜀术等与鱼虞相近。”（武进陶氏本。）又：《辍耕录》卷十七，12页“乐府中押逐赎属字韵者，盖中州之音轻，与尤字韵相近故也。”所谓“音轻”实指入声尾脱落。

⑨《中原雅音》玉音芋，也是入变为去。

⑩李实：《蜀雅》。《历代小史》为丛书，其中收有《辍耕录》一

书。

⑪《燕京学报》31期，67页。

⑫⑬明王骥德：《曲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112页。

⑭《中国语言学史》82页。

⑫李新魁：《古音概说》103页。

⑬吕维祺：《音韵日月灯·序》。

⑪项远村：《曲韵易通》2页。

⑫《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113页。

⑲同上书，112页。

⑳丛书集成初编本。

⑯关于《中州音韵》的参考文献有：赵荫棠《〈中原音韵〉研究》。日本佐佐木猛《〈中州音韵〉的性质》。《均社论丛》4卷1期。许德宝《〈中州音韵〉的作者、年代以及同〈中原雅音〉的关系》。《中国语文》1989年第4期。

⑪关于《韵略易通》的参考文献有：陆志韦《记兰茂〈韵略易通〉》。见《陆志韦近代汉语音韵论集》。另有群一和彗生的文章，分见于《中国语文》1986年第2期及1988年第5期。

第十七节　元明等韵学

在这一节里，要评介十一种等韵学著作。其中《经史正音切韵指南》是元朝人刘鉴写的，成书于元顺帝至元二年（公元1336年）。其余十种都是明代的作品。明代的等韵学著作当然不只这

十种，当时的等韵学相当发达，我们只不过谈几种有代表性的著作，足以说明当时等韵学的一些特点就行了。

刘鉴说：他的“《经史正音切韵指南》与韩氏《五音集韵》互为体用，诸韵字音，皆由此韵而出也。”（自序）《五音集韵》比刘鉴的《指南》要早一百多年，后者既是以前者为依据，它当然就不可能如实反映元末的语音系统了。

《切韵指南》分十六摄，二十四图。与《四声等子》相比多出了四个图，就是将江摄从宕摄中独立出来，立为“江摄外一”，将梗摄从曾摄中独立出来，立为“梗摄外七开口呼，梗摄外七合口呼”两图；咸摄《等子》只有一图，《指南》分为两个图。

《指南》的语音系统虽说是以《五音集韵》为依据，实际上更接近于《四声等子》，如咍泰、鱼虞等韵，《五音集韵》并未合并，而《指南》跟《等子》一样合并了；元魂二韵，《五音集韵》同用，刘鉴不赞同，他说：“及乎元魂二韵，声相背戾而反通押，是何其若此之不伦也。”因此，《指南》跟《等子》一样，把元韵并入仙韵；只有江阳二韵，《指南》不从《等子》合并，而从《五音集韵》分立。

在声母方面，《指南》仍用36字母，但卷首的“交互音”说：“知照非敷递互通，泥娘穿彻用时同，澄床疑喻相连属，六母交参一处融。”这个“交互音”如果为刘鉴本人所作，说明实际上只有30个字母了。因为知彻澄已与照穿床合一，非敷合一，疑喻合一，简少了六个声母。

在声调方面，刘鉴还谈到了浊上变去的问题。他说：“时忍切肾字，时掌切上字，同是浊音，皆当呼如去声，却将上字呼如清音赏字；其蹇切件字，其两切强字，亦如去声，又以强字呼如

清音䃁（丘仰切）字，然则亦以时忍切如哂字，其蹇切如遣字，可乎！”（自序）他的意思是：浊上变去是通例，如“肾”为古禅母上声，“件”为古群母上声，到刘鉴时皆“呼如去声”了。按通例，“上”字、“强”字也应当读为去声，可是，“上”可读成“赏”，清音，上声；“强”读成“䃁”，也是清音，上声，这正好是两个变例。“上”字在现代汉语中还有上去两读，“强”字作为“其两切”也有上去两读。

谈到明代等韵学著作，首先要介绍《青郊杂著》。作者桑绍良，河南范县人，大约生于明正德末年，卒于万历年间。桑氏的语音系统无疑为北方官话音系。有声母二十，用一首《圣世诗》作为代表字：

国开王向德　　天乃赉祯昌

仁寿增千岁　　苞磐民弗忘

诗，的确不敢恭维。绍良自己也承认：“齐序虽得，而诗意牵强不畅。”不过，自我欣赏之情又溢于言表。他说：“精思所致，自与古人契合。若兰君者，岂非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邪？”他在读到兰茂《韵略易通》之前，已得出二十母的结论。这种“契合”，说明二十母符合一定地区的实际语音。桑绍良这首诗约写于万历九年（1581），上距兰茂《早梅诗》（1442）已有一百三十多年。《圣世诗》与旧声母对应关系是：

见溪影晓/端　　透泥来/知彻

日审/精清心/　　帮滂明非微

《青郊杂著》有十八个韵部，四十六个韵母，六个声调，“两平、上、去、两入是也。”入声的设立可能是存古。因为“去入二声，俗呼相似。”口语中可能已不存在入声。下面是《青郊杂

著》的韵母表：

	开	齐	合	撮
东部			uŋ	yŋ (iuŋ)
江部	ɔŋ	iɔŋ	uəŋ	
侵部	əm	iəm		
覃部	am	iam	uam	
庚部	əŋ	iəŋ	uəŋ	yəŋ(iuəŋ)
阳部	aŋ	iaŋ	uaŋ	
真部	ən	iən	uən	yən
元部	an	iɛn	uan	yan
歌部	o		uo	
麻部	a	ia	ua	
遮部		iɛ		yɛ
皆部	ai	iai	uai	
灰部			uei	
支部	ï	i		
模部			u	
鱼部				y
尤部	əu	iəu	uəu	
萧部	au	iau	uau	

桑绍良的重要贡献就是明确提出了“四科”。他说：“四科者，音有四等：重，次重，轻，极轻是也。如元部官、捐、干、坚同为宫音，而重轻不同，他韵准此。然每部内有四科全具者，有三科、二科、一科者，不可一律论。”他的《一十八部七十四母纵横图》，共有四张图。第一图为重科，第二图为次重科，第

三图为轻科，第四图为极轻科。“四科”就是后来的四呼。重科相当于合口呼，次重科相当于撮口呼，轻科相当于开口呼，极轻科相当于齐齿呼。桑绍良在朴隐子、潘耒之前，于16世纪下半期就能明确划分四呼，这是值得郑重表彰的。

明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金台（即北京）布衣徐孝写了一本《司马温公等韵图经》，这个《图经》附于张元善编的《合并字学篇韵便览》中，一般图书馆已经见不到此书了。陆志韦先生在《燕京学报》32期对《等韵图经》作了详细介绍，可以参阅。

此书打着司马温公的旗号，但与司马光没有任何关系。它是在归并《切韵指南》韵摄的基础上写成的，所反映的语音系统跟《切韵指南》大不一样。它分十三韵摄，共二十五个图。

每图横列十五行，分列二十二字母。其中非敷微列在帮滂明之下，照穿稔审四母列在精清囮心四母之下。其实直接分列22行，更为明确。

这二十二母之中，那个囮母“见居吴楚之方”，微母在韵图中只有一个带方框的“纹”字（见臻摄），敷母在韵图中只有带方框的“非”字（见垒摄）和“纤”字（见流摄），在当时的北方官话中，这三个声母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司马温公等韵图经》有效的声母只有十九个，与《早梅诗》相比，少了一微母，微母已由〔v〕变为〔w〕，并入影母，即零声母。下面是十九母的拟音：

k（见） k′（溪） x（晓） o（影）

t（端） t′（透） n（泥） l（來）

ts（精） ts′（清） s（心）

tʂ（照）　tʂʻ（穿）　ʂ（审）　ʐ（稔）

p（帮）　pʻ（滂）　m（明）　f（非）

影母下面列有日母“尔二而”等字，这也是值得注意的。李思敬说：“万历时代的《等韵图经》把儿系列字列入影母，而且那时已经有了‘儿化音’，所以明代晚期儿系列字也肯定已经是〔ə〕音值了。”（《汉语“儿”〔ɚ〕音史研究》33页）

各图均分上中下三等。上等列洪音字，中等只列照系字（卷舌声母），下等为细音字。如止摄开口图，上等列“此次慈”，中等列“蚩齿尺池”，下等列“妻泚砌齐”。上等读〔ʅ〕，中等读〔ʅ〕，下等读〔i〕。下等字一般为颚化音，非母字列在下等，则不伦不类。

徐孝的十三摄是：通、止、祝、蟹、垒、效、果、假、拙、臻、山、宕、流。除祝摄为独韵，其余十二摄均分开合，所以有二十五个图。与刘鉴的十六摄相比，有并有分。并江于宕，并曾梗于通，并深于臻，并咸于山，共合并五摄。－m尾已消失。徐孝又从止摄分出垒摄，从假分出拙摄。祝摄相当于遇摄。徐孝的十三摄与后来清代早期就流行的十三辙相当。

1.通——中东辙　　2.止——一七辙

3.祝——姑苏辙　　4.蟹——怀来辙

5.垒——灰堆辙　　6.效——遥条辙

7.果——梭坡辙　　8.假——发花辙

9.拙——乜斜辙　　10.臻——人辰辙

11.山——言前辙　　12.宕——江阳辙

13流——油求辙

在声调方面，分平声、上声、去声、如声。“如声”就是阳

平。"凡例"说："设如声者，谓如平声也。"

万历三十一年（1603）出现了两部颇有影响的等韵学著作，这就是《交泰韵》、《字学元元》。两书的语音体系大不相同。

先说《交泰韵》。此书作者吕坤(1536——1618年)，别号新吾、心吾，晚年又号抱独居士，河南宁陵人，明末思想家。曾任山西巡抚，刑部左侍郎。万历三十一年（1603）撰《交泰韵》凡例与总目，并自序其研治音韵学之历程。"全书虽不具，而无一体不括凡例中，无一字出于总目外。观者持此以衡诸家，而心目自豁然矣。韵名'交泰'，以上下相呼应也。"（自序）

所谓"上下相呼应"，这是他改良旧反切的理论基础。具体办法是：平声切下字分阴阳；上去二声以本声为母；平入共用切上字，"平韵用入为子（指切上字），地气上交；入韵用平为子，天气下交，地天泰。母（指切下字）是平上去入，顺而下行；子是入上去平，逆而上行，亦地天泰。"平与入互为终始，故"上下相呼应。"下面举几个反切为例：

同：徒红切。改为他红切。

通：他红切。改为他翁切。

宠：丑陇切。改为楚陇切。

送：苏弄切。改为素瓮切。

空：苦红切。改为酷翁切。

酷：苦沃切。改为空尾切。

从他对切上字的改动，可以看出浊声母已消失，知照已合流，实际声母只有十九类：

k　k'　x　o

t　t'　n　l

ts ts' s

tʂ tʂ' ʂ ʐ

p p' m f

这个声母系统与《等韵图经》一样。

《交泰韵》有21个韵部：东、真、文、寒、删、先、阳、庚、青、支、齐、鱼、模、皆、灰、萧、豪、歌、麻、遮、尤。

《交泰韵》反映了当时中州地方的实际口音。万历十四年（1586）吕坤在北京任吏部郎中时，曾与天宁寺上座慕勖讨论音韵。慕勖和尚是守旧派。他说："平生苦心三十年，自谓深得七音三十六母之精，十三门十六摄之妙，而公更简径明切，我学非耶？"吕坤因为以口语为据，所以宣称："我无法门，信口便是法门……夫声出于天而字从之，率然自然，人无毫与。我天声，汝人声也。我求近而汝求诸远，我取易而汝取诸难也。我索一而汝索诸万，我得之不思而汝得之熟诵也。我重阴阳而汝不论阴阳，我反切平上去入而汝不问平上去入也。"所谓"天声"即存在口头的天然的活语音，所谓"人声"在这里是指脱离口语的靠死记硬背的旧读。

《交泰韵》在明末清初影响较大。方以智的《切韵声原》、林本裕的《声位》、彝族诗人高奣映的《马氏〈等音〉序》都肯定《交泰韵》"废门法"。清初朴隐子作《反切定谱》更得益于《交泰韵》。他说："……而于用母之法，终难考其定理。及得吕坤《交泰韵》，乃以其法参之，三年豁然有悟。"《四库全书总目》由于立场保守，认为"其分部纯用河南土音，并盐于先，并侵于真，并覃于山，支微齐佳灰五部俱割裂分隶，则太趋簡易。于无入之部强配入声，复以强配之入声转而离合平声之字，

则太涉纠缠，未免变乱古法，不足立训矣。”（385页）盐侵覃之归并于先真山，说明-m尾已变为-n尾，无入之部配入声，说明入声已经消失或是与阴声音近。

1927年，王力先生根据吕氏父子所写的《小儿语》、《续小儿语》写了一篇《三百年前河南宁陵方音考》，对于我们研究《交泰韵》音系有参考价值。

再说《字学元元》。此书作者袁子让，湖南郴州人，万历辛丑（1601）进士，授四川嘉定（今乐山一带）知州，后入京，官兵部职方司员外郎。袁子让将此书命名为“字学”，因其中不单是论等韵，也讨论“六书”（卷七）；之所以叫“元元”，是作者认为“天有元声（指韵），地有元音（指声）”，以往的韵图多音声不正，他要“扶其元”、“溯其元”、“清其元”，“是集调‘元’者也。”从这样的目的出发，此书不只是有等韵图表，还有大量分析音理、议论诸家得失的文字。资料相当丰富。

《字学元元》所反映的语音系统跟《交泰韵》不同。它在声母方面拘守三十六字母，在韵摄方面取舍于《四声等子》和《洪武正韵》之间，分为二十二个韵摄。

1．从遇摄分出模摄。从《正韵》而不从《等子》；

2．从蟹摄分出齐摄。从《正韵》而不从《等子》；

3．从效摄分出宵摄。从《正韵》而不从《等子》；

4．从山摄分出天摄。从《正韵》而不从《等子》；

5．曾摄与梗摄分立。从《等子》而不从《正韵》；

6．假摄《正韵》分为麻、遮两韵，袁子让合而为一。

赵荫棠批评它是“非驴非马的东西”[①]，不无道理。袁子让既要存旧，又想标新，结果就弄得不旧不新。在四等的划分上，

也表现了同样的态度。此书存四等之名，行上下两等之实。“凡例”说：

> 字有开、发、收、闭（即一二三四等），开、发为上等，收、闭为下等。切脚（即反切）下字逢上等切上字，逢下等切下字，所谓上下从等也。

上下等又分开合，相当于后来的“四呼”这足以表明旧等韵图的四等说已经不能表现当时的实际语音了。

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叶秉敬（浙江衢州人）写了《韵表》一书。这部书依平水韵列表。如第一韵表：东一韵要；第二韵表：冬一韵要；第三韵表：江一韵要，江二韵要；第四韵表：阳一韵要……这样的韵表共有三十。每一韵表之内又分上下二等。

叶秉敬主张韵分二等。他说：“每韵依四派祖宗，当有二表。前表庚干、经坚，后表觥官、扃涓。”实际上叶氏所说的“四派”乃是“四呼”的问题。新的概念往往孕育在旧的名称之中，这是常有的现象。在这里，叶秉敬用“庚干”代表开口呼，“庚”在中古属开口二等，“干”在中古属开口一等，到这时变为开口呼了；“经坚”代表齐齿呼，“经坚”在中古都是开口四等字，这时变为齐齿呼了；“觥官”代表合口呼，“官”在中古是合口一等，“觥”在中古是合口二等，这时变为合口呼了；“扃涓”代表撮口呼，“扃涓”在中古都是合口四等，这时变为撮口呼了。可见，叶氏所说的“韵依四派祖宗”，实指开齐合撮四呼，“二表”是指开、齐一类，合、撮一类。

新的语言现象要求用新的概念来表达。现代汉语中四呼的名称在《韵法直图》中已经出现了。

《韵法直图》是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梅膺祚从新安（安徽歙县）得到的[②]。共有四十四图，每一图就是一韵，以起头第一个字作为韵名，如公韵、庚韵……图中分开、齐、合、撮等十呼。今按呼将四十四图分列于下：

开口呼

7．庚梗更格　　8．根頣艮〇
23．该改盖〇　　31．歌哿箇〇
34．干秆干葛　　41．高杲诰〇
43．钩苟构〇

齐齿呼

3．骄矫叫〇　　4．基己寄吉
9．京景敬戟　　10．巾紧靳〇
24．皆解戒〇　　26．嘉贾驾〇
28．迦〇〇〇　　35．坚茧见结
42．交绞教〇　　44．鸠九救〇

合口呼

1．公䡗贡谷　　15．裩衮睔骨
16．光广诳郭　　71．觥矿〇国
19．规诡贵〇　　20．姑古顾〇
22．乖拐怪〇　　25．瓜寡卦〇
30．戈果过〇　　32．官管贯括
37．关〇惯刮

撮口呼

5．居举据〇　　7．弓拱供匊
13．钧窘郡橘　　29．靴〇〇〇

33. 涓卷绢厥

以上开口呼七图，齐齿呼十图，合口呼十一图，撮口呼五图。另有：

混呼两图：14. 扃炯褧䀹，18. 江襁绛觉。所谓"混呼"，对十四图来说，可能是合撮混，对十八图来说，可能是开齐混。

还有九个图的名称是：

2. 冈晄扛各　平入开口呼，上去混呼。

21. 赀子恣〇　咬齿呼。

27. 奢䯀肜〇　舌向上呼。

38. 艰简谏戛　齐齿卷舌呼。

40. 监减鉴夹　齐齿卷舌而闭。

11. 金锦禁急
12. 簪〇谮戢
36. 兼检剑颊
39. 甘感绀阁
（以上四图）闭口呼。

所谓闭口呼是指收－m尾的韵。－m尾此时已脱落。

《直图》的呼既不同于宋元时代的开合二呼，又不同于清初出现的四呼。《直图》分呼的标准比较乱，它在以介音有无作为分呼标准的同时，又运用了其他标准，如闭口韵称之为"闭口呼"，庚青、江阳二部都有"混呼"（图14、18），实则庚青混呼应归撮口，江阳混呼应归齐齿；所谓"咬齿呼"仅见支思韵，只有一个韵母〔ï〕，韵母制定者认为与开口呼不同，就设立了"咬齿"这个名目，"齐齿卷舌"也只有一个韵母，即寒山部的〔ian〕；"齐齿卷舌而闭"只有监咸部的〔iam〕；"舌向上"只有家麻部的〔a〕韵母。这些呼的设立，恐怕主要是韵图的设

计者音理不清；对于南方人来说，要区别呼的不同，比北方的桑绍良、徐孝要困难得多。南方复杂的方言土语为废等分呼带来了困难，明末的等韵学家还处在摸索阶段。

《韵法直图》有四十四个韵母，按原十呼分列：

	开	齐	合	撮	混	咬齿	舌上	齐卷	齐卷闭	闭
1.东钟			uŋ	iuŋ						
2.江阳	aŋ		uaŋ		iaŋ					
3.萧豪	au	iau,iɛu								
4.齐微		i	ui							
5.鱼模			u	y						
6.庚青	əŋ	iŋ	uəŋ		iuəŋ					
7.真文	ən	in	un	yn						
8.侵寻										
9.支思						ï				im,əm
10.皆来	ai	iai	uai							
11.家麻		ia	ua				a			
12.车遮		ie		ye						
13.歌戈	o		uo							
14.桓欢			uon							
15.先天		iɛn		yan						
16.寒山	an		uan					ian		
17.监咸									iam	am
18.尤侯	ou	iou								
19.廉纤										iɛm

与《中原音韵》相比，《直图》少了〔ei〕、〔io〕两个韵母，与《中州音韵》相比，韵母数目一样，但少一个〔ei〕，多一个

〔iɛu〕。《中州》萧豪的〔iou〕已与〔iɛu〕合流，而《直图》齐齿呼有“骄矫叫”（第三图）与“交绞教”（第四十二图）的对立，说明三四等（宵萧）与二等（肴）的主元音不同。

《直图》保存入声，与阳声相配。

《韵法横图》又名之为《切韵射标》。作者李世泽（即李嘉绍，南京上元人）。《横图》与《直图》在排列方式上不一样，音系也有些差异，如《横图》仍保留三十六母，《直图》只有三十二母（知彻澄娘并入照穿床泥），呼的名称取消了咬齿呼、舌向上呼。李世泽的父亲李登（字士龙，号如真）也是音韵学家，著有《书文音义便考私编》。

上述七种等韵著作都出现在万历年间，说明万历年间的等韵学颇为发达；同时，也说明语音变了，等韵学的内容也跟着发生了变化。所以仅就等韵学分期的话，明清等韵学应放在一起来叙述，因为它与宋元等韵学颇为不同。明末崇祯年间还有两部值得叙述的等韵学专著，就是陈荩谟的《皇极图韵》和方以智的《切韵声原》。

陈荩谟，字献可，又字益谦，号磏庵，浙江槜李（今嘉兴）人，黄道周（1585—1646）弟子。他的《皇极韵图》成于明崇祯五年（1632），其中包括《四声经纬图》和《转音经纬图》。

陈氏在明末清初是一位相当有影响的等韵学家。刘献廷《广韵杂记》卷三说：“槜李陈啸（磏）庵先生著有《皇极统韵》一书，亦精唱韵，余虽得一晤，而不及久作盘桓。其后访之缁流，竟无一人矣。”

方以智《切韵声原》说：“陈磏庵《皇极纵横图》横列三十切母，纵约为三十六韵”。方氏的“内外八转，以《洪武正韵》

酌陈礻肃庵三十六旋"，对闭口韵的处理也是"酌之礻肃庵而主《正韵》者也。"

明末著名戏曲家沈宠绥（？—约1645）在《度曲须知》中对陈氏的《经纬图》有详细评介。他的儿子沈标说："先君子读书赏音，雅有神解，尝得槜李陈子《四声经纬图》，为之反复紬绎，以韵偭母，适得翻切天然谐合之妙，虽为此图者，亦未能洞晓本末至此也。"沈宠绥本人也说："近得槜李陈献可所著《皇极图韵》，中有《四声经纬》及《转音经纬》之图，盖体释氏等韵诸编，翻为简径捷法。凡切脚转音，不烦口调，按图历历可稽。"

下面将陈氏三十六韵按他的十呼分列，并拟测其韵母音读。

合口：东　模　乖　灰　桓　还　戈　光

uŋ　u　uai　ui　uɔn　uan　uo　uaŋ

撮口：冬　鱼　文　元

yŋ　y　yn　yan

齐齿：青　支　皆　齐　真　先　萧　尤

iŋ　ï　iai　i　in　iɛn　iau　iou

开口：庚　咍　寒　歌　唐　豪　侯

əŋ　ai　an　o　aŋ　au　ou

闭口：侵　覃　盐

im　am　iɛm

əm

合口附开口：魂　　　齐齿附合口：麻

un　　　ia

ən　　　ua

齐齿卷舌：删　　　　齐齿附撮口：遮

ian　　　　ie

　　　　ye

混呼：肱　　阳

uəŋ　　iaŋ

iuəŋ

陈氏有四十一个韵母，与《直图》相比，麻韵无〔o〕，萧韵无〔iɛu〕与〔iau〕对立，覃韵无〔iam〕。

沈宠绥对陈献可的《经纬图》在大力肯定的同时，也有批评：

> 但按此图繇来，原不过仍唐韵以叶梵音，未尝为填词度曲作地，细举图中之字与图位之音，律以《洪武》《中州》声韵，率多牵强未谐。即如庞、傍，东、冬，本属同音，今则开、齐、合、撮，各标一韵（盈按：陈氏傍字归唐韵，属开口；庞字归阳韵，属混呼，实为齐齿；东合冬撮），江阳通韵口法开张，今则光合唐开与阳混，派钤三等（盈按：所谓"三等"即合、开、混三呼）。况疑娘禅床四母，字音先与图音不肖，故下边三十六子，如敖、昂、尼、狞、船、垂等字，亦并涉东南土语。其他铿、梗、恒、庚之犹宗沈约讹音，而与两韵书相背者，又何堪一一枚指哉！然图位之字虽有讹填，而图位之音天然常正，五方无殊响，千古无异音，譬如张公头错带（戴）李公帽，讹在帽不在头也。
>
> （《度曲须知·经纬图说》）

沈氏的批评大多是对的。但"铿、梗、恒、庚"四字《广韵》属开

口，明代北音也归开口（如《等韵图经》），陈献可归开口并不是"宗沈约讹音"。沈氏一定要依《中原》庚叶京、铿叶轻、恒叶刑、梗叶景，拿《中原》来要求陈氏，这是不恰当的。《经纬图》原本不是为曲韵而作。

陈荩谟的分呼受到潘耒的批评。潘氏说："陈氏《统韵》之图，但取纵横三十六（盈按：即纵列三十六韵，横列三十六字母），以根之开口附于昆之合口（盈按：即魂韵合口附开口），家之齐齿附于瓜之合口（盈按：即麻韵齐齿附合口），又别立混之一呼，以姜阳之齐齿，肱扃之合口、撮口当之（盈按：即混呼之肱与阳韵），谬误滋甚。"（《类音》卷一）又说："后之明音韵者，多苦等韵之烦碎，而别为图谱，如《字汇》之末，有《横》《直》二图，陈氏《皇极统韵》有《经纬图》，皆不用门法，直捷明了，贤于等韵数倍。所遗憾者，不知每类之各有四呼，不可增减，而仅就有字之呼叙次之。《直图》则各类各呼，隔别不贯。《横图》贯矣，而每类或二呼，或三呼，则减于四。又附金于昆君根巾之下，附兼于官捐干坚之下，又以肱扃姜为混呼，而别立卷舌之名，则增于四。《经纬图》大概与之雷同，不去知彻澄娘，而并昆根为一格，家瓜为一格，迦靴为一格（盈按：即齐齿附撮口），肱絅为一格，以凑三十六之数，牵合补苴，亦多可议。"（《类音》卷二）潘氏对《直图》、《横图》、《经纬图》分呼的批评相当正确，但各类四呼"不可增减"一语欠妥，桑绍良的"四科""不可一律论"是正确的。另外，《横图》"附金于昆君根巾之下，附兼于官捐干坚之下"，也无可非议。"金"（侵寻）、"兼"（廉纤）均收－m尾，附于－n尾，这是语音变化的结果。

方以智（公元1611年—公元1671年），字密之，安徽桐城人，明季四公子之一。明亡后，于清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出家为僧。方以智是明末的风云人物，十七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又是一位很有影响的等韵学家和词汇学家。他的《切韵声原》作于明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③。

有声母二十，按发音方法分为初发、送气、忍收三类：

帮（发）滂（送）明（收）

见（发）溪（送）疑（收深发）晓（浅发送）

夫（送） 微（收）

端（发）透（送） 泥（收）

精（发）清（送） 心（收）

知（发）穿（送）审（收）

来（收余）日（收余）

方以智将声母分为发送收，他说是受到《西儒耳目资》的启发“愚初因邵入，又于‘波梵摩’得发送收三声，后见金尼(阁)有甚次中三等，故定发送收为横三，啌嗤上去入为直五，天然妙叶也。”实际上金尼阁所说的“甚次中”是韵母问题，与声母无关。方氏大概并未弄懂“甚次中”是什么意思。

所谓“啌嗤上去入”是五个声调。以“啌”代表阴平，“嗤”代表阳平，“不以混开合之阴阳，清浊之阴阳也。”

《切韵声原》分十六摄，每摄一图，每图上端横列二十母，二十母又分“宫倡”、“商和”两类。“凡音在唇腭中谓之宫音穿齿外皆谓之商。”（帮滂明见溪疑晓夫微为宫倡，端透泥来精清心知穿审日为商和）声母之下按四呼（翕辟穿撮）、五声列字。

翁雍　uŋ　iuŋ

乌于　u　y

噫支　uei　i　ï　əɚ

隈挨　uai　ai　iai

昷恩　un　ən　in　yn

欢安　uɔn　(an)

弯闲　uan　an　ian

渊烟　iɛn　yan

呵阿　uo　(io)　o（今苏州、江阴、吴兴"靴"读—io）

呀挪　ua　ia　ie　ye

央汪　uaŋ　iaŋ　aŋ

亨青　ɛŋ　iŋ　uəŋ　iueŋ

爊夭　au　iau

讴幽　ou　iou

音唵　əm　im　am

淹咸　iɛm　iam　(am)

方以智的韵母系统与《经纬图》的系统基本相同。他的"翁雍"相当于《经纬图》的"东""冬"。"乌于"相当于"模""鱼"。"噫支"相当于"灰""齐""支"，不同之处是方以智"儿为独字，姑以人谁切附此"，〔ɚ〕韵已经产生，《经纬图》无儿韵。"隈挨"相当于"乖""皆""咍"。"昷恩"相当于"魂""真""文"。"欢安"相当于"桓""寒"，"弯闲"相当于"还""删"，不同之处是《经纬图》以"寒还删"同一主元音，桓韵相当于《中原》的"桓欢"，方以智既以"安"配"欢"，"弯闲"中又重出"安"韵字，并在"欢安"

韵中注明："干读叶姧，则入删韵；丹餐叶删韵"，删韵在弯闲韵中，可见"欢安"中的〔an〕实无存在的必要，这种纠葛说明欢安与弯闲的区别已经很勉强，可能带有存古的主观色彩。"呵阿"相当于"戈""歌"，不同之处是方以智的晓母下有一个"靴"字。这个字《中原》、《中州》、《经纬图》都归车遮部。前二书读〔luɛ〕，《经纬图》读〔ye〕；方以智的"呀挪"韵又以"靴"为"穴"之阴平，所以呵阿韵的〔io〕实际上可以取消。"呀挪"相当于"麻""遮"，也就是家麻、车遮二部，方以智合为一摄。"央汪"相当于"光""阳""唐"。"亨青"相当于"庚""青""肱"。"爊夭"相当于"萧""豪"。"讴幽"相当于"侯""尤"。"音唵"相当于"侵""覃"。"淹咸"相当于"盐"。不同之处有二：《经纬图》的覃韵只有一个韵母，而这些韵字在《切韵声原》里有〔am〕〔iam〕两个韵母，而且〔iam〕归淹咸韵；另外，〔am〕既见于音唵，又见于淹咸。

《切韵声原》还收录了所谓《徽州传朱子谱》。方以智说："㧑谦门人柴广进云：'朱子定本，此黎美周所藏者。'后见□庵许邈所抄，即此《谱》也。"

㧑谦即赵古则，元末明初浙江人。这个《谱》分十二韵摄：

1.翙　东冬

2.逋　模鱼

3.陂　齐微　知迟　支缁　赀差

（舌上）（正齿）

4.牌　灰皆

5.宾崩　青真　盆文　庚僧

6. 波　（独韵）

7. 巴　（独韵）

8. 邦　阳方忘　光匡

9. 包　豪宵

10. 豪　侯尤

11. 鞭　仙元　廉纤

12. 班　寒山（寒叶桓）监咸

此谱可能是托朱熹大名以重其说。罗常培认为是“后人由新安而想到朱熹，于是牵强附会的认为这是‘徽州所传朱子谱。’”不过，这个《谱》对研究明代徽州方言应该有意义。如“宾崩”（真登）不分，—m尾消失，寒山与桓欢合流，都是实际语音的反映。

在本节的结尾，我们介绍一下明末西洋传教士对汉语语音的研究，主要是介绍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

1.《西儒耳目资》成书过程

这是一本用罗马字注音供西洋人学习汉语、汉字用的音韵学著作。作者为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1577—1628）。

金尼阁，字四表，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来华，一说三十三年（1605）来华。1624年（天启四年）应山西绛州韩云之请，往山西传教。半年后，去陕西传教，途经新安县（今属洛阳市），结识音韵学家吕维祺，讨论音韵。不久，来到陕西三原，结识王征，《耳目资》最后定稿，此时为天启五年。王征请求张问达父子（陕西泾阳人）出资刊刻，后来杭州也有刻本问世。王征《西儒耳目资释疑》说：“是书也，创之者四表金先生，赞成者豫石（吕维祺的号）吕铨部，景伯（韩云的字）韩孝廉、子建卫文学，

而冢宰诚宇张先生（即问达）与其季子敬一（名缅芳）则所为捐赀刻传之者，余小子征特周旋终其役耳。至于一字一音，一点一画，细加校仇，而毫不致有差遗者，则金先生之门人鼎卿琢子之功为最。书作于乙丑年（天启五年，1625年）夏月，于丙寅年（1626年）春月告竣。”

金尼阁编著《耳目资》，不仅得到中国学者的直接帮助，也吸取了利玛窦等人的研究成果。《耳目资》集中地体现了明末西洋传教士研究汉语音韵的光辉成就，是中西两种文化相结合的典型。

2.《耳目资》的内容

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耳目资》共分三册。第一册名叫“译引首谱”，“译者资耳，引者资目……‘首谱’有二：图局，问答。”所谓“图局”，包括“万国音韵活图”、“中原音韵活图”、音韵经纬总局”、“音韵经纬全局”等。“总局”是汉语声韵拼音表，“全局”是汉语声韵调配合表。所谓“问答”是用“中士”问、作者答的形式讲解拼音知识，是有关理论问题和技术问题的说明，作者对用西洋字给汉语注音中的种种问题都有非常详细的解说。今天读来，仍会感觉到金尼阁的一般语音知识和汉语音韵方面的修养都是相当杰出的。

第二册名叫“列音韵谱”。“音韵谱”是按摄排列的同音字表，将本书所收汉字全依音序排列，从拼音查汉字，“是为耳资”。

第三册名叫“列边正谱”。何谓“边正”？作者在《列边正谱问答》中说：“字体多双，则有边有正。边者在字之傍者是，边字之外，或在左右、上下、四方者俱曰正。”“边”就是偏旁，也是部首，一个字除去偏旁的部分就是“正”。如“炮”字，火

是边，包是正。此谱将汉字按笔画、部首排列，便于从汉字查拼音，“是为目资”。

金尼阁的罗马注音字母有声母二十，叫做“同鸣字父”。分“轻”“重”两类。送气的为重，不送气的为轻。他选用了二十个汉字作为“字父”代表字，并用罗马字注音（这里改用国际音标）。

百　魄　麦　弗　物

p　p′　m　f　v

德　忒　搦　勒

t　t′　n　l

则　测　色

ts　ts′　s

者　扯　石　日

tʃ　tʃ′　ʃ　ʒ

格　克　黑　额

k　k′　x　ŋ

额的标音金氏原作g，各家多以〔ŋ〕代之，这是对的。通观金氏的论述和归字，g是舌根音，有人当作零声母来处理，不恰当。

元音有五个，叫做“自鸣字母”。

丫　额　衣　阿　午

a　e　i　o　u

金氏以“自鸣”、“同鸣”作为元音与辅音的区别是有道理的。“开口之际，自能琅琅成声，而不籍他音之助，曰自鸣；喉舌之间若有他物厄之，不能尽吐，如口吃者期期之状，曰同鸣。夫同鸣者既不能尽，以自鸣之音配之，或于其先，或于其后，方能成

閗声焉。”（《译引首谱·问答》）

《耳目资》有五个声调。“平声有二，曰清曰浊；仄声有三，曰上、曰去、曰入。五者有上下之别，清平无低无昂，在四声之中，其上其下每有二，最高曰去，次高曰入，最低曰浊，次低曰上。”清平、浊平，就是阴平、阳平。他说：“余曾见有一书，分称阴阳者，则与清浊之义相合也。”（《译引首谱。问答》五十一页，即149页）他的五声有两种排列法。一是以清平居中，则为：入、去、清、上、浊。一是以清平开头，则是“曰清、曰去、曰上、曰入、曰浊，不高不低在其中，两高与两低相形，如泰山与丘垤之悬绝，凡有耳者，谁不晢之乎！”（《问答》五十二页）他认为“中国五音之序，曰清浊上去入，但极高与次高相对（即去与入相邻），极低与次低相对（即上与浊相邻），辨在针芒，耳鼓易惛。”所以他不赞同这种顺序。五声有五种调号：

清	去	上	入	浊
—	／	＼	V	Λ
ā	á	à	ă	â

韵母分四类五十摄。第一类叫“一字元母”，即单元音韵母；第二类叫“二字子母”，即二合音；第三类叫“三字孙母”，即三合音；第四类叫“四字曾孙母”，即四合音。各摄韵母都用直音或反切作为代表。“字同摄者俱同韵，韵同者父异母同；字閗切者俱同音，音同者父母俱同。”下面是“列音韵谱”中五十摄的目录（并列举例字）：

第一摄丫（土音）a　　巴麻马骂八

第二摄额（土音）e　　车蛇者射泽／质

第三摄衣	i	伊齐倛易〇
第四摄阿	o	歌婆果佐咋／竹
第五摄午	u	租赞诸勃词除楚此主助恣恕卒帅入
第六摄爱（土音）	ai	哈来宰在〇
第七摄澳（土音）	ao	高豪早造〇
第八摄盎（土音）	am	昌唐党抗〇（m等于-ŋ，下同。）
第九摄安（土音）	an	甘寒产暗〇
第十摄欧（土音）	eu	周侯有宙〇
第十一摄硬（土音）	em	庚朋猛赠〇
第十二摄恩（土音）	en	臻文辰散〇
第十三摄鸦	ia	家牙雅亚甲
第十四摄叶	ie	爹爷野夜列／一
第十五摄药	io	〇〇〇〇爵／育
第十六摄鱼	iu	居鱼语御聿
第十七摄应	im	英盈影映〇
第十八摄音	in	真辰品浸〇
第十九摄阿化切	oa	花华耍化刷
第二十摄阿感切	oe	〇〇〇〇或
第廿一摄瓦	ua	蛙〇瓦卦刖
第廿二摄五石切	ue	〇〇〇〇国
第廿三摄尾	ui	虽微尾未〇
第廿四摄屋	uo	戈禾火货郭／沃
第廿五摄而	ul	〇而尔二〇
第廿六摄翁	um	东同董冻〇
第廿七摄无切	un	谆纯蠢闰〇

第廿八摄无切	eao	○聊了料○
第廿九摄无切	eam	○良两谅○
第三十摄隘	iai	街厓矮界○
第三十一摄尧	iao	交乔巧叫○
第三十二摄阳	iam	江阳讲降○
第三十三摄有	ieu	幽尤有右○
第三十四摄烟	ien	先前衔谚○
第三十五摄月	iue	靴瘸○○月
第三十六摄用	iun	扃穷拥用○
第三十七摄云	iun	君群陨韵○
第三十八摄阿盖切	oai	衰怀伙坏○
第三十九摄无切	oei	悲为美背○
第四十摄阿刚切	oam	庄黄晃创○
第四十一摄阿干切	oan	寰还缓患○
第四十二摄阿根切	oen	昏魂混慁○
第四十三摄歪	uai	乖○拐快○
第四十四摄威	uei	归葵轨匮○
第四十五摄王	uam	光狂广旺○
第四十六摄弯	uan	关顽碗惯○
第四十七摄五庚切	uem	肱○矿○○
第四十八摄温	uen	昆门粉粪○
第四十九摄碗	uon	欢桓短换○
第五十摄远	iuen	冤元远院○

《耳目资》并不只五十个韵母，某些摄有“甚”、“次”或、“甚”、“次”、“中”之别。

①第二摄入声分甚次

入声甚有下列反切：自黑、此黑、主黑、处黑、古黑、苦黑、布黑、普黑、都黑、土黑、儒黑、梧黑、路黑、母黑、怒黑、数黑、书黑、沥则等切。

入声次有主十、处十、儒十、书尺等切（质尺日失等）

②第四摄入声分甚次

入声甚有则恶、测恶、者恶、扯恶、格恶、克恶、百恶、魄恶、德恶、忒恶、日恶、弗恶、额恶、勒恶、麦恶、搦恶、色恶、石恶、黑恶等切。

入声次有则熟、测熟、者熟、扯熟、格熟、克熟、百熟、魄熟、德熟、忒熟、日熟、物熟、弗熟、勒熟、麦熟、搦熟、色熟、石速、黑熟等反切。

③第五摄清平、浊平、上、去、入都有甚次中之别。以清平和入声为例：

清平甚有则乌、测乌、扯乌、格乌、克乌、百乌、魄乌、德乌、忒乌、弗乌、色乌、黑乌等切。

清平次有则私、测私、色姿等切（赀、雌、私等字）

清平中有者书、扯书、石诸等切（诸、樗、书等字）

入声甚有则俊、测卒等切（崒、焌等字）

入声次有色师切（率、帅等字）

入声中有者述、扯述、日述、色述、石入等切（术、黜、入、恤、述等字）

④第十四摄入声分甚次。

入声甚有衣黑、则叶、测叶、格叶、克叶、百叶、魄叶、德叶等切。

入声次有衣十、则一、测一、格一、克一、百一、魄一、德一等切。

⑤第十五摄入声分甚次。

入声甚有衣恶、则药、测药、格药、克药、勒药等切。

入声次有衣熟、格欲、克欲、黑欲等切。

⑥第廿四摄入声分甚次。

入声甚有午恶、格斡、克斡、额斡、黑斡等切。

入声次有午熟、格屋、黑屋等切。

区别甚次中有两种符号。“凡元母首上有一小点则次，其下有点则中，无点则甚。”（《问答》五十五页）

摄 调 类	二　摄	四　摄	十四摄	十五摄	廿四摄	五　摄				
	入	入	入	入	入	清	浊	上	去	入
甚	ĕ 热舌	ŏ 弱落	iĕ 灭叶	iŏ 药脚	uŏ 郭斡	ū 租	û 锄	ù 阻	ú 助	ŭ 卒
次	ė̂ 日实	ȯ̌ 肉禄	iė̌ 蜜一	iȯ̌ 欲菊	uȯ̌ 国屋	u̇̄ 赀	u̇̂ 词	u̇̀ 此	u̇́ 刺	u̇̂ 率
中						ụ̄ 书	ụ̂ 殊	ụ̀ 暑	ụ́ 处	ụ̆ 入

五十摄“加‘次’在入声者另有五”（《译首谱引·音韵经纬全局说》），再加“次”“中”在第五摄者另有二（不计声调的区别），共计五十七摄。

所谓甚次中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区别呢？

王征在《释疑》中说：“平仄清浊甚次中，在字母而不在

父。”甚次中与辅音无关，是韵母问题。

《音韵经纬全局说》指出：“母音分平仄，平仄分清浊，平仄又分甚次中。”这是说无论平声韵还是仄声韵都可分为甚次中三类。事实上五声都有三类之别的，只出现在第五摄午u中，其余二、四、十四、十五、二十四等摄只入声有甚次之别。

《列音韵谱问答》：“问曰：甚次何如？答曰：中华具其理，未具其名。甚者，自鸣字之完声也；次者，自鸣字之半声也。减甚之完则成次之半。如‘药’甚‘欲’次，同本一音，而有甚次之殊；又如‘叶’甚‘一’次，同本一音，而亦有甚次之殊。”（五十三页）同一个元音，“完声”为甚，“半声”为次，这是一种区别。

又：“问曰：甚次之别綦难矣，辨之有巧字？答曰：减元声全声之半，何有于甚次！且以出人口，开唇而出者为甚，略闭唇而出者为次，是甚次者开闭之别名也。”（五十五页）

根据金氏所说的“完声”、“半声”和“开闭”两种音理，我认为入声甚次中之别是表示《西儒耳目资》中的入声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有〔-ʔ〕尾，声调短促，具有“半声”、“略闭唇”的特点，这就是“次”入。如〔-eʔ〕日实，〔-ioʔ〕欲菊，〔-uoʔ〕国屋；另一类已经失去〔-ʔ〕尾，自成调类，其元音与平上去已无不同，这就是“甚”入。正因为其元音与平上去同，所以是“完声”。至于“中”入，只见于第五摄，共计五个反切，二十一个字，这类字大概喉塞音尾已经弱化，但元音略短，还未接近“完声”，所以自成一类。就全书入声而言，绝大部分属于甚类，次类不多，中类特少。

至于非入声之甚次中，为数极少，它们的区别也是元音问

题。《列音韵谱问答》有一条讨论这个问题。

问曰："有甚有次矣，但'全局'又有中何？"

答曰："中者，甚于次、次于甚之谓也。假如'数'，甚也；'事'，次也；其中有音不甚不次，如'胥'、'诸'、'书'是也。盖'数'sŭ，午u在末者，粗也；'事'sɨ̆，午ɨ在末者，细也；'书'xṳ̆〔ʃṳ̆〕，午u在末者，比于甚略细，比于次略粗，故曰中耳。"

（五十三页，即153——154页）

这里提出了"粗"、"细"、"略细"三种元音，陆志韦用u、ï、ʮ三个音来表示。次类只有则、测、色（ts、ts′、s三母〔ʅ〕韵字。

罗常培先生认为，甚次中的区别"只是金氏对于不能用罗马字母标注的中国语音想出来的补救办法。"此话非常有理。〔-ʔ〕、〔ï〕、〔ʮ〕（或ɥ）这些音罗马字母无法标注，故用"甚次中"以济其穷。

《西儒耳目资》第二十五摄而，用ul表示〔ɚ〕音。"而ul字母，五声俱无子，故同母者俱无，故而ul字能借午u首字以代其父，不能觅同鸣之勒l以代其母耳。"（六十五页）金氏"所记录的儿化音节确实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群众口语中的儿化韵。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汉语音韵学史籍中最早的儿化音记录。"（李思敬《汉语"儿"〔ɚ〕音史研究》55页）

3.《耳目资》的音系基础

1930年，罗常培在《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中认为，《耳目资》的音系是明末官话北平音，陆志韦的《金尼阁〈西儒耳目资〉所记的音》认为："这书所代表的语音可是他在二年以前在山西记下来的……广义的说，这山西方言是一种近古的官

话。”1990年8月，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王力先生九十诞辰语言学研讨会上，张卫东、刘丽川提交了一篇《论〈西儒耳目资〉的记音性质》，对山西方音说，明末官话北平音说都进行了否定。他们认为：“《耳目资》所记的是明代官话，而明代官话的标准音是南京音，不是北平音。”张、刘二人的主张是可信的，只是把明代官话标准音定为南京音，“不是北平音”，这个观点不尽恰当。这本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应当分开来谈。我们知道：“官话”、“正音”，有的书也叫“中原音”，这都是一些外延非常宽泛的概念，我在本书已经指出：“正音……不见得就是单一音系”。就是在今天，官话还可以分为北方官话、西北官话、上江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江淮方言），明末的官话大致上也应如此，只是各官话区之间，同一官话内部之间，分歧会更多些。把一种方言定为全国的标准“官话”，这是辛亥革命前后才有的事情。至于明朝末年，或更早更晚的各个王朝，都没有明确法定某一种方言作为官话“标准”。至于朝廷命官、文人学士的口语，以今例古，无疑是“五花八门”，法定标准无有，自然形成的传统标准是有的，地区差异是有的。所以明朝末年的北平音是官话，南京音也是官话，二者的主要共同点是全浊声母已经消失，平声均分阴阳，-m尾也已经消失。在入声问题上，南北二京各不相同，北平无入声，南京有入声。也就是根据这些相同点和不同点，以及《耳目资》的成书过程，利玛窦、金尼阁等人在华的生活经历，我赞同张、刘二位的南京音说。足以证成南京音说的理由、材料，张、刘二位已列举不少，我在这里略作补充、引申。

金尼阁天启丙寅(1626年)写的《自序》说：“五阅月始成此

书，书分二谱首。”这里说的“二谱”很容易误解为“列音韵谱”、“列边正谱”。可是《译引首谱》的“小序”说：“译者资耳，引者资目，俱先传行，用救不聪不明之癖。旅人聋瞽，故作此首。首谱有二：图局，问答。”（上册三页，即53页）很显然，金尼阁用五个月时间写成的“二谱首”，就是因“景伯韩君之固请”而写成的、包括“图局”、“问答”在内的“二谱首”，至于“资耳”的“列音韵谱”，“资目”的“列边正谱”，“俱先传行”。他在韩云家所“开旅人字学音韵之编，则能察音察字，随手可得。”（《问答小序》）就是后来定名为“音韵谱”和“边正谱”的手稿。前者用来“察音”（即查音），后者用来“察字”（即查字）。如果认为全书三册，都是这五个月之内写成的，这是任何人都难以办到的。而金尼阁赴山西之前，长住南方，中册、下册的写作显然是在南方就早已完成了的。韩云、吕维祺、王徵等人的参订，对此书的音系会有一定影响（如照顾传统韵书、存古等），但不可能以山西音或别的方音从根本上改变其音系。

拿《耳目资》的韵母系统与同时代的《等韵图经》相比，正好看出万历年间南京官话与北京官话有别，《耳目资》也不可能代表北平音。

先说阳声韵。《等韵图经》有十五个韵母，《耳目资》有二十二个韵母：

aŋ	uaŋ	oaŋ	iaŋ	eaŋ	əŋ	uəŋ	ɪŋ	uŋ	yŋ
唐	光	黄	阳	良	庚	肱	英	东	扃

an	uan	oan	uɔn	iɛn	yɛn	ən	uən	oən	ɪn	un	yn
寒	关	还	欢	先	元	文	昆	魂	真	谆	群

陆志韦将光黄合并、阳良合并、关还合并、昆魂合并，也还有十八个阳声韵。比《等韵图经》多出肱、欢、谆三韵。陆先生合并的原则是e介母韵并于i介母韵，o介母韵并于u介母韵。我以为这是以北音官话来衡量南京官话，从而抹杀了明末南京官话的特点。如：

良韵只有为数不多的来母字，阳韵正好缺来母，似乎可以构成互补，合而为一。但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前期，良、阳是否存在差别呢？现在难以确证。不过，现在的福州话良阳韵母不同：

良duɔŋ　　阳cyɔŋ

我无意拿闽方言来证明末的下江官话，只是想说明这种区别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至于光黄，二者并不存在互补关系，都有tʃ，tʃ′，ʃ三母，但一字两收的情况不少，如"庄妆装、窗枞摐，双霜泷"等。这种相混的情况，只能证明这些字有两读，oaŋ正在uaŋ靠拢、过渡。

阳声韵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保存欢韵。我们知道，明末北京官话桓欢已与寒山合流，而反映南音的《韵法直图》、《皇极图韵》（陈献可）都保存桓欢韵，方以智的《切韵声原》也保存〔uon〕韵，这也是南京音说的有力证据。

再说阴声韵。据陆志韦构拟的《等韵图经》有二十五个韵母，构拟的《耳目资》有二十三个韵母。我认为《耳目资》有三十个韵母：

a　ai　ao

ɛ　əu　eao

ɿ　ʅ　ia　iɛ　io　iai　iao　iəu

o　oa　oə　oai　oei

u　ua　uɛ　ui　uo　uai　uei

y　yɛ　ɿɿ　ɚ（ɿɿ，采取陆志韦的构拟，罗常培认为是ɥ或ʒ）按五十韵母计，除去阳声二十二韵，本来只有二十八个阴声韵，因为第五摄又分甚次中三类，所以要加上〔ï〕，〔ɿɿ〕两个韵母，才得出阴声韵母三十的结论。陆志韦根据上文谈到的介音合并原则，将oa并入ua，oai并入uai，oei并入uei，eao并入iao，减少了四个韵母。这样两种韵图的阴声韵母从数量上看就很接近了。但是，这种合并也没有必要。如eao韵只有来母字，iao韵来母无字，而eao所收字多为四等萧韵系从尞得声的字，金尼阁将这类字专门立一个韵母，应当是有实际语音作为根据的。

《耳目资》并非一般韵书，完全是从查寻字音的目的出发而分韵的。他说："诗家同韵于末相通者，并用之，故中原音韵诸卷多有，助作诗者之便用耳。"有人问曰："先生不用为何？"他说："愚意不在诗文，总从寻字之便而已。"（《译引首谱·三韵兑考》九十四页，即235页，文字改革出版社）根据这个实用原则，我们相信他分出的这些韵母反映了明末的下江官话，如果我们加以合并，就会抹杀这个韵母系统所固有的特色（罗常培先生认为这些韵母的分立是"韵随声变的现象"）。

再说入声韵。保存入声，这是《耳目资》非北平音系的重要证据。《耳目资》既有入声调，又有入声韵。入声调的韵母只是调值不同于其他阴声韵母，io、oe、uɛ三个摄的字全来自中古入声韵，但已阴声化了。《耳目资》只有七个带〔-ʔ〕尾的入声韵。这些入声韵的分布，上文讲甚次中时已有介绍，这里用国际音标拟测其音值。

ɛʔ oʔ iɛʔ ioʔ uoʔ ɤʔ iʔ

将阴声韵、入声韵、阳声韵加起来，共计五十九个韵母。张卫东说："这样一个庞大的韵母系统，在今天官话区里，只有江淮官话才跟它较为接近。韵母超过40的方言，集中在江淮地区：合肥41个，扬州47个，南京53个。"这个意见值得重视。

《耳目资》的声母系统也与同时代的《等韵图经》不同。如果算上零声母，《耳目资》实际上比《等韵图经》多出〔v〕、〔ŋ〕两个声母。

微母字已经分化，"微未味"等变为零声母，金尼阁归"自鸣字母"，"武舞侮务雾物"等则读〔V〕（陆志韦拟为"W"）。

〔ŋ〕母以"额"字代表，包括疑母字，如"俄鹅讹我"等；也包括喻母字，如"为伟"等；也包括影母字，如"恩哀爱"等。金尼阁在第二、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等摄中，用"额、爱、澳、盎、安、欧、硬、恩"等字作母音代表字，全都注明是"土音"。说明"土音"中这些字已归零声母，所以借用来作母音，而"正音"中这些字都有"字父"，读〔ŋ〕。在《三韵兑考问答》中对"额"作字父，字母的问题专门有一道问答题。

问曰："额字同鸣之第九也（指在声母中居第九位，如果连送气音一起计算，则是第十四位），今自鸣之二（指第二摄），一字何亦如是？"

答曰："额，中字，字子也，实不能为同鸣之父，亦不能为自鸣之母，彼此俱借之耳。盖额中字，用西号有二：首号额g，同鸣之九；末号自鸣之二，曰额e……盖多省'额'字风气曰e字，则减同鸣之首，故所剩于末者，足以

代自鸣之二矣。”

总之，明末北京音，〔ŋ〕母已经消失，而下江官话还保存。

4.利玛窦等人的拼音方案

金尼阁之前，利玛窦等人已经用罗马字母拼写汉字。金尼阁说自己是“述而不作，敝会利西泰、郭仰凤、庞顺阳实始之，愚窃比于我老朋而已。”（《自序》）

西泰是利玛窦（1552—1610）的字，意大利人，在葡萄牙殖民势力的支持下，万历十年（1582）来华传教。

仰凤是郭居静（1560—1640）的字，也是意大利传教士，万历二十二年（1594）来华。

顺阳即庞迪我（1571—1618）。

利玛窦等人的拼音资料主要有两条：

一条是：利玛窦与罗明坚（1543—1607）在万历十二年至十六年（1584—1588）之间，与华人钟鸣仁合作，撰写了一部《葡华字典》，《字典》手写原稿现存罗马耶稣会档案中，有189页。卷首《平常问答词义》，是用拉丁字拼写的汉语会话书，为罗明坚著。《字典》正文每页分三栏：第一栏为葡语，第二栏为拉丁字母拼写的汉语，第三栏为汉字。开头四页有第四栏，为意语。这是第一部用西方语言和汉语对照的双语词典，也是第一部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系统著作，是研究明末官话的宝贵材料。（以上材料转引自张永言《读〈西字奇迹〉考》，见《语文导报》1986·12）

另一条是：利玛窦曾为四篇文章用罗马字注音，即在直排的每行汉字旁边，注上罗马字母的拼音。这四篇注音文章写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共用了387个不同音的汉字，罗常培曾根据

各字的注音，归纳出传教士的拼音方案。这四篇文章就是人们熟知的《西字奇迹》，保存在明末程君房（名大约，字幼博）编的《程氏墨苑》中，1957年文字改革出版社以《明末罗马字注音文章》为题印出。（可参阅尹斌庸《〈西字奇迹〉考》。《中国语文天地》1986年2期，罗常培《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三分，1930年）

何高济等译的《利玛窦中国札记》谈到郭居静对汉语的研究，现摘录于此。“在观察中他们注意到整个中国语言都是由单音节组成，中国人用声韵和音调来变化字义……他们采用五种记号来区别所用的声韵，使学者可以决定特别的声韵而赋予它各种意义，因为他们共有五声。郭居静神父对这个工作做了很大贡献。他是一个优秀的音乐家，善于分辨各种细微的声韵变化，能很快辨明声调的不同。善于聆听音乐对学习语言是个很大的帮助。这种以音韵书写的方法，是由我们两个最早的耶稣会传教士所创作的，现在仍被步他们后尘的人们所使用。”

金尼阁在《西儒耳目资》里也赞扬了郭居静的辨音审音能力。“平仄、清浊、甚次，敝友利西泰首至贵国，每以为苦。惟郭仰凤精于乐法，颇能觉之，因而发我之蒙耳。”（《译引首谱·问答》四十八至四十九页，即144—145页）这些材料充分证明，《西儒耳目资》包含利玛窦、郭居静的研究成果在内。而且金尼阁在《自序》中称利、郭为“老朋”，这里又称之为“敝友”，肯定郭仰凤“发我之蒙”，说明金尼阁去山西、陕西之前，对汉语拼音问题早已有研究。

《西儒耳目资》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它首次运用“西字”标注汉语音节，并进行音素分析。所有汉字，一个音节

之内"有单，有双，有三，有四，有五，不能再多。"（王徵《西儒耳目资释疑》）就是说，一个音节，可以只有一个音素，也可是两个、三个、四个音素，最多不超五个音素，如 kiuen。韵母部分分解为："首元母，二子母，三孙母，四曾孙母。"（王徵语）最多不超过四个音素。明朝末年，旧的"等韵切法，有无数之乱，至若门法，是犹启钥而反扃锸之也。"（上册《问答》）金尼阁的音素分析法，对旧等韵无疑是有力的冲击："此一文典式之工作，颇引起中国人之惊奇。""极为学者所称道。"（转引自任道斌编著《方以智年谱》90页，1983年，安徽教育出版社）方以智、杨选杞还由此提出了汉字应当实行拼音化的主张。不过，金尼阁本人似乎并不赞同汉字西化。《问答》讨论过这个问题。

> 问曰："果尔，用西之切法，不大过于敝国之法乎？"
>
> 答曰："否！中华之字，同音极多，如衣、医、依一音也而有多字，西字止有衣 i 之一字。用之，岂不乱哉！"
>
> （五十六页）

一个外国人而有这样精辟的见解，是因为他善于比较，对汉语的特点有深刻认识。

注：

① 《等韵源流》152页。

② 梅膺祚说："壬子春，从新安得是图……中有经有纬，经以切韵，纬以调声，一切一调，彼此合凑……图各三十二音，上下直读，因为《韵法直图》。"《直图》附于《字汇》。

③ 《切韵声原》见于《通雅》。

第十八节 明代古音学

明代古音学的代表人物是陈第。在陈第之前，杨慎（公元1488年—公元1559年）也有关于古音学的论著。他的《转注古音略》和《答李仁夫论转注书》影响较大。

杨慎对《切韵》系韵书与上古音不同是有一定认识的。他说："自沈约之韵一出，作诗者据以为定，若法家之玉条金科，而古学遂失传矣。故凡见于经传子集，与今韵殊者，悉谓之'古音转注'也。"①

什么叫做"古音转注"呢？就是程可久说的："四声互用，切响（指声母相同）通用。"不过，杨慎特别强调：

> 原古人转注之法，义可互则互，理可通则通，未必皆"互"皆"通"也。如"天"之字为"天、忝、舔、铁"，是其四声也；他年切之外有铁因切，是其切响也。其音"忝、舔、铁"三音皆无义，而不可转，"铁因"之切则与方言叶，故止有"切响"可通，而四声不互也。
>
> （《答李仁夫论转注书》）

杨慎所说的"义"与"理"，实际上是指有无证据，如果有语言文字资料为证，就符合"义理"，否则就不能"互"，不能"通"。他这个话是针对宋人"四声皆可转，切响皆可通"的理论而发的。

尽管杨慎强调“古音转注”要以“义理”为据，但他的“转注”论也还是字无定韵，可以随上下文临时改变音读，跟宋人的“叶音”说没有本质上的差异。甚至可以说，他的指导思想仍然是“叶音”说。他认为：

《诗》十五国不同言语，而叶音无异也。楚远在江汉数千里外，而叶音无异于《诗》也。汉人赋颂，《史》《汉》叙传，扬雄《太玄》，焦贡《易林》，其取韵又何异于《易》、《诗》、《楚辞》哉！

（《答李仁夫论转注书》）

杨慎还不懂得上古语音也有时地不同的问题，也不懂得字有定韵，不存在什么“叶音”问题。所以，他谈古音，还是执今音部分妄以通转古音，离不开平水韵的框架。他的《转注古音略》就是按平水韵编排的。凡今音与古音不同的，他就说是“音之讹尔”，是“沈约偏方之音”，韵字的归部更是杂乱无章，如“鞠”归一东，“遇”归二冬，“冰”归十三职，从本部“转”到了另外一个完全无关的部，这就是他所谓的“转注”。“转注”论的根本错误还是立足于今音去看古音，不了解古音有自己的系统性，有自己的严密的韵部系统，不能临时“转”来“转”去。

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建立起科学的古音系统，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要破除“叶音”说，也就是要破除“转注”论。担负起这个批判任务的是万历年间的焦竑（公元1540年——公元1620年）和陈第（公元1541年——1617年）。焦竑说：

诗有古韵今韵，古韵久不传，学者于《毛诗》、《离骚》皆以今韵读之，其有不合，则强为之音，曰：此“叶”也。予意不然，如《驺虞》一“虞”也，既音“牙”而叶

"葭"与"豝"，又音"五红反"而叶"蓬"与"豵"；"好仇"——"仇"也，既音"求"而叶"鸠"与"洲"，又音"渠之反"而叶"逵"。如此，则"东"亦可音"西"，"南"亦可音"北"，"上"亦可音"下"，"前"亦可音"后"，凡字皆无正呼，凡诗皆无正字，岂理也哉！

（《焦氏笔乘》卷三，63页）

陈第，字季立，福建连江人。他在少年时代就接受了叶音之说不可信的教育。他说：

余少受《诗》家庭，先人木山公尝曰："叶音之说，吾终不信。以近世律绝之诗叶者且寡，乃举三百篇尽谓之'叶'，岂理也哉！然所从来远，未易遽明尔。竖子他日有悟，毋忘吾所欲论著矣。"余于时默识教言，若介于胸臆。故上综往古篇籍，更相触证，久之豁然自信也。

（《屈宋古音义·跋》）

后来他读了焦竑的《笔乘》，对于"古诗无叶音"的主张，深表赞同，认为"此前人未道语也。"②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春他来到南京，这年秋末，造访焦竑，"谈及古音，欣然相契。"③《毛诗古音考》就是在这里正式定稿的。在写作过程中，焦竑"又为补其未备，正其音切，于是书成"④。这时，焦、陈二人都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又过了十年，也就是万历四十一年，陈第又写了《屈宋古音义》，这两部著作都有焦竑写的序言，二人的观点完全一致。所以，我们在叙述这段历史时，若只讲陈第，根本置焦竑于不顾，那是不公正的。

陈第在古音研究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两条：

一、彻底与"叶音"说决裂，建立明确的历史观点。他有一

段名言：

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故以今之音读古之作，不免乖剌而不入，于是悉委之"叶"，夫其果出于"叶"也，作之非一人，采之非一国，何"母"必读"米"，非韵"杞"、韵"止"，则韵"祉"、韵"喜"矣；"马"必读"姥"，非韵"组"、韵"黼"，则韵"旅"、韵"土"矣……厥类实繁，难以殚举，其矩律之严，即《唐韵》不啻，此其故何耶？又《左》、《国》《易·象》、《离骚》、《楚辞》、秦碑、汉赋、以至上古歌谣、箴铭赞诵，往往韵与《诗》合，寔古音之证也。

（《毛诗古音考·自序》）

陈第知道了音有古今之别，古韵"矩律之严，即《唐韵》不啻"，这是一个重大发现。他根据押韵的规律，确定了一些字的古读，其具体音值是否妥当，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从此以后，人们懂得了古诗自有韵，自有其读音，不宜执今音以概古，"叶音"说也就彻底地被否定了。

二、确定研究范围，发明新的研究方法。焦竑指出，吴才老、杨用修的失败，就在于他们"未尝合《诗》、《骚》古赋参读之，犹溺于近世叶音之说"，就是说，他们谈古音，没有以《诗》、《骚》为根据。陈第才明确划定研究范围，选定研究材料，因为他已经有了明确的历史观点。他的研究方法也与吴、杨等人迥异。他的《毛诗古音考》"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错以谐其韵。"如：

服，音逼。徐蒇曰：服"见于《诗》者凡十有六，皆当

为蒲北切，而无与房六叶者。”愚按：不特《诗》，凡《易》古辞皆此音。

本证：《关雎》得、服、侧。《有狐》侧、服。《葛屦》襋、服。《蜉蝣》翼、服、息。《候人》翼、服。《采薇》翼、服、棘。《六月》饬、服。（略）

旁证：《易·谦》得、服。《象》忒、服。《成王冠颂》服、职。《仪礼》服、德。《离骚》服、则、息、服。秦《泰山刻石》饬、服。汉《天马歌》极、德、国、服。

（略）

考证一个“服”字的上古读法，他就汇集了本证、旁证二十余条。这个方法实际上就是归纳汇证法。他用这个方法，考证《诗》中“其音合于古而异于今者，凡五百字”。后来他又“检屈宋音与《毛诗》同者八十余字，则提其本音，首注云：详见《毛诗古音考》，其《毛诗》所无者一百五十余字，辄旁引他书以相质证。”⑥陈第总共对六百多个古今读音不同的字，一一进行了注音。有了这样的归纳工作，注音工作，距离上古韵部的建立就为期不远了。但陈第也有以今律古的错误。清初的柴绍炳批评说：“季立刻于只字，昧于通部，每就本通之韵，别求转叶，过费推寻，不惜其赘。又生产闽中，读音不正，如‘南’叶‘心’而云音宁，‘天’叶‘人’而云音汀之类，俱吐属讹谬，未足谐声。”⑦这个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南（−m）宁（−ŋ）不同尾，天（−n）汀（−ŋ）亦不同尾，自不可互音，说他“昧于通部”也符合事实。

注：

①《答李仁夫论转注书》，见于《转注古音略》。丛书集成初编本，5页。

②③④陈第：《毛诗古音考·跋》。

⑤《毛诗古音考·自序》。

⑥《屈宋古音义·凡例》。

⑦柴绍炳：《古韵通·杂说》。南音宁，天音汀，均见《毛诗古音考》卷一。

第十九节　元明文字学

元明二代的文字学著作，数量并不算少，质量高的却不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戴侗的《六书故》，周伯琦的《六书正讹》，李文仲的《字鉴》，赵撝（huī）谦的《六书本义》，赵宧（yí）光的《说文长笺》。

戴侗，字仲达，浙江永嘉人，生活于宋元之际。他的《六书故》刊行于元延祐七年（公元1320年），“是编大旨主于以六书明字义，谓字义明则贯通群籍无不明。”（《六书故》）

全书三十三卷，按事类编排，共分七个大类。如果从查检的角度考虑，这样的分类并不能给读者带来什么方便。

七个大类是：数（卷一）、天文（卷二、三）、地理（卷四至七）、人（卷八至十六）、动物（卷十七至二十）、植物（卷二十一至二十四）、工事（卷二十五至三十一）。除此七类外，

卷三十二为“杂”，卷三十三为“疑”。不能归于前七类的字则归“杂”类，字形疑而未定的则归“疑”类。

全书分四百七十九个细目。其中一百八十八为文，四十五为疑文，文，母也，皆大书；还有二百四十五个为字，字，子也，皆细书。

书的前面有《六书通释》一卷，其中有不少意见都值得称道。如对语言和文字之间的关系，看法比较正确。他说：

> 夫文生于声者也，有声而后形之以文，义与声俱立，非生于文也。
>
> （《六书通释》）

先有语言而后才有文字。词的意义和语音形式并存，意义并不是由文字所产生的。这些观点都很正确。所以，他主张在探求字义的时候，不仅要“因文以求义”，还要“因声以求义”。戴侗批评当时的“训诂之士，知因文以求义矣，未知因声以求义也。夫文字之用莫博于谐声，莫变于假借。因文以求义而不知因声以求义，吾未见其能尽文字之情也。”（《六书通释》）戴侗提出的“因声以求义”，到清代发展为训诂学中的一大法宝。

关于文字起源问题，他也有很好的见解：

> 文字未兴也，其类滋，其治繁，而不可以，莫之征也，然后结绳之治兴焉；治益繁，巧益生，故有刻画竹木以为识者，今蛮夷与俚俗不识文字者，犹或用之，所谓“契”也，契不足以尽变，于是象物形、指事之状而刻画之，以配事物，而简牍刀笔兴焉，所谓“书”也。
>
> （《六书通释》）

在文字（书）产生之前，经过了结绳记事的阶段，经过了刻

画竹木以为"契"的阶段，宋元之际，有的少数民族（蛮夷）和俚俗不识字的人，还用这个办法记事。戴侗认为文字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契"的发展创造出来的，他不相信圣人造字的传统说法。"六书不必圣人作也"（《六书通释》），这样的论断是科学的。

文字学和古书注释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戴侗揭露注疏的弊端也很中肯。他说：

> 注疏未兴，经义常明；注疏日繁，经义日晦，非经有明晦，学者不知六书故也。
>
> （《六书通释》）

戴侗所说的"不知六书"，不是说不懂六书的理论，而是人们分不清字的本义，引申、假借等，以致"缘词生训，析言发义"（《六书通释》）。他虽然没有像后来的段玉裁、朱骏声那样，系统地考察"本义"、"引申"、"假借"，但是，他对这三个概念是分别得很明确的。他在《六书故》中对所收的字，用六书的原则进行了一次系统的分类，以期达到"贯通群籍"的目的。这样的用心是好的，但由于他所掌握的文字资料有限，再加上他还不了解古音系统，结果只能像方以智所批评的："永嘉戴侗起而调之，是非相半。"①

《六书通释》对"本义"、"引申"、"假借"也有具体的论述。如说："道从辵，本为人之行路；理从玉，本为玉之文理。引而申之，则道之广大、理之精微者无不通，此充类之术也。"这是以"道""理"二字为例，说明本义和引申义的关系。

关于"假借"。他说："假借多而义难求，古人谓令长为假借，盖已不知假借之本义矣。所谓假借者，谓本无而借于他也。

合卩为令，本为号令、命令之令（去声），令之则令（平声）。长之本文虽未可晓，本为长短之长（平声），自稺而浸高则为长（上声），有长有短，弟之则长者为长（上声），长者有余也，则又谓其余为长（去声。盈按：即“身无长物”之“长”。音zhàng）。二者皆有本义而生，所谓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非假也。所谓假借者，义无所因，特借其声，然后谓之假借。”这里以“令”“长”为例，说明假借与本义、引申义有何不同，他对许慎的批评是正确的。

唐兰说：戴侗“对于文字的见解，是许慎以后，惟一的值得在文字学史上推举的。”（《中国文字学》22页）

在文字材料方面，他大胆采用钟鼎文，不拘守小篆。

《六书故》“为以金文参校《说文》之始”

（《沈兼士学术论文集》67页），

是值得肯定的。如：

射，《说文》从矢从身。篆文从寸。戴侗说：“射之从身绝无义，考之古器铭识，然后得正其字，盖左文之弓矢讹而为身，右偏之又讹而为寸也。手弓加矢，射之义也。”甲金文都证明戴侗的分析完全正确。

在字义的训释方面，有时也不够精审，往往标新而失据。如卷二对“景”字的释义：

景：居皿切。日光所照物之阴为景。俗作影。颜之推曰：葛洪始加“彡”，读于景切。且以景为光景，非也。

颜之推根据许慎的意见认为“景”的本义是“光”（颜说见《颜氏家训·书证》），本来不错，戴侗把“影”当作“景”的本义，反而欠妥。

他对字形的分析也不尽可信。如认为“元”是形声字，“从一，兀声”，徐锴已指出：“俗本有‘声’字，人妄加之也。”（《说文系传》卷一）其实，“元”应该是象形字。

前人对《六书故》的评价往往多贬词。元代吾邱衍批评其“杂乱无法”，“六书到此为一厄矣”（《学古篇》）。现代学人胡朴安批评其“非今非古，殊无根据。”（《中国文字学史》248页）直到唐兰，才对《六书故》作出高度评价。

周伯琦，元末江西鄱阳人。他的《六书正讹》成于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比《六书故》晚出三十多年。这部书的目的是为了“正其形体、音、义之讹者”。全书所正之字两千多，按四声分卷排列。如上平一东：

公，沽红切。背厶为公，从八从厶，八犹背也，厶即私字，会意。别作“合”，非。

上声十六铣：

㕣，以转切。此即兖州之兖，从口，象山门也；八，半水也。隶作“兖”。按兖字、沿字从此，与“公”字不同，俗作“兖”，非。

这部书对于普及汉字形体结构知识以及字体规范，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学术水平不高。《正字通》的作者批评说：“元鄱阳周伯琦《六书正讹》，非讹者概以为讹，非俗者概以为俗，此病在不通者也。”（《凡例》）“不通”实有之，鄙两个“概”字未免言过其实②。

《字鉴》的性质也是为了“辨正点画，刊除俗谬”。其辨正字形的根据则“本之《说文》”。作者李文仲，元末吴郡人。

此书按韵编排，一般是先出反切，再引《说文》，后正俗

字。如：

奇，渠宜切。《说文》：异也。从大从可。俗作竒。

（五支）

冃，莫报切。《说文》：头衣也。从冂从二。冂，音覓，凡冒帽曼漫冔（xū）冕胄冣冡（tǒ）䍃之类，从冃，中从二，左右俱不连，与“日”“曰”二字不同，偏旁俗混作“曰”，误。

（三十七号）

元末明初浙江余姚赵捣谦（古则）著有《六书本义》。此书亦按《六书故》的方法，依事类分篇，共分数位、天文、地理、人物等十类。作者又受郑樵的影响，将《说文》部首并为三百六十。在注释方面，除了注明这个字的本义，分析其形体之外，如有用作假借义时，则一律另加解释。如：

天，它年切。得阳气成象运，地外无不覆，主物者。从一大为[意]（即会意）○[借]刑名，凿额也。《易》：其人天且劓（yì）。

（一部）

元，愚袁切。头也，人页（xié）在上，故从人二为[意]○[借]始也，大也。

皮，蒲糜切。剥取兽革，生曰皮，理之曰革，柔之曰韦。从又[指]（指事）所剥皮○[借]肌表肤。

（又部）

赵古则的释义颇有可取之处。他认为“元”的本义是“头也”，不取许慎“始也”，戴侗“生物之本始也”这些说法，是很正确的。但是，他把本义之外的引申义全归之为假借，这就大

成问题了，如“天”的“刑名”义，是由“头顶”义引申而来，“皮”的“肌表肤”义是由兽皮引申而来，都不应列入假借。后来朱骏声在本义、假借之外，又列“转注”（即引申）一项，就克服了这个缺点。

赵㧑谦之后，崑山人魏校（弘治十八年进士）著《六书精蕴》，万历中歙县布衣吴元满（字敬甫）著《六书正义》、《六书总要》、《谐声指南》等，在当时都有一定影响。吴氏“指摘许慎而推崇戴侗、杨桓”，故《四库总目》批评其“根本先已颠倒。”

明末万历年间用毕生精力从事《说文》研究的有赵宧光。赵宧光，字凡夫，苏州人。赵宧光这个名字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已经很陌生了，其实他的巨著《说文长笺》常被明末清初人提起。方以智、顾炎武都读过此书，印象却都不好。顾炎武批评他：

> 将自古相传之五经肆意刊改，好行小慧，以求异于先儒……其实《四书》尚未能成诵……乃适当喜新尚异之时，此书乃盛行于世，及今不辩，恐他日习非胜是，为后学之害不浅矣。
>
> （《日知录》卷二十一）

说公道话的也有，刘献廷说：“寒山赵凡夫先生六书之学，近代人无出其右者，其《说文长笺》虽未尽合于理，然亦弘博可观矣。”

（《广阳杂记》卷一）

《说文长笺》结构宏伟，从“长笺总目”所揭示的内容看，全书有本部一百二十卷，述部二十四卷，作部分前四十六卷，后一十六卷，体部一十八卷，用部四卷，末部四卷。内容包括说文

笺、等韵、书法、音训刊误等。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两种刊本，都只有“本部”这一部分。据宧光的儿子赵灵均说：“述、作、体、用等部，则详之解题条目中行于世矣，诸书尚存家塾，未能俱事梨枣，姑再以俟之岁月云。”（《序言》）这说明“述、作、体用等部”当时并未刊行问世，这些原稿大概早已散佚。从“长笺解题”中，我们知道“作部”有《谐声韵表》二卷。这个“表”的内容是什么呢，与段玉裁的《谐声表》有无关系呢，这是语言学史上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可是，关于这个《谐声韵表》似乎从未有人提起过。此事不唯关系到对赵宧光的评价，也可以帮助人们开阔眼界，看看谐声表的发展过程。所以，在这里将整段文字抄录出来：

> 谐声表者，以声统字，推而上之，极于自出声字（即原始声符），立为韵之始祖，所从出字，谐其声即同某韵，皆其子孙也。常按古今韵书，互相出入，无有同者，求其根原，略无的据。此表，统于谐声，立不破之地，欲破此表，先破谐声，既不破慎，表亦不破矣。常十手稿，始得阁笔，尚借吴氏（指吴元满）谐声之便，使可作稿本而以，必取汉人正音，参之三百篇成协，始可杀青，十一稿其庶几乎！
>
> （《说文长笺·解题》）

赵宧光的《谐声韵表》虽然无法见到了，这个“题解”却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些重要内容：1.“以声统字”，就是把所有的字都归到有关的声符之下，这些最早的声符，就是“韵之始祖”；2.“谐其声即同某韵”，在万历末年，也就是早于段玉裁一百六七十年，赵宧光已有这样精辟的见解，他的名字在中国语

言学史上是不应该被埋没的；3.这个谐声表要“取汉人正音，参之三百篇成协”，说明赵宧光已懂得要拿《说文》谐声材料与《诗》韵互证“成协”，按照这个路子搞下去，他就有可能弄出一个上古韵部的科学体系；4.赵光宧为作此表，已经写了十次手稿，还准备写十一稿，可见他对这个问题的钻研是煞费苦心、日趋精密的，有可能十一稿尚未完成他就去世了。他的《长笺》是在去世之后才刊行的。

赵宧光的《谐声表》，上承徐蒇、吴元满，下启段玉裁。徐蒇只谈到：“殊不知音韵之正，本诸字之谐声有不可易者”③，还没有提到“表”的问题。段玉裁对上面所引的赵宧光的话不可能没有读过，《长笺》“盛行于世”，段氏会于此书全然不知吗？我推断他有可能从中受到过启发。

赵宧光在文字学方面的确发表了一些迂腐的意见。如认为“反切”应写作“翻窃”。“反”写作“翻”不难理解，古书中本有作“翻”的；“切”为何要改为“窃”呢？他说：“窃，盗也，借取也，言取声也。”又说：“瓜分”这个词错了，应该说“爪（pòl）分”，《玉篇》错了，应该写作《王篇》，“现在”应该写作“晛在”，“许慎”只能写作“鄦慎”，“周伯琦”应写作“周伯奇”。

从上述这些著作可以看出元明文字学的共同特点：1.不遵《说文》旧部，大胆归并部首；2.在编排方式上除部首检字法之外，有按事类编排的，近乎雅书，有按韵编排的，近乎韵书；3.重视六书理论的研究，并注意用六书的原则对汉字进行具体分析，后人称之为“六书学”；4.在文字资料方面不拘泥于小篆，对钟鼎文也比较重视；5.对字形结构的规范，正俗体的区分，都

作了大量工作。他们的研究成就不算高，这是因为：1.古音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一个科学的体系；2.当时的训诂学水平不高，名物制度的考订工作成就不大；3.他们没有把文字学与音韵学、训诂学结合起来；4.学风不朴实，欠谨严。

注：

①《通雅》卷首之二。

②关于《六书正讹》的评价，还可参阅胡朴安《说文管见》卷中47—50页。丛书集成初编本。

③徐蒇：《韵补序》。

第二十节　明代辞书

明代产生了两部影响很大的字典，这就是《字汇》和《正字通》。

《字汇》成于明神宗万历乙卯（公元1615年）。作者梅膺祚，字诞生。这部字典吸收了17世纪以前字典编纂的经验，比以往的字典有很大进步。

一、检字方便。在此以前的字典有的按《说文》部首检字，有的按音序（或四声，或三十六母）检字，都不灵便。《字汇》改为按笔画多少，循序建立部首，从一画至十七画，列214部①，深受社会欢迎。一个掌握了汉字的人，只要知道一个字的笔画，纵使不知道它的读音，大致上也能把字查出来。所以三百多年来，

梅氏所创立的部首检字法，一直为辞书编纂工作者所遵循（至于部首多少不等，也只是改良而已）。

《字汇》为了方便读者，在每一卷之前“各具一图，图每行分十格，卷若干篇，图若干格，按图索之，开卷即得”（《凡例》），就是在格内标明部首在卷内的页码，这看来只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实则也反映了编者处处为读者着想的态度。

二、收字适中。以往的字典有的收字太少，有的收字太多，《字汇》收了33179个字，对“《篇海》所辑怪僻之字，悉芟不录”。对经史所有文字和通俗用字，都加以收录。

三、注音详明。“经史诸书，有音者（指直音）无切，有切者无音，今切矣，复加直音，直音中有有声无字者（即没有同音字），又以平上去入四声互证之，如曰某平声……至四声中又无字者则阙之……音相近而未确者则加一‘近’字。”（凡例）《字汇》使用了四种注音方法：1.直音；2.反切；3.纽四声法（即所谓四声互证）；4.音近某。这四种办法都不灵，则阙之。

四、字的释义较为全面，而且尽量列举书证。

《字汇》因为有以上这些优点，所以在17世纪非常流行，如年希尧在《五方元音·序》中说：“字学一书，指不一家，近世之所流传而人人奉为拱璧者，莫如《字汇》。盖以笔画之可分类而求，悉数（指计算笔画）而得也。于是老师宿儒，蒙童小子，莫不群而习之。”

当然，它和任何一部字书一样，也存在缺点，也有常识性的错误。清代的一些学者抓住这些缺点而极力贬低其价值，那是不正确的。

《正字通》是《字汇》之后《康熙字典》之前的一部重要字

书。它的作者是谁，存在争议。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小学类存目》说："《正字通》十二卷，旧本或题明张自烈撰，或题国朝廖文英撰，或题自烈、文英同撰。考钮琇《觚賸·粤觚下篇》载此书本自烈作，文英以金购得之，因掩为己有，叙其始末甚详。然其前列国书（盈按：指满文）十二字母，则自烈之时所未有，殆文英续加也。裘君宏《妙贯堂余谈》又称文英殁后，其子售版于连帅刘炳，有海幢寺僧阿字知本为自烈书，为炳言之，炳乃改刻自烈之名。诸本互异，盖以此也。"参以其他材料，《正字通》的原作者应为张自烈。

张自烈，字尔公，号芑山，江西宜春人，崇祯末年南京国子监生。明亡不仕，隐居庐山。张与方以智为好友。方以智的儿子方中通说："芑山先生初辑《字汇辨》，时过竹关，取老父《通雅》商榷。"又说："时先君天界圆具后，闭关建初寺之竹轩（盈按：天界，即天界寺。竹轩即天界寺之看竹轩，又名竹关，在南京雨花台），芑山先生居止数武，朝夕叩关，商略可否，日辑七字为度，殆二十年而成。成，易名《正字通》。"可证《正字通》始名《字汇辨》，写了二十年才完稿，崇祯十五年(1642)方以智为此书作序时，尚未易名。《浮山文集前编》卷五《曼寓草》卷中有《字汇辨序》云："予友张芑山，宗格致之学……中有余暇，复取《字汇》是正其伪，属智序之。"（以上所引方以智、方中通的材料都转引自任道斌编著《方以智年谱》188页，112页）

廖文英，字百子，连州人，康熙中官至江西南康府知府。而张自烈"穷困特甚"，甚至连日绝粮断炊，"有时贵馈金求文，斥之不受。"（方中通《呈父执张芑山先生》）但后来还是把

《正字通》卖给廖文英，大概不如此，则非饿死不可。《正字通》“部画次第一仍梅氏之旧”，与《字汇》不同的地方是：

《字汇》对一个字的古体、籀体、篆体、隶体、俗体、讹体都分列各部，《正字通》把“散见各部者，并归本部大字后，详为考定”（凡例）。

《字汇》中有不是古文当作了古文的，有不是俗体当作了俗体的，有字同训异、字异训同的，有前后重复自相矛盾的，有引证错误的，有书证文意不周的，《正字通》则加以改正。在释义方面，也有一些新的见解。

明代最有特色的雅书是方以智编著的《通雅》，其次是《骈雅》。杨慎的《古音复字》、《古音骈字》收集了不少叠音字、双音节名词、联锦字，虽无“雅”书之名，实则跟《骈雅》差不多。

《骈雅》，朱谋㙔（字郁仪）作，成书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分七卷十三门，有释诂、释训、释名称、释宫、释服食、释器、释天、释地、释草、释木、释虫鱼、释鸟、释兽。这部书为什么叫做《骈雅》呢？余长祚在序言中说：“骈之为言并马也，联也，谓字与说俱耦者也”（丛书集成初编本，2页）。所谓“字与说俱耦”，就是此书所收的词条是双音节的，担任解说的词也是双音节的。如：

仿佛、放悬、髣髴、傻俙、髣髴、依稀：疑似也。

（释诂）

郁悠，思念也；惆怅，悲哀也；憭慄，凄怆也。

（释训）

附娄、培塿、墪敦、魁父：小土山也。

（释地）

这部书对我们研究古代联锦字有一定的作用，但由于作者不懂上古音，对许多联锦字不能从语音上进行分析，对词条的排列和词的释义，也很不理想。

明代雅书水平较高的是方以智的《通雅》。他于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开始编著《通雅》，清康熙三年（公元1663年）刊行，全书五十二卷，约七十万字。②

《通雅》开篇有三卷概论性质的文章：一、"音义杂论"；二、"读书类略"、"小学大略"；三、"诗说"、"文章薪火"。"音义杂论"和"小学大略"是研究语文的，"读书类略"中论到读书方法等问题，"诗说"及"文章薪火"相当于"诗话"、"文话"。这三卷文章与后面的正文在内容上有密切关系，作者在这里谈到了他关于语言文字的一些根本看法。正文五十二卷的内容是：

卷一至卷二疑始，讨论古篆古音；卷三至卷十释诂；卷十一、十二天文；卷十三至十七地舆；卷十八身体；卷十九称谓；卷二十、二十一姓名；卷二十二至二十五官制；卷二十六、二十七事制；卷二十八礼仪；卷二十九乐典；卷三十乐舞；卷三十一至三十五器用；卷三十六、三十七衣服；卷三十八宫室；卷三十九饮食；卷四十算数；卷四十一至四十五植物；卷四十五至四十七动物；卷四十八金石；卷四十九谚原；卷五十切韵声原；卷五十一脉考；卷五十二古方解。

我不厌其烦地把这个细目抄录于此，是为了让读者明了此书为什么叫《通雅》。作者生当末世，又是一个思想敏锐的哲学家，对中国传统的音韵、文字、训诂之学，很有修养，所以他能站在一定的历史高度，贯通各种学科，出之以雅书的形式，治为

一炉。

关于这部书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现在还缺乏有分析的评论。我认为起码有以下三点是值得肯定的。

一、方以智在研究古汉语词义时，发展了戴侗的“因声以求义”的理论，明确提出了“欲通古义，先通古音”（卷首“音义杂论”），“因声求义，知义而得声”（卷六）的正确主张。方以智是一个懂得音韵学的人，他认识到研究古义要以研究古音作为前提，仅此一点，就大大地超越了以前的各种雅书。说实在的，“欲通古义，先通古音”这八个字，作为一种理论，对清代的语言文字学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个问题我在第六章中还要专作分析。

从方以智个人来说，他的《通雅》在词义解释方面多所发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得力于这八个字。如《史记·三王世家》：“毋俷德。”《索隐》引苏林云：“菲，废也。本亦作‘俷’。俷，败也。”（中华书局版，2112页）《通雅》卷四释诂：“俷德：犹偝德也。偝与背、倍、北、悖皆通。《史记·三王世家》‘毋俷德’。注：俷，败也。其实与‘背’字通。”方以智按照“因声求义”的原则正确地批评了苏林的释义。又如在释诂卷五中他谈到：“霝始霝终，即令始令终也。令命即令名，领闻即令问。古盖‘令’、‘霊’、‘霝’并通。”这些意见都很好。他还认识到“命”和“名”“本一字而平去二音”；“令”字是“平去声通用”，这是用中古声调来分析上古声调，在时代上有问题，但我们是赞同古无去声说的，所谓“一字平去二音”，“平去通用”，如改为“古读平声”就对了。

二、《通雅》以前的雅书，在释义时一般都不出书证，更没

有驳议。《埤雅》和《尔雅翼》虽备举书证，但他们的目的不在于释词义，而是要"格物致知"。《通雅》则着重于解释词义，而且作者在收集词条时，就立意要解决一些词义疑难问题，对疑难问题往往是聚讼纷纭，就不得不产生驳议。所以，《通雅》有些词条，很像是词义札记。方以智说："凡属文所常用，而历代忽略之者，为折衷其音义云尔。"（卷三释诂）对音、义方面的是非进行"折衷"，是此书的又一特色。如黄山谷送定公诗："引绳痛排挕。"自注：挕音病。黄山谷以为"排挕"就是"排摈"，所以"挕"字的读音是"病"。方以智说："愚按从艮，当以痕、狠、艮为声者近，山谷之音未敢信。"（卷五释诂）又如：

> 以胹合欢，言调和也。《庄子》：宋钘、尹文，以胹合欢，以调海内。注：胹和万物，（物）合则欢矣。此字从肉，而丁度遂收作"聏"，公绍收作"胹"，一从耳，一从目，今《字汇》耳部、目部并载之，并引《庄子》。即以二者言，必有一讹矣。论其义，则胹和正调和也。又有《唐韵》足证，三家（指丁度等人编的《集韵》，黄公绍的《古今韵会举要》以及《字汇》）之讹，更何疑乎！胹：熟煮也。《方言》秦晋之郊谓熟曰胹；《左传》"胹熊蹯"；《史记》"臑熊蹯"；《内则》"濡豚"，注："濡读为而"。《集韵》作𦟜、胹、臑、；《广韵》亦作臑、䏧；《龙龛》亦作䏧。
>
> （卷五）

三、研究先秦词汇要读《尔雅》，研究汉魏词汇要读《广雅》，如果要研究唐宋元明词汇，则不可不读《通雅》。中国的

雅书，最为重要的就是这三部。《通雅》解释了不少从唐至明的词汇，这是一大贡献。如：

古曰“堂老”，今曰“阁老”○唐以政事堂，故宰相称堂老，两省（指门下省，中书省）相谓曰阁老。今则尊宰相为阁老矣[5]。

（卷十九称谓）

今吴下称父多曰“老相”。自江北至北方曰“老子”。其曰“爷”、曰“爹”者，通称也。

（卷十九称谓）

禅衫，中单也。今吴人谓之衫，北人谓之褂。禅衫，正今兜袖单衣无襟者也。会典朝服、祭服，内单衣皆曰中禅，本古名也。唐侍御史六人，衣朱纁裳，白纱中禅，宋人通称内衣曰中禅，则中禅即汗衫矣……按汗衫谓其近身，中单谓其在中，理本可通，今以中单为公服，而汗衫为亵称，安知古不通称乎！

（卷三十六衣服）

《通雅》的缺点是内容比较庞杂，不够精粹，连药方也收进去了，似可不必。另外，书中有些意见并不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一些雷同文字，大可删汰。

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通雅》，为《方以智全书》第一册，分上下两卷。这个本子比较好。

扬雄以后，已很少有人再从事大规模的方言词汇研究，一些笔记文中偶然有一些零散的方言资料，也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直到明朝，又出现了几种方言词汇著作，如杨慎的《俗言解字》、岳元声的《方言据》、李实的《蜀语》等。

《俗言解字》条目不多，一共才五十二条，其目的也是探求俗语的本源。

> 㜮子，京师俚语目形容短矮曰㜮。《文选》有㜮脆之语。《唐书·王伾传》：形容䠩陋。《通鉴音义》作七禾切。
>
> 跳出，《魏晋仪注》：写表章别起行头者谓之跳出，今曰台头。
>
> 纃线，《集韵》：缝衣曰纃。今俗云：穿针纃线是也。杜诗：褥纃绣芙蓉。而字借"隐"。

《方言据》成书于万历乙卯（公元1615年），分上下两卷及"续录"，共收词条261。书以"据"为名，就带有考据的意思，证明方言口语"多有来历者"。（《方言据·小引》）

它的释词一般都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注音、释义、书证。如：

> 雺凇，音梦送。混混不明了，谓之凇雺。冬月寒甚，夜气塞空如雾，著于林木，凝结如珠玉，见晛乃消，因风飘落，齐鲁之间谓之雺凇。按《元命包》：阴阳乱，为雾气蒙冒之象。因以为不明了之称。又吴歌云：霜凇打雪凇，贫儿备饭瓮。盈按：雺凇也叫"树挂"，雾或水气结成的冰花。
>
> （卷上）
>
> 挑达，轻跳不受制束，谓之挑达。《诗》：挑兮达兮，在城阙兮。挑，他刁切。达，他末切。轻儇跳跃貌。盈按："挑达"一词，在湖南安仁方言中还存在，用于形容幼儿聪明伶俐。
>
> （卷上）

罢（入声），父谓之罢，入声。唐人诗：不如长在郎罢前。闽人谓父曰“郎罢”。《随隐漫录》吴一斋诗：新诗却要多拈出，突过郎罢张我军。江右人亦有此说，不独闽矣。

(卷上)

睩睩　目四顾审视曰睩睩。睩，古禄切。睩，卢谷切。《玉篇》：“目开也。”《九辩》：“娥眉曼睩目腾光。”

(卷上)

齼，有所畏谓之齼（楚去声）。京师亦有是语。此字原谓“齿怯”，今借通用。曾茶山《和人赠柑诗》云：“莫向君家樊素口，瓠犀微齼远山翠。”④

盈按：齼（chǔ）《说文·齿部》写作“齭”，许慎解释说：“齿伤酢也。”段玉裁注：“亦作齼。凡言痛憷、𪘏涩皆同。”（二篇下，80页）什么叫“齿伤酢”呢？段注：“酢者，今之醋字，酸涩也。”由牙齿怕醋酸引申为怕其他酸物（齿怯），再引申为对事物害怕、畏缩。《新华字典》“憷”字注：“害怕，畏缩：他遇到任何难事，也不发～。”“憷”就是“齼”，也就是“齭”。“憷”的今义在明代已经产生了。

李实，字如石，四川遂宁人，崇祯癸未（公元1643年）进士，明亡后，寓居苏州，著有《蜀语》、《吴语》。

《蜀语》是一本记载四川方言词汇的著作，全书收词564条，对了解明代四川方言和研究现代汉语词汇都有意义。此书不分卷，也不分类。下面分四个方面作一介绍：

一、人物称谓。

呼母曰姐。姐，读作平声。如呼女兄，作上声。

母之父母曰外公、外婆。外，音位。盈按：今成都"外"字有两读：wài，wèi。

亲家。亲，读去声，音浸。

称子曰崽。崽，子改切，音宰……又自高侮人，则称人曰崽。郦道元《水经注》曰：弱年崽子。盈按："文革"中常有侮人为"狗崽子"者，亦"自高侮人"之意也。

小儿女曰幺。幺，音腰。俗作么，误。

自谓曰我每，谓人曰你每。俗用"们"，误。考字书：们，音闷。们，浑肥满貌。宜用"每"字为是。

称人曰汉。年长者曰老汉，少壮者曰汉子。

二、一般称谓。

村市曰场。入市交易曰赶场，三六九为期，辰（七、八点）集午（十一、二点）散。犹河北之谓"集"，岭南之谓"墟"，中原之谓"务"。

干肉及饼曰巴。牛肉曰牛干巴，荞饼曰荞巴，盐块曰盐巴，土块曰土巴之类。

蒸糯米粉揉为饼曰餈巴，凡饼块曰"巴"，蜀之通称也。

馄饨曰匾食。射洪县绝品。

米砻曰礧。礧音内，以木为齿，公输班作。盈按：湖南安仁方言也把脱谷壳的工具叫做"礧"。

驿递曰站，充徒曰摆站。站音战。

三、人物动作。

谓看曰觰。觰，柔何切，锁平声。

谓看曰瞧。瞧音樵。

手承物曰拓。盈按：即托。

手掬曰抔。抔音掊。《唐书》：一抔之土未干。

手挽曰撦。俗作“扯”，非。

笑曰哑哑。哑音格。《易》曰：笑言哑哑。

赶曰碾。赶上前人曰碾上，赶鸡曰碾鸡。“碾”今作“撵”。

拾物曰搴。搴，音简。

唾人曰啡。啡，坏、配二音。

呼人曰噡。噡，音胃，轻之之词也。噡今作“喂”。

以篾束物曰箍。箍，音孤。

人死曰过世。

凡戏玩曰耍。耍，音洒。

四、形容词

老曰老革革。盈按：《三国志·蜀书·彭羕传》：羕骂刘备为“老革”。

不精彩曰腊骟。腊骟，音腊塔。

谓人形短曰矮矬矬。矬，七禾切，音槎，《唐书》：王伾形容蹉陋。蹉，行貌。当用矬字为是。

小曰蔑蔑。凡言人物小谓之蔑蔑。

少曰丁丁。又曰点点，又曰些些。

香气盛曰蓊。蓊，音蓬去声。

凡颜色鲜明曰翠。骆宾王文：缛翠萼于词林，綷鲜花于笔苑。东坡诗：两朵妖红翠欲流。以“翠”对“鲜”，既曰“红”，又曰“翠”，皆谓鲜明之貌。

注：

①张元善《合并字学篇韵便览》自序说：“又删昔之444部，改为201

部。”比《字汇》的部首少13个。

②刘叶秋《中国古代的字典》102页说，《通雅》“这部书是方以智在万历己卯年（公元1579年）以前完成的。”此说显然有误。方以智生于万历辛亥（公元1611年），不可能在未出生之前的三十多年就完成了《通雅》。

③李肇：“宰相相呼为元老，或曰堂老。两省相呼为阁老。”《唐国史补》卷下，49页。古典文学出版社。

④曾茶山，即曾幾（1084—1166），赣州人，自号茶山居士，有《茶山集》。樊素，白居易的歌伎。所谓“樱桃樊素口”。瓠犀：《诗·卫风·硕人》：“齿如瓠犀。”

第二十一节 元代语法研究

中国古代有无语法学，大家的看法还不一致。我认为既然虚词是汉语语法的重要内容，那么，古人在这方面已经自觉地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我们就应该承认这种研究具有语法学的性质。

古代的语法研究是在训诂学、修辞学、音韵学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汉代的《毛传》、《说文》以及郑玄的注、笺都从训诂的角度对“名”（或字，即实词）和“辞”（或词，即虚词）进行了区别，他们已经使用了“叹词”、“禁词”、“语已词”、“别事词”这样一些分析虚词的术语，唐代的孔颖达也从训诂的角度提出了很多语法见解①；南朝梁刘勰、唐柳宗元等又从文章修辞

的角度研究了一些常见虚词的运用问题；《史记正义·论音例》以及宋代贾昌朝《群经音辨》的有关篇还对词性问题作了某些有意义的探讨。但是，这些研究都还是零碎的，直到元代才产生了一部研究文言虚字的专著，这就是卢以纬的《语助》。

卢以纬，字允武，浙江东嘉（永嘉）人。《语助》成书于元泰定甲子年（公元1324年），北京图书馆的《奚囊广要丛书》收有此书，承刘燕文同志将全书抄录出来，于漫漶残缺之处，又用胡文焕《格致丛书》本加以校补，我才获睹全书内容。

“奚囊”本与“格致”本有几个重要不同之处。

一、“奚囊”本前有泰定甲子胡长孺的序言；“格致”本没有此序，而加上了胡文焕的一篇序文。

二、“奚囊”本书名《语助》，这是卢氏原书的本名；“格致”本将书名改为“助语辞”。

三、“奚囊”本首尾具全，但中有残字、缺字，是重新裱装本，中有两页次序先后颠倒；“格致”本原为郑振铎氏藏书，是万历年间的刻本，比“奚囊”本晚出，但结尾少了六个条目，这是胡文焕在翻刻此书时有意删掉的。胡为明代杭州人，字德甫，号全庵。

《语助》篇幅不长，全书共计66个条目，对135个词（包括复音虚词）或固定结构进行了解释。

古代的虚词著作，大体上可分为两个流派。一是修辞派，一是训诂派。卢以纬的《语助》和清代袁仁林的《虚字说》属于修辞派；刘淇的《助字辨略》和王引之的《经传释词》属于训诂派。

修辞派着重研究文言虚词的运用规律，研究文言虚词所表现

的语气神情。胡长孺《语助序》说：

> "乎欤耶哉夫者，疑词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②昔人是言，为用字"不当律令"发，惜概而弗详。予友卢子允武以文诲人，悉来学者抱疢犹彼若，爰摭诸语助字释而详说之……文岂易言！庄左马班，手段固殊，韩柳欧苏，家数亦别，然资助于余声接字，同一律令，作文者不于此乎参，其能句耶？浑浑噩噩，杰然蔚然，"法语"直遂，"巽与"婉曲③，阖辟变化，宾主抑扬，个中妙用无穷，只在一二虚字为之机括，昧者未达也。

所谓"律令"指的就是虚词运用的规律。卢以纬教学生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学生不能掌握这些规律，于是就编了这本《语助》。他对学生说："是编也，匪语助之与明，迺文法之与授。"④"文法"就是作文之法。胡长孺认为古代的大散文家，从庄子到司马迁、韩愈、苏轼这些人，都懂得"余声"、"接字"的"律令"，都善于妙用虚字。要学会写文章，就应学会运用虚字。后来胡文焕在《助语辞·序》中也特别强调这一条。他说：

> 助语之在文也，多固不可，少固不可，而其间误用更不可，则其当熟审也明矣。苟非熟审之，是未免（免）为文之累，虽琬琰锦绣奚益哉！故谚有之云："之乎者也已焉哉，用得来的好秀才。"盖谓此易晓而不易用也。

柳宗元批评杜温夫"用助字不当律令"，是针对杜文存在的缺点而发的。不能由此引出结论：文章写得好，"只在一二虚字为之机括"。所以卢以纬们的"文法"观点具有片面性。但是，从语言学的观点来看，卢以纬对许多文言虚字的语法意义、功能的研究是有价值的，其中有不少结论是正确的。在研究方法上他

特别注重比较研究。

一、从位置不同比较一个虚字的用法。如：

而。是句中转折带此声以成文见意。句首有“而”字，亦是承上文转说下意；句末有“而”字，却是咏歌之助声，与“兮”字相类。“偏其反而”，⑤“俟我于著乎而”。⑥

夫。“夫”字在句首者，为〔发语之端，虽与“盖”字颇相近〕，⑦但此“夫”字是为将指此事物而发语为不同；有在句中者，如“学夫诗”⑧之类，与“乎”字似相近，但“夫”字意婉而声衍；在句末者，为句绝之余声，亦意婉而声衍。

二、从意义不同比较一个虚字的用法。如：

或。有带疑辞者；有带未定之意者；有不指名其人、指名其事，但以或字代之者；有未有此事，预度其事物设若如此者；有言其事之多端，连称几“或”字以指陈之者。

且。有宽缓说来之意；或有诿尔如此之意；或有苟且之意；或有将次之意。

三、对同类义近虚字进行比较研究。如：

于。是指那事物或地名之类而言，故着一“于”字以指定之，与“於”字相类，微有轻重之别。“于”比“於”意略重。

所。亦指事物而言，如“所能”、“所学”之类，比“于”字所指之义绝不同。“所”字活，“于”字死。“于”是死字，故所指之事亦不活，如“志于学”⑨之类，但指其事耳。“所”是活字，若曰“所学”，是明指其学习之而为其事也。

（盈按：卢氏将“于”“所”相提并论，全当指事词看待，欠妥。）

四、将文言虚字与俗语进行比较研究。这部分材料很值得重视。如：

亦。是俗语"也"字之意。"不亦说乎"谓"莫不也有喜悦处么"（原注：平。盈按：即读平声。）但"也"意缓，"亦"意颇切。

尔。"尔"字有带"此"字意处，俗言"恁地"。

尝谓。俗语不特而今说，也曾每每说道。

未尝。俗语"未曾"之意。"尝"即是"曾"，喻如曾经口食之而知其味也。

甚矣，甚哉。"甚"字犹吴人俗语"𠯿"字。凡此二字在句首者，欲扬言下文事物太煞（原注：去）之意，故先以此发语。

（盈按："𠯿"字应相当于叹词"呵"。）

者。或有俗语"聻"（nǐ，原注：宜夜切，本宜止切）字意……或有俗语"底"（原注：平）字意……

之。之，指也。"大成之殿"指此殿为大成之殿也；"圣人之言"指此言为圣人言也。凡"之"字有"底"（原注：平）字意。

卢以纬明确讲到"者"字或有俗语"底"字意，又说：凡"之"字有"底"字意，且特意注明，"底"在这里读平声。这两条材料为"底"来源于"之""者"的说法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很明显，"底"在这里是假借字，"之"和"底"不仅声近韵近，而且按俗语"底"读平声的话，调亦相同了。王力先生说："一向大家都认为'底'字是从'之'字来的。这是可以相信的。"⑪章炳麟在《新方言》中主张"底"不唯源于"之"，

也源于“者”。王力先生认为“底”从“者”来的说法解释起来有“困难”。我以为这种演变是在“俗语”（方言）中实现的，当然就很难从《广韵》的读音来寻找演变的根据了。

《语助》作为第一部研究文言虚字的专著，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已经很不错了。它当然也有缺点和不足之处，这些就不细述了。

元代刘鉴的《经史动静字音》，也涉及到语法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刘鉴说：“凡字之动者，在诸经史当以朱笔圈之，静者不当圈也。”刘鉴所谓的“圈”，前人叫做“点”、“发”。如：《史记正义·发字例》：“古书字少，假借盖多，字或数音，观义点发，皆依平上去入。”⑪又如《唐语林》说：“稷下有谚曰：‘学识如何观点书’。书之难，不唯句度义理，兼在知字之正音、借音。若某字以朱发平声，即为某字，发上声变为某字，去入又改为某字。转平上去入易耳，知合发不发为难。”⑫

“圈点”之例盖起于“齐梁人分别四声”⑬之后，它跟语音、词义有关，也跟语法有关。刘鉴就是以“圈”或“不当圈”来区别字之动静的。

他所说的“静字”并不就是名词，而是指不须圈点的本音，即张守节说的“如字初音者皆为正字，不须点发。”⑭也就是《唐语林》所说的“正音”；他所说的“动字”并不就是动词，而是指“借音”，即圈点后的读音。如：

王平声，君也。　　君有天下曰王。去声。

冠平声，首服也。　　加诸首曰冠。去声。

空平声，虚也。　　虚之曰空。去声。

数上声，计之也。　　计之有多少曰数。去声。

"王"、"冠"读平声时，是静字，在这里静字等于名词；读去声时，是动字，在这里动字等于动词。

"空"读平声时，是静字，在这里静字又等于形容词；读去声时，是动字，在这里动字等于动词。

"数"读上声时，是静字，在这里静字又指的是动词；读去声时，是动字，在这里动字指的是名词。

可见，静字可以指名词，也可以指动词、形容词；动字可以指动词，也可以指名词。要之，动静之别的语法作用就在于改变词性而已。这种情形，清人称之为"两声各义"或"一字两读"⑮，现在通行的说法叫"读破"、"破字"。"读破"究竟产生于何时，如何看待"读破"问题，看法不一样。这不是本书所要讨论的问题，在此就不叙述了。

注：

①许慎还给"词"下了一个定义。《说文·司部》："词，意内而言外也。"段玉裁解释说："意者，文字之义也；言者，文字之声也；词者，文字形声合也。凡许之说字义，皆意内也；凡许之说形声，皆言外也。"（段注430页）段说显然误解了许慎原意，段是把"词"当作实词来理解的。王筠说："意内言外者，谓不直说其意，而于词露之也。"（《说文句读》卷十七）王说较段说为优，但亦不甚了然。

傅东华说："余谓词虽不为义，而非无意。不为义者，谓不如名之有实可以界画，言之有实可以直指耳，而其'向背疑信'之意则固在，此其所以为'意内而言外'，谓意在于言外也。"（《文法稽古篇》。《中国文法革新论丛》148页。）

我以为"意内"即意在词之内，词虽不为义（实义），而非无

"意"（指语法意义）。"言外"即在言之外，"言"指实词、句子等。虚词是在实词之外来表达其语法意义、功能的。语气词、连词、介词都不能独立作为句子成分，这也是"言外"。一句话，"词"是"言外之意"。

孔颖达称实词为"义类"，虚词为"语助类"。详说可参阅刘世儒《孔颖达词类说和实词说》、见《训诂研究》第一辑。

②语出柳宗元：《复杜温夫书》，《河东先生集》第五册，第三十四卷。

③《论语·子罕篇》："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

④胡长孺：《语助·序》。

⑤《论语·子罕》引诗。

⑥《诗·齐风》。

⑦〔　　〕内"发语"第十一字，原书残缺，据"格致"本补。

⑧《论语·阳货》："小子何莫学夫诗？"

⑨《论语·为政》："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⑩《汉语史稿》中册320页。

⑬⑭《史记》第十册，《史记正义·发字例》16页。

⑫《唐语林》62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⑭《十驾斋养新录》卷五，91页。

⑩顾炎武有"先儒两声各义之说不尽然"的主张，见《音论》卷下。钱大昕也有专文论及"一字两读"，见《十驾斋养新录》卷五92页。

第六章　清代语言学

（公元17世纪中叶——公元19世纪）

概　　况

中国古代语言学发展到清代，进入了全面总结提高阶段。在二百六十多年的时间内，产生了一大批著名的音韵学家、文字学家、训诂学家，传统语言学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

清代语言学的发展有三个阶段。顺、康、雍为第一阶段，乾、嘉为第二阶段，道、咸至清末为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开创风气的时期，顾炎武、毛奇龄、黄扶孟、刘献廷、潘耒等是代表人物；第二阶段是清代语言学的高峰，也是中国古代语言学最为辣桀的一个高峰，江永和戴、段、二王是杰出代表；第三阶段是衰落时期，陈澧、俞樾、孙诒让是代表人物。

清代语言学是在批判宋明理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清代语言学的奠基人顾炎武首先冲锋陷阵，对明代的学术思想、学风开展了尖锐的批判。他批判明人空谈"心""性"，"置四海困穷不言"（与友人论学书）。又说："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盗窃而已。"① "万历间人，看书不看首尾，只看中间两三行。"② 他明确提出：

古今安得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

（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

"经学即理学"，这是清儒实行学术变革的指导思想。对于"理学"的批判，就意味着经学的发展要以"小学"为基础，要把"经"的研究建立在古音古义研究的基础上。顾炎武说："故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③

到了乾、嘉时代，皖派的领袖人物戴震进一步阐述了语言文字之学与经学的关系。他说：

仆自十七岁时（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可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④

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其古圣贤之心志。⑤宋已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⑥

戴震这些观点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皖派学者赞同他的看法，吴派中的某些学者也深受其影响。如钱大昕说：

夫穷经者，必通训诂，训诂明而后知义理之趣。后儒不知训诂，欲以乡壁虚造之说求义理所在，夫是以支离而失其宗。⑦

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⑧

谓诂训之外，别有义理，如桑门以不立文字为最上乘

者，非吾儒之学也。⑨

通经必先通古人的语言，通古人的语言就必先通古代的字义、名物、制度，这是乾、嘉语言学家的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决定了清代语言学的内容以研究古音古义为主。

顾炎武的《音学五书》是研究古音的奠基之作，他的《日知录》和黄扶孟的《字诂》、《义府》是研究古义的奠基之作，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是辨伪书的奠基之作。十七世纪后半期出现的这几部著作，开一代学风，影响了整个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学术方向。清代第一流的语言学家，如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江有诰等人，都以毕生精力从事汉语古音古义的研究。

清代语言学之所以如此发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音韵、文字、训诂，是传统语言学的三大部门。这三个部门的发展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对清代语言学发展起制约作用的是上古音系统的确立。由于顾、江、段、戴等人在上古音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科学的古音系统，这就引起了整个清代语言学的变革。也就是说，古音学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使音韵学得到了发展，这一成果被直接运用到文字学、训诂学，使得文字学、训诂学中一大批疑难问题，有了新的答案，获得了满意的解决。清以前的文字学家、训诂学家，由于"不达古音，往往舍声而求义，穿凿傅会，即二徐尚不能免，至介甫益甚矣"。⑩所以我认为，清代语言学得以繁荣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顾炎武、戴震等人，紧紧地抓住了上古音这个中心环节。

第二、学术事业的繁荣，要靠学术队伍的整齐、强大。清代

的语言学队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都要整齐。他们有顾炎武、戴震这样的见高识远、头脑细密、造诣很深的学术带头人。他们从事一个研究项目，都舍得把毕生的精力投进去，桂馥花了四十年时间、段玉裁花了三十多年时间从事《说文》研究，朱骏声写《说文通训定声》，也是“其平生之心得在是矣”。王念孙用十年时间写《广雅疏证》，邵晋涵用十年时间作《尔雅正义》，郝懿行用十四年时间著《尔雅义疏》，江有诰一辈子都在研究上古音。一般来说，他们的写作态度也比较严肃，他们中的多数人遵循了顾炎武提出的著书原则：“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⑪他们的学风也比较好，“实事求是”，“好学深思”，这是他们在学风方面的根本特征。他们既反对“凿空”，又反对“墨守”，“好古敏求，各造其域，不立门户，不相党伐。”⑫

第三、一种学术事业的繁荣，没有一定的社会条件也是不行的。清代语言学的发展，从社会条件来看主要有以下四点：一、官方的文教政策；二、图书资料；三、学术交流；四、社会经济。

关于清代的文化政策，过去只讲文字狱，只讲镇压的一面，甚至认为清代语言文字学的兴起，是清廷实行高压政策的产物，这样的看法具有很大的片面性，与实际情形不完全相符。清代康、雍、乾三朝，的确大兴了几次文字狱，也禁毁了一些书，但在恢复和整理汉民族的传统文化方面也作了不少工作。康熙开博学鸿词科，开明史馆，乾隆接受朱筠的建议，纂辑四库全书，不论他们的动机如何，在客观上促进了学术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开四库馆，从全国各地征集图书资料，这就使一些学者能有机会接

触到大量的古典文献，并有机会交流学术思想，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也成了语言文字学的研究中心。清代一些著名的语言学家，都跟北京有直接关系，戴震是在来到北京之后，才被钱大昕发现，誉为“天下奇才”，⑬邵晋涵、孔广森、王念孙、王引之、郝懿行、段玉裁、桂馥等人，有的长住北京，一面做官，一面从事著述；有的是在北京接受了戴震的学术思想，确立了自己的专业研究方向。

以籍贯而论，清代的语言文字学家绝大多数都出生在苏皖地区，因为这里靠近运河，靠近长江下游，经济比较发达，文化教育较为普及，像《尔雅》、《说文》、《广韵》这样的著作，明末清初的士人已很难见到，而到了乾、嘉时代，东南地区有的乡塾就以这些书作为教科书。“许郑之学”，风靡一时。正因为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才能造就出一批专业人才来。

清代语言学的成就很突出，问题也很突出。首先，他们有严重的复古主义倾向。具体表现在：对汉以后的语言文字学没有采取分析态度。顾炎武就开了这个不好的风气。但是，顾炎武的批判主要是针对明末的士人，他心怀亡国之痛，对明朝的士人很有情绪，他认为这般人不务实学，空谈性命，把国家也给“谈”没了。这样的认识显然不正确。我在上一章已经讲了，明万历年间的语言学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不可一概否定。到了戴震、钱大昕，不仅批判明朝人，对明朝语言学的成就否定过多，就是对晋唐宋的语言学成就也否定过多。戴震说：

晋人傅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胸臆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在其所弃。⑭钱大昕说：

汉儒说经，遵守家法，诂训传笺，不失先民之旨，自晋

代尚空虚，宋贤喜顿悟，笑问学为支离，弃注疏为糟粕，读经之家，师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诠释经典。⑮

晋宋两代的训诂学，各自有其特色，他们有"师心自用"的缺点，但也敢于创新。朱熹也"常教人看注疏，不可轻议汉儒。"⑯朱熹称赞"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⑰何曾"弃注疏为糟粕"！至于以"俚俗之言，诠释经典"，有何不可！

理论上的片面性，实启门户之争。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把顾、江、戴、段、二王等列入"汉学家"的行列，本是不伦不类，但宋学家正好瞄准这个靶子，大肆攻击。顾、江、戴、段等人根本不是什么"汉学家"，⑱而有清一代的汉宋之争，顾与戴是有责任的。

清代语言学的复古主义倾向，还表现在他们对现实语言问题漠不关心。多数语言学家在故纸堆中讨生活，甚至对汉以后清以前一些研究活语言的著作，评价也非常之低。他们在活语言研究方面成绩最差，远不如元明二代的语言学家。

在研究方法上，有的人过分强调考据，甚至为考据而考据。乾、嘉以后的语言学家，统观全局的能力，分析的能力，越来越差。有的人终其身只会爬梳材料，堆砌材料，引不出科学的结论。这说明传统语言学已经走向终点，必须要有新的观点，新的方法，对之进行新的改造，才能别开新面。

注：

①《日知录卷》十九。

②《日知录卷》二十一。

③《答李子德书》。

④《戴东原集》（下），107页。万有文库本。

⑤《戴东原集》（下），36页。万有文库本。

⑥⑭《戴东原集》（下），33页。万有文库本。

⑦《潜研堂文集》卷24，344页。万有文库本。

⑧⑮《潜研堂文集》卷24，349页。万有文库本。

⑨《潜研堂文集》卷24，348页。万有文库本。

⑩《潜研堂文集》卷24，351页。万有文库本。

⑪《日知录》卷十九。

⑫阮元：《揅经室集·国史儒林传序》。

⑬《潜研堂文集》卷39，620页。万有文库本。

⑯⑰皮锡瑞：《经学历史》299页。

⑱可参阅龚自珍：《与江子屏笺》。《定庵全集》卷六。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另外，可参阅拙文：《乾嘉时代的语言学》。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1期。

第二十二节　清代古音学

学术史上常有这样的情形，旧观点、旧体系受到批判之后，并不是马上就会消失的；新观点、新体系提出之后，也并不可能一下子就会获得普遍的赞同。新旧之间总要经过一番较量、斗争，新的体系才能取代旧的体系，并胜利地向前发展。清代初年古音学领域也展开了一场新旧之间的斗争。新体系的代表人物是

顾炎武，旧体系的维护者是毛奇龄。

顾炎武（1613—1682），初名绛，字宁人，人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明清之际的思想家，著名学者。他“潜心声韵几五十年，作《音学五书》，而古音乃大明于天下”。①《五书》以《诗本音》和《古音表》最为重要，《诗本音》是《古音表》的根据，《古音表》是《诗本音》的归纳。顾炎武将上古韵划分为十类：

东冬钟江第一

支之半脂之微齐佳皆灰咍尤之半第二

鱼虞模麻之半侯第三

真谆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删山先仙第四

萧宵肴豪尤之半幽第五

歌戈麻之半支之半第六

阳唐庚之半第七

庚之半耕清青第八

蒸登第九

侵覃谈盐添咸衔严凡第十

顾炎武还没有给韵部立专有名称，只是用《广韵》平声五十五个韵目（庚尤不在内）分别给各类命名。十部之中，六、七、八、九等四个部为江永以后的古韵学家所接受，其他六个部虽说比较粗疏，也不过是进一步离析的问题。咸丰七年杨传第在《重刊李氏古今韵考序》中说，江、段二人的分部“益密于顾氏，然皆自顾氏之十部导之，故通乎十部之说，则于求古人之音，思过半矣。”②

《古今韵考》的作者是顾炎武的友人李因笃，字天生，一字子德，陕西富平人。他“于顾氏《音学五书》尝预参订，深明顾书之蕴。”③所以顾炎武曾说：“深知吾书，海内惟李生一人。”④李因笃的《古今韵考》成书于康熙二十八年，也遵顾说分古音为十部，并高度评价了《音学五书》，这在当时是很有意义的。因为顾炎武已于康熙二十一年去世，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毛奇龄抛出了《古今通韵》，坚持古音“转叶”的观点，对陈第、顾炎武大加非议。李因笃一向反对毛奇龄的“转叶”论，据说他们曾在一起论古韵，意见不合，“奇龄强辩，因笃气愤填膺，不能答，遂拔剑斫之，奇龄骇走，当时相传为快事。”⑤在《古今韵考》中，李因笃又指出：“固陋自安，妄言转叶，虽当代通儒不免焉。”所谓“通儒”，就包括毛奇龄在内。

毛奇龄（1623—1716），字大可，浙江萧山人，人称西河先生。他对清代学风的转变起过重要作用。阮元说：“有明三百年，以时文相尚，其弊庸陋谫僿，至有不能举经史名目者。国朝经学盛兴，检讨(毛奇龄曾官翰林院检讨)首出于东林、蕺山（晚明顾宪成等人曾在东林书院讲学，称为东林党。晚明刘宗周因讲学于蕺山，学者称蕺山先生。黄宗羲是他的学生）空文讲学之余，以经学自任，大声疾呼，而一时之实学顿起……迄今学者日益昌明，大江南北，著书授徒之家数十，视检讨而精核者固多，谓非检讨开始之功则不可。”⑥但《古今通韵》一书，实是大倒退，无“开始之功”可言。写此书时，毛奇龄正在翰林院任检讨，纂修明史，他把自己的韵书进呈康熙，康熙“特召阁臣使传谕称善”。此书的正式名称为《康熙甲子史馆新刊古今通韵》。题上“康熙”，有与《洪武正韵》相提并论之意，“甲子史馆新

刊”则是取《壬子新刊礼部韵略》之意。这部韵书一经康熙御览，算是通了天，一般人只能说是，顾炎武的外甥徐乾学（时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为此书作序，也只说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什么“乾学无似，不能为说以通两家（指顾与毛）之邮，惟是二书（指《音学五书》和《古今通韵》）各有归趣，要皆积数十年精力为之，其必传于后无疑者。先舅藏书名山，以俟后人，而此书遂达御前，宣付史馆刊行于世。”毛奇龄在书中大批顾炎武，说“顾亭林作《音学五书》，遵陈第古无叶音之说”是“大无理”，是“偏执”，是“不识古韵，而欲以讲韵学，虽读书多年，犹多误处”，是“明知故犯”，“岂有此理”。对此，徐乾学一句反驳的话也没有。其实，毛奇龄完全是开倒车，他不仅要倒回到吴棫、郑庠的老路上去，而且比吴、郑还要荒谬。他把自己的古韵体系概括为一句话，叫做：五部三声两界两合。

五部：

东冬江阳庚青蒸第一部

支微齐佳灰鱼虞歌麻尤第二部

鱼虞歌麻萧肴豪尤第三部

真文元寒删先第四部

侵覃盐咸第五部

跟郑庠的六部相比，一、四、五三部完全一样，鱼虞歌麻萧肴豪尤，郑庠分为两部，毛奇龄合而为一，又将鱼虞歌麻尤五韵与支微齐佳灰混为一部。

三声：就是主张上古声调平上去三声合用。

两界：就是阴声十三韵（无入声相配）为一通，阳声十七韵（有入声相配）为一通。阳声十七韵的具体通转界限是：第一部

（收－ŋ）与第四部（收－n）通，第四部又与第五部（收－m）通，叫做"连环通转"。

两合：就是阴声韵的去声和跟阳声韵相配的入声相合（以去之无入十三部与入十七部互合，而平上不与焉）。阴声韵的去声与阳声韵的入声"互合"，有一定的根据，后来段玉裁主张古无去声，与毛奇龄的"两合"说有相同之处。

毛奇龄的古韵体系，从表面上看，比之吴棫、郑庠要严密得多，实际上这个体系是无意义的。因为部虽有五，而界只有二。结果是阴声韵等于只有一个部，阳声韵经"连环通转"，也等于只有一个部了。整个上古韵就只有两个大韵部了。其中阳韵之入又与阴韵之去"互合"，两大韵部的界限也突破了，这才是真正的"岂有此理"！

错误的体系源于错误的指导思想。毛奇龄主张"字有本音，有转音。本音为韵，转音为叶"。"转是转注，所谓一字数音，必转释其音而后可知者"，"叶即古协字……调剂谐之义，凡古文旧注所称'叶韵'者皆是。大抵今韵押例，律诗同用，古诗通用，通用而不用本音谓之转用，转其一二字而不与全部通转者，则谓之叶。"⑦

古音通转是有条件的，通转之所以产生，是方音或历史演变的缘故，并不是像毛奇龄所说的这样，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的范围内，同一个字有什么"本音"、"转音"之别。从宋之吴棫到明之杨慎，一直到清之毛奇龄，他们都还不懂什么是真正的"古本音"，不懂得研究上古音，只能选取上古时代的韵文材料；也不研究韵例，当然也就不懂得本韵、合韵的区别了。他们花费很多时间搞出来的体系，只不过是一团乱麻。我们充分了解这些失

败的教训，就更可以深刻认识顾炎武的古音体系有多么重要的意义。钱大昕说："此顾氏讲求古音，其识高出于毛奇龄辈万倍，而大有功于艺林者也。""若毛奇龄辈，不知而作，哓哓謷謷，置与勿辩可也。"（《潜研堂文集》卷十五）

毛奇龄之后，康熙年间还有一位持"叶音"说的人是邵长蘅（公元1637—1704年），他是江苏武进（常州）人，于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6年）写成《古今韵略》五卷，其书"古韵依才老《韵补》，省其复字，而仅益以杨氏《古音》（指杨慎的《转注古音略》），及今增三百四十余字。"⑧他不赞同陈第古无叶音的学说。邵长蘅将古韵分为十类，每一类就是一部。内分"古韵通"与"古韵叶"两部分。所谓"通者，如东冬江相通，支微齐佳灰相通之类是也；叶则音韵俱非，而切响通之。《毛诗》、《离骚》谓之叶（指朱熹注文的叶音），杨氏（指杨慎）谓之转注，义则一耳。"⑨如一东类，"古韵通"就是一东通二冬、三江，"古韵叶"所收的字有虞、牙、家、国等，这些就是与东部"音韵俱非"而"切响"可"通之"的字。他的分部与吴棫、毛奇龄都不同，吸收了顾炎武、柴绍炳等人的长处，如阳韵独立成部，不与江通，从顾；庚青蒸三韵相通，而不通真，从柴。这部书谈不上有什么发明独创，它是立足于叶音通转而又想向顾氏靠拢的过渡产物。

康熙年间的古音学基本上还处在草创阶段。到了乾、嘉时代，清代古音学达到了高峰，这时，叶音通转说被完全抛弃了，毛奇龄的红极一时的《康熙甲子史馆新刊古今通韵》已被束之高阁，顾炎武的《音学五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沿着顾炎武所开辟的研究道路往前进的有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孔

广森、姚文田、张惠言、严可均、刘逢禄、江有诰、夏炘、朱骏声、龙启瑞等人，他们都有专著问世，成就的大小，自不可一概而论。

顾炎武去世的前一年，江永诞生了。江永（公元1681—1762年），字慎修，安徽徽州府婺源（今属江西省）人。他精通三礼、天文、乐律，又是著名音韵学家。《古韵标准》是他研究上古音的代表作。在此书的“例言”中，他批评顾氏“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长于“审音”，正是江永的特色。所谓“审音”就是运用等韵学、今音学的原理来研究上古韵部的分合，就是从语音的系统性来考察古韵，而不只是局限于韵文材料的考订。在实际研究中，江永是把考古与审音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运用的，所以他能对顾炎武的三、四、五、十等部重新进行分析，得出了古韵十三部的结论。

顾炎武的第三部包括鱼虞模侯及麻之半。江永将侯韵划归幽部，将虞韵一分为二，一部分还留在鱼部，一部分归入幽部。这样，鱼部的内容就相当于《广韵》的鱼模两韵及虞、麻之半。

顾炎武的第四部包括从真谆至先仙十四个韵（也就是平水韵的真文元寒删先六韵），这是继承郑庠的分法，柴绍炳在《古韵通》中已经批评了郑庠。他说：“真文互通于寒删先者，间亦有之，岂成法哉！故两部自当区分，考之古制，断不能并……寒删先，真文，绝不相杂。故断以真文为一部，寒删先为一部，元则半通两属焉。”⑩江永也将这十四个韵分为两部，具体分法与柴氏有所不同。他把真谆臻文殷魂痕七韵定为真部，把元寒桓删山仙六个韵定为元部，剩下一个先韵析分为二，一部分字归真部，一部分字归元部。

顾炎武的第五部包括萧宵肴豪幽及尤之半。江永也析之为二：幽部包括幽韵和从顾氏第三部划出来的侯韵及虞尤之半（尤韵的另一半，顾氏归第二部），还包括萧肴豪三韵的部分字（口弇而声细者）；宵部以宵韵为基础，另收萧肴豪的部分字（口开而声大者）。

顾炎武的第十部包括从侵到凡九韵。江永说："愚谓此九韵与真至仙十四韵相似，当以音之侈弇分为两部。神珙等韵分深摄为内转，咸摄为外转是也。"⑪这就是侵谈分立。侵部以侵韵为主，兼收覃谈盐以及东韵一些字；谈部收覃谈盐严咸的部分字。

江永将顾炎武的四、五、十部都析分为二，其音理根据就是侈弇（敛）对立。用现代术语来解释，大致上是舌面元音高低的问题。弇或敛是指舌面元音较高，侈是指舌面元音低。江永认为真幽侵三部属弇音，元宵谈三部属侈音。我们现在对这几个部的主要元音的构拟也体现了这个特点。

乾隆年间古音学的重要人物有戴、段、王、孔。

戴震上承江永、下启段、王。但按成书年代而论，段先于戴。

段玉裁（公元1735—1815年），字若膺，号茂堂，江苏金坛人，晚年侨居苏州，曾在贵州、四川等地当过知县。他于二十九岁那年在北京请业于比他大十二岁的戴震，从此开始，直到戴震去世，他们师生相与论韵达十五年之久。

段玉裁分古韵为十七部，是在乾隆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之间。起初，戴震认为"支脂之分为三者，恐不其然。"（段玉裁：《声类表序》）过了五年，也就是乾隆三十八年，戴震才肯定段氏分支脂之为三部是正确的。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

段玉裁在四川刻印《六书音均表》，四十二年正月戴震为此书作序。序文说："若夫五支异于六脂……七之又异于支脂……蹇千有余年莫之或省者，一旦理解，按诸三百篇划然，岂非稽古大快事欤！"

段玉裁在古韵分部方面的另外两个成就是从江永的真部又析出一个文部；从江永的幽部析出一个侯部。他还第一次按照音理将古韵十七部分为六大类：

第一部（之）为一类；

二、三、四、五部（宵幽侯鱼）为一类；

六、七、八部（蒸侵谈）为一类；

九、十、十一部（东阳耕）为一类；

十二、十三、十四部（真文元）为一类；

十五、十六、十七部（脂支歌）为一类。

邻韵以类相从，对"古合韵"的解释就较为可信了。"如母字古在之咍部，《诗》凡十七见，而《蝃蝀》协雨，兴字古在蒸登部，《诗》且五见，而《大明》协林、心是也。知其分而后知其合，知其合而后愈知其分，凡三百篇及三代秦汉之音，研求其所合，又因所合之多寡远近及异平同入为处，而得其次弟，此十七部先后所由定。"⑫ 研究合韵的分布状况，是排列十七部次弟的重要依据。"同类为近，异类之远，非同类而次弟相附为近，次弟相隔为远。"⑬ 这些意见对于我们拟测上古韵部系统不无参考价值。

戴震（公元1724—1777年），字慎修，又字东原，安徽徽州府休宁（今屯溪市隆阜村）人。他是乾隆中期学术界的领袖人物，著名思想家、语言学家。他出身贫寒，青年时代常靠教书维持生

活。四十岁（公元1762年）才考中举人，考了六次进士都没有考中，直到五十三岁时，才奉命与乙未（乾隆四十年）贡士一体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

戴震于青年时代就钻研音韵学，与其师江永“商定《古韵标准》四卷……于韵学不无小补。”⑭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他主张分古韵为七类二十部（平上去十三部，入声七部），去世前一年写的《答段若膺论韵书》，最后将古韵定为九类二十五部，若入声附而不列，则为十六部。各韵部以影母字命名，具有用汉字标注音值的性质，请看下表：（见303页附表）

戴震这个韵部系统的特点是：

一、入声独立。这一点与江永有一致之处，江氏入声分八部，戴氏分为九部，就是从药部中析出了一个铎部，但铎部本应跟药部一样，归入鼻音类，戴震却归入了喉音类，配置不当。至于以宵配阳，也嫌证据不足。

二、第七类将祭部独立出来，这是他的新发现，但把祭部放在阴声韵的位置上，不合理。

三、最为重要的是戴震进一步确立了阳阴入三分法的上古韵部系统。在这个完整的体系中，最为人所不满的是他把歌部列入第一类的阳声韵。但我认为也可能是我们误解了戴震的本意。戴震说：“歌戈本与旧有入之韵近。”⑮“旧有入之韵”就是阳声韵，戴震只是说歌戈与之相“近”而已，相近不等于相同。而他之所以将歌韵列为全表的第一部，因为他认为“凡音声皆起于喉，故有以歌韵为声音之元者。”⑯很显然，所谓“凡音声”是包括阴声韵和阳声韵都在内的。戴震把歌部置于诸韵部之首，正体现了“声音之元者”的思想，其性质与一般阴声韵不同，与一

第一类	喉音	一	阿	（歌）	阳	第二类	鼻音	四	膺	（蒸）	阳
		二	乌	（鱼）	阴			五	噫	（之）	阴
		三	垩	（铎）	入			六	億	（职）	入
第三类	鼻音	七	翁	（东）	阳	第四类	鼻音	十	央	（阳）	阳
		八	讴	（侯）	阴			十一	夭	（宵）	阴
		九	屋	（屋）	入			十二	约	（药）	入
第五类	鼻音	十三	婴	（耕）	阳	第六类	舌齿音	十六	殷	（真）	阳
		十四	娃	（支）	阴			十七	衣	（脂）	阴
		十五	戹	（锡）	入			十八	乙	（质）	入
第七类	舌齿音	十九	安	（元）	阳	第八类	唇音	二二	音	（侵）	阳
		二十	霭	（祭）	阴			二三	邑	（缉）	入
		二一	遏	（月）	入						
第九类	唇音	二四	醃	（谈）	阳						
		二五	韘	（叶）	入						

般阳声韵也不同。我这样理解不一定对，意在说明戴震不至于糊涂到连歌部不是阳声韵也不知道。

阳阴入三分法确立于戴氏，导源于江永。戴震说，江永已知阳声韵、阴声韵“皆有入声”，“江以屋质月药锡职缉盍隶东真元阳耕蒸侵谈，又以屋隶侯，质月锡职隶支，药隶鱼，缉盍隶侵谈。”⑰用表排列起来，这就是阳阴入三声相配。

东	真	元	阳	耕	蒸	侵	谈
屋	质	月	药	锡	职	缉	盍
侯	支		鱼	支			

江永并没有彻底解决三分法的问题，这跟分部不彻底也有一定的关系。直到段玉裁分出支脂之三部，戴震又分出祭部、铎部，入声与阴声的搭配就大为改观。

若仅就阳声韵和阴声韵而论，戴、段不同之点是："今书内列十七部，仆之意第三（幽）第四（侯）当并，第十二（真）第十三（文）亦当并"[18]。幽侯并，真文并，十七部减为十五部，再加上戴氏自己分出的祭部，就成为十六部了。

孔广森（公元1752年—1786年），字众仲，一字抝约，号顨（xùn）轩，山东曲阜人，十七岁中举人，二十岁中进士。他虽是戴震的弟子，却是个今文经学家，姚鼐称赞他"博学工为词章。"[19]

孔广森的古韵学著作有《诗声类》和《诗声分例》。他分古韵为十八类，阳声九类，阴声九类。

阳声	阴声
1.原类（元）	歌类
2.丁类（耕）	支类
3.辰类（真文）	脂类
4.阳类（阳）	鱼类
5.东类（东）	侯类
6.冬类（冬）	幽类
7.侵类（侵）	宵类

8.蒸类（蒸）　　之类

9.谈类（谈）　　合类（缉叶）

孔广森的分部与段玉裁基本上一样，不同的是从东部分出冬部（冬众宗中虫戎宫农夆宋等字），又从侵谈二部分出一个合部，这个合部他是当作阴声韵来看待的，显然不妥。另外，真文合一，不从段而从戴。

孔广森还明确提出了“此九部者，各以阴阳相配，而可以对转”的理论。⑳他说：“入声者，阴阳互转之枢纽，而古今变迁之原委也。举之咍一部而言之，之上为止，止之去为志，志音稍短则为职，由职而转则为证、为拯、为蒸矣；咍之上为海，海之去为代，代音稍短则为德，由德而转则为嶝、为等、为登矣。推诸他部，耕与佳相配，阳与鱼相配，东与侯相配，冬与幽相配，侵与宵相配，真与脂相配，元与歌相配，其间七音递转，莫不如是。”㉑他用宵类配侵类，跟他把合类当作阴类一样，都是不合理的。严可均批评说：“孔以宵配侵，既不顺口，又左验绝稀。”㉒

阴阳对转的理论为上古韵部的构拟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因为阴阳之所以能对转，证明其主要元音是一样的。对转论与吴、郑、杨、毛的通转论在性质上完全不同。阴阳对转是以上古韵部的科学划分作为基础的，没有严密的古韵部的划分，只就《广韵》音系去谈对转，就会转成一团乱麻，通转论的失败就在于此。

对转论实始于戴震。戴震在《答段若膺论韵》中说：

其正转之法有三：一为转而不出其类，脂转皆，之转咍，支转佳是也；一为相配互转，真文魂先转脂微灰齐，换

转泰，咍海转登等，侯转东，厚转讲，模转歌是也；一为联贯递转，蒸登转东，之咍转尤，职德转屋，东冬转江，尤幽转萧，屋烛转觉，阳唐转庚，药转锡，真转先，侵转覃是也。以正转知其相配及次序，而不以旁转惑之，以正转之同入相配，定其分合。㉒

戴氏所说的正转还是从《广韵》的角度来谈古韵的。他所说的"转而不出其类"、"联贯递传"是属于古韵分部和邻韵相通的音理根据，"相配互转"则属于阴阳韵的关系问题，"相配"是指阴阳相配，"互转"是指阴阳互转，其中的"模转歌"，是把歌韵当作阳声韵来对待的。戴震的"正转"法概念还比较模糊，搭配也不成系统。所以，阴阳对转理论的完整的运用还是要归功于孔广森。

王念孙（公元1744—1832年），字怀祖，人称石臞先生，江苏高邮人。他的父亲王安国担任过礼部尚书、工部尚书等职。他3岁随父进京，四岁读《尔雅》，13岁从戴东原学习。他跟段玉裁同时进行古韵研究，得到的结论大多不谋而合，但他的古韵学著作问世的时间却晚于段玉裁。他分古韵为二十一部，东、蒸、侵、谈、阳、耕、真、谆、元、歌等十部为一类，皆有平上去而无入；支、至、脂、祭、盍、缉、之、鱼、侯、幽、宵等十一部为一类，或四声皆备（支脂之鱼侯幽宵），或有去入而无平上（至祭），或有入而无平上去（盍缉），而入声则十一部皆有之，正与前十类之无入者相反。"此皆以九经、楚辞之文为准，而不从切韵之例。"㉓

研究上古音的人都承认：江、戴是审音派，段、王是考古派。王念孙对古音系统的看法的确跟戴震有所不同。他强调"不

从切韵之例”，若从戴震的观点看来，正是“考古之功多，辨声之功少也。”㉔他们对入声的配置也很不一样。王念孙自东至歌之十部（戴氏真谆合一，故只有九部）都无入声与之相配，戴则全配之以入声。

段、王之间也有不同：一、王氏将收-p尾的入声缉盍二部独立出来，段则附于侵谈；二、王氏将收-t尾的至祭二部独立，段则将至部的一部分字归入他的第十二部（真部），这是很不恰当的，王氏独立出一个至部，这是他对古韵分部的独特发现。关于这个问题，他于乾隆五十四年秋在北京和段玉裁当面讨论过，但段玉裁没有接受他的意见。㉕

王念孙与孔广森不同的是：东冬不分立。晚年著《合韵谱》时，才增立冬部，定古韵为二十二部。

继孔广森之后，严可均（1762—1843）分古韵为十六部。严氏号铁桥，浙江乌程人，精于《说文》之学，他的《说文声类》是按古音系统研究《说文》谐声关系的，阴声、阳声各八部。阴声有之、支、脂、歌、鱼、侯、幽、宵八类；阳声有蒸、耕、真、元、阳、东、侵、谈八类。阴声分部全同于孔广森，阳声类与孔略有不同，并冬于侵（王力先生亦主张《诗经》时代冬侵合用，均收-m尾，《楚辞》时代冬由-m尾变-ŋ尾）。另外，孔氏的合类，严附于谈类之下。

姚文田（1758—1827），字秋农，浙江归安人，嘉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他的《古音谱》完稿于道光初年，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正式刊印。这时姚氏谢世已近二十年。《古音谱》分古韵为八类二十六部（不计入声，则为十七部）。

第一类：　东　侵　登

第二类：　之　齐　支

第三类：　文　真　寒　青

第四类：　麻

第五类：　鱼　侯　幽　交

第六类：　庚

第七类：　炎

第八类：　九个入声韵部。姚文田说："月、易、卬、昔、屋、甸、乐、合九部，其平声皆有别，然四声惟入音最短，故各部皆相近，诸书亦彼此互通，今定以为第八类。"

拿他的八类与段玉裁的六类相比，姚氏的分类系统性不强，将"青部"（即耕部）归到第三类，侵部不与炎部（即谈部）同类，反而与东同类，都不妥。

江有诰（1773—1851），字晋三，号古愚。徽州府歙县人，一生"惟好音韵之学"⑳，著有《诗经韵读》、《群经韵读》、《楚辞韵读》、《唐韵四声正》、《谐声表》、《入声表》、《等韵丛说》，分古韵为二十一部，在十七部的基础上，将祭部独立，他是在不了解戴震已分出祭部的情况下得出这一结论的。他在给段玉裁的信中说："去之祭泰夬废，入之月曷末辖薛，《表》中并入脂部，有诰考此九韵，古人每独用……则此九韵当别为一部无疑也。"又"以缉合为一部，盍叶以下为一部，如此，增立三部，合先生之所分，共二十部。"后来，他读了孔广森的《诗声类》，又吸收孔氏东冬（江有诰将冬部改名为中部）分部的意见，定古韵为二十一部。这就是：

之、幽、宵、侯、鱼、歌、支、脂、祭、元、文、真、耕、阳、东、中、蒸、侵、谈、叶、缉。

各部次序的排列，较之段玉裁更为合理，至今仍有不少古韵学家采取这种排列法。

段玉裁于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为江有诰的《诗经韵读》作序时，称赞此书“精深邃密”，“集音学之成，于前此五家（指顾、江、戴、孔、段）皆有匡补之功”，还赞扬他在审音、考古两个方面都“深造自得”。这时，段玉裁七十八岁，他说“晋三富于春秋”，当时的江有诰还不到四十岁。段玉裁去世之后，江有诰又与王念孙讨论韵学。王念孙给江有诰写信说：《诗经韵读》“与鄙见如趋一轨，不觉狂喜。”段、王二人，奖掖后学，不遗余力，这种品质是很可贵的。

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中分古韵为十八部，用《易》卦作为部名：

丰部（东）	升部（蒸）	临部（侵）
谦部（谈）	颐部（之）	孚部（幽）
小部（宵）	需部（侯）	豫部（鱼）
随部（歌）	解部（支）	履部（脂）
泰部（祭）	乾部（元）	屯部（文）
坤部（真）	鼎部（耕）	壮部（阳）

朱氏分部“大抵从懋堂先生为多，若别霁质于真而为泰部，入声以屋烛承侯为需部，又参酌于怀祖先生之说。”（罗惇衍《说文通训定声·序》）

朱骏声的十个入声韵具有半独立的性质，他称之为“分部”。各分部的字附在有关阴声韵下，但可以与相应的阳声韵相配。请看下表：

阴声　　入声　　阳声

颐	革	升
孚	复	丰①
需	剥	丰
小	彝	壮
豫	泽	
随	泽	
解	益	鼎
履	日	坤
	日	屯②
泰	月	屯
	月	乾
	习	临
	噬	谦

①丰之"分部同孚需"。即与孚之分部、需之分部相配。

②屯之"分部同履泰"。即与履之分部、泰之分部相配。

朱氏也注意韵"转"的问题，可阅《说文通训定声总目》各部目小注。

龙启瑞（1814—1858），字翰臣，广西桂林府临桂县人。著《古韵通说》二十卷。

龙氏分古韵为二十部：冬、东、支、脂、质、之、歌、鱼、侯、幽、宵、真、谆、元、阳、耕、蒸、侵、谈、缉。二十部中有两个独立的入声韵，即质（相当于王念孙的至部）、缉部。他说："大抵古时入声字绝少，其偏旁皆从彼三声（盈按：指平上去）递转而来。"又说："然则质之不入脂，缉之不入侵谈，何也？曰：古入声之为用，与三声异，必如《广韵》之分配则凿矣。善言韵者，于此皆听其自为一部可也。"（卷二十）他对入声的看法不符合《诗经》时代的实际情况。

关于冬部独立，他坚决维护张广森、张惠言的结论。“意以《唐韵》冬为都宗切，东为德红切，一宽博而平缓，一峻上而高亮，即音分韵，必有深意存乎其间。三百篇中用蒸侵之字，多与此部（冬）相合，鲜有搀入东钟江韵者，此其所以别乎东而自成一部，后之谈古韵者，莫能易之也。”（卷一）

他将二十部通而为十：冬东通，支脂之质歌通，鱼不与他部通，侯幽通，幽宵通，真谆元三部通，真又自通耕，阳不与他部通，蒸不与他部通，侵谈缉三部通。

每一部之内有下列内容：诗韵、经韵、本音、通韵、转音、论曰、赞曰。

诗韵、经韵取裁于段氏《六书音均表》，本音取裁于姚文田《说文声系》，张惠言《说文谐声谱》，苗夔《说文声读表》。所谓“本音”即各部之谐声表。“通韵”指邻韵之字相通。所谓“转音”，属于异读问题。龙氏说：“骖、阴、饮、谌、临（俱侵部韵）、宏（蒸部韵），以上六字，诗韵俱转入此部（冬部），侵蒸部中字与此部为双声也。后凡言转声之字，仿此。”又说：“转音，即双声之异名，天地间自有是不可磨灭者，今时方音及儿童学语，往往有之，乃振古之元音也。古经中用韵，及字书偏旁有不合者，苟求之于是，无不可通，必谓古一字只有一音，非确论也。兹故设为此条，所以济本音、通韵之穷，而读古书及《说文》者，愈释然而无疑矣。”

刘禧延《古韵通说·跋》：“桂林龙翰臣方伯纂《古韵通说》，荟萃诸家，衷于一是，义例精详，严其所以分，而终表其所以合，不为傅会，亦不涉拘墟，自谓古韵之学之大成，非过论也。”其实，龙氏的古韵学说瑕瑜互见，根本谈不上集“大成”。

夏炘（1789—1871）的《诗古韵表二十二部集说》，是一本综合性质的史料书，书中着重介绍了顾、江（永）、段、江（有诰）、王等五家分部情况。他认为五家分部已成定论，“增之无可复增，减之亦不能复减，凡自别乎五先生之说者，皆异说也。”（卷上）他肯定五家分部，这是对的，但将异乎此者斥之为“异说”，未免武断。

一门学科的发展兴盛，总要具备两个条件才行。一条是要有先进的理论作为指导；一条是要有解决具体问题的科学方法。

清代的古音学者之所以能取得空前的成就，在理论上受到明代陈第、焦竑的“古诗无叶音”的启迪，在实践中，又经过几辈人的努力，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这就是：一、诗韵系联法；二、谐声类推法；三、古今（今，指广韵）韵比较法，即唐韵离析法。

诗韵系联法就是把《诗经》（后来也推广到先秦所有的韵文）中互相押韵的字系联在一起，组成韵部。顾炎武的《诗本音》、《易音》，对押韵的字一一注明。如“关关雎鸠”，“鸠”字下注云：“十八尤。言十八尤者，此字在《唐韵》之十八尤也。余做此。”下面的“洲”、“逑”、“流”、“求”，都注明“十八尤”。《邶风·柏舟》首章的“舟”、“流”、“忧”、“游”，也注明“十八尤”。《鄘风·载驰》首章“悠”字下注“十八尤”，“漕”字下注“六豪”，“忧”字注“十八尤”。这样，他就把鸠、洲、逑、流、求、休、舟、忧、游、悠、漕等字都联在一起了，然后归入他的《古音表》第五部，证明它们同一韵部。这种做法比陈第只注直音且不分部的方法进步多了。它的好处就是通过归纳，可以上升为系统。

诗韵系联法，张惠言（1761—1802，字皋文，江苏武进人，清代常州词派创始人，官翰林院编修）称之为“丝联绳引”法。他的《说文谐声谱》卷二说：“余既以诗韵丝联绳引，较其部分。”其于张成孙注释说：“丝连绳引者，意谓由‘中’而得‘宫躬降’，复由‘宫’而得‘虫宗’，复由‘降’而得‘螽忡’等字是也。故今表诗韵，即以名之。”王显同志说：“大概从顾炎武起，就都是使用这个方法。不过他们既然没明白地说了出来，那么总结出这个方法，自然只能归功于张惠言。”（《清代学者在古韵分部研究上的贡献》，见《古汉语研究论文集》二，12页）王显同志还指出：“顾炎武、段玉裁他们又还使用了统计法。除此以外，是否还使用了别的方法，对这个问题过去很少研究，此刻还回答不上来。”

“同谐声者必同部”，这是段玉裁归纳古韵部的一个重要方法。他在《古十七部谐声表》中说：

> 考周秦有韵之文，某声必在某部，至啧而不可乱。故视其偏旁以何字为声，而知其音在某部，易简而天下之理得也。许叔重作《说文解字》时，未有反语，但云某声某声，即以为韵书可也。自音有变转，同一声而分散于各部各韵，如一“某声”，而“某”在厚韵，“媒腜”在灰韵，一“每声”，而“悔晦”在队韵，“敏”在轸韵，“痗䵋”在厚韵之类，参差不齐，承学多疑之。要其始则同谐声者必同部也。

《表》内共分十七部，把他认为是音同或音近的声符分别归在各部之下，全《表》共有声符1521个。后来江有诰又对此《表》进行了一番改造，该归并的归并，该增补的增补，并按照他的分部，又作了一个《谐声表》，共列声符1139个，比段玉裁

的《谐声表》少了380多个声符。清代的古音学家也有仅仅根据《诗经》中出现的偏旁作谐声表的，如孔广森在《诗声类》中列举了770声符，夏炘的《诗古韵表二十二部集说》列举了757声符。

谐声表有两个好处。一是能把上古一万多字都分归在各部之下，这是按诗韵分部所难以办到的。《诗经》入韵的字，总共才一千八百七十多，而《说文》有字九千多，还有《说文》不录之字，加起来有一万多。这一万多字除掉《诗经》入韵的字，还剩下八千多，这是很大的一个数目字，这些字应当归到哪些部中去呢，有了谐声表就可以类推了。如《诗》韵中仅有“作”、“酢”、“柞”三字，按谐声类推，我们就知道凡是从“乍”得声的字如迮、昨、笮、诈、怍等，都应归到同一韵部中去。严可均的《说文声类》、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都是按照这个办法，把《说文》所有的字分别归到各韵部中去了。段玉裁说：“一声可谐万字，万字而必同部。”㉗这个论断基本上是科学的。

谐声表的第二个好处是它有很高的实用价值。一个初学古音学的人，对一万多字的归部是很难一一记住的，若掌握了谐声表，就可按谐声类推了。如知道了“台声”在之部，从台得声的治、枲、怠、怡、始、笞、眙、邰、绐、苔、给等，无疑也是之部字了。例外也是有的。如“铁”字本是从“壬”（他鼎切，tǐng）得声，朱骏声据此把“铁”归到鼎部（即耕部），从谐声系统看是对的，从语音系统看就乱套了，“铁”是入声字，本应归质部，依壬声归耕是不妥的。有时，谐声会与诗韵发生矛盾。如：“那”本从“冄”得声，在诗韵中“那”却和歌部字押韵，“那”应归歌部，朱骏声归谦部（即谈部），欠妥；又如“斯”字，许慎的分析是“从斤，其声”，而从诗韵看，“斯”押韵三次，不与之

部字相押，应归支部。段玉裁说："其声，未闻。'斯'字自三百篇及唐韵在支部无误，而'其声'在之部，断非声也。"㉘朱骏声认为"斯"字是"从斤，从其，会意"。㉙段、朱二人都在支部立了一个"斯声"，以与之部"其声"相别，这是正确的。这些例子说明，按谐声归部也是一件复杂的工作，谐声的时代不一，谐声的可信程度如何，同一个字的偏旁，有人认为是谐声，有人认为不是谐声，这些都涉及到归字的问题。一般说来，谐声偏旁与诗韵发生矛盾时，原则上应以诗韵为准。诗韵比谐声产生的时代要晚，它更符合春秋战国时代的实际语音。

据谐声、诗韵建立上古韵部，只能描写出上古韵的横切面，必须拿中古音进行对比分析，才能使上古韵部真正建立在语音发展的系统性的基础之上。这种对比分析的有效方法就是从离析唐韵入手，以观察古今音的变化，进而确立"古本音"。离析唐韵以推求上古音的方法，首创之功应归于顾炎武。顾炎武以前的郑庠，"专就唐韵求其合，不能析唐韵求其分"，"虽分部至少，而仍有出韵。"㉚顾炎武已经认识到，古韵与今韵之间有分有合。如上古的第六部（即歌部）分化为中古的歌戈麻支，第七部（即阳部）分化为中古的阳唐庚。也有上古几个韵部的某些字到中古时合流为一韵的，即中古一个韵的字来自上古几个不同的韵。顾炎武离析唐韵的方法是科学的，但观点却不正确。他在古今音对比过程中，发现今音与古音不一致的地方，就认为"乃韵谱相传之误"，以至于写《唐韵正》来"正"唐韵，据古以"正"今，实属荒谬。

清人对古韵的研究结论比较一致，成绩也很可观。但对上古声调的看法则颇为分歧。江有诰道光初年给王念孙写信说："古

韵一事，至今日几如日丽中天，然四声一说，尚无定论。”[31]

顾炎武主张古有四声，但又认为“古人四声一贯”，“上或转为平，去或转为平上，入或转为平上去，则在歌者之抑扬高下而已，故四声可以并用”，“一字之中，自有平上去入”。[32]顾炎武的“一贯”论就是认为一个字的声调是随着具体的语言环境而变的，他虽然肯定古有四声，实际上是认为字无定调。

江永不赞成顾炎武的主张。他说：“平自韵平，上去入自韵上去入，恒也。亦有一章两声或三四声者，随其声讽诵咏歌，亦自谐适，不必皆出一声，如后人诗余歌曲，正以杂用四声为节奏，诗韵何独不然？”“顾氏于入声皆转为平、为上、为去，大谬。”[32]

段玉裁认为“考周秦汉初之文，有平上入而无去……古平上为一类，去入为一类；上与平一也，去与入一也。上声备于三百篇，去声备于魏晋。”[31]

孔广森认为古有平上去而无入。“至于入声，则自缉合等闭口音外，悉当分隶自支至之七部而转为去声。盖入声创自江左，非中原旧读。”[31]他对去声的看法也与众不同。他说：“去声之中，自有长言短言两种读法，每同用而稍别畛域，后世韵书遂取诸阴部去声之短言者，壹改为诸阳部之入声。”[31]

段、孔二人的意见正好相反：前者认为古无去声，后者认为古无入声。但二者都把去入合为一类来考察，这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两个调类的字在上古韵文和谐声系统中，关系非常密切。我们认为：古无入声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孔是山东曲阜人，在他的口语中入声已经消失，就误以为上古也根本不存在入声。不过，他承认上古去声有长短之别，还是注意到了中古的去入二类在上古是有别的。

江有诰“初见亦谓古无四声……至今反复紬绎，始知古人实有四声，特古人所读之声与后人不同，陆氏编韵时不能审明古训，特就当时之声误为分析。”㉝于是他就写了一本《唐韵四声正》，拿上古声调来“正”中古声调，这跟顾炎武“正”唐韵一样，缺乏历史发展观点。

清人关于上古声调的意见，最可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入声问题。顾炎武、段玉裁是考古派，他们只不过把入声当作一个调类看待。顾炎武分入声为四部，却不独立，分别附于第二（脂）第三（鱼）、第五（萧）、第十(侵)部。王念孙称赞顾氏前三部阴入相承，“可称卓识”，而“以缉承侵，以乏承凡，此两歧之见。”㉞这个评论是对的。后来,王念孙、江有诰把缉、叶两部独立出来，正式确立了收-p尾的两个部，把至部、祭部独立出来，确立了收-t尾的两个部，但收-k尾的几个入声部仍然依附于阴声韵，未之独立。只有戴震将全部入声韵独立成部，姚文田在《古音谐》中也将九个入声部全部独立。与戴震不同的是：他虽阴阳入三分，却不是阴阳入相配。

总之，入声问题看起来是个调类问题，实际上关乎到韵部的问题，即对上古韵部采取阴阳两分法，还是阴阳入三分法。这也是考古派与审音派的一大分歧。在当前来说，这个问题还牵涉到如何拟测上古音。

二是古无去声说。王力先生说：“段氏这一个发现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但解决了上古的调类问题，同时也解决了阴声韵和入声韵的分野问题。”㉟所谓解决了调类问题，就是肯定了去入为一类；所谓解决了分野问题，就是确定了阴声韵属于开口音节，去入一类都收-k、-t。

关于上古声母问题，没有引起清儒的普遍注意。有的人认为上古汉语也只有三十六个声母。如江永说："昔人传三十六母，总括一切有字之音，不可增减，不可移易。凡欲增减移易者，皆妄作也。"㊵这段话主要是对明清等韵学而言的，但也反映了他对古声母问题的一个总的看法。

清代语言学家在声母研究中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只有钱大昕一人。

钱大昕（公元1728—1804年），字晓徵，号辛楣，又号竹汀居士。江苏嘉定人。他在上古声母研究中解决了两个问题。

一、古无轻唇音。"凡轻唇之音，古读皆为重唇。"㊶

二、"古无舌头舌上之分，知彻澄三母，以今音读之，与照穿床无别也，求之古音，则与端透定无异。"㊷

轻重唇不分，知组（舌上）与端组（舌头）不分，这两条都已为音韵学家所接受。

钱大昕之后，夏燮(1799—1875)的《述均》、邹汉勋（1805—1853）的《五均论》都讨论过声母问题。《述均》有"齿头、正齿、半齿合用证"，主张精庄合一；又有"舌齿出入证"，主张知照合并。邹汉勋也主张照二与照三分开，又主张照三应与端知合并，但有目无文，语焉不详。

注：

①④李因笃《古今韵考·序》。音学五书包括音论、诗本音、易音、唐韵正、古音表等五种。顾炎武在音学五书后叙中说："予纂辑此书，几三十年。"李因笃说是"几五十年"。二说似有矛盾，但曹学佺于崇祯癸未（公元1643年）年已为《诗本音》作序，证明顾氏在青年时代已开始古音的研究，直至晚年，犹"潜心声韵"，"几五十年"之

说也是有根据的。

②③《古今韵考》。丛书集成初编本，编号为1259。

⑤江藩：《宋学渊源记》卷上，八页。万有文库本。

⑥阮元：《揅经室集·毛西河检讨全集后序》。

⑦以上关于《古今通韵》的引文，均见该书“论例”。

⑧宋荦：《古今韵略·序》。

⑨《古今韵略·例言》。

⑩柴绍炳：《古韵通·凡例》。柴氏用的是平水韵的韵目。

⑪《古韵标准》平声第十二部总论。

⑫《说文解字注》80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⑬《说文解字注》8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⑭《古韵标准·例言》。

⑮⑯⑰《戴东原集》（上），61页。

⑱《戴东原集》（上），58页。

⑲《惜抱轩文集》卷十四。

⑳《诗声类·序》。

㉑《诗声类》卷十二。

㉒《说文声类》侵类。43页。见音韵学丛书。

㉓《经义述闻》卷三十一。

㉔《戴东原集》（上），68页。

㉕参看王念孙：《与江晋三书》。见《高邮王氏遗书》。

㉖江有诰：《寄段茂堂先生书》。

㉗《说文解字注》817页。

㉘《说文解字注》717页。

㉙《说文通训定声》解部。2048页。万有文库本。

㉚江有诰：《音学十书·序例》。

㉛㉜《再寄王石臞先生书》。见《唐韵四声正》。

㉜《音论》卷中。

㉝《古韵标准》入声第一部总论。

㉞《说文解字注》8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㉟《诗声类·序》。孔氏又在《诗声类》卷十二说："夫六朝审音，于古去声之中别出入声。"

㊱《诗声类》卷十二。

㊳ 王念孙：《与李方伯书》。见《经义述闻》，卷31。李方伯指李许斋，生平不详。

㊴《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一册183页。

㊵《四声切韵表·凡例》。

㊶《十驾斋养新录》，卷五101页。

㊷《十驾斋养新录》，卷五111页。

第二十三节　清代今音学

今音学是特指研究《切韵》系韵书的学科。清朝初年，今音研究没有作出什么成绩来。除顾炎武等少数人而外，有些颇有影响的音韵学家连《切韵》系韵书的基本情况都搞不清楚。如有人以为《广韵》206韵是沈约《四声类谱》旧目，有人把明朝人潘恩编的《诗韵辑略》说成是"唐礼部韵略"，有人以为206韵的同用、独用是沈约注的，有人认为以四声分字，全起于陆法言。当时流行的韵书是阴时夫、中夫编的《韵府群玉》，有的人连《广韵》是什么样都不知道。以上所言为顺治、康熙两朝的情形。

乾嘉时代，音韵学家们的主要注意力都集中于古音学，今音

研究比较有成就的唯江永与戴震二人；直到清末才出现一个陈澧，对切韵音系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作出了重要贡献。

江永的《四声切韵表》是一部用等韵原理研究切韵音系兼及上古音的著作。他说：

> 此《表》为音学设，凡有字之音，悉备于此。审音定位，分类辨等。
>
> 此《表》依古二百六韵，条分缕析，四声相从，各统以母，别其音呼等列，字之切即注本字下，开卷了然，学者由此研思，音学庶无差舛。

《表》的前面有凡例六十二条，其中有些很好的看法。如第二十一条说："凡分韵之类有三：一以开口合口分；一以等分；一以古今音分。"所以他这个音表，不仅标明等、呼，还注明古今音，这种做法虽然受到某些人的非议，但对我们了解古今音的流变以及《切韵》音系的性质，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据今人任铭善说：①1948年有人曾在上海书肆发现一种未曾刻印的抄本《四声切韵表》，内容与各刻本都有所不同。其中论反切上字义例有这样一段文字：

> 三四等之重唇不可混也，照穿床审之二等三等不相假也，喻母三等四等亦必有别也。

（盈按：这段话又见之于《音学辨微》）

约在陈澧一百多年前，江永已经发现照二照三"不相假"，喻三喻四"必有别"，这是应当受到称赞的。

戴震关于今音学的重要著作有《考定广韵独用同用四声表》②。这个表的作用有五：

一、用表的形式把206韵依四声排定，便于人们掌握《广韵》

四声相承的全面情况。读者从表上立即可以了解到哪些韵有入声，哪些韵没有入声，哪些韵没有平上声，哪些字少的韵没有韵目而附入了其他韵。

二、《广韵》上去二声最后几个韵目，排列次序有误。戴震据徐锴《说文解字韵谱》和吴棫《韵补》作了订正。

	广韵原韵次	戴震订正韵次
上声	俨第五十二	豏第五十二
	豏第五十三	槛第五十三
	槛第五十四	俨第五十四
去声	酽第五十七	陷第五十七
	陷第五十八	鉴第五十八
	鉴第五十九	酽第五十九

三、对同用、独用的考订。

1.平声。文第二十注"欣（殷）同用"。顾炎武《音论》指出："唐时二十一殷……绝无通文者，而二十文独用，则又绝无通殷者，合为一韵，始自景祐。"戴氏据以订正。

2.上声。吻第十八注"隐同用"。戴震亦根据顾炎武、李因笃的考察（见《音论》卷上），把吻、隐二韵都改为"独用"。他断定这是"景祐《礼部韵略》颁行后涂改之本，非《广韵》旧注也。"

又上声琰第五十注"忝俨同用"。戴震据别本将"俨"字删掉，而在俨第五十二下注："范同用。"豏韵原注："槛范同用。"戴将"范"字删去。

3.去声。卦第十五注"怪夬同用"。而怪第十六注："独用。"与上注矛盾。戴震将"独用"二字删去。艳第五十五注：

"㮇𧮪同用。"戴将"𧮪"字删去，改为"𧮪梵同用"。陷韵下注："鉴梵同用。"戴将"梵"字删去。

四、对各韵的等呼进行分析。戴震认为，韵分四等，各等又分开合，"其说虽后人新立，而二百六韵之谱，实以此审定部分，然则呼等亦隋唐旧法，后人窃其意以名专学耳。"③根据这一认识，他对《广韵》的等呼情况进行了系统的考察：

盖昔人论韵，审其洪细为一二三四等列。如：平声二冬、十一模、十五灰、二十三魂、二十六桓、全韵皆内声（合口）一等。十六咍、二十四痕、二十五寒、六豪、七歌、二十二覃、二十三谈、全韵皆外声（开口）一等。十九臻、五肴、二十六咸、二十七衔，全韵皆外声二等。二十文全韵皆内声三等。二十八严、二十九凡，全韵皆外声三等。三萧、二十幽、二十五添，全韵皆外声四等。上去入大致准此。

余韵或主辨等，兼内声、外声为一韵。如十一唐、十七登及十四泰一等。三江、十三佳、十四皆、二十七删、二十八山、十三耕及十七夬二等。八微、十二齐、二十二元三等。一先、十五青四等。并兼内声外声。上去入准此。

或因字少，不烦别出，则兼数等为一韵：钟韵兼三等、四等，肿韵之三等四等字，为钟之上声，惟湩䳊二字属一等，为冬之上声，以字少不别立部目。臻栉二韵无上去声字者，其上去声字在隐焮二韵内。臻韵、栉韵并二等。欣韵、迄韵并三等，惟上声隐韵，去声焮韵兼二等、三等，其二等𧨴、龀等字，即臻栉二韵之上去也，亦以字少不别立部目。

五、考订声类异同。戴震所谓的"声类"，并不是指声母系

统，而是指大的韵类。

所谓声类异同者，就二百六韵之次第考之，亦不甚远。东冬钟一类也；江则古音同东冬一类，今音同阳唐一类；支佳一类也；脂微及祭泰夬废一类也；之咍一类也；齐韵半属脂微，半属支佳，而皆灰二韵，则半属脂微，半属之咍；鱼虞模一类也；真谆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删山先仙一类也；萧宵肴豪一类也；歌戈一类也；麻一类也，古音半同歌戈一类，半同鱼虞一类，元以来麻韵又歧为二；阳唐一类也；庚耕清青一类也；蒸登一类也；尤侯幽一类也；侵覃谈盐添咸衔严凡一类也。古音盖十有三类，今音十五类。上去入统于此。

（《声韵考》卷二 5—6 页）

戴震和江永一样，在研究《广韵》音系时，着重于"分类辨等"。往往上联古音，考察韵部的分合流变。他们都还没有深入到《广韵》内部，揭示其实际包含的声类和韵类。因为他们都没有对《广韵》一大堆反切资料进行独立的考察，所以陈澧说："隋以前之音异于唐季以后，又钱戴二君所未及详也。"（《切韵考·序》）对《广韵》声类韵类的考察这个任务，是由陈澧来完成的。

陈澧（公元1810年—1882年），字兰甫，号东塾，广东番禺人。他的《切韵考》六卷和《切韵考外篇》三卷，成书于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是清代今音学的代表作。

陈澧著《切韵考》的目的是要通过《广韵》考出陆法言《切韵》的本来面貌。他认为"《切韵》虽亡，而存于《广韵》"（《切韵考·序》），《广韵》的反切就是陆氏"旧法"。因此，他的全部考证就是着眼于分析《广韵》中的反切。

他确立的基本原则是：反切上字与所切之字一定是双声，反切下字与所切之字一定是叠韵；凡是两个反切上字同类的，其反切下字必不同类；凡是两个反切下字同类的，反切上字必不同类。

他分析反切的方法就是系联法。所谓系联法也就是归纳法。归纳的具体条例有三：同用；互用；递用。如：

声类

一、同用例。冬，都宗切。

当，都郎切。

冬当的切上字都用“都”，无疑同类。

二、互用例。当，都郎切。

都，当孤切。

当都互用为切上字，无疑同类。

三、递用例。冬，都宗切。

都，当孤切。

冬都当递用，无疑同类。

韵类

一、同用例。东，德红切。

公，古红切。

东公的切下字都用“红”，无疑同类。

二、互用例。公，古红切。

红，户公切。

红公二字互用为切下字，无疑同类。

三、递用例。东，德红切。

红，户公切。

东以红为切下字，红又以公为切下字，无疑同类。

此外，陈澧还制定了两个补充条例。

一、有的切上字明明同类，可是系联不起来，就据又音系联。如：

一东：涷，德红切，又都贡切。

一送：涷，　　　　　多贡切。

"都贡"、"多贡"同音，则"都""多"二字实同一类也。

今于切语上字不系联而实同类者，据此以定之。

二、切下字也有实同类而不能系联的，则据四声相承的情况以定其分合。

他说：

今考平上去入四韵相承者，其每韵分类亦多相承，切语下字既不系联，而相承之韵又分类，乃据以定其分类；否则，虽不系联，实同类耳。

陈澧用系联法将《广韵》452个切上字分别为四十个声类。这四十个声类没有立下专一名称，与三十六母相比较，其分合情形如下：

唇音

1. 帮——边等八字
2. 滂——滂等四字
3. 並——蒲等七字
4. 明微——文等十八字
5. 非——方等十四字
6. 敷——敷等九字

7．奉——房等十六字

舌音

8．端——多等七字

9．透——他等八字

10．定——徒等十字

11．泥——奴等六字

12．来——卢等十五字

13．知——张等九字

14．彻——抽等七字

15．澄——除等十一字

16．娘——尼等三字

齿音

17．精——将等十三字

18．清——仓等十四字

19．从——才等十四字

20．心——苏等十七字

21．邪——徐等十字

22．照$_2$——庄等七字

23．穿$_2$——初等八字

24．床$_2$——锄等十二字

25．审$_2$——山等十字

26．禅——时等十六字

27．日——如等八字

28．照$_3$——之等十二字

29．穿$_3$——昌等七字

30. 床$_3$——神等四字

31. 审$_3$——书等十四字

牙音

32. 见——居等十七字

33. 溪——康等二十四字

34. 群——渠等十字

35. 疑——鱼等十五字

喉音

36. 影——於等十九字

37. 晓——呼等十六字

38. 匣——胡等七字

39. 喻$_3$——于羽云等十四字

40. 喻$_4$——余以等十二字

陈澧将照二照三分为两类，喻母分为两类，比三十六字母多出了五类。因他将明微二母合而为一，故实际只多了四类。江永指出："凡三等唇音轻重不兼，有轻唇而复有重唇之明母者，间有数韵，三等之变例也。"（《音学辨微》）陈澧将明微合而为一，对此"变例"认识不清。

陈澧又把《广韵》1200多个反切下字系联为三百一十一个韵类，与206韵相比，其分类情形如下：

一韵只有一类的，计125韵。

平声32韵：冬钟江之鱼虞模灰咍谆臻文殷魂痕寒桓萧肴豪歌蒸尤侯幽覃谈添咸衔严凡。

上声36韵：董肿讲止语麌姥荠骇贿海准吻隐混很旱缓篠巧皓哿果耿拯等有厚黝感敢忝豏槛俨范。

去声39韵：宋用绛志御遇暮队代废震稕问焮慁恨翰换啸效号箇过诤劲径证嶝宥候幼沁勘阚㮇陷鉴酽梵。

入声18韵：沃烛觉术栉物迄没曷末职合盍帖洽狎业乏。

一韵分两类的，计63韵。

平声19韵：东微齐佳皆元删山先宵戈阳唐耕清青登侵盐。

上声15韵：尾蟹轸阮潸产铣狝小养荡静迥寝琰。

去声16韵：送未霁祭泰卦怪夬願谏裥霰笑漾宕艳。

入声13韵：屋月黠辖屑药铎麦昔锡德缉叶。

一韵分三类的，计12韵。

平声 4 韵：脂真仙麻

上声 2 韵：旨马

去声 3 韵：至线祃

入声 3 韵：质薛陌

一韵分四类的，计 6 韵。

平声支庚

上声纸梗

去声寘敬

《广韵》有的韵部之所以能分出二类或三类以至四类，其中有的是开合有别，有的是等列不同。

陈澧的系联基本上是成功的。他第一次揭示出：《广韵》的声母系统与通行的三十六字母并不完全一样。他把照系分为二组，喻母分二组，都很正确。江永也发现了这些区别，由于他泥于三十六母，未能根据事实作出相应的结论。陈澧对切下字的分析，也是有意义的。它使人们对《广韵》的韵母系统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陈澧的分析结果，与韵图的音素分析大体上一致，这

就是对此书精确性的最好检验。

《切韵考》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反切上字的分类，见系可分为二（有人主张精清从心亦应分为二，这些问题应留到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中讨论），帮系应合而为一（他只合了一个微母）。

反切下字的分类也有些问题。如漾韵是阳韵的去声，在漾韵中“放防妄”等字归合口一类，阳韵的“永芳房亡”，也应归合口才对，陈澧却把这些字归到开口一类去了，这是自乱其例。

《切韵考》产生一些缺点，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陈澧给自己规定了这样一条不正确的原则：“惟以考据为准，不以口耳为凭。”④就是说，他只管分析材料，不管音理是否相合。他把“方芳房亡”等字归到开口的错误就是这么造成的。他说：“此韵狂字巨王切，强字巨良切，则‘王’与‘良’韵不同类。方字府良切，‘王’既与‘良’韵不同类，则亦与‘方’韵不同。”说“王与良韵不同类”，这是对的，因为两切上字都是“巨”，下字必不同类；说“王”与“方”亦不同类，从而把“方”与“良”系联为一类，这就错了。从反切材料看，方，府良切。“良”是开口字，“方”亦应归开口。但是，《广韵》中唇音字开合难分，唇音合口字可以用开口字作切下字，陈澧不懂得这一音理，以致归类失误。

二、陈澧所依据的反切材料并不全可靠。《广韵》的反切、又音，时代不一，错误不少，陈澧已尽力所能及作了一些校正。不过，切一、切二、切三，王一、王二、王三这些材料，他当时都不可能见到，甚至连《韵镜》他也没有可能见到，这些都给他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不利。如现代考订《广韵》声类的人，知道把疑母分为五、鱼两类，这是因为切三、王三中的“五”字都作

吾古反，与鱼类字区别得很清楚。而陈澧所见到的材料（广韵）“五”字作疑古切，据此他将五、鱼系联为一类，这不能不说与所见材料的局限有关。

陈澧的《切韵考外篇》是用等韵图的形式展示《广韵》声韵调的配合关系。《外篇》分三卷。卷一为《切语上字分并为三十六类考》，卷二为《二百六韵分并为四等开合图摄考》，卷三为《后论》。重点是卷二。陈氏分为十四摄，与十六摄相比，果、假二摄并，曾、梗二摄并。

梁僧宝的《切韵求蒙》也是用韵图形式来研究《广韵》的，本来应该在“清代等韵学”中介绍，但因为与《广韵》直接有关，故放在这里一块来谈。

梁僧宝，广东顺德人，咸丰九年（1859）进士。《求蒙》成书于光绪三年（1877）。其表“经之以二百六韵，纬之以三十六母”，分十六摄：通、江、宕、梗、曾、深、咸、臻、山、止、蟹、果、假、遇、流、效。韵图收字，以《广韵》为主，也酌量收了《玉篇》、《集韵》中一些字。

梁氏还著有《四声韵谱》。《求蒙》是音节表，《韵谱》是同音字表，其编次是“每摄以韵为序，同韵以开口呼、合口呼为序，同呼以等为序，同等以母为序。”

陈澧的《外篇》和梁僧宝的这两部著作，都是研究《广韵》的最方便的参考书。

清代还有一些研究中古韵书的著作。如纪容舒的《孙氏唐韵考》，据徐铉《说文》反切以考校孙愐《唐韵》分合之例与《广韵》改并之迹，纪昀的《沈氏四声考》据沈约韵文以考证沈约《四声谱》的面貌。这类著作都不可与陈澧的《切韵考》相提并论。

注：

①任铭善：《旧钞定本四声切韵表跋尾》，见浙江学报，二卷二期。

②此文见《声韵考》卷二。

③《声韵考》卷二5页。

④《切韵考·序》。

第二十四节　清代等韵学

清代康熙年间，等韵学较为发达。这时距明末还不算远，明末研究等韵的盛况得到继承发扬。马自援的《等音》，林本裕的《声位》，潘耒的《类音》，以及附于《康熙字典》前面的《等韵》都颇具特色。

康熙之后到清朝末年，等韵学较为有影响的作品，只有江永的《音学辨微》，李汝珍的《音鉴》，庞大堃的《等韵辑略》，劳乃宣的《等韵一得》。

马自援，名鑾什，其父依附吴三桂在云南为官，马自援的《等音》就写于云南，可能成书于吴三桂叛清期间。

《等音》所反映的语音基本上是北方音。但声调有五：平上去入全。“平”与“全”两个调，马氏又叫做上平、下平（与《广韵》的上平下平不同），其实就是阴平和阳平。他为什么把阳平称之为“全”呢，因为“平上去入四声下，新增以全声，而五声始全”。五声例字如下：

耶也夜谒爷

烟衍晏谒延

身审圣食神

马氏废"等"名"呼"。呼分为五，叫做"大五音"。

宫音合口呼

商音开口呼

角音闭口卷舌混呼

徵音启口齐齿呼

羽音撮口呼

韵分十三，以见母字命名：光、官、公、棍、高、乖、钩、规、锅、国、孤、骨、瓜。

声母二十一：见、溪、疑、端、透、泥、邦、滂、明、精、清、心、照、穿、审、晓、影、非、微、来、日。二十一字母又分属喉舌唇齿牙，叫做"小五音"。与《韵略易通》的《早梅诗》相比，多一个疑母。与三十六字母相比删掉了十五个声母。因为：一、浊音清化，群定并奉从邪澄床禅匣十个浊母分别并入清声母；二、知照合流，泥娘合流，非敷合流，影喻合流。这个声母系统并非《等音》独创。林本裕说："至马黎什《等音》字母，一遵如真所定。"①

林本裕，字益长，随兄居云南，与马自援同时，继《等音》而作《声位》。这两本著作性质相同，内容大同小异。《声位》声母系统与《等音》有两点不一样。一、影疑合而为一。林本裕说："愚常再三审度，疑、影二母下字，实无丝毫之异，不敢附会古人，尤恐有误来者。"林氏取消疑母是对的，在北音系统中，疑母早已消失。二、《声位》将疑影合一之后，本来只剩下

二十个声母了，但林氏又另外增加了四个声母：

◎、吒瑟、诃婆、曷罗多。

这四个声母等于画蛇添足。第一个声母有音无字，后三母为梵音而设，即所谓的二合母、三合母。

这两部等韵学著作都不能说是单一音系的反映。马自援说："是集惟用正音。按《正韵》（指洪武正韵）谓'天地生人即有声音，五方殊习，人人不同，鲜有能一之者……'欲知何为正音，五方之人皆能通解者，斯为正音也'，今遵之。"②《洪武正韵》是一部杂凑性质的韵书，它标榜的"五方之人皆能通解"的"正音"，其中就有入声，《等音》《声位》也保存入声，就是"遵"的《正韵》。

潘耒的《类音》也是企图搞出一个"欲使五方之人……归于大中至正"的音系来，它的音系也不是单一的。

潘耒（公元1648年—1708年），字次耕，号稼堂，江苏吴江人。《类音》的最大特点是用"四呼"分析韵类。

> 何谓四呼？曰：开口也，齐齿也，合口也，撮口也。凡音皆自内而外，初出于喉，平舌舒唇，谓之开口；举舌对齿，声在舌腭之间，谓之齐齿；敛唇而蓄之，声满颐辅之间，谓之合口；蹙唇而成声，谓之撮口。　　（卷一）

潘耒从发音时舌位的高低和嘴唇形状的不同来说明"四呼"的特点，很得要领。他把四呼的分析看得非常重要。他说："欲明音韵者，先明四呼，其余自迎刃而解矣……。神珙（唐代和尚）以来，未论及此。"（卷二）又说："一母之音，分而成四呼，四呼之音比而成一类，有呼有类，而韵生焉。"（卷二）所谓"四呼之音比而成一类"，反过来说，就是一个韵类之内包含着

四呼。《类音》分24个韵类，乘以四呼，应有96个韵（实际上不足此数，因为并非每一韵类都四呼俱备）。

韵类	开齐合撮	韵目	全分	韵类	开齐合撮	韵目	全分
第一类	○衣○於	支微	全	第十三类	坳幺○○	肴萧	全
第二类	○○威○	规闚	全	第十四类	麃婴○○	豪宵	分
第三类	○○○耶	遮车	全	第十五类	恩因温氲	真文	全
第四类	○○○○	遮车	分	第十六类	安烟蜿鸳	元先	全
第五类	○○隈	灰回	全	第十七类	○殷弯○	删山	分
第六类	哀挨娃○	皆咍	分	第十八类	○邕翁硧	东冬	全
第七类	○○乌纡	敷模	全	第十九类	罂英泓萦	庚青	分
第八类	○○○○	敷模	分	第二十类	佒胦汪○	江唐	全
第九类	沤忧○○	尤侯	全	第二十一类	○央○○	阳姜	分
第十类	○幽○○	尤侯	分	第二十二类	○音○○	侵寻	全
第十一类	阿○倭○（正音）	歌戈	全	第二十三类	谙淹○○	覃盐	全
第十二类	阿鸦蛙○（北音）	家麻	分	第二十四类	谽○○○	咸凡	分

以上二十四类多有全音分音之别。潘耒解释说：

何谓全？凡出于口而浑然蕴然，含蓄有余者，是谓全音。何谓分？凡出于口而发越嘹亮，若剖若裂者，是为分音。二者犹一干也，枝则歧而为二，既已为二，不可得合矣……（卷一）

南人读麻如磨，读瓜如戈，口启而半含，北人读麻为马遐切，瓜为古窪切，唇敞而尽放。含者，全也；放者，分也。北人读湍如滩，读潘如攀，读肱如公，读倾如穹，读江如姜，读腔如羌，

读嫌如咸，读兼如缄，南音则判然为二。其读傀如乖，读恢如豗，则南北音皆然。湍潘也，公穹也，江腔也，嫌兼也，傀恢也，全音也，启而半含者也；滩攀也，肱倾也，姜羌也，咸缄也，乖豗也，分音也，敞而尽放者也。是二者，欲以为一，则各有四呼，各有阴、阳、平仄，不容相混；欲以为二，则气分相似，声吻相似，非如支微与真文之迥别悬殊，故命之全、分。　(卷一)

潘氏所言全与分的对立是元音发音部位的区别。发言部位较前的是分音，发音部位较后的是全音。如：

麻	╱磨。全音。	南人
	╲马遐切。分音。	北人
瓜	╱戈。全音。	南人
	╲古窪切。分音。	北人
湍	╱湍。全音	南人
	╲滩。分音	北人
潘	╱潘。全音	南人
	╲攀。分音	北人
肱	╱肱。分音	南人
	╲公。全音	北人
倾	╱倾。分音	南人
	╲穹。全音	北人
江	╱江。全音	南人
	╲姜。分音	北人
腔	╱腔。全音	南人
	╲羌。分音	北人

婔	婔。全音	南人
	戊。分音	北人
菲	非。全音	南人
	绒。分音	北人

全音与分音的区别，是以南北方言的不同作为根据的。同一个字，南人读为全音，则北人读为分音，或者相反。这些资料，对我们研究清初南北方音的区别有一定的意义，若作为单一音系来要求，就与潘耒的原意大相乖违了。潘耒说："二十四类……，有全分之类二十，无全分之类四。全、分者，自一而二，可相通也，如通之则少其十。"（卷二）他的意思是，如果不顾全、分的对立，合起来就只有14个韵类了。

《类音》的声母有50个，"略如邵子（指邵雍）之四十八，而加详焉。"与三十六字母相比，删去五个声母（知彻澄娘敷），增加19个声母：舅语老杜乃绕朕已在武蓄关些而耳〇〇〇〇。这19个声母是根据什么理由增加的呢？它的模式是：五音之内分出清浊两类，清浊两两相配。如下表（338页）。

这个声母图也是脱离实际的，不能代表任何一个方言的声母系统。

潘耒从小"留心音学"（卷一），对燕齐晋豫湖湘广海之间的方音都进行过一番考察，但他还根本不懂得要搞一个单一的方言音系。相反，他真心实意追求的是要搞出一个无所不包的汉语音系来，这几乎是明清等韵学家的共同观念。潘耒已经表白得很明确："《类音》之音，非南音，非北音，乃人人本有之音也。"③非南非北，这是事实。什么"人人本有之音"，这个说法就很糊涂。

喉	清	影	晓	见	溪	舅	语
音	浊	喻	匣			群	疑
舌	清	老	耳	端	透	杜	乃
音	浊	来	而			定	泥
腭	清	审	绕	照	穿	朕	○
音	浊	禅	日			床	○
齿	清	心	巳	精	清	在	○
音	浊	些	邪			从	○
唇	清	非	武	邦	滂	菶	美
音	浊	奉	微			并	明

清代影响较大的等韵图是附在《康熙字典》前面的《等韵》，其中包括两种性质不同的韵图。《字典》成于康熙五十五年，这两种图理应早于《字典》④。

第一个附图叫《字母切韵要法》，它还是用宋人的三十六字母，只不过“群床”二字被改为“郡状”，匣喻的次序被改为喻匣。它的分韵与《等音》差不多，有十二个韵摄，即：

迦、结、冈、庚、祴、高、该、傀（guī）、根、干、钩、歌。

《要法》的韵图有两部分：一是《内含四声音韵图》，这是一个声韵配合图，包括四张图表。第一张叫“开口正韵”，即开口呼；第二张“开口副韵”，即齐齿呼；第三张“合口正韵”，即合口呼；第四张“合口副韵”，即撮口呼。

这四张图的内部结构一样，都是顶端横列三十六母，但三十六母并不是在每一张表中都同时出现。如第一表只有二十七个声

母，没有非敷奉微，照穿状审禅；第二表只有二十八个声母，没有知彻澄娘，非敷奉微；第三表只有二十七个声母，没有帮滂并明，照穿状审禅；第四表只有二十个声母，没有端透定泥，知彻澄娘，帮滂并明，非敷奉微。

表内各声母之下，也就是第二个横列，是用符号标明各声的清或浊。以○代表清；⊙代表次清；●代表浊；◒◓◐◑代表次浊。在这些符号之下，共有十四个横列，每同一横列的字就属于同一个韵摄，同一竖行的字就同一个声组。如表一“见○”之下，有：

迦　冈庚庚⃝裓⃝高该裓根干根⃝干⃝钩　歌

这十四个字就代表十四个韵摄，同属见母。这里有几个问题要解释一下：

一、《要法》本来只有十二摄，而表内却多出了庚⃝●干⃝三摄，这就有了十五个摄，这种矛盾现象，反映此图作者有存古思想。事实上在表内这三个摄都是虚有其目，并无韵字，全部用○表示。其中的庚⃝摄相当于旧等韵图的曾摄（蒸韵），根⃝摄相当于深摄（侵韵），干⃝摄相当于咸摄（覃盐咸）。曾摄已并入梗摄，深摄、咸摄早已消失，《要法》都还保存其目，这就是对旧等韵图的留恋。

二、裓⃝摄就是傀摄，而要在裓字外面加一圆圈，这是表明傀摄的开口字，其主要元音与裓摄开口字一致，所以寄入裓摄。

三、《要法》本来有一个结摄，而图内未出现，因为韵图作者把结摄归到了迦摄。迦摄相当于《中原音韵》的家麻部，结摄相当于《中原》的车遮部，这两个部在明清时代的韵书和等韵图中，从古音的就合而为假摄（如《字学元元》），从时音的就分

别为二。《要法》本来从时音，分出了结摄，但图内又合在一块，这也是骑墙之见。

四、图内于迦韵之下，歌韵之上，各空一行，表示这两个韵摄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迦摄的元音为a，歌摄的元音为o，始于a，终于o，其余各韵的元音都由此而产生。清末劳乃宣对此有详细论述。他说："各摄皆生于阿厄。"[1]劳氏的阿厄两摄，即《要法》的迦歌两摄。

《要法》的另一部分是《明显四声等韵图》。这是个声韵调配合表，其音系与前图一样。全图按十二摄分为十二章，每一章横列三十六母，纵列开齐合撮四呼。每呼一大格，每一大格之内（也就是每一呼之内）又纵列平上去入四声。此图用四呼代替四等，与宋元时代的韵图根本不同，反映了实际语音的变化。

《字典》前面还附设一种韵图，叫做《等韵切音指南》。全图分八类十六摄，各摄的名称与《四声等子》及《切韵指南》相同，分二呼四等，保存—m尾、入声韵。很明显，它所反映的是宋元时代的语音面貌。

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江永以七十九岁高龄写了《音学辨微》，这是一本研究宋元等韵学原理的普及读物，是为"有志审音不得其门庭者"而作。

全书主要内容有十一辨：一、辨平仄；二、辨四声；三、辨字母；四、辨七音；五、辨清浊；六、辨疑似；七、辨开口合口；八、辨等列；九、辨翻切；十、辨无字之音；十一、辨婴童之音。除了一、二、七辨之外，剩下的八辨都跟三十六字母有关。

"辨婴童之音"是借婴童之音以辨字母。江永企图把字母之

学通俗化，联系婴儿的发音说明字母之学并不神秘。"能呼'妈'，唇音明母出矣；能呼'爹'，舌音端母出矣；能呼'哥'，牙音见母出矣；能呼'姐'，齿音精母出矣。"这当然算不上是科学的表述，但在当时还没有音标的情况下，也很难找到更为理想的表述法了。

"辨疑似"是辨"有字无音"的。"疑似"是指"字母之疑似"。如有的方言疑母喻母不分，呼"颙"如"容"，呼"鱼"如"余"，呼"银"如"寅"，呼"尧"如"遥"，呼"牛"如"由"；有的泥、娘、来三母不分，呼"泥"似"犁"，呼"娘"似"良"，呼"尼"似"泥"（尼为娘母，泥为泥母）；还有的端透定与知彻澄不分，知彻澄与照穿床不分，心邪不分，匣喻不分等等。江永主张都要用"正音""以矫其偏"，不能反过来因"疑似"而增减字母。江永所谓的"正音"并不是指"官话"，也不是指任何一种单一的活语音，而是指与三十六字母读音相同的字母。他举了一个例子：

> 吾五二字，举世呼之似喻母，一若"吾"为"乌"之浊，"五"为"邬"之浊者，然婺源西北乡有数处呼之，独得其正。天下何地无正音，人自溺于方隅，不能以类推矣。

"吾"、"五"原本是疑母字，明清时代疑母和喻母相混，早已变为零声母。至于婺源西北乡有的地方还保存疑母（ŋ-），这是古音残存现象，江永却认为这才是"正音"，并要用这样的"正音"去"矫偏"，去改变"有字无音"（即有的字母在方言中已经消失，如上面说的疑母）的情形，这是缺乏历史发展的观点。因此，他对明清等韵学家根据实际语音增减三十六字母，一再加以反对。乾隆四年春，他在给汪绂写信时表示：

弟之所主张者……《切韵》三十六母，一字不可增损，亦一字不可模糊，当细辨其腭舌唇齿喉与半舌半齿，而天下之正音当参合五方之音，盖官音亦有俗，乡音亦有正也……昔与崔兄论字母，不合。弟主三十六，渠主二十四，临别相视而笑曰：此事两人终身不能相合矣。[6]

在这封信里，“正音”、“官音”、“乡音”是三个不同的概念，要“参合五方之音”才能找出三十六“正音”，这是他“终身”没有改变的一个观点。

“辨无字之音”（即有其音但不见于三十六字母）是指字母之外的音，江永称之“为俚俗不典之音”，这样的字母共计十四个，三十六加十四，共五十字母。这五十个字母是怎么摘出来的呢，也是按照清浊相配的原则制订的，和潘耒的声母系统，在原理上是一样的。

自来谈等韵的人都没有对四等的区别作出合理的解释。江永首先用洪细区分四等：“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细，而四尤细。”洪细之别，用今天的术语来表达，是介音和主要元音的不同。

江永还主张“辨等之法，须于字母辨之”。他总结了三十六字母与四等相结合的规律。我们知道了各等中有哪些字母，自然也就可以知道各等中没有哪些字母。依字母辨等，也是分析中古语音结构的一个办法。

《李氏音鉴》是一部基本上反映北音面貌的等韵学著作。《音鉴》的作者李汝珍（约公元1763年——约公元1830年），字松石，直隶大兴（今属北京市）人，小说家，音韵学家。李氏青年时代离开大兴，随兄宦游于江南，长住海州板浦（今江苏连云

港市灌云县板浦镇），《音鉴》即成于海州。李氏生平，可参阅孙佳讯《〈镜花缘〉作者的疑案》（《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三辑）

《音鉴》成于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全书六卷，前五卷用问答体形式讨论了三十三个关于音韵方面的问题，卷六为“字母五声图”，是声韵调相配的字表。这个图不同于一般的等韵图，它先按三十三个字母分为三十三个图，每图之内纵列五个声调，横列二十二韵（同母二十二音），也就是每一个图有二十二条同母音，全书计七百二十余条，以此数乘以声调五，知全书有反切三千六百多。

《音鉴》与一般韵图还有一个不同之点是，它不用等、呼之类的术语，却提出了语音有粗细之别。他说：“母中所收各音，以翻切论之，必使母韵相等，粗细相同，苟失其当，则声因之而讹。”（卷二：问切分粗细论）又：“粗细二音，各归一母。”（卷二：问字母粗细论）粗细，是李汝珍划分声母、韵部的一条重要原则。

声母三十三，有二十八个是按粗细分立的。他的声母标目是一首《行香子》词。

1. 春	2. 满（粗）	3. 尧（细）
4. 天（细）	5. 溪（细）	6. 水
7. 清（细）	8. 涟（细）	9. 嫩（粗）
10. 红（粗）	11. 飘（细）	12. 粉
13. 蝶（细）	14. 惊（细）	15. 眠（细）
16. 松（粗）	17. 峦（粗）	18. 空（粗）
19. 翠（粗）	20. 鸥（粗）	21. 鸟（细）

22. 盘（粗）	23. 翾（细）	24. 对（粗）
25. 酒（细）	26. 陶（粗）	27. 然
28. 便（细）	29. 博（粗）	30. 箇（粗）
31. 醉（粗）	32. 中	33. 仙（细）

其中"博便"、"盘飘"、"对蝶"、"陶天"、"醉酒"、"翠清"、"松仙"、"蛮涟"、"满眠"、"嫩鸟"都可以合并，如果再把"鸥尧"（零声母）合并，三十三个声母就只剩下二十二个了。如果再把"箇惊"、"空溪"、"红翾"合并，就只有十九个声母了。

李汝珍将声母分为粗细，实际上是把介音与声母混为一谈了。"便、飘、蝶、天、酒、清、仙、涟、眠、鸟"等"细音"，都有一个 i 介音。李汝珍既不讲开合，又不讲四呼，只在声母上做文章，这是不可取的。

《音鉴》有二十二个韵，没有立名称。有十八个韵因粗细对立而分，如果合并，就只有九个韵，另有三韵有细无粗，一个韵有粗无细。九加三加一，共十三个韵。

第一韵：江阳。　　（细）
第二十二韵：江阳。　　（粗）

第二韵：真文元侵。　　（细）
第十六韵：真文元。　　（粗）

第三韵：东冬。　　（细）
第十七韵：庚青蒸。　　（粗）

第四韵：鱼虞。

第五韵：萧肴豪。　　（细）

{ 第六韵：支佳灰。　　　（细）
  第二十一韵：支佳灰。　（粗）

{ 第七韵：支微齐。　　　（细）
  第十五韵：支微齐佳灰。（粗）

第八韵：麻。

{ 第九韵：元寒删覃咸。　（细）
  第十八韵：删咸。　　　（粗）

{ 第十韵：先盐。　　　　（细）
  第十一韵：元寒先。　　（粗）

第十二韵：尤

{ 第十三韵：歌。　　　　（细）
  第十九韵：歌。　　　　（粗）

{ 第十四韵：麻。　　　　（细）
  第二十韵：麻。　　　　（粗）

韵分粗细，也是介音问题。如第一韵细，为aŋ，iaŋ，即开口呼和齐齿呼；与之对立的第二十二韵粗，为uaŋ，yaŋ，即合口呼和撮口呼。

《音鉴》缺点有二：一是掉书袋的习气严重。这跟作者在《镜花缘》里所犯的毛病是一样的。《音鉴》引书达四百多种，有不少引文与所要说明的问题毫无关系。劳乃宣批评说："其书文辞辩博，征引浩繁，类有学者所为，故浅人多为所震，其实未窥等韵门径。"⑦二是"南北方音兼列"。如以声母而论，"北音不分香厢、姜将、羌枪六母"（凡例），李汝珍知道得很清楚。但他却根据南音加以分别："香"归翻母，"厢"归仙母；"姜"归惊母，"将"归酒母；"羌"归溪母，"枪"归清母。

余集（字秋室，仁和人）在序言中赞扬这种做法"非囿于一隅之见"，真是不通之论。

庞大堃（1787—1858），字子方，亦字厚甫，江苏常熟人，官国子监学录。著《等韵辑略》三卷，"属稿于道光丁丑（1837），成书于庚子（1840）"（大堃之子庞钟璐《等韵辑略·跋》）。庞大堃认为："不明等韵不可以读书。"他是从读书的角度来研究等韵的，目光必然局限于古代。《等韵辑略》分上中下三卷。中下两卷带有通论性质，上卷有《韵摄总图》，以十六摄统二百六部，分开合口，内外转，通广，侷狭门。还有《门法总图》，为辨呼、辨等之"捷诀"。还有《十六摄图》，"以陆法言《切韵》为次，先以《广韵》反切按纽排纂，附以《唐韵》、《集韵》、《五音集韵》及《玉篇》、《类篇》、《篇海》之切，一韵兼开合者，分为两图。入声有正纽，有反纽，今音多从正纽，古音多从反纽，今于平上去之下，并列其部目，韵字则从正纽。……凡图六十有一，纽凡四千四百四十有五，按韵收声，莫备于此。"（庞钟璐《跋》）

庞氏将《广韵》二〇六韵分为六十一图，对于我们了解《广韵》音系很有帮助。但由于庞氏"博采诸书"，六十一图中有些音、有些字不见于《广韵》，内容显得杂而不纯。

《等韵辑略》是研究中古音韵的重要参考书。

清代最后一个有成就的等韵学家是劳乃宣（公元1843年—1921年）。劳氏为浙江桐乡人，清末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他从幼年就留心等韵学，经过三十多年的钻研，于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写成《等韵一得》。

这是一部结构谨严的科学著作。作者一开篇就抓住了等韵学

的实质："凡音之生，发于母，收于韵，分属于四声。母也，韵也，四声也，是为三大纲。"

劳乃宣在三十六字母的基础上分出了五十八个声母，比旧字母多出二十二个。五十八字母跟江永的五十字母一样，也是按音理推出来的。

他按发音部位将声母分为八类：喉声（即影喻）；鼻音（牙音）；重舌音（舌头音）；轻舌音（舌上音）；重齿音（正齿音）；轻齿音；重唇音（双唇音）；轻唇音（唇齿音）。又按发音方法将八类声母各分为清浊二类，共计十六类，其中有十四类都乘以四（即戛透轹捺），共得五十六母，加上喉音二母，即五十八母。江永只按清浊分类，所以才五十母，劳氏在分清浊的基础上又分以戛透轹捺，故声母比江氏还要多。但清声、浊声各有十一个声母为虚设，有音无字，除去这二十二个声母，还是三十六。

劳氏所谓的戛透轹捺也是发音方法问题。戛透是送气或不送气的区别，如见群为戛类，不送气；溪透为透类，送气；轹为摩擦音，如非心等；捺为鼻音，如疑泥等，见本节附表一。

关于韵部的划分，劳氏按照收音不同，分为六个韵部：

1.喉音一部（即直喉。阿鸦窪）

2.喉音二部（即展辅。埃厓歪）

3.喉音三部（即敛唇。敖幺）

4.鼻音部（即穿鼻，收一ŋ尾。昂央汪）

5.舌齿音部（即抵腭，收一n尾。安焉弯）

6.唇音部（即闭口韵，收一m尾。谙奄）

六部之中，又各分阴阳两类，阳声即开元音韵类（a），阴声即

闭元音韵类（o），喉音一部还有"下声"，即最闭元音i，u，y。共得十三韵摄。十三韵摄之内又各分开齐合撮四呼，共得五十二韵类。

《等韵一得》的十三韵摄是参照《字母切韵要法》十二摄和《切韵指南》十六摄写成的，见本节附表二（253页）。

在声调方面，劳氏分平上去入四声，入声与m，n，ŋ相配。

《等韵一得》析音精细，但声母仍分三十六，声调存入，韵部存－m尾，杂采南北方音，这些都证明它不是单一音系，劳乃宣说："古人所定母韵，乃参考诸方之音而为之，故讲求音韵者，必集南北之长乃能完备，即口吻不能全得其音，亦当心知其意，乃不为方音所囿也。"⑧

在本节结束时，我们还要提到刘献廷（公元1648年—1695年）的《新韵谱》。

刘献廷，字继庄，别号广阳子，直隶大兴（今属北京市）人，长期生活在南方，客死苏州。

《新韵谱》早已失传。由弟子黄宗夏编定的《广阳杂记》（195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标点本）第三卷记载了此书的梗概：

> 壬申（康熙三十一年）之夏，于衡州署中，初定《韵谱》。先立鼻音二。鼻音声韵之元，有开有合，各转阴、阳、上、去、入之五音，共十声，而不历喉腭舌唇齿之七位，故有横转而无直送。横转为平上去入，而平声则有阴阳，故五。等韵惟不达此，故多重叠。
>
> 次定喉音四，为诸韵之宗，太西蜡等话以□阿咿呜午之五音为韵父⑨，然午即呜之横转上声。女直国书则有六音，

而第六字实即第五字也。盖外国皆不知有横转之五音，故有此惑。惟梵音十二字恰合此式，然喉鼻不分，则父子无别矣。今定□为喉之喉，开之开；阿为喉之腭，开之合；伊为喉之齿，合之开；呜为喉之唇，合之合。四音定而万有千五百二十之声，举不出其范围矣。是之谓正喉音。

又从□字追出□字，为□之半音；从阿字转出而字，为阿之转音；从咿字想出□音，而见之于齿之□、思、兹、雌，故□〔为咿〕（二字原脱，以意增补）之伏音；从乌字究至于字，于为乌之送音。□、而、□、于，四字为变喉音。

又以合口鼻音为韵，分配□阿咿乌，则为鸯、鞥、英、翁，此四音为东北韵宗。又以开口鼻音为韵，配以□阿咿乌，则为〔安、恩、因、温，此四音为〕（以上八字原脱，以意增补）西南韵宗。此八韵立，而四海之音可齐矣。

次以喉自互交合，凡得音一十有七；喉鼻相互交合，得音一十。又哀、爊二音，有余不尽，三合而成五音。共三十二音，为韵父。韵历二十二位，则韵母也。横转各有五子，子凡若干，万有不齐之声，无不可资母以及父，随父而归宗，因宗以归祖，由祖而归元，天地之秘藏，一朝启之，归山后次第成书也。

（中华标点本，文字标点均有误，夺文亦未增补。这里所引参照了罗常培的考释）

刘氏所说的二鼻音指辅音韵尾n、ng。四喉音指a，e，i，u四个元音，这是“正喉音”。“从□字追出□字”，指从a分化出ê；“从阿字转出而字”，指从e分化出er；“从咿字想出□音”，指从i分化出ɪ；“从乌字究至于字”，指从u分化出ü。

ê，er，ï，ü，这是“变喉音”。

“合口鼻音”指后鼻音，与a，e，i，u相结合，为ang（骯）、eng（鞥）、ing（英）、ung（翁）。“开口鼻音”指前鼻音，与四个正喉音结合，为an（安）、en（恩）、in（因）、un（温）。

“喉自互交合”，指两个元音结合为双元音韵母，这样的二合韵母有十七个。

“喉鼻相互交合”，指鼻音韵母，有十个。

“哀”（ai）、“爊”（ao）又分别跟别的元音结合成三合韵母，计五个，这就是“三合而成五音”。

十七加十又加五，等于三十二个韵父（即我们今天所说的韵母），刘氏所说的二十二韵母，即二十二个声母。刘献廷还打算用他的《新韵谱》进行方言调查。他说：“于途中思得谱土音之法，宇宙音韵之变迁，无不可纪，其法即用余《新韵谱》，以诸方土音填之，各郡自为一本，逢人即可印证。以此法授诸门人子弟，随地可谱，不三四年，九州之音毕矣，思得之不觉狂喜。”（《广阳杂记》卷三，150页）

梁启超、钱玄同、罗常培等都对刘继庄有高度评价。钱玄同在《与黎锦熙罗常培书》中主张用刘氏的生年作为国语运动的纪元，钱氏还把自己的号由“德潜”改为“掇献”，欲“掇拾刘献廷之坠绪也”。

罗常培《刘继庄的音韵学》（《国语周刊》1932年，32、33、34期），倪海曙《中国最早的两个拼音化者——刘继庄和龚自珍》（《语文杂谈》，新知识出版社，1957），周有光《刘献廷和他的〈新韵谱〉》（《语言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5），1957年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的《刘献廷》，均可参阅。

注:

①如真，即明代的李登（字士龙），著有《书文音义便考私编》。定声母为二十一。林说见《声位·疑影喻三母说》。

②《马氏等音·叙略》。

③《类音》卷一。

④关于这两种韵图的详细介绍，可参阅李新魁的《康熙字典的两种韵图》一文。见《辞书研究》，1930年第一辑174页。

⑤《等韵一得·外篇》。

⑥《汪双池先生年谱·江永答汪绂书》。

⑦《等韵一得·外篇》。

⑧《等韵一得·外篇》。

⑨太西也写作“泰西”，犹言极西。中国古代称中亚诸国为“西域”故以远于西域之西方欧美各国为“泰西”。“蜡等”即拉丁(Latin)泛指西方的拉丁字母。

附表一　劳乃宣《等韵一得》声母分类表

发音部位／声源／发音方法	鼻、腭（舌根）	舌（舌头）	齿（舌叶）	唇（双唇）
	腭形平 音如杖之平末者 遇物而成	舌形圆 音如弹丸之圆者 遇物而成	气达于齿，其形锐，音如矛之锐末者 遇物而成	唇形扁，音如掌之扁者 遇物而成
戛 稍重，气作戛击之势，如剑戟相撞。（不送气塞，塞擦。）	戛〔k〕 如杖筑地	答〔t〕 如弹掷地	查入〔tʂ〕 如矛卓地	巴入〔p〕 如掌击地
透 最重，气作透出之势，如弹丸穿壁而过。（送气塞，塞擦）	喀〔k′〕 如杖穿壁	嗒〔t′〕 如弹洞壁	叉入〔tʂ′〕 如矛刺壁	葩入〔p′〕 如掌破壁
轹 稍轻，气作轹过之势，如轻曳柴行于道。（擦，边）	哈〔h〕 如杖曳于地	拉〔l〕 如弹滚于地	沙入〔ʂ〕 如矛画于地	夫〔f〕 阿入 如掌摩于物
捺 最轻，气作按捺之势，如蜻蜓点水，一即而仍离。（鼻）	迎〔ŋ〕 阿入 如杖略拄于柔物	纳〔n〕 如弹略抵于柔物	髯〔ʐ〕 如矛略点于柔物	嘛入〔m〕 如掌略按于柔物

此表转引自吴宗济先生《补听缺斋语音杂记》，见《中国语文》1989年6期。

第二十四节附表二

平水韵韵目	指南十六摄	要法十二摄	等韵一得十三摄	拟音
麻	假摄	迦摄 结摄	阿（喉一阳）	a ɛ
歌	果摄	歌摄	厄（喉一阴）	ə
庚青	梗摄	庚摄	鞥（鼻音阴）	əŋ
蒸	曾摄	(庚)摄		
东冬	通摄	庚摄合口	鞥摄合口	uŋ
支微齐	止摄	裓摄	侅（下声）	ï
鱼虞	遇摄			iuy
佳	蟹摄	该摄	埃（喉二阳）	ai
灰		傀摄	额（喉二阴）	əi
元寒删先	山摄	干摄	安（舌齿音阳）	an
覃盐咸	咸摄	(干)摄	谙（唇音阳）	am
侵	深摄	(根)摄	音（唇音阴）	əm
真文	臻摄	根摄	恩（舌齿音阴）	ən
江	江摄	冈摄	昂（鼻音阳）	aŋ
阳	宕摄			
萧肴豪	效摄	高摄	敖（喉三阳）	au
尤	流摄	钩摄	欧（喉三阴）	əu

第二十五节　清代韵书

清代较为重要的韵书，有《五方元音》，《音韵阐微》。从音系性质看，《五方元音》是中原系韵书，《音韵阐微》是切韵系韵书。清代还有几种南曲韵书。如：《诗词通韵》、《中州音韵辑要》、《曲韵骊珠》、《新订中州全韵》等。词韵书有《词林正韵》，归纳宋人词韵而成，基本上也是切韵系韵书。

《五方元音》作者樊腾凤，字凌虚，河北尧山（今邢台地区隆尧县）人。樊氏生活在明末清初，其书可能成于清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到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之间。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和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年希尧先后两次对此书进行修改，内容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①

何谓"五方元音"？年希尧在序言中说："阴阳五行之理，而在天为五行，在地为五方"，"直欲以天地自然之律和天地自然之声谓之曰元音。""律"是指十二律，《五方元音》分韵部为十二，就是与十二律相应和，表示这是"天地自然之声"，也就是"元音"。

《五方元音》属于北音系统，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它的声调有五，阴阳平、上、去之外，还有入声（与阴声韵相配），这个入声到底是北方某一方音的反映呢，还是作者因此书要体现"五方"（而不是一方）的"元音"而故意存古呢？对此，目前有不

同的看法。我个人认为这是"存古"，并非实际语音的真实描写。

《五方元音》有二十个声母：

梆、匏、木、风、

斗、土、鸟、雷、

竹、虫、石、日、

剪、鹊、丝、云、

金、桥、火、蛙、

韵部十二：

天、人、龙、羊

牛、獒、虎、驼

蛇、马、豺、地

它的声母系统与兰茂的《早梅诗》相近，不同的地方只有一点，早梅诗有微母（无），樊腾风将微母归入蛙母，他的蛙母与云母其实都应看作零声母，区别只在于韵头。

《五方元音》是一部韵书，但书前附有十二韵的等韵图，叫做《韵略》。每图横列二十字母，纵列开齐合撮四呼，每呼又依五个声调排列。看来樊腾风不精于等韵，四呼的排列，杂乱无章。

正文分上下两卷。一天至六獒为上卷，七虎至十二地为下卷。每卷按声母、声调归字，字下一律不注反切，有时注直音，每字下都有简要的释义。如：

一天：〔剪〕〔上平〕煎，油煮……〔去〕煎，蜜浸果物。

"天"，代表韵；"剪"，代表声母；"上平"、"去"代

表声调。“煎”字有两个读音，两个义项。读去声的“煎”字，就是现代汉语中“蜜饯”的“饯”字。

《五方元音》在清初颇有影响，跟它具有音义兼备、通俗简要的特色，不无关系。

历史上多数统治者对于编字典和韵书这两件事总还是比较关心的。康熙曾指示张玉书等人编纂《字典》，就在《字典》完稿的前一年，又命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编纂韵书。

李光地（公元1642年—1718年），字晋卿，号厚庵，福建安溪人。他和翰林院侍讲王兰生（字振兴，一字坦斋，河北交河人）一起奉命编纂《音韵阐微》，至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由王氏完稿，历时十一年之久。

《音韵阐微》按平水韵排列，只有并入文吻问物的殷隐焮迄四韵，以及并入迥韵的拯韵，并入径韵的证韵，都按“独用”的原则分别列出。每韵内部先分开齐合撮四呼，再按三十六字母及四等编成同音字群。凡领头字都注明旧反切、今读，所收各字都有释义，这些释义都抄自旧的字书，不如《五方元音》通俗。如去声十七霰“騗”字引《集韵》注：“跃而乘马也。”《五方元音》注：“跳上马。”后者完全用口语释义。《音韵阐微》也附有等韵图，叫做《韵谱》。每一图横列三十六母，纵列开齐合撮四呼，每呼又分平上去入四声列字。

《音韵阐微》所反映的实际语音跟《切韵》系韵书已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它对旧的反切进行了大规模的改良。这种改良是受了满文的启发。康熙认为“国书（即满文）合声之法出于自然，足以尽括汉文翻切之要妙也。”② 于是指示李光地等人用合声法改良反切。

所谓“合声法”就是满文拼音法。运用于汉文反切，“其为法也，缓读则成二字，急读则读一音”③，为了便于二字急读成一音，编纂者确定用支、微、鱼、虞、歌、麻等韵的字作切上字，这些韵属于开音节，韵尾没有鼻音，与下字相拼时，中间没有多余成分。如：

姑翁—公　　姑威—归

姑弯—关　　姑汪—光

基因—巾　　基烟—坚

基腰—骄　　基优—鸠

“姑”，虞韵，见母合口呼；“基”，支韵，见母齐齿呼，都与被切字同母同呼。

切下字要求清声用影母字，浊声用喻母字。这些字以元音或半元音开头，拼读时没有辅音声母从中阻隔。如：

基烟—坚　　欺烟—牵

梯烟—天　　卑烟—边

奇延—虔　　池延—缠

弥延—绵　　齐延—钱

“烟”，清声影母；“延”，浊声喻母。

切上字没有尾巴，切下字没有头部，二者急读便可成一音，这是合声切字法的优越性。

但是，反切毕竟不就是拼音，无论怎么改良，它的局限性也难以彻底避免。在整个《音韵阐微》中，共三千八百八十四个音纽，用合声作反切的不过四百八十五个，才占总数百分之十二点五④。因为多数字不能从支微等韵中找到本母本呼的切上字，或不能从本韵中找出影喻两母的字作为切下字。于是编纂者就想出

了一些变例以济其穷，最常用的变例有今用、协用、借用三种。

今用。“因本母本呼于文微鱼虞数韵中无字者，则借仄声或别部之字以代之，但开齐合撮之类不使相淆；遇本韵影喻二母无字者，则借本韵旁近之字以代之，其清母浊母之分，不使或紊，其取音比旧稍近也。”（凡例）如：

通〔广韵〕他红切。〔集韵〕他东切。〔今用〕秃翁切。按：“秃”，入声屋韵合口，比之旧切上字用“他”（开口）有改进。

江〔广韵〕〔集韵〕古双切。〔今用〕基腔切。按：“基”属支韵，与“江”同为齐齿呼；“腔”，溪母，与“江”同为清声。

书中以“今用”注音的占绝大多数。

协用。协助“今用”的一种方法。假如“今用”切下字不属于本韵中影喻二母的字，于是“再借邻韵影喻二母字中以协其声。”（凡例）如：

奸〔广韵〕古颜切。〔集韵〕居颜切。〔今用〕皆删切，〔协用〕基烟切。按：奸、删，都属删韵清声，比之用“颜”（浊声）作切下字算是已有改进，但“删”非影母字，故借邻近先韵影母“烟”字作为切下字。

〔借用〕。“借邻韵并非影喻二母中字，其声为近，而亦不甚协者。”（凡例）如：

迦〔广韵〕〔集韵〕居伽切。〔借用〕基遮切。按：迦，歌韵清声，伽，浊声，不相合，故从麻韵借用照母清声字“遮”。

上述例证已足以说明：《音韵阐微》的反切，跟现代汉语的语音已经很相近，所以旧的《辞源》和《辞海》，都用此书的反

切注音。还有一点也值得肯定，《音韵阐微》对历史上一些重要韵书的反切、分韵和等呼情况，都有较为详细的说明，为我们研究字音的演变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康熙、乾隆年间出现了四部南曲韵书。

第一本是朴隐子（江苏人）著的《诗词通韵》。全书正文五卷，按上平、下平、上、去、入排列，另附《反切定谱》一卷。康熙二十四年（1685）问世。这部书名曰《通韵》，就是将诗韵与词（指曲）韵进行对比研究，以曲韵为基础，分二十个韵部。

翁音　东冬　庚二　青二　蒸二
映音　江　阳
而音　支一
伊音　支二　微　齐　灰二
纡音　鱼一　虞二
乌音　鱼二　虞一
鸦音　佳一　麻一
欸音　佳二　灰一
恩音　真　文　元一
安音　元二　寒二　删
嫣音　元三　先
剜音　寒一
鏖音　萧　肴　豪
阿音　歌
耶音　麻二
英音　庚一　庚二　青一　青二　蒸一　蒸二
讴音　尤

阴音 侵

语音 覃 咸

淹音 盐

三个闭口韵实际上已经消失。《反切定谱》明确指出："侵韵与真文同反，覃咸韵与寒删同反，盐韵与先韵同反。"（13页）就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材料而言，清代明确以"开齐合撮"为"四呼"之名，并按四呼列字的，恐怕以《诗词通韵》为最早。《诗词通韵·例说》："韵有四呼七音三十一等。呼分开合，音辨宫商，等叙清浊。"所谓"七音"，指宫商角徵羽变徵变商，"三十一等"就是三十一个声母，"等叙清浊"就是声母有清浊之别，这是南曲韵书声母方面的主要特点之一。其清浊关系如下：

凡宫角徵羽之一等为正清（包括影见端邦），二等为次清（晓溪透滂），三等为正浊（匣群定并），四等为次浊（喻疑泥明）。

变徵变商皆次浊音（来日）。

商及次商之一二等与宫角同，三等为次清次音，四等为正浊，五等为次浊（商之一、二等指精清，次商之一二等指照穿，三等次清次指商音的心母及次商的审母，四等指从母和床母，五等指邪禅）

次羽之一等为正清（非），二等为正浊（奉），三等为次浊（微）。

关于声调。平声不分阴阳，有十七个入声韵部，为了适应唱曲的需要，朴隐子将其分别派入齐微、居鱼、苏模、家麻、歌罗、车遮等部。

何九盈以及日本学人花登正宏都有专文讨论《诗词通韵》。

何的文章发表在《中国语文》1985年第4期上，花登的文章发表在《语言学论丛》第十五辑上。

《中州音韵辑要》成书于乾隆辛丑（1781年），上距《诗词通韵》将近一百年。编者王鵔，字履青，江苏昆山人。《辑要》以明末范善臻《中州全韵》为基础，“删其僻而辑其要，并辨正字体”；反切方面则“参证《诗词通韵》”；注释方面，“虽半为参易，无不本诸《字典》也。”（序言）《辑要》分二十一部：

东同	江阳
支时（有作上入声）	机微（入作三声全）
归回（入作三声全）	居鱼（入作三声全）
苏模（入作三声全）	皆来（入作三声全）
真文	干寒
欢桓	天田
萧豪（入作三声全）	歌罗（入作三声全）
家麻（入作三声全）	车蛇（入作三声全）
庚亭	鸠由（入作三声全）
侵寻	监咸
纤廉	

这个分部与范善臻略有不同。从机微析出归回，从居鱼析出苏模，多了两个部。

此书去声依范善臻，亦分阴阳。《例言》说：“周德清去声不分阴阳，遂致互混，如沈君徵（盈按：沈宠绥的字，沈为明万历时江苏吴江人）《度曲须知》之精详，音律亦宗周本，得范昆白分列二门，而心目豁然，洵为词坛首功也。”其实，南曲韵书

调分阴阳，其性质与《中原音韵》平分阴阳不同。《中原》的阴阳纯属声调问题，南曲韵书分阴阳是把声母的清浊与声调的阴阳混而为一。这个问题，早在30年代张世禄先生就已经指出（《中国音韵学史》下册，232页）。前些年，我在《〈中州音韵〉述评》中又一次论证了这一点。

对入声的处理，遵循《中原》而又照顾到南音。《例言》说："清入声正次俱作上，正浊入声作平，次浊入声作去，随音转叶，前本皆然。间有歧收而未当者，俱推敲归整。惟入声分叶三声，专归北调，四声中阙一声，宜不免訾议。兹先将入声正音切准，而后注北音而叶各韵，前本之混不分门者，并为派清，则四声皆全，而南北中州俱明矣。"

《韵学骊珠》的作者沈乘麐，字苑宾，江苏太仓人。书前有乾隆十一年芥舟写的"弁辞"，又有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周昂写的序言。据周序说，此书早已定稿，但未正式刻印。沈氏本人在"凡例"中说，这本书写了整五十年，七次易稿。

《韵学骊珠》"专为歌曲者而作"，"向来曲韵，必南从《洪武》，北问《中原》，今合南北为一书。"③因为它有"合南北为一"的特点，故昆曲、京戏界都颇为重视。解放后项远村写了《曲韵易通》，用现代语音学知识，对《韵学骊珠》进行了通俗解说。

《韵学骊珠》的分韵基本上取舍于《洪武》和《中原》。《洪武》将《中原》的寒山、鱼模、齐微各分为二，定为二十二韵。《骊珠》依《洪武》分鱼模为姑模、居鱼，分齐微为机微、灰回；寒山则依《中原》，不分为二。定为二十一韵。《洪武》有入声十韵，《骊珠》合为八韵。值得注意的是，入声各小韵都注明了南

音、北音。

《中原音韵》始平分阴阳，范善臻《中州全韵》于平去二声都分阴阳，《骊珠》则进而将平上去入四声都分阴阳，有八个声调。沈氏所说的“阴阳”跟声母有关，阴是清音（指不带音），阳是浊音（指带音），他所说的“清浊”则专指送气和不送气的区别，不送气的叫“清”，如东、冬、宗；送气的叫“浊”，如通、充、冲。作者在“凡例”中说：“音分清浊，本于《五车韵瑞》而参酌之。”⑥

《骊珠》不用三十六字母，直接用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七音代表声母。

《新订中州全韵》作者周昂，字少霞，江苏虞山（今常熟市）人。他的《全韵》于乾隆年间问世。

这部韵书有二十二个部，比沈乘麐多一个知如部，这个部的字来自齐微、居鱼两部，如“知痴池”、“如诸书”等。知如部的设立应有实际方音作为根据，它的韵母应是舌尖元音〔ɥ〕，今苏州话这类字还保存这个韵母。

周昂韵书的另一个特点是上声也分阴阳。刘禧延说：“去入声阴阳，呼之俱易分明，独上声阴阳，最难显分界限，即了然于心，亦未必了然于口。其阳声清者（原注：指次浊言），呼之似近阴声浊音（原注：指全浊言），又似近乎阳去……近虞山周少霞始分定阴阳，而字音仍多蒙混。”（《刘氏遗著·中州切音谱赘论》）道理很简单，浊上字早已开始变去，即使吴语的浊上字，系统也不完整，故难以“显分界限”。

上面提到刘禧延的《中州切音谱赘论》，这是一篇研究中州音的论文，目的“为度曲家正讹”，大概写于道光末年。文中以

《中原》系韵书传统的十九部为结体，结合明清曲韵书，并联系吴中方言，逐部进行讨论。无论见解还是资料，都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刘禧延是江苏吴县的一个贡生，“工诗词，善画，喜谈金石，而尤精于音韵之学。”（雷浚《刘氏遗著·叙》）

中国古代诗和曲都有韵书，词则没有。清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江苏吴县戈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写成《词林正韵》三卷。作者在“发凡”中说：“是书列平上去为十四部，入声为五部，共十九部，皆取古人之名词参酌而审定之。”

十九韵没有立名称，只是将《集韵》韵目分别排列成部，并按韵尾的不同，将十四部（入声不计）分为穿鼻（—ŋ）、抵腭（—n）、闭口（—m）展辅（—i）、敛唇（—u）、直喉（—e，—a）等六大类。

《词林正韵》对韵部的归并与平水韵不相同。一、灰咍二韵，平水合而为灰，戈载将灰韵归到他的第三部，咍韵归到第五部；二、元魂痕三韵，平水韵合为“该死的十三元”，戈载将元韵归到第七部，魂痕归到第六部；三、佳韵一分为二，一部分开口字归到第五部，一部分归到第十部。

戈载批评平水韵“妄为删并，纷纭淆乱，而填词者亦不知宗矣”。（发凡）但他的分部也不是尽善尽美，鲁国尧指出“《词林正韵》入声分部的失当”就可以为证。⑦

注：

①关于《五方元音》，可参阅赵荫棠的《等韵源流》226页，以及陆志韦的《记五方元音》，见《燕京学报》34期。

②③《音韵阐微·序》。

④可参阅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选集》141页。

⑤《韵学骊珠·凡例》。

⑥《五车韵瑞》，明代凌稚隆著。在元代阴时夫《韵府群玉》的基础上增补而成。

⑦《语言学论丛》第八辑，110页。

第二十六节　清代词源学

我国古代有三种不同类型的探求词源的方式。刘熙的“声训”法是一种类型，王圣美的“右文”说是一种类型，戴震的“转语”又是一种类型。转语既不像刘熙的“声训”那么泛滥无边，又不像右文说那样仅局限于文字的声旁。戴震企图通过语音内部的对转规律说明词义之间的联系，他这个办法较之前两者都进步，可惜，戴震只是在青年时代写过一篇《转语二十章序》，二十章全书却未之见。我们只能通过这篇序言和他的《声类表》，了解关于“转语”的一些基本原则①。

第一、他认为“古今言音声之书，纷然淆杂，大致去其穿凿，自然符合者近是。昔人既作《尔雅》、《方言》、《释名》，余以谓犹缺一卷书，创为是篇，用补其缺。俾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看来，戴震是接受了刘熙的教训，所以他强调要“去其穿凿，自然符合”。刘熙的声训，处处穿凿，谈不上“自然符合”。为了避免“穿凿”，戴震注意到声和

义之间的辩证关系，不仅要以声"求"义，也要以义"正"声。从声义两方面探求词源，这样才可以"去其穿凿"。

第二、戴震把声母按发音部位分为五个大类，各类之中又按发音方法分成四个声位。《转语二十章》正好是每一个声位一章。见下表（367页）。

确定了声类与声位，"转语"就有了一定的基础。先不论这个基础是否合理，是否完善，它毕竟摘出了一个语音系统，严格按此系统去谈"语"之"转"，就是遵循了一定的准则，比之漫无边际的声训，又是一大进步。

第三、戴震的"转语"法有"正转"和"变转"之别。正变转的区分原则是："凡同位为正转，位同为变转，"因为"凡同位则同声，同声则可以通乎其义；位同则声变而同，声变而同则其义亦可以比之而通。"

所谓"同位"与"位同"的区别，是指声母发音部位与发音方法的区别。"同位"这个概念在江永的《四声切韵表·凡例》中已经出现了："切字者，上一字取同位……同位不论四声。"同位就是同一母位，也就是声母相同。后来钱大昕也使用过这个概念。他说："喉腭舌齿唇之声，同位者皆可相转。"钱氏所说的"同位"与戴震一样，都是指的发音部位相同。

"位同"这个概念似乎为戴震所独创。什么叫"位同"呢？他说：

> 台、余、予、阳，自称之词，在次三章；吾、卬、言、我，亦自称之词，在次十有五章。截四章为一类，类有四位，三与十有五，数其位皆至三而得之，位同也。

"台余予阳"在第3章喉音第三位，属次浊音，"吾卬言我"在

章数	声类	声位	发音方法	三十六声母
1	喉	一	清	见
2		二	次清　浊	溪　群
3		三	清　次浊	影　喻微
4		四	清　浊	晓　匣
5	舌	一	清	端
6		二	次清　浊	透　定
7		三	次浊	泥
8		四	浊	来（实为次浊）
9	腭	一	清	知照
10		二	次清　浊	彻穿　澄床
11		三	次浊	娘日
12		四	清　浊	审　禅
13	齿	一	清	精
14		二	次清　浊	清　从
15		三	次浊	疑
16		四	清　浊	心　邪
17	唇	一	清	邦
18		二	次清　浊	滂　并
19		三	次浊	明
20		四	清　浊	非敷　奉

第15章齿音第三位，也是次浊音；两项都属第三位，声变义通，这就是“位同”。他还举了一个例子：

尔、女、而、戎、若，谓人之词，而、如、若、然，义又交通，并在次十有一章。《周语》：“若能有济也。”注云：“若，乃也。”《檀弓》：“而曰然。”注云：“而，乃也。”《鲁论》：“吾末如之何。”即“奈之何”。郑康成读“如”为“那”。曰“乃”、曰“奈”、曰“那”，在次七章。七与十有一，数其位亦至三而得之。

这是说：“尔女而戎若如然”在第11章第三位，“乃奈那”在第7章第三位，都是次浊，属于“位同”，故称为“变转”。

戴震不仅运用“转语”法以求古音古义，还运用它来考察方言。本来，“转语”这个词最早见于扬雄《方言》③，扬雄已运用“转语”这个概念去解释某些方音现象，戴震也继承了这个传统。他说：“用是听五方之音，及少儿学语未清者，其展转讹溷，必各如其位。”

戴震的“转语”之所以没有写成书，大概是在写作过程中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因为“位同”、“同位”只是转语的条件之一，谈“转语”而置韵部于不顾，势必难以行得通。就同位与位同而言，同位正转的可信程度要高一些，而位同变转却没有什么说服力。从戴震所举的两个例子来看，都不必用“位同”的条例来解释。因为疑喻本属牙喉音（戴震将疑母归在齿类，将微母归在喉类，不可信），无关乎“三位”；泥日在上古可以视为同母，也与“三位”无关。清代的语言学家讲“位同”的只有戴氏一人，他的弟子们没有谁这么讲的。但段注《说文》讲双声时，实际上运用了“位同”分析法。

与戴震同时的程瑶田也探求过词源。程瑶田（公元1725年—1814年），安徽徽州府歙县人，与戴震同乡，又同师江永。他的《通艺录》“解字小记”有《果蠃转语记》四篇，但有目无书，只存《果蠃通义说》一文。1931年有人发现稿本一篇，并有王念孙跋语。此稿已收入《安徽全书》。

《果蠃转语记》是一篇词源学论文。程瑶田通过“果蠃”一词的考察，罗列了一大批与“果蠃”音义相关的同源词。他说：“里谚所称，虽妇人孺子，见物之果蠃然者，皆知以果蠃呼之，虽微（非）草木之实，苟类是，即无不可与之以是名也。”程氏所谓的“果蠃然者”，即像“果蠃”那样的圆形的东西，都可以从“果蠃”之声得名。如：

栝楼（“瓜”之合声）

蠮（蜾）蠃　（细腰土蜂）

锅䥶（温器）

蛞蝼（即蝼蛄）

痀偻、岣嵝。

毂辘。

离娄、连嵝。

程瑶田从声音和意义两方面去追溯同源词，这个原则是正确的。他说：

声随形命，字依声立，屡变其物而不易其名，屡易其文而弗离其声，物不相类也而名或不得不类，形不相似而天下之人皆得以是声形之，亦遂靡或弗似也。

“声随形命”，是说按事物的形状而命之以一定的语音形式，如“果蠃”之形圆，则凡圆形之“锅䥶”、“毂辘”等都以

此声命名；“屡变其物而不易其名”，是说物各不同而名称则不变；“屡易其文而弗离其声”，是说书写形式不同而其音不变。

程瑶田讲“转语”未免有些滥。他认为岣嵝又转为《匈奴传》之“拘留”，又转为《东夷传》之“高句骊”，又转为“俱卢”、符离转之为“梵言菩提”，都不可信。

王念孙的《释大》（见《高邮王氏遗书》）也是研究词源的著作。此书没有写完，现存稿只有八篇，每篇一个声母（见、溪、群、疑、影、喻、晓、匣），各母下所收之字都与“大”有关。如：

> 冈，山脊也；亢，人颈也，二者皆有大义。故山脊谓之冈，亦谓之岭，人颈谓之领，亦谓之亢。强谓之刚，大绳谓之纲，特父谓之㧻，大贝谓之魧（音冈。《尔雅·释鱼》贝大者魧。《说文》读若冈。）大瓮谓之瓬（音冈），其义一也。
>
> 大赤谓之绛，大水谓之绛。
>
> （以上卷一）
>
> 空、孔、康，声之转，故虚谓之空，亦谓之孔，亦谓之康。
>
> （卷二）
>
> 牙，壮齿也。故大旗谓之牙旗，建大旗于门谓之牙门。
>
> （卷三）

王念孙的《释大》比较严谨，虽不是句句精粹，但多数条目言之成理。

与王念孙同时的阮元（公元1764年—1849年）也研究过词源学。他的《释门》（《揅经室集》卷一）就写得不错。他认为：

凡事物有间可进，进而靡已者，其音皆读若“门”。或转若“免”、若“每”、若“敏”、若“孟”，而其义皆同，其字则展转相假，或假之于同部之叠韵，或假之于同纽之双声。试论之凡物中有间隙可进者，莫首于门矣。古人特造二户象形之字，而未显其声音，其声音为何，则与“釁”同也。釁从爨得音，釁、门同部也（都是文部字），因而釁又变为斖、为亹、为璺……璺，玉之坼也。《方言》亦云：器破而未离谓之璺。释文注：亹，本作璺。是璺与亹同音义也。玉中破未有不赤者，故釁为以血涂物之间隙。音转为盟……若夫进而靡已之义之音则为“勉”，勉转音为“每”。“亹亹文王”，当读若“每每文王”。亹字或作斖，再转为“敏”、为“黾”，双其声则为“黾勉”，收其声则为“蠠没”，又为“密勿”。

清代倡右文说的有黄承吉。黄氏字春谷，为黄扶孟族孙，祖籍歙县，生长于扬州。他的《字义起于右旁之声说》颇有影响。

黄氏将谐声字分为左右二部，称右旁之声为纲、为母，左旁之形为目、为子。声符何以为纲、为母？因为“谐声之字，其右旁之声必兼有义，而义皆起于声，凡字之以某为声者，皆原起于右旁之声义以制字，是为诸字所起之纲。”

事实上，黄承吉的声同则义同的理论不局限于右旁，他认为：“并有不必举其右旁为声之本字，而任举其同声之字即可用为同义者。盖凡字之同声者，皆为同义。”的确，同源字并不一定声符都相同，突破右文偏旁的局限，同源字有更为广阔的天地。黄氏的错误是把话说绝了，什么“任举”、“凡”，都不科学。

黄氏还说什么“且凡同一韵之字，其义皆不甚相远，不必一读而后为同声。”只要同一个韵部义意就相近，这就更不科学了。后来刘师培继承了这个理论，把同源词的研究引向了邪路。

为什么义起于声，黄承吉想从理论上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盖语原自性生，而字本从言起。婴儿甫通人语，未识字而已解言，而所解之言即是字，可见字从言制也。呼鸡为喌，使犬为嗾，鸡犬何知有字，而闻之皆应，而呼使之声即是字，可见字从言制也。从言制即是从声制，可见字义皆起于右旁之声也。”所谓“字本从言起”，只能说明文字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文字是纪录语言的符号，并不能证明所有的同音字都有同义关系。如果所有的同音字意义都一样，则汉语的语义系统就会贫乏到非常可怜的地步，在交际中必然造成混乱。至于呼鸡使狗，这类象声字为数不多，而且也不能拿来证明音同则义同。右文说的目的是要建立汉字的族属关系。黄氏企图寻找字之“鼻祖”以明“其制字之所以然。”他曾“穷溯招、标、杓三字之源。招字则起于刀之上指，标字则起于火之上飞，杓字则起于勺之曲出。则刀、火、勺三字乃招、标、杓三字之鼻祖，而上指、上飞、曲出乃三字从出之所以然。是以召字、票字、勺字以及凡从召、票、勺之字，其训义无不究竟归于为末、为锐、为纤，总不离乎上指、上飞、曲出之义。而招、标、杓三字皆为同声，是以同义。”

黄氏大概不懂上古音，“火”为晓母微部字，“標”为帮母宵部字，它们并不同音。召字从口刀声，招字从手召声，实在看不出招与“刀之上指”有何关系。杓是枓柄，取义于勺，所谓“曲出”义也是缺乏理据的联想。总之，黄氏所举三例，都不可信。

注：

① 《转语二十章序》，见《戴东原集》（上），73页。万有文库本。可参考马裕藻的《戴东原对于古音学的贡献》，见《国学季刊》二卷一期。另有《戴东原转语释补》一书可参阅。

② 《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三，520页。

③ 《方言》卷三、卷十。请参阅本书第三节。

第二十七节　清代语义学

清代语言学成绩最为突出的，第一是古音研究，第二是古义研究。所谓清代语义学，主要内容是古汉语词义的研究。

清代古汉语词义研究的名著有：

一、《字诂》、《义府》。作者黄生（1662—？），字扶孟，明末诸生，安徽徽州府歙县人。

二、《尔雅正义》。作者邵晋涵（公元1743年—1796年），字二云，浙江余姚人。

三、《广雅疏证》、《读书杂志》。作者王念孙。

四、《尔雅义疏》。作者郝懿行（公元1755年—1823年），号兰皋，山东栖霞人。

五、《经义述闻》。作者王引之（公元1766年—1834年），

六、《群经平议》、《诸子平议》。作者俞樾（公元1821年—1907年），字荫甫，浙江德清人。

清人在古词义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主要原因是他们掌握了三个法宝。

以声求义，这是第一个法宝。清代研究词义的人对此莫不津津乐道。

早在清朝初年，黄生在研究古汉词语义时，就已经知道“因声以知意”（《义府》卷上6页），“古音近通用”（《义府》卷上4页），“一音之转”（《义府》卷上1页）这样一些原则。清人刘文淇说：“夫声音训诂之学，于今日称极盛，而先生实先发之。”刘氏还称赞《字诂》、《义府》“博大精深，所解释者皆实事求是，不为凿空之谈。”（《字诂、义府跋》）不过，黄生并不精于古音，对某些字之间的音义关系，解释亦不尽当。如说“以，语词也。凡训由、训用、训与、训因，皆以声近而借。”这五个字的语音关系有的相差较远，且同义不一定都是声近借用。“后”“厚”同音，不错，但黄生说“后……疑即古文厚字。”也毫无根据。但他所倡导的原则是正确的，后来的戴、段二王等人都抓住这些条条不放。

戴震说：“凡故训之失传者，于此亦可因声而知义矣。”① 在给《六书音均表》作序时又强调：“今乐睹是书之成也，不惟字得其古人音读，抑又多通其古义……夫六经字多假借，音声失而假借之意何以得？”②

段玉裁说：“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③

王念孙说：“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譬如振裘必提其领，举网必

挈其纲，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此之不寤，则有字别为音，音别为义，或望文虚造而违古义，或墨守成训而鲜会通。易简之理既失，而大道多歧矣。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伸触类，不限形体，苟可以发明前训，斯凌杂之讥，亦所不辞。”④

王引之说：“大人（指其父王念孙）曰：诂训之旨，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则诘𫌀为病矣。”⑤

本来，以声求义，作为一种研究古词义的主张来说，并不是清朝人的独创。元初的戴侗，明末的方以智都已经谈到了。但是，只有段、王等人才成功地运用了这个原则，这是因为只有在段、王那个时代才真正建立起一个科学的上古音系统。古音系统一天建立不起来，以声求义就一天不能彻底实现。戴震高度评价段玉裁的《六书音均表》，认为这部著作问世，不仅得其古音，“又多通其古义”，道理也就在于此。段玉裁批评有的人“言假借而昧古音，是皆无与于小学者也。”⑥道理还在于此。

以声求义这个法宝能破“缘词生训”。所谓“缘词生训”也就是“望文生训”，这是古词义研究中的一大弊端。戴震说：“是故凿空之弊有二：其一缘词生训也，其一守讹传谬也。缘词生训者，所释之义非其本义。”⑦“所释之义非其本义”主要表现在两点上：一是把假借字当作本字来解释；二是把双声叠韵联绵字拆开来加以解释。王念孙说：“夫双声之字，本因声以见义，不求诸声而求诸字，固宜其说之多凿也。”⑧又说：“大抵双声叠韵之字，其义即存乎声，求诸其声则得，求诸其文（字）则惑

矣。”⑨下面我们摘录《经义述闻》关于“犹豫”一词的释义，就可以看出“求诸声”和“求诸字”的区别：

家大人曰：犹豫，双声字也，字或作“犹与”，分言之则曰“犹”，曰“豫”……合言之则曰“犹豫”，转之则曰“夷犹”，曰“容与”。《楚辞·九歌》：“君不行兮夷犹。”王注曰：“夷犹，犹豫也。”《九章》曰：“然容与而狐疑。”“容与”亦犹豫也。案《曲礼》曰：“卜筮者，先圣王之所以使民、决嫌疑、定犹与也。”《离骚》曰：“心犹豫而狐疑兮。”《史记·李斯传》曰：“狐疑犹豫，后必有悔。”《淮阴侯传》曰：“猛虎之犹豫，不若蜂虿之致螫，骐骥之踯躅，不如驽马之安步。”“嫌疑”、“狐疑”、“犹豫”、“踯躅”，皆双声字。“狐疑”与“嫌疑”一声之转耳。后人误读“狐疑”二字，以为狐性多疑，故曰“狐疑”。又因《离骚》犹豫、狐疑相对为文，而谓“犹”是犬名，犬随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来迎候，故曰“犹豫”。或又以豫字从象，而谓犹豫俱是多疑之兽。

在王念孙之前，黄生也讲到了“犹豫”这个例子。他说：

犹豫犹容与也。容与者，闲适之貌；犹豫者，迟疑之情。字本无义，以声取之尔。俗人妄生解说，谓兽性多疑，此何异以蹲鸱为怪鸟哉！（盈按：蹲鸱，大芋头。）……盖以声状意，初无一定之字，妄解兽名，有眼缝自未开尔⑩。

在黄生之后，王念孙之前，吴玉搢在《别雅》卷二也讲到“夷由”，卷四讲到“犹与、冘豫、由与、犹豫”。由于吴玉搢不明古音，他还是相信“犹，兽名也，性多疑虑”这样的“缘词生训”，他也不懂得“冘”（yóu，以周切）与“犹”“由”音

近相通（三字都属喻四，冘在上古属侵部，犹、由属幽部），以为冘"是尤字之讹，因犹声同尤，尤形似冘……而后人传写作'冘'。"这就是黄生所说的"眼缝未开尔"。而不明古音，正是"眼缝未开"的原由。"眼缝未开"的不只是吴玉搢一人。《后汉书·马援传》有"计冘豫未决"。章怀太子李贤注："冘，音以林反。"宋人袁文说："恐当时只是'犹'字，借用'尤'字耳，传写之错，致章怀误音也。"（《瓮牖闲评》卷二19页）

以例求义，这是第二个法宝。阮元说："稽古之学，必确得古人之义例，执其正，穷其变，而后其说之也不诬。"⑪"义例"也就是"例"，即规律性的东西。"执其正"是指掌握一般规律，"穷其变"是指掌握特殊规律。在古汉语词义研究方面，段玉裁是最善于创通条例的一个人。

一、他正确地揭示了汉人注经的义例。他在《周礼汉读考》自序中说：

> 汉人作注，于字发疑正读，其例有三：一曰读如、读若；二曰读为、读曰；三曰当为。
>
> 读如、读若者，拟其音也。古无反语，故为比方之词；
>
> 读为、读曰者，易其字也。易之以音相近的字，故为变化之词；
>
> 比方主乎同，音同而义可推也；变化主乎异，字异而义憭然也。比方主乎音，变化主乎义；比方不易字，故下文仍举经之本字；变化字已易，故下文辄举所易之字。注经必兼兹二者，故有读如，有读为。字书不言变化，故有读如，无读为，有言读如某、读为某，而某仍本字者。"如"以别其音，"为"以别其义。

当为者，定为字之误、声之误而改其字也，为救正之词。形近而讹，谓之字之误；声近而讹，谓之声之误。字误、声误而正之，皆谓之“当为”。

读如、读若是注音问题，读为、读曰是以本字破假借字的问题，当为是纠正形误、声误的问题。三者都有可能涉及到词义问题，如果弄不清这些义例，就必然要产生穿凿附会、望文生训的毛病。所以阮元说：“自先生（指段玉裁）此言出，学者凡读汉儒经子汉书之注，如梦得觉，如醉得醒，不至如冥行擿埴，此先生之功三也。”⑫

二、段玉裁明确提出了词义的系统性以及掌握这个系统的基本方法。他说：“凡字有本义，有引申之义，有假借之义。”⑬如“亯”的本义是祭祀，引申之凡下献其上亦曰“亯”，又同音假借为“飨”。怎么确定本义、引申义、假借义呢？段玉裁说：

《说文解字》全书，其篆文下必举篆之本义，不及其引申之义。其他篆下说解用此篆本义者，则彼此互注，所谓考老为转注是也；有用此篆引申之义者，则与本义训说可相通。如“初”为“衣之始”，“始”为“女之初”，而凡“始”凡“初”可用是也。断无有说解中所用与本篆义绝不相蒙者，此许氏之例也。⑭

段玉裁揭示的《说文》释词义例，对我们掌握词的本义、引申义以及确定词的同义关系都大有用处。

区别假借字与本字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段玉裁区分二者的办法是：

凡治经，经典多用假借字，其本字多见于《说文》。学者必于《尔雅》、传、注得经义，必于《说文》得字义，既

读经注，复求之《说文》，则可知若为假借字，若为本字，此治经之法也⑮。

这个办法就是拿经义与《说文》相印证，二者相符，无疑是本字，如果不符，就可判断经文系假借字。段玉裁是研究《说文》的，所以他确立本义，区分假借义，一以《说文》为准，这个原则在多数情形下是行得通的。问题在于《说文》的释义并非全都是本字本义，有以引申义释篆字的，甚至有以假借字释本字的，有什么也不是，纯属臆造的。如果全依《说文》，就必然要出错。

三、依文例推求词义。古书注释甚至正文中往往有各种各样的讹误，亦可于文例推求其谬误而正之。段玉裁的《密州说》和《春秋经杀弑二字辨别考》等论文⑯，就运用以文例推求词义的方法。

襄三十一年《经》："莒人弑其君密州。"《左氏传》："书曰，莒人弑其君买朱钼。'"杜曰："买朱钼，密州之字。"按：此语必误。"买""密"双声，"朱""州"叠韵。"州"为"朱钼"，犹"邾"为"邾娄"也，断非一名一字。未有弑君书君字者，亦未有圣《经》书其名，《传》易之以字而冠以"书曰"者。《公羊》曰：地物从中国，邑人名从主人。《谷梁》曰：号从中国，名从主人。盖买朱钼者主人，密州者从中国欤？此《左经》曰密州，《左传》以买朱钼释之，岂非通夷夏之语互训之欤？

段玉裁判断杜注"买朱钼为密州之字"必误，并无其他证明材料，而是拿三条文例推求出来的。1.弑君没有书君之字的；2.也没有《经》上写的是名，而《传》却把名换成字的；3.按"名

从主人”之例，推断出“买朱钼”是莒语，“密州”是夏语，并证之以双声叠韵。有此三例，问题就得到了合情合理的解释。

另外，他断言“凡三经三传之用‘杀’为‘弑’者，皆讹字也。”也是从文例推求出来的。他说：

> 凡《春秋传》于弑君或云“杀”者，述其事也；《春秋经》必云“弑”者，正其名也。弑者，臣杀君也。杀声于音在脂部（收-t尾），式声于音在之部（收-k尾。杀、弑均入声字，段玉裁入声部不独立，故云在脂、之部），脂、之者古音之大判，彼此不相假借者也。凡六书假借必其音同部，是故“杀”与“弑”，音殊义殊。汉《公羊经》《传》假“试”为“弑”，断无有假“杀”为“弑”者也。

按臣杀君必曰“弑”之通例，又“杀”、“弑”古音不通假之例，因此，凡理应作“弑”的地方如写成了“杀”字，那就是错字。依汉人注经之例，就应这样说：“杀”当为“弑”，而不能说“杀”亦有“弑”义。

创通条例就是从大处着眼。汪中的《释三九》⑰，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的“上下文异字同义例”、“上下文同字异义例”、“参见互义例”等，都是以例求义的具体运用。

归纳汇证，这是第三个法宝。王氏父子最长于此道。王念孙的《读书杂志》，“一字之征，博及万卷，其精核如此”。王引之的《经义述闻》于“凡古儒所误解者，无不旁征曲喻，而得其本义之所在。”⑱“博及万卷”、“旁征曲喻”就是归纳汇证，就是详细占有材料，引出科学的结论。

有人认为：归纳汇证并不难，把各种有关的例证汇集起来就行了。这是外行说的话。事情果然如此简单，为什么宋儒、元

儒、明儒同样也见到了这些材料，而他们却没有作出清儒这样的成绩呢？清儒熟读经史子集的人也不在少数，为什么只有段、王等人才能作出这么好的成绩，而有的人却“手披万卷，不能识一字之声义”⑲呢？

要有证明问题的本领，首先就要有发现问题的本领。没有发现问题的本领，也就谈不上运用广泛的知识来论证问题了。《诗·小雅·斯干》有一句诗：“如竹苞矣。”毛传：“苞，本也。”“苞”为什么会有“本”的意思呢？“本”又是什么意思呢？陈奂《诗毛氏传疏》说：“《传》云‘苞，本’者，竹本以喻本根深固也。”陈奂将“本”字释为“根本”的“本”，这是否符合毛传的本意呢？

王念孙原来也不理解毛传为什么要解“苞”为“本”，后来他在给邵晋涵的信中说：

> 昨偶阅《玉篇·草部》：“蕁（zǔn），本蕁，草丛生。字或作荃。《西京赋》荃蕁蓬茸。”始知《传》训苞为本者，乃丛生之义，非根本之义也。《斯干》笺云：言时民殷众，如竹之本生。“本生”犹言丛生，故以比民之殷众。故孙炎云“物丛生”，非根本之义明矣⑳。

王念孙能发现问题，他也能解决问题。陈奂在王念孙之后，连王念孙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他都不能吸收其成果，二家识见之高下就可见一斑了。

应该承认，归纳汇证，包括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全过程，是破疑义的重要法宝。从这个意义来说，证据就是学问，证据就是水平，证据就是力量。王引之说：“经之有说，触类旁通。不通全书，不能说一句，不通诸经，亦不能说一经。”㉑只有“触

类旁通”，才谈得上科学的归纳汇证，随意抓几个例子就妄加解释一番，算不得什么“汇证”。据说，西方某些治学严谨的学者，把“绝对不引证自己没有从头到尾读过的一本书”奉为金科玉律。要求这样严格，也是为了避免断章取义，曲解原文，为我所用。

以上谈的是方法问题。就研究内容而言，清人对同词相反为义、二字同义连用的研究也值得称道。

同词相反为义就是一般训诂著作中所谓的“反训词”。齐佩瑢曾经指出：“反训只是语义的变迁现象而非训诂之法则。”我很赞同这个说法，所以我主张不用“反训”这个术语，改为“同词相反为义”。

同词相反为义是由语义内部结构对向演变所造成的。最早发现这种现象并从理论上加以概括的是东晋时候的郭璞。

郭璞（276—324），字景纯，文学家，训诂学家。山西闻喜县人。他在《尔雅·释诂》注中说：“肆既为故，又为今，今亦为故，故亦为今，此义相反而兼通者。”又：“以徂为存，犹以乱为治，以曩为曏，以故为今，此皆诂训义有反覆旁通，美恶不嫌同名。”他在《方言》卷二注中说：“苦而为快者，犹以臭为香，乱为治，徂为存，此训义之反覆用之是（应作“者”字）也。”郭璞举的这些例子是否都属于“义相反而兼通者”，后人有不同看法，有人还以此为理由来否定语义中有“相反而兼通”的事实，这也是徒腾口说，自以为是。我以为即使郭璞举的这些例子均不确，他提出的“义相反而兼通”，“义有反覆旁通，美恶不嫌同名”，也是一个颇为重要的发现。清代语言学家如王念孙、段玉裁、钱绎等都列举了许多语义材料证实了这个理论的正确

性。

《广雅·释诂》王念孙《疏证》指出："敛为欲而又为与，乞丐为求而又为与，贷为借而又为与，禀为受而又为与，义有相反而实相因者，皆此类也。"（卷三下，9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

"相反而实相因"，揭示了同词相反为义的哲学基础。王念孙虽然不懂唯物辩证法，但由于他掌握了大量的语义材料，又能融会贯通，又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自然就会用朴素辩证法的观点进行概括、总结。我们说"他掌握了大量的语义材料"，也有他自己的话为证。《广雅疏证》卷二下："凡一字两训而反覆旁通者，若乱之为治，故之为今，扰之为安，臭之为香，不可悉数。"（65页）

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多次指出同词相反为义的问题，这里不一一列举。其中"贷"字的注释很值得注意。他说："古无贷（tè）、贷之分，由贷字或作贷，因分其义，又分其声。如求人曰乞，给人之求亦曰乞，今分去讫、去既二音。又如假、借二字，皆为求者、予者之通名，唐人亦有求读上入，予读两去之说，古皆未必有是。"（2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段玉裁把同词相反为义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提出了字形分化问题，由贷分化出贷，声音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假借"二字又涉及到四声别义问题。据贾昌朝的《群经音辨》卷六载："取于人曰假古雅切，与之曰假古讶切。取于人曰借子亦切，与之曰借子夜切。"段玉裁说的"求读上入"，即指假借二字在"求"这个意义上分别读作古雅切（上声）、子亦切（入声）；"予读两去"，即指在给予这个意义上读古讶切（去声）、子夜切（去声）。这种

字形分别、语音分别，说明同词相反为义这种语义现象虽然是客观存在，但毕竟是语义不精密的表现，所以要用文字形体和读音等办法加以规范。

钱绎对同词相反为义的论述都在《方言笺疏》一书中，材料相当丰富。另外，俞樾《古书疑义举例》有“美恶同辞例”，可参阅。

清代之前，郭璞之后，谈到同词相反为义的，还有元朝的李冶（1192—1279），亦作李治，号敬斋，河北栾城人。他的《敬斋古今黈卷一列举了不少例证。明代焦竑称这种现象为“倒语”，《焦氏笔乘》卷六有“古文多倒语”条，列举了一些“美恶相对之字。”（140页）

二字同义连用是古汉语中一种重要语言现象。唐代李贤等注《后汉书》时已注意到此。如《南匈奴列传》：“况种类繁炽，不可单尽。”注：“单亦尽也。犹《书》云‘谟谋’。即是古书之重语。”（2961页）这里的“重语”即王引之所说的“平列两字上下同义”和俞樾说的“两字一义”。

王引之写过《经传平列两字上下同义》，收在《经义述闻》中。王氏说：“古人训诂，不避重复，往往有平列两字上下同义者，解者分为两义，反失其指。”文章从《周易》、《尚书》、《毛诗》、《周礼》、《左传》、《国语》等书中列举了六十多条同义连文材料，进行分析辨证。今人周斌武的《中国古代语言学文选》选了这篇文章，有详细注释和说明，可参阅。

俞樾说：“古书中两字一义者，往往有之。”他的《古书疑义举例》有“两字一义而误解例”。如：

《襄三十一年传》：“寇盗充斥。”按：充、斥二字同

义。充，大也，见《淮南·说山篇》、《吕氏春秋·必己篇》高诱注。斥亦大也，见《文选·魏都赋》李善注。凡有大义者皆有多义，如"殷"训"大"，亦训"盛"，"丰"训"大"，亦训"满"，皆是也。充、斥并为大，故并为多。"充斥"，言多也。杜注曰："充满斥见"，失之。

（卷七，141页）

了解同义连文的用词规律，对注释、阅读古书，研究古汉语词义，都有用处。至于同义连文的类别、性质、语法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清代词义研究的主要缺点有两条：在范围方面仅局限于汉魏以前。"非先秦两汉之书不敢观"，这是他们的通病。另外，滥用"以声求义"这个法宝。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就已肆意于"以声近、声转为义"，到了俞樾更是常常祭起这个法宝以逞私臆。他那两本《平议》，就精审、谨严而言，就远不如高邮王氏父子了。

注：

①《戴东原集》（上），38页。万有文库本。

②《戴东原集》（下），41页。万有文库本。

③⑥《王怀祖广雅注·序》。见《经韵楼集》卷八。

④《广雅疏证·序》。

⑤《经义述闻·序》。

⑦《戴东原集》（下），36页。万有文库本。

⑧《广雅疏证》卷六，723页。万有文库本。

⑨《广雅疏证》卷六，748页。万有文库本。

⑩《字诂义府合按》193页。

⑪⑪《周礼汉读考·序》见《揅经室集》。

⑬见《富饕二字释例》。《经韵楼集》卷十一。

⑭《说文饕字解》。见《经韵楼集》卷十一。

⑮《经韵楼集》卷二。

⑯这两篇论文都见于《经韵楼集》卷四。

⑰《释三九》一文见《述学内篇》。

⑱阮元：《经义述闻·序》。

⑲阮元：《晚学集·序》。

⑳《与邵二云书》。见段王学五种。又可参阅《广雅疏证》卷三354页"葆，本也"条。万有文库本。

㉑王引之：《中州试牍序》。见《王文简公文集》卷三。

第二十八节 清代文字学

清代文字学的主要内容乃《说文》之学。清初，《说文》之学犹未兴起，一般学者甚至连始一终亥本《说文》都没有见过。如顾炎武说："《说文》原本次第不可见，今以四声列者，徐铉等所定也。"①可证他把李焘（字仁甫，宋代四川眉州丹棱人）的《说文解字五音韵谱》误以为大徐本了。

整个清代研究《说文》的著作有二百多种，著名的有十几家，中叶以后，大徐本《说文》，小学家几乎人手一册，可以说得上是盛况空前。清代研究《说文》的风气始于乾隆中期，这和当时古音学、训诂学的兴旺发达有密切关系。此学的倡导者有惠栋、

戴震、钱大昕、朱筠等人。朱筠于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任安徽学政。“乃教士曰：读书不可不识字。为刻旧本许氏《说文解字》。”② “广布江左右，其学由是大行。”③他的重刻《说文解字》序就是一篇重要学术论文④。到了嘉庆年间，许慎在士人心目中已成为偶像，阮元在杭州西子湖畔立的诂经精舍，就设立许慎的牌位，让士人顶礼膜拜。嘉庆、道光两朝，《说文》之学达到了高峰，说文四大家（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都出现在这一时期。清人《说文》研究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王筠说：“《说文》屡经窜易，不知原文之存者，尚有几何？”⑤恢复许书原貌，这是《说文》学家们要做的第一件事。钮树玉、严可均、段玉裁都在校勘方面狠下了一番工夫。钮树玉著《说文考异》，段注多有采录；严可均肆力十年，著《说文校议》，专正徐铉之失，举正三千四百四十条；段注在校勘方面也细密精审。同治年间莫友芝得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多与段严校正暗合。如：

楗　大徐本作“限门也”。

段注：“歫，各本作限，非。”唐写本正作“歫门”也。”

柿　大徐本作“削木札樸也。”

段注：“各本作削木札樸也，今依玄应书卷十九正。朴者，木皮也；樸者，木素也。柿安得有素，则作‘朴’是矣。”

唐写本正作“削木朴也。”

槽　大徐本作“畜兽之食器。”

段注：“兽，各本作畜兽二字，今正。”

唐写本正作“兽食器也。”

梳　大徐本作“理发也。”

段注：“所以理发也。”

唐写本作“理发者也。”

“理发也”是讲不通的，段玉裁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按文意补“所以”二字，虽与唐写本字面不合，但意思不错。段玉裁在取舍之间也有不当之处。如：

牀：唐写本作“安声之坐也”，大徐本作“安身之坐者”，小徐本作“安身之几坐也”，《玉篇》引作“安身之坐者”。

段玉裁舍大徐而取小徐，不取《玉篇》，不当。

段玉裁有时甚至连篆文都给删掉了，未免武断。如二徐本皆分“樛”、“朻”为二，“樛”本“朻”之重文。段玉裁把“樛”字篆文删去，释“朻”为“高木下曲也。”他“不知朻自来不训高木也。”⑥

二、发明许书义例。许慎作《说文》本有一定的义例，但他并没有把这些义例明确地集中地罗列出来，后来的研究者如大徐“犹未能悉通叔重之义例。”⑦清代《说文》学家们在探求许书义例方面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尤以段玉裁、王筠为突出。段玉裁揭示的义例甚多，如：

凡部之先后，以形之相近为次；凡每部中字之先后，以义之相引为次。

（见段注第一篇上，1页）

小篆之于古籀，或仍之，或省改之。仍者十之八九，省改者十之一二而已，仍则小篆皆古籀也，故不更出古籀，省

改则古籀非小篆也，故更出之。

（见段注第一篇上，1页）

凡云古文以为某字者，此明六书之假借。以，用也。本非某字，古人用之为某字也。如古文以“洒”为“灑埽”字，以“疋”为《诗·大雅》字，以“丂”为“巧”字，以“臤”为“贤”字……籀文以“爰”为“车辕”字，皆因古时字少，依声托事。至于以“屮”（chè）为“艸”字，以“疋”为“足”字，以“丂”为“亏”字……此则非属依声，或因形近相借，无容后人效尤者也。

（见段注一篇上，21页）

《说文》言“一曰”者有二例：一是兼采别说，一是同物二名。

（见段注第一篇下，26页）

段玉裁所说的“义例”，不见得条条都正确。诚如王筠所言：“段氏书体大思精，所谓通例，又前人所未知，惟是武断支离，时或不免，则其蔽也。”⑧

王筠的《说文释例》是一部“能启汶长未传奥旨”⑨，“补茂堂所未备”⑩的著作。王筠（公元1784年—1854年），字贯山，号菉友，山东安邱人。道光举人，官山西乡宁知县。他研究《说文》三十余年，除《说文释例》之外，还有《说文解字句读》和《文字蒙求》。《释例》成书于道光丁酉（公元1837年），是经过二十多年准备写成的。它独具体例，不愧为“一家之言”。在六书体例和《说文》说解体例方面，创获良多。如关于“指事”，他区分为正例一，变例八。“独体指事”为正例，“以会意定指事”、“省体指事”、“借象形以为指事”等为变例。“象形”，

他区分为正例一，变例十。“会意”有正例十，变例十二。他对“假借”和“转注”的看法也很值得重视：“假借者，一字而数义，何为其数义也，口中之声同也；转注者，数字而一义，何为其数字也，口中之声不同也。”⑪ 假借必须同声，转注必须同义，这是他的主张。

《释例》的卷十是讨论“说解正例”、“说解变例”的。有些辨析非常精到。如：

许君说解，必先字义而后字形。其说形也，或此字形属会意，则先举本部首而后及别部之字，如“天”在一部，云“从一大”，先“一”后“大”是也；如字义重“大”，则必入大部，而说曰“从大从一”矣；然有以其词之顺而先言它部之字者，如“斲”（折）在艸部，而说曰“从斤断草”是也，即其文不如是，亦必曰“从斤艸”，而不曰“从斤从艸”。盖并峙为义，则先一义为主，字当入主义之部也。

（《说文释例》卷十，881页）

王筠有些义例的发明，也不过是曲为之说，如说：

字有不能直解者，则分情状说之。如“快”下云：“不服懟也。”不服，其情也；懟，其状也……“懟”下云：“怨也。”怨者不必有理，而快之懟则由无以服之也。

（《说文释例》卷十，892页）

“不服懟”一语根本不通（请参看本书145页），王筠硬要从体例上强作解说，欠妥。

三、对《说文》字义进行疏证。《说文》一书释义简奥，不要说今天的读者不凭借注释已难读懂了，就是古人要读懂它也是困难重重。清代对《说文》全书进行注释而质量又较高的，首推

段注，其次是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再其次是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

桂馥（公元1736年—1805年），字未谷，山东曲阜人。他比段玉裁只小一岁，两人几乎是同时进行《说文》研究的。他于55岁时才考中进士，于嘉庆元年派到云南当知县，在这偏僻之乡，“求友无人，借书不得”⑫，五十卷《义证》书稿，未及最后修订就与世长辞了。关于桂段二书的优缺点，王筠有很公正的评说：

> 今天下之治《说文》者多矣，莫不穷思毕精，以求为不可加矣。就吾所见论之，桂未谷《说文义证》，段氏茂堂《说文解字注》，其最盛也。桂氏书征引虽富，脉络贯通，前说未尽，则以后说补苴之，前说有误，则以后说辨正之，凡所称引，皆有次第，取足达许说而止，故专胪古籍，不下己意也。读者乃视为类书，不已昧乎！惟是引据之典，时代失于限断，且泛及藻缋之词，而又未尽加校改，不皆如其初指，则其蔽也。段氏书体大思精，所谓通例，又前人所未知，惟是武断支离，时或不免，则其蔽也。

（《说文释例·序》，7页）

段氏在字义注释方面的最大特点是阐明许慎的原义，他特别注意区别本义、引申义，注意辨析“浑言”与“析言”。他的经验是：

> 弟以注此书为读郑之阶级，读此注而知许郑之异，亦知许郑之同，而知天下之字无不异，而知天下之字无不同。其要在以经注许，以郑注许，而尤要在以许注许。

（《与刘端临书》）

以许注许，一经拈出，无人不称快。

（《与刘端临书》）

段玉裁因为能“以经注许，以郑注许”，“以许注许”，就避免了“时代失于限断”的缺点，科学性、精确性都相当高。可以说，研究先秦两汉词义，段注是必读之书。段注在嘉庆年间问世之后，“缀学之家，几于户置一册，而桂书多未及见。”⑬

“桂书多未及见”的原因，是此书长期未能刻印流布，桂馥去世后40多年，即道光已酉至咸丰辛亥年间，由许印林（瀚）负责校雠，刻入山西灵石人杨墨林的《连筠簃丛书》，印数不多，板亦旋即毁于兵燹。至同治九年，经张之洞倡议才重刻此书。桂注的优点是材料相当丰富。他的注释基本上分为两部分。先引书证解说篆文，然后引书证证明许慎的说解。如对一部“吏”字的注释，先引《书》、《孟子》、《曲礼》、《左传》、《周礼》、《韩诗外传》、《物理论》、《九经字样》、《汉书·百官公卿表》等10种材料证明“吏”的常用意义，然后再证许慎的说解“治人者也”，用了《周礼》、《管子·明法解》、《鬻子》、《韩非子·外储说》、贾谊《大政篇》、《潜夫论·衰制篇》、《艺文类聚》引《风俗通》、《论衡·量知篇》等8种材料。桂馥对许书的体例也进行过研究。如“吏”字“从史，史亦声”。桂馥说：“当言‘史声’。后人加‘亦’字。凡言‘亦声’，皆从部首之字得声，既为偏旁，又为声音，故加‘亦’字，不从部首得声，何言‘亦声’。”但是，桂书基本上是一部资料书，他在形、音、义方面，的确不如段注能融会贯通。段注是一部真正的语言学著作，桂书则是训诂资料书。

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于字义疏证也有自己的特色。朱

骏声（公元1788年--1858年），字丰芑，江苏吴县人。他的书名就表明了全书的内容。

曰“说文”，表所宗也；曰“通训”，发明转注假借之例也；曰“定声”，证《广韵》今韵之非古而导其源也。

（《说文通训定声·奏呈》）

此书最精采的部分是“通训”，即朱氏对转注、假借之例的发明。他对“转注”的看法全然不同于戴段等人。他说：

转注者，体不改造，引意相受，令长是也；假借者，本无其意，依声托字，朋来是也。凡一意之贯注，因其可通而通之为转注；一声之近似，非其所有而有之为假借。就本字本训而因以展转引申为他训者曰转注，无展转引申而别有本字本训可指名者曰假借。依形作字，睹其体而申其义者，转注也；连缀成文，读其音而知其意者，假借也。假借不易声，而役异形之字可以悟古人之音语；转注不易字，而有无形之字可以省后世之俗书。假借数字供一字之用，而必有本字；转注一字具数字之用，而不烦造字。

（《说文通训定声》，44—45页）

说了好半天，所谓“转注”，就是引申，这当然不失为一家之言；所谓“假借”，是音语近似而意义又无联系，这也是对的。但他说“必有本字”，这就大错。朱书讲假借常常讲错，就在于他硬要去找什么“本字”。

朱书在释义方面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创立了一个较好的释义体例。如：

僮　未冠也。从人童声。按十九以下，八岁以上也。字亦作“僮”。经传多以“童”为之。《广雅·释言》：僮，

稚也……〔转注〕《广雅·释诂》三：童，痴也。《释训》：僮，昏疾也。《晋语》：僮昏不可使谋。注，无知也。字亦作"瞳"……〔假借〕为童。《汉书·贾谊传》：今民卖僮者。注，谓隶妾也……〔声训〕……〔古韵〕……

（豐部第一，128页）

他把本义、转注（即引申义）、假借加以区分，这是对的，至于就具体的一个字来说，区分得是否正确，这就要靠读者进行具体分析了。

朱书还有一个优点是材料相当丰富。此书晚出，利用了段注和《经籍籑诂》等书的资料，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四、以声统字。清代学者对于《说文》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字形字义的范围之内，他们特别重视声音的研究。这个问题我在"清代词义学"这一节中已经谈到了，这里主要谈一下以声为纲对《说文》重新进行编排的问题。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戴震。戴震在《答段若膺论韵》（写于1776年）中说：

谐声字，半主义，半主声，《说文》九千余字，以义相统；今作《谐声表》，若尽取而列之，使以声相统，条贯而下如谱系，则亦必传之绝作也。

（《戴东原集》卷四，62页）

这个任务段玉裁没有完成，段玉裁的弟子江沅实现了。江沅的《说文解字音均表》就是以段玉裁《六书音均表》"第二表之列某声某声者为纲而件系之，声复生声，则依其次弟。"⑭但"某部某声某声，不尽与段表同。"⑮各部所收之字也有简单的释义，这些释义也并不是跟段注都一样，如十五部"费"字注云：

费 六篇下贝部，散财用也，从贝弗声。"散"当作"楸"。引申之过用曰费。

（见《皇清经解》续编本卷105）

"散当作楸"以下的文字为段注所无。江书的主要意义当然不在于此，此书和《说文通训定声》一样，对于研究字族、探求词源，都有参考价值。严可均的《说文声类》也有类似的作用，但该书为古音而作，全无释义。

清代《说文》学的兴盛，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古音学的系统已基本确立，为古文字研究大开方便之门（段玉裁说："音均明而六书明。"见段注805页）；二是造成了社会风气，不少人十几岁就学习《说文》，一个读书人根本不读《说文》，被视为学无根底；三是进行持久的深入的专题研究，像段、桂、朱、王四大家都是用毕生精力钻研《说文》，所以都能有新的发现，有新的创获。流弊也是有的，像惠栋的弟子江声（1721——1799，江苏吴县人），连写信、记帐都要用小篆，有人将《说文》不录之字一律斥之为俗体，这都不足为训。

清代末年，金文、甲骨文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孙诒让的《古籀拾遗》、《古籀余论》、《契文举例》、《名原》都是研究甲金文的代表作。

吴大澂（公元1835年—1902年），字清卿，江苏吴县人。历任广东巡抚、河道总督等职。他于光绪癸未（1883年）成《说文古籀补》，收有三千五百余字。"是编所集，多许氏所未收，有可以正俗书之谬误者，间有一二与许书重复之字，并存之以资考证。不分古文、籀文，阙其所不知也；某字必详某器，不敢向壁虚造也；辨释未当，概不羼入，昭其信也；索解不获者，存其字

不绎其义，不敢以巧说衺辞使天下学者疑也。石鼓残字，皆史籀之遗，有与金文相发明者，古币、古鉨、古陶器文，亦皆在小篆以前，为秦燔所不及，因并录之，有抱残守阙之义焉。”⑯

《说文古籀补》所收的字“多许氏所未收”，这是因为“郡国所出鼎彝，许氏实未之见，而鲁恭王所得壁经，又皆战国时诡更变乱之字，以至文考、文王、文人读为宁考、宁王、宁人，宜许氏之不获见古籀真迹也。”⑰所以“甲作+，丁作口……皆许氏古文所无。”⑱

吴氏对古籀的释义相当谨慎，而且有不少见解高出许氏之上。如：

王　《说文》的释义是：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

《说文古籀补》的释义是：王，大也，盛也。从二从山，山古火字。地中有火，其气盛也。火盛曰王，德盛亦曰王。

许慎对“王”字的释义纯属穿凿傅会，吴氏的释义有字形为据，比较科学。

孙诒让（公元1848年—1908年），字仲容，号籀庼，浙江瑞安人。他“治古文大篆之学四十年、所见彝器款识逾二千种。”⑲甲骨文出土之后，于1904年就写出了《契文举例》一书。这是第一部全面地研究甲骨文的著作，全书分月日、贞卜、卜事、鬼神、卜人、官氏、方国、典礼、文字、杂例等10篇。孙氏辨认了100多个甲骨文，对于甲骨文的辨认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当时对甲骨文的研究还处在草创阶段，书中有不少误释，这是很可以理解的。1905年，孙诒让又写了《名原》，对《说文》中的错误多所纠正。

甲金文的研究使人们关于古文字的观念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如怎么看待《说文》未甄录之字，孙诒让的看法就和前人大不一样了。他说：

> 许书九千字，为字书鼻祖，小学家奉为职志，凡经典文字《说文》所无者，概斥为俗书。自金文发现，古文繁出，如"寍"、"妥"、"悆"、"祢"之类，皆相承习见之字，而《说文》咸未甄录，然三代彝器固塙有其文，则非后世增益造作，昭较可知。至于诡形异体，日出不穷，宋以来考释家所说，凿空者奇，或不可凭，然古文正字，多杂出其间，精思博考，辄得塙证，而许书阙如，亦其疏也。推寻厥由，或小篆本无此字，许君不能尽见古文，遂不免漏略；或《说文》本有，而传写挩佚，皆未能决定。
>
> （《名原·说文补阙》第七）

有了金文、甲骨文，人们对许书形体方面的谬误也有更为清楚的认识了。孙诒让说：

> 古文为李斯所变乱，汉时已无完书，籀篇复阙于建武之际，故其形声义例，许君已不能尽释。《说文》所载汉人说，亦多皮傅之论（如"對"古文本从士，不从口，而许以为汉文帝所改，及"易"下引秘书日月为易，"秃"下引王育谓仓颉出见秃人伏禾中之类）……自屡经改窜，失其本恉，而后定象形字强变诎曲为整齐，或依傅它字以易其原形，盖始于晚周，而秦篆为尤甚。许书古籀重文，传写舛互，后人不审所从，辄依形近字臆改之，以牵就篆法，此弊尤夥。如籀文"车"作䡕（龟甲文作𨏥，此半象车双轮，半象辀持衡及两轭形），而《说文》讹作䡕，则以其偏旁与𢀩相近也。

古文“射”作䠶（象手执弓注矢形），而篆文改作“射”，则以其偏旁与身寸相近也。“鬥”本从两丮（依段若膺说。甲文省作𩰊，足证段说之塙），而许君以为两士相对，则以丮从丮，与士相近也……若兹之类，小学家多知之，今更以金文、龟甲文校覈许书古籀，或舛误昭然，而沿袭莫辨，或义例两通，而意恉迥异，考释家未及详者，更偻难数。虽未必原始旧文，而较之秦篆，则犹近古。

（《名原·古籀撰异》第四）

孙诒让而后，甲骨文研究最有成就的应推罗振玉、王国维。但罗、王应算是民国时代的人，以放在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中评述为当。

注：

①《日知录》卷21，77页。国学基本丛书本。

②《知足斋文集》卷三。

③孙星衍：重刊宋本《说文》序。

④有人认为这篇序文为王念孙代撰。

⑤《说文释例·序》。

⑥钮树玉：《段氏说文注订》卷二，71页。丛书集成初编本。

⑦《潜研堂文集》卷27，413页。万有文库本。

⑧《说文释例·序》。

⑨潘祖荫：《说文释例·序》。

⑩王筠：《说文解字句读·序》。

⑪《说文释例》卷一，39页。万有文库本。

⑫桂馥：《晚学集·寄颜运生书》。

⑬陈庆镛：《说文解字义证·叙》。

⑭段玉裁：《说文解字音韵表·叙》。

⑮说文解字音均表81页。《皇清经解续编》卷一〇五。

⑯⑰⑱吴大澂：《说文古籀补·叙》。

⑲孙诒让：《契文举例·叙》。

第二十九节　清代辞书

清代辞书的数量颇为可观，但质量高的却不是太多。

在字典方面，整个清王朝只有一本《康熙字典》，此书是在《字汇》、《正字通》的基础上编纂而成，为张玉书、陈廷敬等人集体编著。全书收47035个字，收集的音义资料比较齐全，查检也较为方便，这都是它的优点。

但这部由中央王朝组织力量编纂的字典，并没有反映出当时的学术水平。工作草率，质量低劣。字义字音疏于考证，引文也是错误百出。王引之在道光年间奉命作《字典考证》，查出错误达2588条。他给陈奂写信说①：

现有校刻《康熙字典》之役，错误太多，不可胜改，只能去其太甚者耳。

可见，王所揭举的错误只不过"太甚者耳"，还有的错误一时改不胜改。

清代文字学这么发达，学者这么多，完全有条件编出一本高水平的字典来，为什么让《康熙字典》横行一世，再也没有第二部字典问世呢？这完全是政治上的原因所造成的。乾隆四十二年

(公元1777年)曾出现过一起《字贯》文字狱②。江西有一个举人王锡侯以个人的力量编了一部字典，名叫《字贯》。书中纠正了《康熙字典》的一些谬误，又在“凡例”中，“将圣祖(康熙)、世宗(雍正)庙讳及朕(乾隆自称)御名字样开列”，这就触犯了乾隆皇帝的淫威，乾隆狠狠地批示：“深堪发指，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于是，两江总督、江西巡抚都因办案不力受到处分，王锡侯全家被诛。有了这次血的教训，清代学人谁也不敢谈字典之事了。王引之虽奉圣旨考证字典，也不过发其显误而已，至于音义方面的各种问题，一仍旧贯，不敢置一辞。

清代还有三部规模宏大的资料性质的辞书：《佩文韵府》、《骈字类编》、《经籍籑诂》。

《佩文韵府》是奉康熙之命编撰的。始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于康熙五十年十月全书告成，共一百〇六卷。“佩文”是康熙的书斋名；所谓“韵府”就是将古诗文中的常见词语、典故按106韵编排。此书为集体编写，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张玉书、经筵讲官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陈廷敬、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李光地等人主持其事，编写人员多为翰林院的官员。

此书所收词条均以最后一字归韵。如“会同”、“我马同”、“气与山同”，都在一东“同”字下。每一字头之下差不多都有四个部分的内容。即“韵藻”、“增”、“对语”、“摘句”。“韵藻”与“增”只是材料来源不同。“韵藻”采自元代阴时夫编的《韵府群玉》和明代凌稚隆的《五车韵瑞》，“增”是不见于上述二书的增补材料。以卷二十四下、九青“汀”字条为例。

汀　他丁切。水际平沙也。又敬韵。

【韵藻】鹤汀、迴汀、云汀、晚汀、楚汀

【增】临汀、长汀、沙汀、还汀、连汀、循汀、江汀、巡汀、南汀、春汀……

雁去汀、白蘋汀、柳烨汀、杜若汀、桥跨汀、白鸥汀、白鹭汀、夕阳汀……

【对语】鹿砦　獭鹿　辛夷坞　青雀舫

鹤汀　江汀　杜若汀　白鸥汀

【摘句】春溢绿阳汀　月冷芦花白满汀

蘋香月满汀　一点渔灯落远汀

杨柳春前水满汀

酒船安坐蓼花汀

（“韵藻”与“增”的语词下面，原书都引有古人的诗句或文句，因材料太多，此处从略。）

在清代，《佩文韵府》对文人写诗作文，选择词藻，查阅典故和某些词语的出处，都有一定的作用。对于今人来说，既可以作为词汇资料书来利用，也可以作为查寻古诗文词语的工具书来利用。譬如，我们要了解古诗中出现“异乡”这个词的诗句，就可以查卷二十二上、七阳“乡”字“异乡”条。下面有：

〔王勃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许浑诗〕此身多在路，休诵异乡吟。

〔司空图诗〕蜗庐经岁客，蚕市异乡人。

〔欧阳修诗〕惟有寒梅旧相识，异乡每见心依然。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佩文韵府》的引文，只有作者姓名而无篇名；二是引文有误。头两句诗见于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而编者安到王勃头上去了。我们利用《佩文韵府》中的材

料时，应与原书核实。

《骈字类编》是一部专收双音节词语的资料书，张廷玉等编定于雍正年间。是书《凡例》第一条说：

是书义取骈字，必选字面确实、的然成类、不假牵合造作者，除虚字不采外，将天地、时令、山水、居处、珍宝、数目、方隅、采色、器物、草木、鸟兽、虫鱼分为十二门，至如字面虽实，而类聚不伦及不甚雅驯、或于对属无取者，概不泛及。

除《凡例》所言的十二门外，又增添人事门作为“补遗”。全书共计240卷。

作为一部词语方面的资料书，它有两个优点：一是收词比较齐全。如天地门的第一条是以“天”字领头的双音节词语，收录了900多个词条。二是各词条下列有丰富的引文，有的引文还包括注、疏文字。如：

天河　《诗》传见上。《左传》析木之津。注：箕斗之间有天汉，故谓之析木之津。疏：刘炫谓天汉即天河也……

所谓“《诗》传见上”，指上一条“天汉”的引文中有毛传的话：“汉，天河也。有光而无所明。”

这是一部资料书，所以各词条下都没有释义。另外，引《左传》不出某公某年，引书有的不出篇名，如《尔雅》、《庄子》、《吕览》、《素问》、《水经注》等都不出现篇名，于读者不便。

《经籍籑诂》是一部为训诂学服务的资料书。嘉庆初年，阮元任浙江学政，大力提倡经学。但“治经必先通诂训，庶免凿空

逃虚之病。而倚古以来，未有汇辑成书者，因遴拔经生若干人，分籍纂训，依韵归字，授之凡例，示以指南，期年分纂成，更选其尤者十人，每二人汇编一声。”（臧镛堂《经籍纂诂·后序》）嘉庆三年（1798），聘请常州臧镛堂来杭州担任总编，“自孟夏始，至仲秋告竣，凡五阅月，共成书一百六卷，可谓经典之统宗，诂训之渊薮，取之不竭，用之无穷者也。盖非宗伯精心卓识，雄才大力，不足以兴创造之功；而非诸君子分纂之勤，亦不能汇其成也。”（《后序》）

在阮元之前，戴东原、朱筠都想“纂集传注，以示学者，未及成编。”（王引之《序》）阮元“雄才大力”，终于组织人力，完成了这个任务。总编臧镛堂是《经义杂记》作者臧琳的玄孙，乾隆中，受业于卢文弨，与钱大昕、段玉裁有学术上的交往。参加分纂工作的有30多人，其中周中孚（浙江乌程人）、赵坦（杭州人）、洪颐煊、洪震煊（临海人）、陈鳣（海宁人）等后来都成了有影响的学者。

《经籍纂诂》的内容就是网罗经传中的旧注和经传本文的诂训资料，其他字书、辞书（如《尔雅》、《方言》、《说文》、《释名》、《广雅》等）的释义也收入其中。“归字谨遵《佩文韵府》为主，一字数音，则各审其反切归之，如有重见，则详前略后。”（凡例）全稿完成之后，又“续为补遗若干卷”，“补遗采书，悉依旧例，前所失采，俱为增入。又许氏《说文》及孔氏《易》《书》《诗》《左传》《礼记》疏、贾氏《周礼》《仪礼》疏，旧皆未采，今悉补纂每字下。”（凡例）

这部书当然也有错误。阮元在《凡例》中已经明确指出：“此书采辑，杂出众手，传写亦已数过，讹舛之处，或亦不免。

凡取用者，宜检查原书，以期确实。至于遗漏，谅亦不少。”

清代较为重要的“雅书”有7种，虽然多是纂集前人旧说，发明甚少，但也各具特色。

《别雅》是一部研究别字（字别而音同）的书。这里所说的“别字”是特指经籍史传中的别字，也就是假借字或异文。如：

空同、空桐：崆峒也。《庄子·在宥篇》作空同，《尔雅·释地》、《史记·五帝本纪》作空桐；《唐书·地理志》作崆峒。（卷一）

示眯明：提弥明也。《左传》宣公二年有提弥明；《史记·晋世家》作示眯明；《索隐》作祈弥；《汉书·古今人表》作祁弥明。示，本音祈，故与“提”音相近，“眯”、“弥”亦以音近，故所传有此异本也。（卷一）

此书也收了少量口语词汇的异文。如：

拾没：什么也。《字典》云：“不知而问曰拾没。俗讹为什么。”（盈按：见《康熙字典》手部“拾”字释义）按：“么”即“没”之平声，南北语音有高下之不同，无定字也，不必谓之讹。（卷二）

这一条是驳《康熙字典》的，此书作于《字贯》一案之前，所以有此驳议。

本书作者吴玉搢（公元1699年—1773年），字山夫，江苏山阳（今淮安）人。吴氏并不懂得上古音，所以他不能就古音通假以说明别字的语音根据，但他所搜罗的异文假借资料，对我们研究上古音有一定的价值。

《比雅》是一部古汉语近义词的资料书。书名为“比”，就是义近相比附的意思。本书取材以古书注释的资料为多，有毛传、

郑注周礼、礼记、王逸楚辞章句，何休公羊注、高诱淮南注、杜注左传、众经音义的引文、昭明文选注等。如：

方曰筐，圆曰筥。　　（毛传）

背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　　（周礼注）

杂比曰音，单出曰声。　　（礼记注）

背曰负，荷曰担。　　（楚辞章句）

男曰觋（xí），女曰巫。　　（公羊注）

攻击曰寇，杀人曰贼。　　（伪孔传）

相与信为任，同是非为侠。　　（汉书注）

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汉书·艺文志）

《比雅》从古注中搜罗了这些近义词的资料，对我们研究古汉语近义词不无参考价值。它的不足之处是缺乏必要的书证，且缺乏必要的分析。

本书作者洪亮吉（公元1746年—1809年）还著有《六书转注录》，汇编《说文》中的互训词，有本部（同一部首）转注 289条，别部转注（不同部的字互训）92条，共计381条。

《拾雅》是一部补遗性质的著作。“《拾雅》所补，大要有三：《尔雅》各部已释而未详，一也；《广雅》诂训已释而未详，二也；《尔雅》、《广雅》所遗释，三也。”（自叙）可见，《拾雅》就是“拾”雅书之遗。全书体例与《尔雅》一样。如：

靡、奢、汰：侈也。《礼·檀弓》：“若是其靡也。”《论语》：“礼与其奢也宁俭。”《荀子·仲尼》：“般乐奢汰。”

（释言）

两山之间为峡。《淮南·原道》：“彷洋于山峡之旁。”

山穴为岩。楚辞《七谏·哀命》："穴岩石而窟伏。"

（释山）

大者犬，小者狗。

（犬）知人心可使者，獒。

（释畜）

凡应死而生曰幸，应生而死曰不幸，不以寿终曰鲜。《列子·汤问》："其长子生，则鲜而食之。"

（卷十六）

《拾雅》成书于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作者夏味堂，江苏高邮人。"昼考夕思，爰历八载"，乃成此书。嘉庆二十五年，其弟夏纪堂为之作注。《拾雅》资料丰富，是清代雅书中较为优秀的一种。但作者识见不高，择焉不精。如《诗·大雅·烝民》"爱莫助之"的"爱"字，既见于《释言》，解作"隐也"；又见于卷十一，解作"惜也"。前说取毛传，后说取郑笺，两说并收，殊乏裁断。

《叠雅》是一部纂辑叠字的材料书。作者史梦兰（1818—1898，河北乐亭人。道光举人）在自序中说：

惟是形容之妙，每用重言，名物之称，尤多複字。《尔雅》、《广雅》"释训"虽或及之，然止寥寥数则，未克详备。他若升庵辑《複字》，不免臆造之嫌；宓之诂《重言》，止明通转之义；索其于经史子集及诸家注疏之用叠字者，广为搜罗，详加疏证，至今未见专书，岂非艺林一大歉哉。余抱瓮之暇，流览往籍，辑成《叠雅》十三卷。

此书编排体例不见佳，大致上一至十卷为叠字形容词，卷十一为象声词，卷十二象声词和叠字形容词兼收，卷十三为叠字名

词。如：

嘤嘤、蟲蟲：虫声也。

（卷十二）

兄兄、爸爸（八八、巴巴）、爷爷（耶耶）、爹爹：父也。《北齐书·南阳王绰传》：“绰兄弟皆呼父为兄兄。”《正字通》：“夷语称老者为八八或巴巴，后人因加‘父’作‘爸’字。”《玉篇》：“爷音耶，俗呼为父爷字。”《古木兰诗》：“军书三十卷（应是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通作耶。《南史·王彧传》：“彧长子绚年五六岁，读《论语》至‘周监于二代’（盈按：下一句为“郁郁乎文哉”，“郁”与其父名彧音同），外祖何尚之戏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绚应声答曰：“尊者之名安可戏！宁可道‘草翁之风必舅’？”（盈按：《论语·颜渊》的原文是：“草上之风必偃。”“上”与“尚”音同）《广韵》：“爹，父也。屠可、陟邪二切。”宋孔平仲代小子广孙寄翁翁诗：“爹爹来密州，再岁得两子。”

（卷十三）

此书刊于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资料丰富，对研究古汉语叠字有一定的作用。

《毛雅》本名《毛诗传义类》。陈奂(公元1786年—1863年)著《诗毛氏传疏》之后，复将毛氏传“依《尔雅》编作义类。”③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言》附有《说雅》，其书“循《尔雅》之条理，贯许书之说解。”④程先甲（1871—1932，江苏江宁人）于光绪末年编成《选雅》，乃“剌取李注（李善《昭明文选》注），用《尔雅》十九篇之例，以类比附。”（俞樾序）

《毛雅》、《说雅》、《选雅》性质相同，都是汇集一书的注释，依《尔雅》体例编成的资料书。这种资料汇编性质的书，虽说不上是学术专著，但对我们研究古汉语词汇也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清代方言俗语辞书的编撰是有成绩的，这些辞书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研究某一方言的辞书。如胡文英的《吴下方言考》。作者说："予吴人也（江苏武进人），习于吴音，故但注吴音，其燕齐楚粤，间有可以互相证明者，亦一并附入。"（凡例）作者的方法是："尽取古来四部（经史子集）之藏，证诸吴音。"（钱人麟序）"方言之作，本缘人所未能通晓者，释之以开疑义，至于人所共知者，则不引入。"（凡例）研究的虽是活方言，却具有考古的性质。如：

> 看，音堪。少陵句"苏武看羊陷贼庭。"案：看，守也。吴中谓守物曰看。
>
> （卷五）
>
> 膠，音劳。《广韵》："膠，谜语云钱。"案：膠，钱之别名也。吴谚谓钱曰膠曹。
>
> （卷五）
>
> 硙，音碍平声。《洛阳伽蓝记》："鑿（音伊）硙舂簸。"案：硙，细擂研以为末也。吴中谓研末为"硙"，缓磨亦曰"硙"，故吴中称磨墨为硙墨。
>
> （卷六）

第二类，续补扬雄《方言》的辞书，有杭世骏（雍正、乾隆时学者）的《续方言》，程际盛（江苏长洲人，乾隆进士）的

《续方言补》，程先甲的《广续方言》。这三部著作的共同特点是，钩沉古书中所明确提到的方言资料，加以汇编。如：

古谓之娣姒，今关中俗呼为先后，吴楚俗呼为妯娌，音轴里。（颜师古注《汉书·郊祀志》）

江东俗，妇呼舅为钟。（《汉书·广川王传》注）郭庆藩按：《汉书》注作“呼舅姑为钟章，声之转也。”脱“姑”字。

河东以东西为阡，南北为陌。（《史记·秦本纪》集解）

（以上引自《续方言》）

居，读为姬，齐鲁之间语助也。（《礼记·檀弓》注）

南方谓都为猪。《礼·檀弓》注）郭庆藩按：又见《史记·夏本纪》注。

山东人谓关中为秦中。（《史记·高祖纪》注）

越人谓盐曰余。（越绝书）

（以上引自《续方言补》）

《广续方言》所收集的资料除方言词汇之外，还有纯属方音的资料。如：

打，德耿反。陆法言云：都挺反。吴音。（《慧琳音义》八，又二十七云：今取秦音，得耿反。）

打，德冷反，今江外吴地见音为顶。

（《慧琳音义》十一，又卷十二，吴音为顶。两见。）

《广续方言》已超出汉语方言的考证，辑录了不少汉以后的译音资料以及少数民族的语言资料。如：

佛陁与浮图，声相近，皆西方言，其来转为二音，华言译之则谓净觉。

（《魏书·释老志》）

服其道者谓之沙门，或谓桑门，亦声相近，总谓之僧，亦胡言也。

（同上）

鲜卑谓兄为阿干。

（《晋书·吐谷浑传》）

姐，羌人呼母。

（广韵·马韵）

第三类，专释诗词中所用之方言俗语。李调元（字羹堂，号雨村，乾隆进士）的《方言藻》释诗词中所用之方言108条。作者很强调方言与文学的关系。他说：

方言不可以言文，而文非方言则又不能曲折以尽意。故不知方言者，不可以言文也……扬子《方言》炳于世矣，而兹复从诗词中求所谓"方言藻"者，何也？方者，鄙俗之谓，方言而适于文之用，则谓之藻也固宜。

（自序）

李雨村是个文学家，所以对诗词中的方言词语有这么大的兴趣。书中有些词语，近人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亦失收。如：

阿：南人称阿，犹北人称老。如白香山诗："常被老元偷格律"是也。

准拟：准，犹定也。刘德仁诗："曾缘玉貌君王宠，准拟人看似旧时。"

尽教：柳永《卜算子》词："尽无言谁会高意。"周密《探春》词："尽教宽尽春衫。"尽，犹任也。

赢得：杜牧之诗："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赢得，犹今云剩得也。

收将：李义山诗："收将凤纸写相思。"收将，今方言犹云收得也。又庾子山《春赋》："眉将柳而争绿，面共桃而竞红。""将"字犹"与"也。韦应物诗："无将别来近，颜鬓已蹉跎。"又云："无将一会易，岁月坐推迁。"无将，犹云莫以。又，程伯淳诗："将谓偷闲学少年。"邵尧夫云："我将谓取却幽州也。"将谓，犹今云只道是也。（盈按："将"字的四个义项，张相只收了一、二两项。"无将"、"将谓"均未收。）

《方言藻》是一部学术著作，它着重研究唐宋词语，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只是收词尚少，故不为人所注意。

第四类，研究俗语、谚语、成语的辞书。翟灏（1736—1788，浙江仁和人。乾隆十九年进士）的《通俗编》，钱大昕的《恒言录》，钱大昭的《迩言》，梁同书（1725—1815，浙江钱塘人。乾隆十七年进士）的《直语补证》（频罗庵遗集），郝懿行的《证俗文》（郝氏遗书），王有光（江苏青浦人）的《吴下谚联》，平步青的《释谚》，胡式钰的《语窦》，郑志鸿的《常语寻源》等8部辞书，都比较重视口语词汇的探源。如：

阘将：《白头闲话》，都人或十五结党，横行街市间，号为阘将。

（《通俗编》卷八）

破瓜：孙绰《情人碧玉歌》："碧玉破瓜时，郎为情颠倒。"宋谢幼槃词："破瓜年纪小腰身。"按：俗以女子破身为破瓜，非也。"瓜"字破之为二"八"字，言其二八十六岁耳。若吕严赠张洎诗："功成当在破瓜年。"则八八六十四岁。

（《通俗编》卷十八）

烟：淡巴菰也。明张介宾景岳书云：烧烟吸之，大能醉人，前古未闻……今北方转盛，一家男妇，无虑数口，尽解喫烟。

（《证俗文》卷一）

马桶：《梦粱录》："杭城户口繁夥，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蹇去，谓之倾脚头。"张鉴注《通雅》：陈子润曰，兽子者，亵器也。或以铜为马形，便于骑以溲也。俗曰马子，盖沿于此。

（《恒言录》卷五）

糟酵：事多乖舛不济曰糟。京师又有"糟酵"之语。糟则空，酵则浮。金泰和四年定糟酵钱。酵，苦孝切，京师讹呼平声。

（《语窦》）

扒灰：翁私其媳，俗称扒灰，鲜知其义。按昔有神庙，香火特盛，锡箔镪焚炉中，灰积日多，淘出其锡，市得厚利。庙邻知之，扒取其灰，盗淘其锡以为常。扒灰，偷锡也。锡、媳同音，以为隐语。

（《吴下谚联》卷一）

这些俗语辞书对研究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词汇有参考价值。《恒言录》及《迩言》各词条下只有书证，而无释义。他们引用书证，有的只凭记忆，并未核对原文，所以往往出现错误。如平步青《释谚》"妆聋"条引"荪详聋而不知"，本是《九章·抽思》中的句子，作者误以为出自《哀郢》。

注：

① 《王文简公文集》卷四，见《高邮王氏遗书》

②孟森《字贯案》。见《明清史论著集刊》573页。又见《掌故丛编》。

③陈奂：《毛诗传义类·序》。见《诗毛氏传疏》卷八，85页。万有文库本。胡朴安《中国训诂学史》："（此书）实则可谓之毛传雅。"（128页）

④朱骏声：《说雅·序》。见《说文通训定声》卷十七，3975页。万有文库本。

第三十节　清代语法研究

清朝关于文言语法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康熙年间出现了两部研究虚词的著作，这就是袁仁林的《虚字说》（康熙四十九年成书）和刘淇的《助字辨略》（康熙五十年成书）。

袁仁林，字振千，陕西三原县人，雍正贡生。他的《虚字说》收的单音虚词不过六十多个，另外还收了一些复音虚词，篇幅不大。

袁仁林认为"虚字无义"，"凡书文发语、语助等字，皆属口吻。口吻者，神情声气也。当其言事言理，事理实处，自有本字写之，其随本字而运以长短疾徐、死活轻重之声，此无从以实字见也，则有虚字托之，而其声如闻，其意自见。故虚字者，所以传其声，声传而情见焉"。①

作者很重视对语气词所表示的语气情态的分析。如说"夫"字"用为语已辞者，意有所见，而拖其气以盘旋之，有无限虚

空唱叹意。”（“莫我知也夫”！“嗟夫”！“悲夫”！“善夫”！）又如“乎字、与字、耶字之声，均属平拖长曳，疑活未定。”“论其分界不同处：乎字气足，与字气嫩，耶字气更柔婉。”所谓“气足”就是语气重一些，“气嫩”就是语气轻一些，“柔婉”就是语气不那么强烈，不那么直接，口气比较缓和。在用法上又有三点不同：“一则实疑未定者（真正的疑问句）；一则谦退带疑者（表委婉疑问语气，实际上是无疑而问）；一则无疑拖语者（用于赞叹、感叹，有拟议之处）。”他对于“也、矣”二字的分析也很正确。“矣字，类俗间‘了’字口吻”，“也字之气，专确无疑”，“也字有二用：一是结上（即句尾语气词，表判断）；一为起下（即句中语气词，表停顿）。”

袁仁林是位教书先生，他的《虚字说》本是“为予小子辈说书而作也。”（王德修跋语）从他对虚词声情口吻的深入分析，可以想见这位先生于讽诵吟哦、抑扬顿挫是很下过一番工夫的。

1989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解惠全注释的《虚字说》，张清常先生为之作序，序文分析了袁著的特点，可参阅。

《虚字说》还只是描摹声态，分析用法，刘淇的《助字辨略》则不同。首先，刘淇注意虚字的分类，他把虚字分为30个类，但分类的标准不一，有的是从形式上分的，如“重言”类是两个虚字连用，“庸安”、“庸何”、“容或”等；有的是从意义上分的，如“专辞”（范围副词）、“仅词”（程度副词）、“几辞”（表将来式的时间副词）；有的是从语气来分的，如“断辞”（语气副词、语气词）、“疑词”（疑问代词，语气词）、“发语词”（句首语气词）、“语已辞”（句末语气词）。由于分类标准不一，就造成分类繁杂。而且，除了作者在序言中

谈到的这30类之外，行文中还有一些临时设立的类别，如“寇深矣，若之何？”（《左传·僖公十五年》）这个“若之何”他称之为“计较之辞”；“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论语·为政》）他说这个“如之何”是“请教之辞”；“仍旧贯，如之何？”（《论语·先进》）他说这是“商量之辞”。其实所谓“计较之辞”、“请教之辞”都是询问事情怎么办，“商量之词”是询问可否。

在清代的文言虚字著作中，《助字辨略》收字最多，计470多个。各字之下多详列书证，这些书证的内容有经传、诸子、诗词、小说等，上起先秦，下至宋元。书证中以原文为主，有时也引用旧注。如卷一“通”字下引《中庸》：“其次致曲。”“朱注云：‘其次，通大贤以下而言。’愚案：此‘通’字，总举之辞也。”

《助字辨略》的编排体例、释词方式都比《虚字说》要好，但体例还是不够严密。有的词条先出书证，后释词类；有的先释词类，后举书证；有的词条下只有孤证。而且有些书证与要证明的词类不符。如：

> 之：《广韵》云“语助辞”。《诗·国风》：“葛之覃兮。”又云：“公侯之事。”《小雅》：“之屏之翰。”《论语》：“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张曲江《岁初处分敕》：“天下黔黎，皆朕赤子，以诚告示，其或之归。”韩退之《进士策问》：“抑所指各殊而学者不之能察也？”以上之字，并语助辞。

六个书证中只有《国风》二“之”字是真正的“语助辞”，其余四例中的“之”字均应看作代词。

刘淇，字武仲，号南泉，河南确山人。关于《助字辨略》的评价，可参阅杨树达为此书所作的跋语。

王引之的《经传释词》是采用训诂学的方法研究文言虚字的一部著作。全书十卷，按喉、牙、舌、齿、唇五音排列。收字160，以解释“经”、“传”中虚字为主要目的。

《经传释词》对虚词的分类，不是很明确的，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常语，即古书中常用虚词的常用义。如：“而者，承上之词，或在句中，或在句首，其义一也。常语也。”（卷七）“与，郑注《礼记·檀弓》曰：‘与，及也’。常语也。”（卷一）“常语”一般都先出现，而且不举例。

二、语助。如：“与：语助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曰：‘是盟也，其与几何？’言其几何也。”（卷一）又：“云：语中助词也。《诗·雄雉》曰：‘道之云远，曷云能来。’言道之远，何能来也。《四月》曰：‘我日构祸，曷云能谷。’言何能谷也。《瞻卬》曰：‘人之云亡’。言人之亡也。‘云’皆语助耳。”（卷三）“语助”在句中没有实际意义，只起衬贴作用。词头也算是语助，如：“有，语助也。一字不成词，则加‘有’字以配之。若虞、夏、殷、周皆国名，而曰有虞、有夏、有殷、有周是也。推之他类，亦多有此。故邦曰有邦，家曰有家……北曰有北……政曰有政……梅曰有梅……说经者未喻属词之例，往往训为有无之有，失之矣。”（卷三）

三、发声。如：“洪，发声也。《大诰》曰：‘洪惟我幼冲人。’《多方》曰：‘洪惟图天之命。’皆是也。解者皆训为‘大’，失之。”（卷三）“乃，发声也。《礼记·杂记》曰：

'祝称卜葬虞，夫曰乃。'郑注曰：'乃某卜葬其妻某氏。'正义曰：'乃者，言之助也。'"（卷六）所谓发声，也是有声无义。（盈按："洪"字，《词诠》作句首助词。）

四、发语词。"惟，发语词也。《洪范》曰：'惟十有三祀。'哀六年《左传》引《夏书》曰：'惟彼陶唐。'是也。字或作'唯'，或作'维'。"（卷三）"云，发语词也。《诗·卷耳》曰：'云何吁矣。'《简兮》曰：'云谁之思。'"（卷三）王氏所说的"发语词"，相当于句首语气词。

上面已经谈到了，《经传释词》是用训诂学的方法研究虚词，具体办法有：

一、从一声之转判断虚词的同义关系。如卷一"由"字条："《广雅》曰：'由、以：用也。'由、以、用，一声之转，而语词之用亦然。""用"字条："以、用一声之转，凡《春秋公羊传》之释经，皆言'何以'，《谷梁》则或言'何用'，其实一也。"

二、从互文判断虚词的同义关系。"《礼记·礼运》曰：'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用，亦由也。互文耳。"（卷一）又卷二："《大戴礼·朝事篇》曰：'礼乐谓之益习，德行谓之益修，天子之命为之益行。'谓，亦为也。互文耳。"

三、从异文判断虚词的同义关系。卷二"谓"字条："谓，犹为也。庄二十二年《左传》：'是谓观国之光。'《史记·陈杞世家》作'是为'，是其证也……《说苑·君道篇》：'则何为不具官乎？'《晏子春秋·问篇》'为'作'谓'。《吕氏春秋·精谕篇》：'胡为不可'。《淮南·道应篇》'为'作'谓'。《汉书·英布传》：'胡为废上计而出下计。'《史

记》'为'作'谓'。'为''谓'一声之转，故'为'可训'谓'，'谓'亦可训'为'。"又卷一"与"字条："《论语·阳货篇》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言不可以事君也。"自注："孔传曰'言不可与事君。'皇疏曰：'言凡鄙之人，不可与之事君。'皆非也……颜师古《匡谬正俗》曰：'孔子曰：鄙夫可以事君也与哉。'（见该书卷八"鄙人"条）李善注《文选·东京赋》曰：《论语》曰，鄙夫不可以事君。'变'与'言'以'，正与经旨相合。"

四、列举大量书证归纳其义。如卷五"今"字条，根据孙炎注《尔雅·释诂》曰"即犹今也"这一条材料，王引之认为"今亦可训为即"，接着举出了'今'可训为"即"的十一个例证。如：

> 《燕策》曰："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马，马今至矣。"《史记·项羽纪》曰："吾属今为之虏矣。"《郑世家》曰"晋兵今至矣。"《伍子胥传》曰："不来，今杀奢也。""今"字并与"即"同义。

王引之对经传虚字的训释，无疑已达到精粹的地步，但错误也还是有的。如《荀子·非相篇》说卫灵公有一位臣子叫公孙吕的，生得"身长七尺，面长三尺，焉广三寸"。王引之将这个"焉"训为"乃"，"言面长三尺，乃其广仅三寸也。"其实，这个"焉"是假借字，它的本字是"颜"（额头），"焉""颜"在上古同属影母元部，"焉广三寸，是说额宽才三寸，与三尺长的面部相比，乃畸形中之畸形②。

另外，王引之对虚词的分类也不得要领。看来，他还没有严格的分类标准。

继王引之之后，又有江西南丰人吴昌莹于同治年间写成《经词衍释》十卷，《补遗》一卷。其目的有：一、《经传释词》"援引所未详"，再为增补之；二、"又于其释之所未及，而实为义所应有者，博稽而推广之"；三、"释之所可通，而本义实别有在者，征引而并存之"。至于《经传释词》"所略而未释之词，则补遗于卷末。"（自序）全书释词160，另有"补遗"23字。

王、吴二人所进行的虚词研究，基本上都是"就虚字以求实义"③。尤其是王书，"发先儒未发之覆，解后人不解之惑"④，其功不小。

清朝末年俞樾著《古书疑义举例》七卷。本书并非语法专著，但却很注意从句子结构研究文言语法。

俞樾生平著作甚多，可是他的学生章太炎认为最有价值的就是《古书疑义举例》。书中举例88，其中与语法有关的，如：

"倒句例"指出："古人多有以倒句成文者，顺读之则失其解矣。"《左传》昭公十九年："谚所谓室于怒市于色者"，《墨子·非乐上》："野于饮食"。二例中不仅介词"于"的宾语"室"、"市"、"野"前置，而且动词"怒"、"色"、"饮食"都位于补语之后。

"错综成文例"指出："古人之文，有错综其辞以见文法者"。如《论语》："迅雷风烈"。《楚辞》："吉日兮辰良。""迅雷"是偏正结构，"风烈"是主谓结构，"吉日"是偏正结构，"辰良"是主谓结构，错综成文。

"两人之辞而省曰字例"是讲省略的。如《论语·阳货》：

"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女安，则为之"，乃夫子之言，而即承"曰安"之下，无"子曰"字。

"蒙上文而省例"，"探下文而省例"，也都是讲省略的。

"实字活用例"是研究词类活用的。如宣六年《公羊传》："勇士入其大门，则无人门焉者。"俞樾说："上门字，实字也，下门字则为守是门者也。""大门"的"门"是名词，"门焉者"的"门"活用为动词。

其他："语词复用例"，"句中用虚字例"，"上下文变换虚字例"，"反言省'乎'字例"，"助语用'不'字例"，"也、邪通用例"，"虽、唯通用例"，"句首用焉字例"，"古书发端之词例"，"古书连及之词例"等，都属于语法范围以内的问题。俞樾所列举的各种义例，有的已超出传统训诂学的范围，完全属于句法结构的分析，这对于准确地理解古人的文意，是大有好处的。

不过，俞樾所着眼的只是有"疑义"的词句，还不是系统的语法分析，所以完整的汉语语法学，应从《马氏文通》算起。

注：

①《虚字说·虚字总说》。

②邹汉勋：《读书偶识》卷十云："用安为頞，又转为焉。'焉广三寸'，谓无頞也。"（见《邹叔子遗书》）邹氏以为"焉"乃"頞"（鼻茎）之借字，误。王绍兰《读书杂记》亦谓"此焉则頞之借字也。"

③张丙炎：《经词衍释·序》。

④吴昌莹：《经词衍释·自序》。

全书结语

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内容相当丰富，成就不可低估。古人给我们留下了几百种汉语研究的专著，这笔遗产在数量上就已经很为可观，至于古人在汉语研究中所走过的路子，所积累的宝贵的经验，更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我们不可厚古薄今，是古非今，但也不应"数典忘祖"。那种认为中国古代不存在语言学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不能因为有了柏油马路，就不承认土路也是"路"；不能因为有了电灯，就不承认油灯原本也是"灯"。事物总有一个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过程，语言学也不例外。

中国古代语言学基本上还是处于初级阶段。它具有一些什么样的根本特色呢？

一、中国古代语言学的发生、发展，得助于五个朋友。这五个朋友是：一哲学，二文学，三经学，四佛学，五文字学。先秦时代的语言研究是在哲学的摇篮中孕育的；汉语语音的研究是在文学与佛学的推动下进行的；汉语语义的研究是在经学的带动下进行的；至于文字学，它跟汉语研究几乎难以分家，无论是语音还是语义，这两种研究都未曾离开过文字学，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在相当数量的著作中，我们的古人是把语言和文字混同在一起的，甚至是把文字当作语言本身来加以研究的。所以我们这

本语言学史，也包括汉字研究的历史在内。

二、中国古代语言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工具性的学科，它的实用性很强。戴震曾经打过一个比方。他说文字、音韵、训诂之类的学问好比抬轿子的，义理、文章是坐轿子的，他希望人们不要误认为他是抬轿子的（见段玉裁：《戴东原集·序》）。在戴震看来，抬轿子的当然不如坐轿子的高贵、重要，如果把这一层意思去掉，仅就实用关系而言，轿中人怎么能离开轿夫呢！没有轿夫，轿中人就寸步难行，轿夫的重要性是一丝一毫也不可低估的。不过，语言文字之学长期处在轿夫的地位，它的独立性就不会不受到影响。首先，中国古代语言学缺乏发达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抬轿子是不需要多少理论的，他的理论足够用来探索前进的道路就够用了，就满足了，陈第的语言理论，段、王等人关于词义研究的理论，仅止于此。先秦诸子的语言理论，后继无人，就因为对于“轿夫”来说，不存在理论探索的必要性。我认为，轻视理论的倾向，至今仍然有极大的市场，这是值得担心的。其次，中国古代出现了一大批语言文字学家，但很少有人是仅以语言文字学名家的，多数人不是哲学家就是文学家，或者是经学家，有的人则是佛教徒，专攻语言文字之学的人数量不是大多。也就是说，纯粹的“轿夫”是很少的，以戴震本人为例，他既是“轿夫”，又是“轿中人”。

公平地说，轻视理论，理论思维贫乏，是中国各类传统学科的通病，不只传统语言学如此。英国著名数学家A·N·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说：“阿基米德死于一个罗马士兵之手，是一个世界发生头等重要变化的标志，爱好抽象科学、善长推理的古希腊在欧洲的霸主地位，被重实用

的罗马取代了。罗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但是他们却由于只重实用而导致了创造性的缺乏。他们并不是那种能够提出新观点的梦想家；这些新观点能给人以更好地主宰自然界的力量。”（转引自《数学与文化》47页）在古代中国，理论思维、创造性思维被实用思维、自然思维所取代的“头等重要变化的标志”就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创造性思维已经完全失去了社会条件。从此，轿夫只能为孔夫子吹喇叭，抬轿子；轿中人也大多是儒家的偶像及其变种而已。秦皇汉武，岂只“略输文采”，他们在文化学术问题上的宏观决策，实在是贻误千秋万代！

三、中国两千多年的古代语言学，始终只有音韵学和语义学、文字学三大部门。语法学极不发达，即使对具有语法意义和功能的虚词，也是把它当作词汇或修辞对象来研究的。佛经的翻译者也曾经把梵语的语法学引进过，但没有引起人们的兴趣，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汉语属于词根——孤立语，是分析型语言，缺少形态变化，句法关系靠功能词（虚词）和词序来表示。另外，汉语语法的变化不是很明显，而语音、语义的演变迅速得多，复杂得多，不进行专门研究就满足不了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

四、重古轻今，重通语轻方言，重书面语轻口语，这是古人在汉语研究中的主要倾向。把握了这一特点，我们就可以理解：古人始终没有出现过建立单一音系的思想（《中原音韵》是例外），不要说《切韵》是杂凑，就是《中原音韵》以后的北音系韵书、韵图，也大都有存古、有照顾南方方言的特点，在描写语言学还不发达的古代，这种兼包古今南北的思想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读古人书，能观其大体，方可会通，若枝枝叶叶而彤之，

则流于穿凿傅会矣。

五、我们这个民族在历史上是善于吸收外来经验的，汉以后的汉语研究就深受梵文的影响。这种学习也有一个过程，最初是机械的模仿，像曹植、谢灵运大概都做过这种模仿性的研究工作。由模仿而进入独创，像反映汉语特点的字母之学，等韵学，都具有独创性。学习外来经验是非常重要的，是加深汉语研究的重要条件；但必须注意，如果古人不是对汉语本身的特点有深刻的了解，外来经验也是肯定学不好的。如何从汉语实际出发去学习外来经验，至今仍然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一个大问题。我深信，只要我们认真总结历史经验，虚心学习新的观点和方法，我们的语言学事业一定能超越古人，我们的语言学工作者一定能为祖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附　　录

人名索引

A

a

阿基米德　422

阿字　269

an

安然　89，104，148

安釐王　21

B

bai

白香山　410

ban

班固　41，60，62，64，67，75，80

bao

保尔·拉法格　38

ben

本悟　212

bi

毕拱辰　212

bu

卜氏　210，211

C

cai

蔡伯喈　101

蔡邕　41，42，76

cang

仓颉　34—38，40，61，64，92，93，397

苍颉　34，181

苍　69

cao

曹刿　112

曹学佺　318

曹植　424

chai

柴广进 234

柴绍炳 175,257,258,298, 299,319

chang

常璩 44, 51

chao

晁公武 197

chen

陈昌治 183

陈淳 120

陈第 146,168,199,200, 253—257,295,296,298,312, 422

陈铎 210

陈后主 117

陈奂 381,399,407,413

陈荩谟 228, 231

陈抗生 72

陈澧 20, 78, 91,107,143,287,321,324,326,328—331

陈良 13

陈彭年 126

陈庆镛 398

陈䃼庵 228, 229,

陈廷敬 399, 400

陈献可 229—231,247

陈寅恪 98, 99

陈鳣 403

陈振孙 46, 92,103,114

cheng

程伯淳 411

程秉 78

程灝 158

程际盛 408

程迥 174

程君房 251

程可久 253

程明善 201

程树德 68

程先甲 407, 409

程瑶田 369, 370

程颐 158

chu

楚庄王 64

cui

崔儦　122

D

da

大矢透　94

dai

戴东原　306，403

戴侗　199，200，258—264，272，375

戴震　46，47，56，57，92，147，157，288-291，298，300-308，321—324，365，366，368，374，375，379，387，394，422

dao

道安　146

deng

邓退菴　38

ding

丁度　127，195，273

丁杰　57

dong

东坡　196，278

东方朔　192

董仲舒　64，67，74，75，78，396

du

杜甫　166，192

杜林　59，60，64

杜牧之　410

杜台卿　125，136

杜温夫　281

杜预　51，80，88

duan

段茂堂　391

段若膺　398

段玉裁　15，64，65，69，72，79，92，182，191，260，265，266，285，289，290，291，297，298，300，301，304—309，313—317，

374,375,377,
378,379,382,
383,387,388,
389,391,392,
394,395,399,
403, 422

E

en

恩格斯　34
恩斯特·卡西尔　75

F

fan

樊紊　276
樊腾凤　206,354,355
范公偁　197
范昆白　361
范善臻　211,361,363

fang

方以智　135, 158,
200, 222,
228, 232,
233, 234,
247, 252,
260, 264,
270—273,
279, 375
方中通　269

feng

封演　98,104,105,
107, 113,
123, 136
冯春田　104

fu

服虔　42,95,191
傅东华　285
傅毅　64

G

gao

高翥（wěng）映　222
高诱　37, 38, 42,
385, 405
告子　11
戈载　171, 175,
201, 364
葛洪　87
葛毅卿　150
公绍　273

公输班　　277
公孙弘　　22
公孙龙　　4
公孙龙子　5，9，12
龚自珍　　293，350

gou

句中正　　182

gu

古屋昭弘　269
顾广圻　　128
顾亭林　　296
顾宪成　　295
顾炎武　　91，92，93，170，175，176，264，286—291，294，295，296，298，299，300，312，313，315—318，320，322，386
顾野王　　87，115，195

guan

关汉卿　　206
管宁　　78
管子　　4

gui

桂馥　　181，290，291，387，391，392，398
桂未谷　　391

guo

郭居静　　250，251，
郭沫若　　32，37
郭璞　　51，57，88，382，384
郭庆藩　　409
郭仲凤　　250，251
郭在贻　　32
郭忠恕　　176，179，186

H

han

韩道升　　129，138，198

韩道昭　128—131，137，198
韩非　64
韩非子　4，10，12
韩退之　193，415
韩孝彦　198
韩愈　281
韩云　235，246
涵虚子　210
汉武帝　423
hang
杭世骏　408
hao
郝懿行　290，291，373，385，411
he
何超　136
何承天　87
何高济　251
何琳仪　187
何休　405
何晏　88
hong
洪诚　32
洪亮吉　405
洪迈　45，46
洪颐煊　403
洪震煊　403
hu
胡秉虔　267
胡朴安　262，413
胡式钰　411
胡文焕　280，281
胡文英　408
胡毋敬　39
胡长孺　280，281，286
hua
花登正宏　360
huai
怀特海　422
huan
桓谭　72，77
huang
黄承吉　371，372
黄淬伯　191
黄道周　228
黄帝　35，36，37，61

黄扶孟 287，289，371
黄公绍 202
黄侃 22，66，69，72
黄山谷 273
黄生 373，374，376、377
黄宗羲 295
黄宗夏 348

hui

惠栋 386，395
慧皎 89，98
慧琳 137，188
慧生 215

J

ji

纪容舒 331
纪昀 92，96，331
季立 257
季孙 8

jia

贾昌朝 191，280，283
贾魴 41
贾公彦 120
贾徽 64
贾逵 60，64，80
贾谊 42

jiang

江藩 292，319
江晋三 101
江侠庵 23
江声 395
江式 72，107，108，112
江永 85，91，92，133，135，145，153，158，287，289，294，298—304，316，318，321，324，328，329，332，340，341，342，347，366，369

江有诰 289，290，299，308，309，313，315，317
江沅 394
姜亮夫 144
蒋斧 125
蒋礼鸿 183
蒋希文 202

jiao

焦赣 254
焦竑 18，80，199，200，254，255，256，312，384

jie

芥舟 362

jin

金尼阁 200，232，235，236，237，245，246，248—251

jing

荆璞 129，130，138
景审 191

jiu

鸠摩罗什 146，150

ju

沮诵 35

K

kang

康有为 25

kong

空海 97，105
孔鲋 43
孔广森 175，291，299，304—308，311，314，316，
孔颖达 119，279，286
孔子 2，4，8，9，10，18，20，59，63—66，423

L

lan

兰茂 211，217，355

lao

劳乃宣 332，340，345—348

老子 4，5，6，15

lei

雷浚 364

li

黎锦熙 350

黎美周 234

黎庶昌 115

李长 41

李登 101，105，107，228，351

李涪 137

李概 125

李光地 158，356，400

李季节 99，100，101，108

李嘉绍 228

李节 105

李零 187

李汝珍 332，342—345

李若 121，122

李善 120，385，407，418

李实 205，274，276

李世泽 228

李淑 127

李思敬 220，244，

李斯 39，40，397

李焘 386

李调元 410

李文仲 258，262

李贤 94，377，384，

李行杰 143，166

李学勤 186

李新魁 150，214，215，351

李许斋 320

李雨村 410

李义山 411

李治 384
李阳冰 181，182
李因笃 295，318，322
李舟 125，153
李肇 279
郦道元 88，277
利玛窦 200，236，245，250
利西泰 250，251

liang

梁启超 18，25，26，32，293，350
梁僧宝 331
梁同书 411
梁文 18
梁武帝 89，99，115

liao

了义 143
廖文英 269

lin

林本裕 222，332，333
林罕 181
林闾翁孺 44

ling

凌稚隆 365，400

liu

刘备 278
刘炳 269
刘德仁 410
刘逢禄 299
刘鉴 200，215，216，217，284
刘铭恕 197
刘盼遂 197
刘淇 280，413，414，416
刘善经 96，99，100
刘师培 372
刘世儒 286
刘文淇 374
刘熙 21，23，24，77—84，123，365
刘熹 77
刘禧延 311，363，364
刘昱 121

刘献廷 228，264，287，348，350
刘向 45，80
刘孝标 88
刘勰 88，279
刘歆 1，18，24，25，26，44，45，46，48，56，59，64
刘新光 187
刘炫 402
刘燕文 280
刘叶秋 279
刘渊 132
刘珍 77
刘臻 121
刘庄 46
刘宗周 295
柳永 410
柳宗元 279，281

long

龙翰臣 311
龙晦 202
龙启瑞 299，310

lou

楼钥 181，187

lu

卢思道 121
卢文弨 57，403
卢以纬 199，280，281，283
鲁恭王 396
鲁国尧 364
陆德明 87，92，95，117，118，167，170
陆佃 191
陆法言 96，108，110，119，121，123，125，132，133，136，320，324，346，409
陆机 96
陆爽 121
陆宰 192
陆志韦 103，158，160，161，

	162，167，204，205，206，219，244，247，248，364
陆宗达	31

lü

吕忱	87，105，113，114
吕介孺	143
吕静	105，107，108，113，125，136
吕坤	158，221，222
吕思勉	40
吕维祺	202，213，235，246
吕严	411

luo

罗常培	83，150，166，204，235，244，248，250，251，350，365
罗惇衍	309
罗敷	84
罗明坚	250
罗愿	191，193
罗振玉	101，398
骆宾王	278
骆鸿凯	3

M

ma

马国翰	42，108
马縏什	333
马融	42，60，192
马学良	57
马裕藻	373
马援	59
马致远	206
马自援	332，333，334

mao

毛驰黄	201
毛晃	90，128
毛居正	128
毛奇龄	287，294—298
毛氏	65

mei

梅膺祚　198，200，225，252，267

meng

孟氏　65

孟森　413

孟子　2，7，11，13，14

梦英　182

miao

苗夔　311

mo

摩尔根　34，36

莫友兰　387

墨子　4，9—15

mu

慕湘　222

N

nei

内藤虎次郎　23，27

ni

倪海曙　350

儿（倪）说　12

nian

年希尧　268，354

niu

钮树玉　387，398

钮琇　269

O

ou

欧阳　59

欧阳修　18，27，186，401

P

pan

潘恩　320

潘徽　108

潘耒　145，219，231，287，332，334，337，342

潘祖荫　398

pang

庞大堃　158，161，332，346

庞迪我　250

庞顺阳　250

庞钟璐 346

pei

裴松之 88

pi

皮锡瑞 293

ping

平步青 411, 412

pu

朴隐子 219, 222, 359, 360

Q

qi

齐佩瑢 382

祁巂藻 183

qian

钱大昕 72, 78, 92, 117, 131, 137, 138, 143, 144, 147, 171, 201, 286, 288, 291, 298, 318, 366, 387, 403, 411

钱大昭 411

钱人麟 408

钱玄同 350

钱绎 382, 384

qiao

乔世宁 28

qin

秦恩复 210

秦近君 60

秦始皇 39, 58, 61, 68, 423

秦延君 72

qiu

丘雍 126

裘君宏 269

quan

全祖望 288

qun

群一 215

R

rao

饶宗颐 88, 147

ren

任大椿 114, 190

任道斌 252

任铭善 139, 321

ru

如来　189

如真　333

ruan

阮孝绪　87

阮元　31,293,295,319,370,377,378,386,387,402

S

sang

桑绍良　217，218，227，231

seng

僧佑　146

shang

商鞅　17

shao

邵博　196

邵长蘅　298

邵晋涵　28,290,291,373，381

邵棠芬　210

邵尧夫　411

邵雍　158,162，337

she

舍利　143

shen

申不害　10

申子　4

神珙　92，98,147,150,300，334

沈标　229

沈乘麐　362，363

沈宠绥　229，230,361

沈君徵　361

沈括　92，103

沈约　96—104,147,205,208,230,253，254,320，331

沈宗元　196

shi

尸佼　10，17

尸子　4，17

石建　58

史梦兰　406

史游　41

史籀　64

始皇帝 19

shou

守温 140—143, 150

shu

叔孙通 18

叔向 19

si

司空图 401

司马光 158,162, 219

司马迁 20,24,31,80, 112, 281

司马温公 219

司马相如 41, 63, 64

song

宋濂 100, 124, 201

宋荦 319

su

苏林 272

苏轼 281

sui

隋树森 207

sun

孙绰 411

孙光宪 148

孙佳讯 343

孙愐 125, 182, 331

孙冯翼 77

孙奭 120

孙叔炎 92

孙星衍 31, 182, 190 398

孙炎 95, 418

孙诒让 16,32,38,39, 287,396—399

孙奕 154

T

tan

谭长 64

tang

唐兰 89,110,124, 187, 261,262

唐玄度 176, 179

唐玄宗 179

唐作藩

tao

陶方琦 57, 115

陶宗仪 205

teng

滕霄 130

tian

天然秀 206

田穗苴 118

W

wang

汪绂 341

汪中 380

王安国 306

王安石 195,196，197

王弼 88

王辟之 196

王斌 87

王勃 401

王充 21，64

王德修 414

王观国 120，185

王国维 18,28，101，102，125,398

王怀祖 101

王骥德 209，210

王荆公 196

王静如 166

王鹣 361

王兰生 356

王 力 79，85，97，167,208,223，245,283,284，307，317

王利器 42

王莽 32，44，46，56，57

王念孙 57,111,113，289,290,291，298,306,307，309,315,317，369，370,373—376，380—383

王仁昫 106,123,124，125

王融 102

王绍兰 420

王圣美 184，365

王维 401

王文璧 201，210,211

王文郁 131

王锡侯 400

王显 313

王逸 42，405

王引之 280，289，291，373，375，380，381，384，386，399，400，403，416，418，419
王应麟 92，142
王有光 411
王与秘 197
王育 397
王筠 285，387，388—391，398
王微 235，242，246，252
王子韶 186
王子野 40

wei

威廉·汤姆逊 3
韦曜(韦昭) 78
韦应物 411
卫宏 64
魏襄王 21
魏校 264
魏彦渊 121，122

wen

温首座

wu

吾邱衍 262
吴才老 168，175，256
吴昌莹 419，420
吴大澂 395，399
吴梅 211
吴一斋 276
吴元满 264，265，266
吴棫 167，168，170，171，172，174，296，297，298，322
吴玉搢 376，404
吴曾 120
吴稚晖 139
吴宗济 145，352
武玄之 148

X

xi

希麟 188

xia

夏承焘 205
夏侯 59
夏侯咏 125

夏纪堂 406

夏竦 137，186

夏昧堂 406

夏燮 318

夏炘 299，312，314

xiang

项安世 173

项远村 215，362

项子京 121

xiao

萧该 121，122

xie

谢灵运 87，89，150，421

谢朓 102

谢幼槃 411

解惠全 414

xin

辛德源 121，122

xing

行均 194

邢昺 120

xiong

熊士伯 158

熊忠 202

xu

徐蒧 172，256，266

徐光启 200

徐坚 179

徐锴 103，181，182，213，262，322

徐邈 117

徐乾学 296

徐孝 219，200，227

徐铉 181，182，331，386，387

徐彦 120

许昂霄 170

许冲 63

许德宝 215

许古 131

许浑 401

许慎 34，35，37—40，42，43，60—71，77，79，81，87，94，103，113，123，181，183，184，197，261，263，285，314，387，

388，391，396

许叔重　69，72，181，313

许遯　234

许印林　392

xuan

玄应　188，387

玄奘　188

xue

薛道衡　121，122

薛凤生　166

薛尚功　186

薛孝通　122

薛综　78

xun

荀子　4，6，7，10—15，73，75

Y

yan

严君平　44，46

严可均　299，305，307，314，387，395

阎若璩　289

颜师古　120，176，409，418

颜元孙　176，180

颜真卿　177，181

颜之推　94，95，108，121，122，123，132，133，137，176，261

yang

阳休之　110，125

扬雄　1，18，41，43—57，63—66，112，274，368，408

杨子　410

杨朝英　207

杨承庆　178

杨传第　294

杨东莼　40

杨桓　264

杨倞　15，35

杨墨林　329

杨耐思　202，204，211

杨泉　186

杨慎　175，184，187，

253,254,270,
274,297, 298
杨升庵 205, 406
杨上勋 120
杨守敬 116
杨树达 416
杨倓 157
杨选杞 252
杨用修 256

yao

姚鼐 92, 304
姚文田 299,307,311,
317

ye

野王 116
叶秉敬 224
叶大庆 120

yi

伊斯特林 36

yin

阴时夫 320,365, 400
阴中夫 320
殷孟伦 55, 104, 147
尹斌庸 251
尹文 5
尹文子 4, 12, 13

ying

应劭 1,42,51,80,
92, 95

yu

于晓 40
余长祚 270
余集 346
俞敏 89,148,150,
156
俞樾 287,373,380,
384,385,407,
419, 420
俞正燮 91, 93
虞集 205, 206
庾子山 411

yuan

元庭坚 191
袁晋卿 104
袁仁林 280,413, 414
袁文 120,172, 377
袁子让 138,158, 223

yue

乐韶凤 208
岳元声 274

yun

芸叟 196

Z

zang

臧琳 403

臧镛堂 403

zeng

曾茶山 276

曾广源 373

曾朴 77

zhai

翟灏 411

zhan

詹剑峰 15

zhang

张丙炎 420

张伯松 57

张敞 57，59

张成孙 313

张汉 211

张惠言 299，311，313

张洎 411

张戬 191

张介宾 412

张琨 104，137

张谅 103

张林 64

张麟之 146，147，149，150，157

张清常 414

张曲江 415

张参 107，114，176，177

张世禄 139，166，362

张世南 184，185，186，196

张守节 92，120，284

张舜徽 42

张廷玉 402

张卫东 245，249

张问达 235

张相 410，411

张揖 18，25，87，111，112

张有 176，180，181

张玉书 356，399，400

张元善 219，278

张永言 250

张震泽 60，78

张之洞 392
张自烈 269
章炳麟 283
章太炎 83,92,419
长孙讷言 124

zhao

赵诚 107
赵凡夫 264
赵高 39
赵古则 234，263
赵㧑谦 258,263,264
赵灵均 265
赵明诚 186
赵岐 18，42，47
赵善达 211
赵坦 403
赵宧(yí)光 199,258,264,
265，266
赵翼 103
赵荫棠 144,158,167,
204，223,364

zhen

真空 144
甄思伯 100，101

zheng

郑康成 78,80，368,
郑樵 92,142,146,
152,153,183,
184，263
郑庠 174,176,296,
297，299,315
郑玄 18,21,42,60,
62，77，95，
117,123,279
郑渔仲 184
郑珍 187
郑振铎 280
郑志鸿 411
郑众 62

zhi

智广 146

zhong

钟鸣仁 250
钟子期 100
仲弓 117
仲尼 12，17

zhou

周昂 362，363
周斌武 384
周伯琦 258，262

周德清 199—209,361
周公 17, 18
周国光 198
周密 410
周少霞 363
周舍 99
周一良 166
周颙 96,98,99,102
周有光 350
周云之 15
周中孚 403
周祖谟 57, 83, 85, 104,122,127, 158, 161,167
籀 39, 69

zhu

朱翱 183
朱骏声 62,260,264, 290,299,309, 314,315,387, 391,392,393, 407,413
朱谋玮 270
朱权 210
朱熹 19,120,235, 292,298
朱彝尊 201
朱异 99
朱元璋 208
朱筠 290,387, 403
珠帘秀 206
祝泌 143, 158

zhuang

庄君平 46
庄子 4, 15, 281

zhuo

卓从之 207, 208

zi

子夏 17, 18, 118
子游 118

zou

邹汉勋 106,107,318, 420

zuo

左少兴 40
左氏 65
左思 134
佐佐木猛 215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
目录
正文